

###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編機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

① 漢文部分 TK1-TK20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

# 俄藏黑水城文獻①

編者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 社會 科學 院 民 族 研 究 所中國 社會 科學 院 民 族 研 究 所中國 社會 科學院 民 族 研 究 所

即

製

上

海

古

籍

印

刷

廠

ISBN 7-5325-2036-6 /Z·293 開本787×1092mm 1/8 印張 44.25 插頁 99

# 俄藏黑水城文獻①

編者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版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開本787×1092mm 1/8 印張 44.25 插頁 99 開本787×1092mm 1/8 印張 44.25 插頁 99

ISBN 7-5325-2036-6 /Z · 293

印

上

海

古

籍

印

刷

廠

##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Филиале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1

Коллекции части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ТК1-ТК20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Академи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Китая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Шанхай 1996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①
Составител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АОН Китая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Издатель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Китай Шанхай ул. Жуйцзиньэр 272
Почтовый индекс 200020

Печать Шанхайская типография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Институт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ей АОН Китая Шанхай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ревняя книга"

Формат 787×1092mm 1/8 Печатный лист 44.25 Вкладка 99 Первое издание XII.1996г. Первая печать XII.1996г.

Перепечатка воспрещается ISBN 7-5325-2036-6 /Z · 293

##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St.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Manuscripts
TK1-TK20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96

####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Volume ①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72 Ruijin Second Road, Shanghai 200020, China)

Print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rinting Factory

©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8 mo  $787 \times 1092$ mm 44.25 printed sheets 99 insets First Edition: December 1996 First Printing: December 1996 ISBN 7-5325-2036-6 /Z  $\cdot$  293

蔣維崧

俄方

孟列夫

魏同賢

E.N.克恰諾夫

主 俄 藏 編 黑水城文獻

魏同賢(中)史金波(中)

E.N.克恰諾夫(俄)

編輯委員會(按姓氏筆畫爲序)

中 方

毒李字白史鴻偉國童演音國章濱波

####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Главные редакторы Е.И.Кычанов Ши Цзинь-бо Вэй Тун-сянь

Редколлегия(Фамилии по алфавиту)

Е.И.Кычанов
Л.Н.Меньшиков
Бай Бинь
Вэй Тун-сянь
Ли Вэй-го
Ли Го-чжан
Не Хун-инь
Ши Цзинь-бо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Цзян Вэй-сун

####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Editors -in -Chief Shi Jinbo (on Chinese part) Wei Tongxian (on Chinese part) E.I. Kychanov (on Russian part)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Project Committee (in alphabetical order)

In China
Bai Bin
Li Guozhang
Li Weiguo
Nie Hongyin
Shi Jinbo
Wei Tongxian

In Russia E.I. Kychanov L.N. Menshikov

Executive Editor Jiang Weisong 瓜①

Ĵ

####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хранящиеся в России ①

,\*\*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этого тома Ли Вэй-го Заместитель главного редактора этого тома Бай Бинь

####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Volume ①

Editor-in-Chief for this Volume
Li Weiguo
Deputy Editor-in-Chief for this Volume
Bai Bin

Editor-in-Charge
Jiang Weisong
Cover Designer
Yan Keqin
Photographer
Yan Keqin

# 俄藏黑水城文獻總目録

前 言 E.M. 克恰諾夫

言 史金波

前

言 李偉國

前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黑水城文獻

漢文部分

西夏文世俗部分

西夏文佛教部分

1

#### Contents

Preface E. I. Kychanov

Preface Shi Jinbo

Preface Li Weiguo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Manuscripts

Tangut Secular Manuscripts

Tangut Buddhist Manuscripts

前言

E.M. 克恰諾夫

彼得堡所藏罕見的西夏文獻的發現, 成績應當屬于職業地理學家兼旅行家彼• 庫・ 科兹洛夫

# ( 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 1863.10.15-1935.9.26 )

隊。 普爾熱瓦爾斯基中亞探險隊。1887年,科兹洛夫在聖彼得堡軍事學校畢業,並被授予軍官銜。此後他參 年那是偏重數學和自然科學的中學)畢業,而在 1883—1885 年,還很年輕的科兹洛夫就參加了第四 夫此後的生活道路。後來科兹洛夫回憶道:「我永遠,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我大膽而坦誠地 下去。 加 (指普爾熱瓦爾斯基 (Н.М.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在這裏買了一座别墅。1882 年,科兹洛夫與普爾熱瓦爾斯基相遇, 了 這使他得到日後被委托獨立進行探險的鍛煉。他的第一次獨立探險是在 1899—1901 年實現的 科兹洛夫出生在斯摩稜斯克省杜霍夫申小镇一個牲畜販賣者的家庭。 1888 年别夫錯(М.В.Певцов)探險隊和 1893—1895 年羅博羅夫斯基(В.И.Роборовский) 」①在普爾熱瓦爾斯基的提攜下,科兹洛夫得以繼續自己的學業,並在斯摩稜斯克專科學校(當 市一家啤 酒 廠當 -作者注)談了話,這一天決定了我整個一生的前程, 辦事員。恰巧一位當時就已出 名的旅行家 和地 他 在當地學校畢業後, 理學家普 從此我便沿着這條路程走 爾 決定了科兹洛 熱 瓦 爾 就 探險 斯 同 在 他 屆 基 斯

埃爾海 座廢城。 似乎最先是旅行家兼民俗蒐集者波塔寧(『.H.IIorahhh)從土爾扈特蒙古人那裏得知黑水河口 他曾在 1884—1885 年度旅行報告中寫道: 哈拉一 布留克(Эрхэ-хара-бурюк),意指黑水極東部支流岸邊的黑城;他們說,那裏還可見到 他們 指土爾扈特人— 作者注) 説有 一座古城叫 有

曾派 僅 無水 對 不大的 一廢墟 没 有 遣 情 告訴 他 城垣, L ② 1900 年, 況 的 秘 他這 同伴卡贊科夫(A.H.Kasankob)前去尋找此城廢墟, 即 而 不宣 小 座 故 城 城 牆 地質學家奧布魯切夫(B.A.Oбручев)曾試圖 4 所 , 在 四 周 而且 有許多沙埋房屋遺迹。 還把他引嚮了與黑城完全相反的 挖開 黄沙就能 都没有 找到 方嚮 找到 銀器 找到 這座沙埋 3 , 當 9 小 年科 原因還是一 城 小 兹洛 城。 四 周 當 則 夫身在蒙古 樣: 地 爲 流 的 當 蒙古 沙 地 , 附 居 也 民 近

古人搞好關 在 準備 係。 前 往蒙古 後來他寫道: 一四川 考察時, ٦ 我內心 科兹洛夫決定再去尋找。 抱着 個極美好的 幻想·· 他考慮到前人所 在蒙古沙漠找到這座 犯的錯誤 廢 城 決定同 當 地

懷着 你 先 是一次那樣平 夫出發前又得到 沙皇尼古拉二 例 П.П.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ьский)和科兹洛夫積極參與下制定的。1907 蒙古 次 激 請 動 水爲 的 因 心 爲裝備 四 凡 這次探險祝福! 情 世的召見, Ш 離開 沙皇和皇位繼承人阿列克塞第二次召見 而 探險 探 又親切的召見(當時 險隊 沙皇的。 隊的 他在《蒙古 還 行動計 有 當我最後對陛下説:『 』沙皇回答道:『 很 多事要做 劃是由 四 , 帝俄地 |I|我把剛出版的三卷本西藏探險學術著作呈送給了 , 旅行日記》 要花很多時 理學會在著 我且不同你告别 西藏探險進行得很成功, 留下了這樣一段話:「 間 0 名 地理學家兼旅 L 6 在你前去長途旅行出發之前 果然在 年 6 1907 行 請允許 我受到了 月 17 家謝苗諾 年 10 日, 我依照西 月 光榮的召見 29 夫 沙 科兹洛 皇 H 天 「藏 探險 夫 山 科 我 兹洛 還見 我 得 斯 的 是 基 到

十四 人, 這次探險計劃 ⑦配以武器: 是 10 步槍十二支,子彈一 月2 日由沙皇批准的 萬五千發,施密特 0 探險爲期 兩 年 維松左輪手槍六支, 由 國庫 撥款三萬盧 布 子彈六百發 0 探險 隊 ·負規定 8 爲

持證 經蘭 子 境 由 優 州 其 待 人 授予探險隊領導 爲 隨 府及庫倫返回 我帝俄地理學會所遣科學探險隊隊長。該隊將取道恰克圖經庫倫前 從十 特頒此 人陪 照以資 同 俄 人官憑文書如 國。 故 證 希沿 明 隊長爲擲彈兵團統帥亞歷 , 途 並 所經 加 下: 蓋 地 方軍 國 上 璽。 政 帝保佑: 當局 外 交部 查驗 朕全俄皇 山大三世近衛軍中 副 放行 部長,1907 帝、 務令科兹洛夫及其隨從十員 專制 年8 校 君主尼古拉二世 月 彼· 12 往中國西北 庫· H 于 科兹洛 聖 彼 和蒙古 得 (暢通 夫, 仰 堡 全 遵 一體 出 聖 阻 然後途 知 俄 占日 膮 國 並

## 簽字、印鑑」⑨

俄

國 政府和 沙皇本人之重視探險並支持 地 理學會 的 創 議 多係此 類 探險結果獲得歐洲學術界贊賞之

僅 能 是在 力 學 此 故 很 一就 被 和 19 可 敦 歐 自 從 用于軍 美和 能毁 煌 然科學 而大大提高了 世 和黑 紀 而 事 H 末 本對 水 自 不存的東西 至 城的 的 植 20 中國 物 世 清朝 發掘和保存 俄國學 紀 施 動 初 物學等 政 加 因此哪怕是部分地得救,並得以保存到現在 府對 政治 術界的 英、 此 而言, 德 領域 經 無疑作出 國際威望。 濟壓 法 都 此對研 取得了令人矚 力的背景下進行的 俄 了一 究中國文化史乃至中國學 但不能 瑞典 定讓步。 不公正 目的 H 但 本等國 指 是, 成 , 探險所 出 果 衆多探險隊 在 , 這些 對中華帝 俄國參與此 得 術 當地地 探險時 國邊 顯然都 形 在 間 項 已 疆 國 地 測量及情況報告 一從事 際性 過 理 是最寶貴 學 將 學術 此 近 百 民 類 的 年 科 活 族 - 學探 動 貢 的 今天 尤 獻 亦 爲 那 可 史

行 川 京 使 探 的 險一 館曾將探險隊的 0 我 想特 探險隊 事 曾 别 寫 成員 強 道: 調此 進 情況通知探險必經之路上的中國地方當局  $\neg$ 行 類探險 我們是通過俄國駐博格多汗 調查都 I. 作 曾獲中 是曾得到中國 國中央政 府允許並簽發護照。 清 :朝) 的外交使館從北京政府得到護照的 中央政 權機構的 (1) 科兹洛夫就 同意 並 1907 - 1909在 地 方當局 0  $ldsymbol{oxed}$ 10 年蒙古 監 俄國 督之下 四 北 進

邊境 前 進 專 因 員根. 此 探險隊行裝均專僱蒙民駱駝運送。」 在 克 前 往 (П.Е.Генк) 庫倫( 烏蘭巴托) 及時與中國派駐蒙古的管理 的蒙古領土上, 12 所租駱駝計四十峰 探險隊行進途中 當局 接治 都曾乘用蒙古 , 探險隊全體 的 人員得 驛 馬 以乘坐蒙古驛馬 0 多 虧 恰 克

信 知 (Tyňayň)經由拉卜楞至松潘廳的計劃 13 謹 探 險隊並 地 通 理學會檔案中現存一 知 如 非 下, 在 中國境內任 本人 爲 俄國 意行動。 份「 [旅行 致甘 家中校科兹洛夫 例如 0 肅省外事 」母信的日期是1908 西寧辦事 局」 的信中寫道: 大臣就曾及時 確 曾 與 年 11 西 寧欽差 月 22 ٦ 得到有關科兹洛夫探險隊到 兹接外 H 及通 事 判 局 談 1908 判 有關 年 11 我 月 等 15 從 來 H 的 來 通

和 協 助, 至于黑水城 當時他 的 們管理着委付他們管理的領土 發現和進行 ?發掘 , 那 也 ]得到爲清廷服務的蒙古王 , 那是清帝國版圖內 經由 爺巴登札薩克 理藩院特殊管轄的蒙古 和 土 爾扈特 貝勒 的 允許

間 Ŧ 日 爺巴登 便 而 問 A 扎薩 又可 年 ယ 您爲 少花精 克駐 月 初 什 一錫 力 麽 地 探險隊抵達草場天然地界烏果勒 和 消 定要走 當談話涉 耗 額 節 省開 濟 及有關探險隊下 納 河 支 0 ᆫ 而 Ŧ 不 爺 徑 又 往 阿 補充説 步路 津 拉 善 綫 托洛果 衙門? 時, ٦ 王爺得知科兹洛夫很想 直 看 ( Уголцзин-тологой ) 來你 通 阿 們 拉 對 善善 的 額 濟 道 納 路 河 好 很 走 取 感興 道額 即 還 趣 當地蒙古 可 濟納 吧 少 花 河

納 見 密 槍 他 也 東 片 我 和 刻 回 的 西。 被 您是怎麽 不 没有他的協助, 兩位 沙 答巴登 會 槍 慢 掩 15) Улусун-туши-гуна 1 巫 |顧問 你們 埋 慢慢 談 撓 扎 知 地 了 話 請 都「 就去看看吧, 道 你 説 薩克説 的 和 的? 們 結果就是這樣。1908 竭 留 他 7 發 科兹洛夫同他的先行者 [聲機 力使我相信, 們 原 • 掘 説 我回答説 來是這樣! 7 的 是 土 説不定你們自己也會找到什 還有那 的 爾扈特人常去那座 -的 您説 土 信 封請 在我要去的方嚮是没有路的 我 爾 件 是從 的 聽手下 年3 扈 , 俄國駐北京使團 對 特  $\neg$ 我們的 , 月 人 此 那 人講 樣, 舉將 12 直 廢墟採掘埋 裏有 到 旅 H , 是不可 使 最 黑 行家寫 科兹洛夫在給地理 \_\_\_ 他 座 水 近 麼好東西。我看土 轉請清廷 從博格多 他 古城 還 能找到 一藏 們 的 在 書上 的 廢 去過 對 0 城墟 財 黑 黑水城 汗 L 加 和 寶 , , 水 16 封 朝 我朋 確 很 , 學會 和 巴登扎薩克爲「 廷所 湿 但是禮品 有 有 的 通 友 意思 聽説好像 爾扈特人不會 往 得 秘 座 的 刚 7薪俸 書 四 信 0 的 拉 件 幫了大忙。 周 L 信中 于是 增 善 有 有 中 人 牆 得 加 衙 烏 在 的 知 我 寫 門 阻 魯 道 那 的 的 城 倍 擋你們 的 首先是左 孫 市 對 裏找到 0 道 起 話 L 路 圖 初 不 王 17) 去廢 人 加 Ī 過什 由 施 過 爺 問 一輪手 以 此 已 沉 道 墟 保 古 和 可 诼 思

近 貝 如 勒 後 來科 在與哥 在 前 並許諾全力協助…… 兹洛 往黑水城 薩克布 夫 在 公開 的途中, 里亞特農民巴德馬沙 講 演 送到黑水城廢墟。 第二位提供幫助者便是土爾扈特王爺, 中所説 他「 波夫談話 給了探 L 19 險隊很大的幫助 後,「 土 爾扈特貝勒是直屬理藩院 交待 自己 的…… 即土 才有可能找到 爾扈 嚮 導 特貝 把 的 探 勒 黑水城。 險 20 達 隊 希 帶 到 Даши 18 ± 他 的 領 扈 , 地 正 附 特

就開 于此 床 黑水 石 的 Н.Я.Напалков 目 是土 始 0 的 1908 方嚮 整 遇 乾 在 地 到 的 涸 高 夯 年 高 河 我 農耕和定居文化 進發。 低 建築, 們 道 的 臺 月 的 地 河 的 岸 巴塔「 特  $\overline{\phantom{a}}$ 上 激 兩 别是 側 上 情 • H 引 城堡 矗 越 , 從 沿 薩克伊 立 是 曾多次 探 前 着 的 西 途可見寶塔 高 險 北 顯 呵 痕迹 漲 隊 萬諾夫和馬塔耶 然是農 爾泰 到 角 0 五 我們 矗 過黑水故城 名 立 浩特 着 耕 \_ 有磨盤、 成 在 居 ಯ 員: 兩座 民的文化谷地 組輪轂狀塔羣 俄 (Алтан-Хото) 里 L 0 科 或五 夫, 水渠標志 (1 兹 21) 俄里 座 洛 在嚮導巴塔的陪同下,從托羅昂策(Topoй-onu)) 由 夫、 , 探險隊營地到黑水約 散落 約 0 城堡 陶器、 是 最 2.5 切 在 由 後 爾 華 廢 通嚮沙 諾 里 墟 瓷器碎片等等。 黑水城終于 座主塔 夫 (A.A. Чернов) 0 作 傅 埋黑水的古道 者注 説 和 建 守 有60-衛 在 出 處 黑水 城 現 越過 但 牆 了 65 是 外 城 9 里, 越 此 的 9 面 接近 最 條 騎 城 的 納 位 兵 乾 使 小 帕 走 我們 塔 于 就 朝 涸 爾 思 到 的 由 曾 科 幕 組 駐 半 大粒 古 感 興 途 夫 想 成 河

的

趣

嚮

對 固 城 正 的 面 城 方 整 城市過去的 的 0 牆 在 形, 越 城牆高 個 東城 都 迷 接近古 人人的 邊長約 有幾座 E 達6-8 中 外 街道。 城 |稜堡…… 貌呈現 稍偏北 1 9 所 俄里。 米, 見器 在 城西北有雄偉的 在 在 眼 過去建築物的殘址被流沙 西城 東西 碎片 前 0 城城 E 就 L 牆各 中 越多 22根據科兹洛夫的 -則稍 有城門, 0 佛塔羣 城 偏 南 市 的 0 外有 論解廓 起自城門 牆基厚 描 垃圾和泥 凸出 被堆 述 4 - 6高 的 有兩條平行的 城牆是「 的 土所 沙丘 米 形護城 , 遮擋 堆 逐 東西南 漸嚮 壓 , 以 住 主要街道 , 稍 Ŀ 7 防止直 高于 收 北 0 我們 E 縮 嚮 地 人城 東西嚮 , 座 爬 高 面 處厚 門 落 上 臺 這 穿過全城 0 9 城 顯然表明 度 此 地 市 (減半・ 護 城 構 便 成 見 兩 黑 兩 曾 各 堅 個 水 相

險隊 成 員 在 首次 探察此 城 時 便 找 到 許 多陶 瓷器 碎 片 生 鐵 及熟 鐵 銅 • 銀 器 碎 片 瓦 片 , 錢

幣

紙幣,

偶

爾還有祭祀用

是

23)

附 作嚴 兹洛 遺 址 近 在 格 夫本人 探險隊 城 記記 市 録 在 在日記中寫道: 南城東半部, 25 黑水城從 1908 雖則 科兹洛夫在 B 塔在城中央東南部 他 年4 和 城 他的手下人「 月 市平 Н 日 面圖 逗 留留 上 到 標 挖呀 13 出了 H 塔在城中央西  $\vdash$ 刨呀, 號 探 • 察和 2 打碎呀, 號 發掘基本上未按考古學要求進行 南 4 角 號 折 遺 廟宇的 址 斷 呀 在 北 遺址位于西部城牆 都幹 城 南 北 了 中 軸 203對 綫 偏 發掘品 東 南 E ယ 如 未 科

根 據各種 追 述 發現物品計 有

在 在 co 號 號 遺 遺 址 址 有「 有「 畫 波斯文名著《七智者》 在 麻布上 前 小 佛 像 L 故 事 ٦ 集殘葉」 粗 糙 的 金 屬 小 伊 碗 和 斯蘭教經寫本和藝術裝幀品 西夏文字手抄本殘

中 國絹畫 在 像」 塔 ١  $\neg$ 有 個美麗的帶笑容的 三本西夏文書本和三十本西夏文簿册, 大型 面具和許多頭像 面 張麻布畫像『 具し ` 個灰色頭髮的 阿彌陀佛顯靈 佛 頭 L 張

在 W 塔 有 ٦ 幾隻泥塑像脱落下來的透明眼球」 ٦ 幾隻磨製精細的水晶或茶晶 眼 球 ` ر ٦ 個

平面 型 的 大擦 擦 L 26

等 大 有 我們 收 在總結第一 獲: 所 搜集到的考古材料, 有 書 次于黑水城逗留 籍 信 函 紙 張 爲數達 10 的 情況時 金屬 錢 幣 個俄擔箱 科兹洛夫指出 婦 女飾 (1 物 俄擔合16公斤 某些家用器 ٦ 探險隊在黑水城廢墟度過幾天 具 和 H 作者注 常 用 具 殘 , 件 準 備運 和 佛 總 交俄 事 的 用 國 説 밂 等 來 地

堡 理 學會 並 通 報 27 7 有關發現黑水城及在該地發掘的情況, 我們 利用了土 爾扈特貝勒對探險隊的友好態度, 還附送了文字和聖像樣品 立即通 過蒙古郵 以便盡 驛分批經 快研 庫倫 究 和 運 作 往 出 彼

定

年 12 此歷· 他 或成果。 的 紀存在的 他辨認了 回 在探險第三階段將「 信信。 1908 史古城…… 月 23 西夏國 我寄到 據認此地乃是11 他在日記中寫道:「格利戈利耶 年 H 12 寫給倫敦皇家地理學會秘書的一件信稿爲證。 月 被得堡的文字文獻材料, 弄到更多的 都 …… 閣下收到此信時, 科兹洛夫在草地邊界歸都 比 以前花費更長時間在黑水故城再次發掘。 -14 世紀的西夏國都, 貴重文物, 以補充業已部分地運抵彼得堡的 我將已在前 據此趕忙爲我祝賀, 夫以地理學會副會長的身份通 收 到了 看來地理學會對此次發現非常滿意, 地 往蒙古南部 理學會副 科兹洛夫在信中通報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說 説我所發現的黑水城乃是11 會長 的 現已收到俄國地理學會副會長來信 途中, 格 知 利戈 發掘物 再過 我 利 兩 0 耶夫 ( A.B.Г ригорьев 個 談到我 L 29日記所 月 左右即 並 在黑水城的 決定要我 世紀到 述還有 1908 可 抵 達 重返 我 工作 世

夏 其中便有關于西夏歷史的大量中國史材料俄譯文。由此完全可以 流 西夏文文獻中, 國 都 國 放 **沁地**。 乃 我對 都。 是 我的 早在 此城毁于中國明朝與蒙古人 1374 年之戰, 寧夏城即今銀川 祖國同行們懷着深深的敬意,但我至今還不明白, 1833 我們從西夏原始史料了解到, 年 , 比 市 丘林 ( Н.Я.Бичурин, 0 遺憾的是,這種誤解繼續存在于與科兹洛夫的名字有聯繫的 黑水城不僅不是西夏首都, 即 蒙古人曾想恢復他們已經失去了的中國統治權 雅金夫神甫 是誰 看出 ( о. Иакинф ) 和爲什麽說科兹洛夫「 , 在科兹洛夫當 而且是個三等城市 的巨 時 著就已 文獻 人 找 們 認 是罪 到 中。 伊 問 爲 了 鳳 32) 西 世 閣 夏 西

嚮

往

的

西夏廢

墟

30)

從廢城 А.И.Иванов ) 所 年 出寫本 10 月 15 和科特維奇( 除漢文外 H 在 地 理學會專門 還有 B.JI.KOTBHY ) 三人作了 種 用某一 組織的座談會 未知語言書寫 上 有關初步研究黑水城出土物的報告。 , . 的抄本 聽取奧登堡 至少是誰也 (С.Ф.Ольденбург 不懂這種語言 報告說 管文 到

四 川 利戈利耶 而 應返回 戈壁沙漠繼續調查研究黑水古城深部 夫通 知科兹洛夫 , ٦ 鑒于完整發掘的 , 重 要不惜 一要性 人力 地理學會授權我嚮你提 物 力和時間 從事 進 出 建 步發掘 議 不要深 人 字樣品是已經知

道

的

L

33

作 城 中 堡 寫 0 道: 在 35) 距 6 年 離西 月 我 OT E 4 月 城 H 在 底 城門 寫 G 月 晨 和 初 西 10 時間是五 北角的佛塔不遠處架起了我們的帳篷 時, 科兹洛夫執行 透過塵霧, 一點鐘 已感天氣炎熱, 地 我們終于看見了熟悉的黑水城灰牆, 理學 會的 要求 不禁想到 , 回 到了 L 在淒涼 36 黑 水 城 地 死 區 寂 的黑 半 OT 小時後 月 水城 27 我 H 我們 們 將 他 即 在 如 進 何 H 記 I

係 即 土 從 城 地 牆 在 事 理 ,沙漠 較 學會 他 運 距 没 仍 離 近 水 有土 的 黑 秘 然是額 探 水城 運 險 書 爾扈特貝勒的 糧 的 棟 , 等 信中 濟 衹 大屋 12 納河的 0 有當地土 俄里處 特别 因 遺 [此這 址 頭 協助 提到這 的 流過 座 近旁 爾扈特貝勒對我們持友好態度才能進行, 死城又暫且 , 0 種協助: 要對此城進行大規模探查是不可 0 此次 他 L 答應協助 37) , 他 我們的營地没有像上次那樣設在城堡中 一復活 ٦ 在書 在 僱 , 炎熱的季節相當長期地耽在中亞這一 中 用挖土的 還同額濟納的 寫道: I 我們 人 住 0 重 我們 民建立了聯繫。 能 新 的 開 還僱 他使我們有 始了 科 用 兹 同 土 洛 土 爾扈特 夫 爾扈 央, 最靠 在 至今不爲 可能在其屬 1909 特 而是 近 人 每 的 貝 勒 年 設 天從額 額 的 人 在 濟 7 距 納 下 知 愉 月 僱 離 濟 快 河 的  $\infty$ 納 的 西 東 I 角 H 爲 累 城 支 挖 落 致

黑 水 城「了解俄國人在廢墟生活如 土 爾扈特貝 勒 本人 作爲地 方政 何 權 L 的 0 代 39 表 9 對 探險隊的 I 作 也 並 未 不 加 注 意 他經常 派 遣 下 || || || || 官 前

來

我

們

運送河

水

和

Щ

羊

0

L

38)

哥 中 官 子 也 文 薩 ·央高 衙 找 0 克 不到金屬 L 于 布里亞 沿 紙 大建築直 I 北 幣 可 作 以 特 的 西 飾物了。 説, 容 帶 開 通 ` 器 領 始 我們上次探 東門 南 三方 舊兵器等。 站 科兹洛 ٦ 0 組 城 在 中 在城牆上 成 牆 黑水城幾條街道範 央高 布 夫在 查黑水城至少從外 既 置 大建築處有縱横街道通過 還找到 在城 祈 面 日記中這樣寫道 禱場 可 以 發掘 所 看出 個 和 金 佛 圍內系統 也 屬 塔· 這座城市曾是多麽美麗, 表部分是相當正規的 在城外遠 小 . 佛 ٦ 地 像 從 東 南 第 調查房屋廢 0 近各處踏勘 發現 角 ∟ \_\_ 40 天 則是馬廐 起 工作是分 本 , 城城, 我們 , 用 現在 和 金粉 有 就 守 布局又多麽合宜。 兩組進行 41) 時 再也找不到 找到了文字資料(大多是 衛部隊 寫成 也在 華美 我 的 們 • 的 指定: 僱 銅 主 金 來的 一要的 元 字 西 的 藏 蒙古 串 北 地 街 文 方 道 地 珠 品 小 挖 經 了 人 由 過 是 册 漢

市 平. 面 圖 據 上 H 記 我 判 視想這 斷 可 科兹洛夫 能是因爲科兹洛夫衹認得藏文却 本人 並未 Ē 一規參 加 發掘 , 不能 因 此 辨别漢字 甚 至連 和 很 有 西夏字 意義 0 的 在 發 現 他 看 物 來 也 不 那都 曾 登 是 記 在 中 城

深

井

另

組

由

俄

羅斯

人

,

內

L

國貨」。

會 服 中 本 方…… 越大了 國 和 的 鞋子 出 但 多斯托耶夫斯 月 間 土物, 我不懂寫的是什麼 , 9 我 問 日 彼 L 也 有價 43 特 出 涼 爾 去發掘 現已 風 基 我們 值的藏文文獻是被火燒毁了的, 有 ( А.А.Достоевский ) 將 時帶雨的 就 近四 會 0 聽 更使我感興趣的是藏文寫本和書本 知 到工人們 [點, 道。 季節過去了 工人們 」 继先前 的 説話 來 到 他認爲這裏没有墓葬,6 聲 我處 天氣已經炎熱 和 鍋 從保存完好的字母符號看 頭 我同 刨 地 他 聲 。 6 們談了 很 月 難坐 不過暫 12 話 月11 在 , 日 帳 現在他 且 9 篷 科 H 湿 他 没 裏-----兹洛夫寫了 這可 又補 們 有發現。 出 經常 去工 能來自 充説: 發現 一作了 今天又 封 西藏 信給 的 没 0 有 以 得 是 發現 漢 趣 地 外 到 越 文 理 的 批 衣 寫 地 來

安德列・安德列耶維奇閣下ー

墟上 我們 則 話 的 上 晚 畫 臺 古 都 地 你 9 題總離 一駐紮 附 L 物 來我 當作廢 熱浪揚起的塵 炎熱炙 月 作過氣象觀 着 , 0 這 22 我們 不開 往 在粘土上 人會 次 物扔 我 H 發現 I 黑 們 我們又收集到許 6 一具叮 使 水 掉 離 我 測 開 沙令人窒息 城 的 月 們難 座很 當作 這 後 要想取得是不可 東 ,  $\omega$ 西 裏 H , 晚上談 我們就 有 響 以忍受。 年 意思的小廟 依然原封未動。 , 塵 0 的是過去的 多文字 來,還没有 作者注 但是一早一 主 趕緊睡覺, 飛揚 就在陰涼處空氣也要烤 能 材料 的 在 , , X 任 , 空氣中。 探 晚 同 早晨天剛亮就 天找 不僅我的 口處有幾尊彩繪泥 不過是阿 何人到 險隊已 上次一 我們倒還輕松自在, 到了 過去的 此光顧 抵達 樣, 什 拉 伙伴, 伯 麽 黑 文材 這一次探險隊一 到攝氏 37 醒 水城 遺址 周 早上談的是要去找什麼 就是當地土著也都對 7 像 料 趁天氣比較涼爽工作 我們又得到許多像以前 , 看來還同 和錢幣, , 在 牆上還 度多, 自感還可繼續在黑水城工作 其 歷 史性 我們 湿 到 有好看的壁 地 有祭祀 面被太陽烤灼竟達 城牆之內令人感興 走時 黑水城就顯得復 一發掘 用 樣保 時 白 很 畫 品 運 交地 等 天 間 感 0 我們 興 過得 遺 持 0 趣 理 憾 原 在 一學會 很 活 休息 的 城 狀 60 趣 北 我 是 快 7 度 上 們 那 的 壁 處 以 否 每 樣 次 的

[城 能 得 是由 牆 由 手 約 于白天 于年深日 那 米 在 很 廢 可 能 墟 久 位于乾河床 發掘 科學界就不會像現在這樣擁有這些 也 可 所 能是獵人探寶所致 得 不 右岸的大佛塔。 豐 , 不 如 所 望, 此塔高約 ᆫ 科兹洛 這就是説 一畫像 夫便派 10 米 雕 以 人 塑品 包 前當 前 括 往 城 地居民 書籍等特藏了 基 郊調 座 查 也似曾嘗 中 , 腰 最後決定 和 半塌 試 打 開 打 的 開 錐 佛 頂 座

距

頂

塌

如

可

西

明 在 小 確 H 混 于不懂 伙 八件們 邊分 幅 此塔藏有衆多佛像 的 本 起 取 , 很古老的曼陀羅。 H 月 有 語言 類 走 0 出 記 以 12 的 致今 去 的 中 L 裝訂 是僅 ④發掘佛塔 準 有 H 備 這種按開本大小或者按某種我們尚不知曉的標志而進行的「 Ħ 他 所 開 包 僅 記 尚 們 始 有的 装 無法 勘 載 發 半。 和 0 查 掘佛 的 套裝, 可 理 同 了 漢文材料。 工作進行 法年 塔的上部已完全清出 幾 清。 以設想, 塔 今天我信步 座 9 有的分册, 發掘的那 位 那 科兹洛夫本人没 于城 是 了九 塔頂已毁, 將近早晨九點送到營地好多文物, 座 走到 西 天,6 座 預計 200 有 佛塔 塔 的 俄丈 有 前 月 成 壓倒 大量 有經常注 20 日結束。 卷 樣 四周擺 (1 去看 了佛像 西 , 俄丈合 2.134 夏文 這座塔裏也有各種書籍 所剩 46) 着 意佛塔發掘。 泥木坐佛像, 和 , 古物是否還多 書籍是用大帆布包裝運到營 或者這此 漢文書 米 籍 一佛像原 于是我立即前 的 關于塔內 中央放着書籍 佛塔 譯者 分類」 結果 先就同 0 注 簿册  $\neg$ 布 發現我 , 我 )處大塔之一 置 続過 在相當程度上 書 去, 狀 和 卷 籍 況 的 文卷 地 本 蒙古 伙 邊除 手卷 進 和 僅 計 行 畫 I 們 在 書有 分 像 去 人 和 説 産 類 勘 嚮 灰 畫 月 大本 生 還 我 得 像 塵 查 15 由 有 表 扔 IE 的

堆 傳 得 在 堆 量 堆 雜 放 亂 其 得 在 亂 西夏 打開 遍世 中 浴着 極其 無章 地 七 如 的 文字 板 界 果 了 人 糟 有 雜 我 塑像也 上 的時候, 的 寫 座 們 亂 底 , 比 層 有二千多本 著名的佛塔 時 本在做 本本緊疊 才稍 是這樣 較 在寶庫 而説放 一 下 真 法 有 正的 秩 事 的 得井然有序 6 祇在塔底 在 序 月 底層才見出有些 , , 世界聲譽也降臨科兹洛夫。 ·, 「 裏面裝滿了寶 那些寫 12 47) 起 H 在《蒙古、 這座著名佛塔中搜集到 和 有的 才見有些書本是用綱布細心包好的 本數 0 0 後來當 月 壓 以 15 三條 在 物。 百 安多和黑水故城 理: 計 H 另用木軸卷 發現「 剛 的 堆 疊 部分泥 H 揭開 我 着 記 在中亞 , 0 他在自己的回憶録中甚至又稱 就 着 塑像擺在同 的 L 上層, 的 所  $\neg$ 可 畫 獨立工作得到 越往上 有寶物: 發 \_ 像上 現 就發現成 書中, 隨 走 , 書籍 高 着 無論書 , 科兹洛夫又強調 塔裏 度 發 百成千綢 珍 掘 佛像 寶」 可或 的 的 面 書像 朝 東 進 布封 的消 展 西 內 塑 都 就 部 道塔 放 皮 息 科 越 像及其他 9 得 就 説 的 兹 亂 中 像喇 洛 書 如 很零亂 整整整 上 秩 他 書 夫 序 嘛 本 時 籍零 物 層 朝 齊 極 人 而 切 齊 亂 着 好 所 説 包 大 都 地 圍 地 扔

,

L

米 月 即 H H 12 設 的 想 平 H 記中寫道 方 説 米左右 亂 七 八 糟或說井然 是儲藏室, 佛像放 在 它的 有 塔內墊高 序都是 四 周 的 真 坐着 育 地 板 介的 Ŀ L 0 泥 塔 在平 的 木 佛 底層( 臺 像 面 0 的 佛 科兹洛夫説是「 四 像前 周 擺 平 放 ·臺中 書 籍 央有 地 以供 面 根 誦 , 立 讀 面 柱 積 約 49 他 ယ X 在 塔 6

彩鮮 底 碰 裏 H 栩 四 的 便 艷 日 周 栩 掉 如 牆 記又寫道 上 顔色…… 令人驚嘆不 生…… 一掛着 從 神像 . 面 Ė 我邊寫邊欣賞這些 部 0 塑 0 可 用 像 以 的 科兹洛夫的話說: 看 出 尺 碼 則 雕塑家對 與真人一 佛像優美的頭 古典美有很  $\neg$ 般大小 全都泛着柔和的 部 0 據科兹洛夫説 心高的 , 其中 修養 有些頭像 淡藍色和粉紅色的 50 9 這 塔裏取 製作 是一 得 件 出 如 此 的 極 光彩 神 藝 好 像 術 的 藝 形象 不術 瞧 L 着 但 品 是 生動 站 6 稍 <u>\frac{\frac{1}{1}}{1}} \frac{1}{1}</u> 月 在 微 19 色 那

夕 是原來就 但 文字文獻的主要部分, , 這些 可 以 東 設想 放 在塔 西便從城 在塔的 內的 裏 上層 们的廟· 從科兹洛夫的 顯然是出自「著名的佛塔」 宇或可 書籍 和 能 畫 記録看來, 還從管理 像 塑像等 部 盡 門 可 管打 運 能 藏到塔 是 開 亂 的是 放 中 兩 的 0 座 如 0 佛塔 顯然是 此 大 量 , 在 盡管在城區都 的 佛 1226教文獻 年春季蒙古人 及其他 發現文字文獻 文獻 攻 未必 人前

,

子) 邊 分 我們 發現了 H 量 即 所 一藏 將 , 做 又被他 人 内 看 留 然後填了沙 12 月 到: 相 的 下 南城牆 公斤以 19 當齊整 報告的 的 座 埋 壁 寶 H 在 龕 今天把送到 物從這間 F 的 沙裏。 但 速記記録 中 科兹洛夫在 東西 以備日 在 0 我們 1926作者注) 關于所埋的 , 屋子( 主要是塑像和頭像藝術品 後有機會再來。 營地 在 年科兹洛夫再訪黑水城時 我們發現有下述記載: 此此放 日記 在南 來的 及其他物品, 了一些 裏寫道: 地點, 所 部 城牆 有古物 藝術水平高低不等的佛像。 科兹洛夫的日記裏留下了下列 L 發現之物「 51) 即佛塔 還放了許多小物品 看來, 作者注)運出 ٦ 東西是藏在南部城牆。 發現品 我們 , 本想全部帶走 **53** 也可能運走一部分。 以 作 爲這一 9 了 藏在走下城堡 挑 總數約有五十件左右 選 次什 和 還放 埋 但是不 麽也 記 一藏 九載: 了 在 找不到 從科兹洛夫 1926 運 6 可 些 ٦ 月 到城 座佛 能 在 一頭 11 離 9 像 塔 牆 開黑 L 但 23 的 南 他 總 的 部 南 H 無 水 超這此 重 部 法 來說 的 城之前 30 年 牆 城 運 H 12 一東 多 裏 記 走 俄 的 的 中 還 的 月 西 是 我 磅 盡 屋 旁 部 00

可 是至今没 不過, 有 南城牆 找 到 以 0 中 外埋藏的東西 國考古學家最好在 , 看來是在城牆脚 南城 牆 再事 探查 下, 首 和 發掘 先是那 座 原 來放 在 佛塔最 裏邊 的 華

得堡 他 們 分 臉 上邊我們說過 朝塔 所 收 藏 內 的 經 好像 書 , 在 喇 嘛 發掘佛塔時 在 大頁紙寫 做 法 事 本 0 發現塔底平臺中 他 們 頁 面 頁 前 相 放 疊 着 書 -央有 本 其 形 0 顯 式與印 根木質 然這些書本 度和 <u>V</u> 西 柱 就 藏廣泛 是 周 俄 重 流流 端 國科學 坐 行 者 一着 院 和 樣 東方 尚 靠 研 塔 究 的 所 塑 聖 像 北 牆 彼

學 懷疑 來尺寸 年 發 座 蒙語 研 旁 約 現 0 究所 40 不大 根 副 佛 歲, 據牙齒和 光 取 而臉形 坐姿的 可 明 都 屬于西藏 能 者」 面 得 失踪于 嚮 之義 出 齊 人骨 頭骨骨縫狀況 中 Ē 下 央 列寧格勒 列結論 架 9 呵 用 使人覺得頭骨屬于女性 0 格 利安 科兹洛 于稱 根 則 被圍 呼活 朝 蒙古人種 頭骨 可 夫 南 的 在 以推斷死者年近老齡(五十多歲) 佛 年代 保 H 存完好 記 母這具 或 裏 譯 至少本文作者想再研 類型。 寫 者注 道 , 頭骨 顱 盡管眉弓對女人頭骨 格 底較 帶 9 根葬在北 終于發現了 到了 此 窄 塔原爲紀念他 俄 枕骨 國 牆前 究 端 發育不良 經 而 IE 坐 過 不 位 一者 來說似發育 0 仔 知 , 而 的 所 細 取 建 ⑤頭骨曾保 頭 研 在 牙齒 坐 0 顱 究 式 從 0 過 , 頭 很 此 分 人 在 骨 細 人 類學 存 主 小 可 可 , 要 在 可 以 能 介的 家 能 看 科學院 臉 是 沃 引 骨 大 出 起 位 爾 佛 某 科 像 死 格 民 般 此 夫 臺 者 説 根

1211 這 有 新 后 夏 某些 統統 籍 設 治 流 宗 在 1205 年蒙古人第 孟 年 傳 想, 一資 者 列 在位 (1139-到 料 在 夫( 今天, 孟 她不無參與的 Л.Н.Меньшиков 列夫又作 篡奪政 -1193使 我們 人設 權。 年 應該感謝這位女人 想 出 在位) 一次攻 情 孟 個 況下登上了皇 她當了尼姑, 列夫教授根據葬者可 重大結論: 皇 人西 帝 教授曾提 的 夏領土時 遺 孀 位 被 出 著名的 發配到黑水城, 57) 羅氏皇后 此 一個很浪漫的假設: 純祐 後 能是女性便認 佛 她便被擯斥于國 在其母不無參與的情況下被其堂兄弟安全(1206 塔 裏 在其子純祐執 面 的 死後就葬 起爲: 書 籍 塔裏葬的是西夏皇后羅 是 事 之外 她 在 可 政 的 那座 以 (1194 - 1205)不 私 必 她後來 人藏品 懷疑 著名的 的 她 L 命 佛 年) 兒子 運 塔 氏 黑 不 時 得 被 水 曾 城 此 推 而 56 是 出 知 翻 人 皇 後 是 根 土 0 但 太 的 西 據

況 后 新 而 籍 這 進 定是羅皇后 籍 屬 男性 那 行 是 都 中 孟 就 全 僅 有水平的 可 列 夫的 國 能 可 兩 0 科 流 見 以 不 或 是 設想 假 兹洛 通 别 心説 都是: 她 人 的 夫最 類學鑒 是 的 的 部分 作爲 皇 根 私 帝 人藏 個 據 初 書籍 序 施 定, 很 也 印 贈者 書 跋 同 有見地的 發書籍者) 可 意是 確切認定這具 的 能 而 標 而署名 準 是 屬 是 説 她 出 于 推 的 ·男 測 法 所 自 的 性 分 她 送的 私 是 頭骨 但 的 0 僅 次 私 如果塔 書 散 在 人 此 不屬女性 圖 書 施 而 就 跋 書 中 官 己 像 館館 確 0 民 是 不過要駁倒它, 别 我們 葬 次是 不過要 的 的 皇帝 在 看 個 嚴 書上 得出 格 和 指 女 施 出 説 人 來 主 加 點: 又暫 沃爾 衹 蓋 施 這 書 有 7 羅皇 類 施 找 且 科夫對 書 樣 贈 假 回 印 籍 佛 后 設 對 的 這 此 塔 章 的 存 此 出 名字在 個 是有些懷 有 女 在 土 並 很 無 人 的 多記 就 論 西 不 頭 哪 夏 意 疑 是羅皇 骨 味 文 的 載 的 情 重

告别 那 駝 大 科兹洛夫 發現它 有了 的 座著名佛塔提供了多麽巨大的 運出了一個保存完好的 注 信中 拜訪 准 在 發現 噶 探 (1190 險 1926 寫 比 爾 陪 第 良 道 隊 發現了 種 同 即 年的西夏字典 年 12 次前 馬 前 ٦ 將 離 來 在 開 的 月 我 探險隊 一本字典 來考察時更多。 很 是 黑  $\infty$ 圖 日 高 他 水 興能 的 的 書館, 即將上 城之前 ^ 掌 公衆講演速記 繼承人 9 財富 嚮 能幫助 中珠 路 這位蒙古王爺親自道謝 計有二萬四千卷, 當 土 L **58** 我們 天 爾 L 關于從 位十三、 扈 , **5**9 夏 看懂 稿中可 特 作 天的 貝 者注 (勒 ٦ 700 著名的 四 朝 曾 以 歲 卷書。 就高 霞 來 了解:「 漂 在 到 佛塔」 亮可 古 我還記得漢學家伊 東 聲 是他 方 城 如果再 喊 十七 愛的 剛 叫 廢 中 又一 剛 墟 : 發現 男 年前曾從黑水 加 9 映 , 次爲 孩, 上 537 彼得 紅 隨 和 時 即 運 我們提供了 還有· 科兹洛 , 出 土 帽 鳳閣興高采烈的 庫 兹米 的 全體 畫 爾 夫就 城 物 扈 品品 奇 廢 屬 特 寫信 墟 大 考 官 貝 察 勒 那 運 概 在 深黑 麽就 您 他 就來 給 出 數 的 樣 四 量 水 們 地 會 子 + 城 到 都 理 騎 學 明 書 我 的 這 駝 着 白 他 們 裏 會 館裏 幫 作 駱 高 從 助

閣 城 我 佛 個 發現一本字典, 奥登堡説 1909 教祭祀用品 人傾嚮于存放 年秋 及書籍 全部黑 黑 在 使得有可 水城出土物運抵彼得堡 科 學院 水城 展覽。1910 亞洲博物館 能解讀饒有興趣的西夏文字…… 材料現暫放地理學會頂 年末, 想您也有同感 考慮 存放 到 探 在 層 險所 地 的 理學會。1910 空房內 得 對嗎? 獨 問題是黑 0 無二的 L 伊 鳳閣 年 水城材料將存何 文物安排 初 和 科特維奇 在 地 , 理學會舉辦 科兹洛 Ī 在 處尚未得 進 夫從莫斯 行 了 整 到 理 次 科 寫信 黑 伊 決 鳳 水

院 東方研究所 果 然 事 聖彼 情 最 公得堡 後就這樣做 分 所 前 身 7 0 0 全部書籍和文字文獻 圃 畫 像、 雕塑品 和物質文化遺存, 都轉交給科學院 起初是交給俄 亞 洲 博 物 館 國 博 即 物館 現 在 民 的 族 俄 學 或 部 科 學

後

來轉給了國家艾爾米塔什博物

館

發 閣 中 海 編 現 戰争年代 了 7 就曾提 亞 洲 西 部 博 夏詳解 分類字典 未能 到 物 收録三千 館 面世 的 詞 1, 西夏 典 個 · 1935 《音同 没有書名) 西夏文聲類(唇音 文文獻最 西夏文字 年2 ` 初是 的 月 ° 詞 文海 9 61) . 典( 由 H 伊 所 , 指的 西 鳳 和其他分類字典 伊 齒音、 夏 閣 鳳 就是《音同 閣 教 授 漢 致 舌尖音) 從 函 俄詞 事 卯 整 列 典? 克謝耶夫( 理 字典, 歸 伊 類 鳳 文海》 , 0 閣 無詳解。 除字 交給科學院 在 В.М.Алексеев ) 1918 和 典 ^ 2 ^ 雜字》 年發表 番漢 漢 出 合時 文《 版 等字 社 的 出 廣 掌 ^ .典, 西 版 韻 : 中 夏 ٦ 珠 1918 型字 遺憾 但 文 入獻 外 因 的 年 典 處 V 他 是 伊 在 ^ 文 文 聶 或 鳳 還

家奧登堡 被 有 歷 逮 收 Щ 捕 稿 不 丢 知 和 失的 道 退 63 我的手稿, 稿 標 0 除 記的手 伊 鳳 從 1919 閣 稿 外 還 在 , 最早從事黑水城文獻整理者還有蒙古學家兼滿學家科特維奇 我處 年到 0 1922∟ 既然詞 年,就放在 典手稿一 科學院 直 在 伊 我 鳳閣手 取 回 此 中 稿時 看 , 來 就決定不再寫什 是 在他于 • 62 1937 以及佛 麽 了 - 夏季

夫專著, 來, 64) 黑 關于西夏文獻的 水城 文獻 的 研 研 究 究, 和 出 則見各年多種出版物 版是漢 文和西夏文分開 65) 進 行 的 0 關于漢文文獻研 究的 歷 史 請 見 孟 列

Н.А.Невский ) А.П.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在 伊 鳳 閣 之 後 戈 , 不 爾 同 巴 時 )、克平 ( K.Б.Кепинг ) 喬 期 娃 從 ( 3.И.Горбачева ) 事 西 夏 文 獻 研 , 究 本文作者現已完成所藏佛教文獻部分叙録 者 克 有 恰 龍 諾 果 夫 夫 捷 А.А.Драгунов 林 季 耶 夫 卡 坦 聶 斯 歷 基 山

的 無二的材 隨 着上海古籍出版社將黑水城文獻付諸出版, 料 的 毫無疑 八問, 這些材料能對中國文化及中國文化在西夏國的存在 中國 和 世界學術界將有可能 利 用 11 以 及對消逝的西夏 至 14 世 紀這 人民 獨

文化給予

新

説

明

望 將給予尊 己 中 這 以 的 國研 種現象在 及從事登記造册、編寫早期目録的俄國科學家, 那些 文化 事 究者 情 在 重 並 就 是這 和 戰 引爲自豪的 許多民族文化遺存的命運中都 , 争、 讀者 E 樣 是他發現和珍重這些實在是獨一 革命和被 有 當然無疑也包括世界學術界。 累 全體中國人, 情 況 包圍年代的艱苦條件下參與保存、 已 簡 述 還有外國的 如 上) 很普遍 , 部 同 0 無二的 都值得受到感謝 我相信中國同行 如今, 行們, 分文化 黑水城材料 遺存 對俄國 本書的 逐步整理和修復這些罕見的寫本 從 旅 中 出 國 行家、 和所有有文化的 版 領 , 並 主 這些文化 將其轉 地理學家兼博物學家科兹洛夫 傳 到 了 交給了 遺 或 中 存 家 界限 或 中 學 人 的 術 之外 界 以 部分送還 和 及熱愛自 刻 我 順 謹 本 便 希

、黄振華 學 術界了 解並 且珍視中國 陳炳應 西夏專家們的著作 羅矛昆等等 他 們是羅福成、 羅 心福甚 王 静 如 史金 波 李 範 文

白濱

、聶鴻音

•

熱心人獻身此一事業。不過 在 就 面 已經做 臨 着 的 要做一 I 作是不少 次更大、 , 但 更難的 研究西夏文化的隊伍 面 前 工作: 要做的 還更多 鑑定數以 0 遺 E 百計的 憾的 在 逐漸擴 一殘片 是没 有 大。 , 經費 但 我們 是目前 把 :看到對西夏文化感興趣者不僅 黑水城 也 還 所 人手不足 出 的 書籍完全修 需 要有年 復 輕 現 有 的

和 中 城材料是對研究遠東地區文化無可估量的寶貴史料 轉爲西夏文的譯著成爲學術界的財富時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國 地方文化 人、日本人和俄國人,還有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瑞典人、荷蘭人。本文作者堅信,當由藏文 相互作用的顯例, 的 工作 人員以高尚的勞動將爲所 是在此基礎上形成文化上新形式而作爲遠東文化部分的顯例 , 藏族文化和藏傳佛教研究者對西夏文獻的興趣也會大增。 有對西夏文化感興趣的 遠東地區文化的中心就是中國文化。 人們開闢一 條通往西夏文化遺存 這是中國文化 可 以堅信 黑水

之路,必將獲得世界科學界應有的高度評價。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于聖彼得堡

陳鵬譯,黄振華校)

注 :

2

頁。

- 1 科兹洛夫《H.M.普爾熱瓦爾斯基 第一位中亞自然研究者》,聖彼得堡,1913年,84 頁
- I.H. 波塔寧《中國的唐古特— 一西藏邊境和中蒙古 波塔寧 1884—1885 年游記》 , 聖彼得堡,1893 年,464
- 3 B.A. 奧布魯切夫《中亞 、中國北部和南山 **\*** 聖彼得堡,1900—1901 年,卷 2,399—400 頁
- ④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彼得格勒,1923 年,100 頁
- ⑤ 同上,第3頁。
- 6 《1907—1909 年蒙古-—四川旅行日 記》, 地理學會檔案, 特藏 18, 目録 1,154 號。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9號。

7

- ⑧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00 號
- ⑨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00 號。
- 10 蒙古、安多和黑水城故城》一書草稿,地理學會檔案, 特藏 18, 目録 1,61
- ① 探險報告的速記記録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9號。
- ②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19—20 頁
- 探險報告的速記記録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59

號。

13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49號。
-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 76—77 頁。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46號
- T.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 78 頁

探險報告速記記録稿,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9

號。

-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95 頁。
- 同上,99頁。

20

19

18

17)

16

(15)

14)

同上,102頁。

21)

同上,102-104頁。

22

- E.M. 克恰諾夫《衹有文獻在作證》,莫斯科,1965年,27—28

《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

特藏 18,

目録1,154號。

頁。

- 參見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108 頁。
- 同上,108—109頁。

26

25

24)

23

同上,112頁。

27)

同上。

28

29

30

**II.K.**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

目録 1,156 號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0號。
- 雅金夫神甫《西藏和青海歷史》,聖彼得堡,1833年。
- 參見 J.M.穆爾扎耶夫《在亞州心臟》,莫斯科,1990 年,12 頁。

3,

- 參見 E.M. 克恰諾夫《衹有文獻在作證》, 33 頁
- T.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406 頁
- **II.K.** 科兹洛夫《1907—1909 年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6 號
- 同上。

36

35)

34)

33

32)

(31)

37)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55號。

-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46—547 頁
- 同上,547—548 頁

39

38)

40

- Ⅱ.K. 科兹洛夫《蒙古· —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 Ⅱ.K. 科兹洛夫《蒙古、 安多和黑水故城》,550頁。
- **41**) 特藏 18,目録 1,157

-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

號。

**43** 同上。

42

T.K. 科兹洛夫《蒙古-

- 44)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 目録1,54號
- **45**) II.K. 科兹洛夫《蒙古— 四川旅行日記》 ,地理學會檔案, 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 46) 同上。
- 47)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録1,65號
- 48 Ⅱ.K. 科兹洛夫《蒙古、 安多和黑水故城》,556頁。

**П.K.**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

特藏 18,目録1,

157號。

同上。

**5**0

49

- **5**1) 同上。
- **53** 62 同上。

54)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24 號
- **6**5

Ⅱ.K. 科兹洛夫《蒙古—四川旅行日記》,地理學會檔案,特藏 18,目録 1,157 號

- II.K. 科兹洛夫《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55—556 頁
- JI.H. 緬希科夫(孟列夫)《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 II.K. 科兹洛夫特藏),莫斯科,1984 年,75 頁。
- 同上。

67)

56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 目録1,55 號。

**58** 

**5**9

- 地理學會檔案,特藏18,目錄1,124號。
- 60 俄國科學院檔案,特藏 208,目録 3,274 號。

61)

A.M. 伊鳳閣《西夏文獻》,載《俄國科學院通報》,第6集,1918年,799—800頁。此外,參見伊鳳閣出版

鳳閣附漢譯文。此外,至少還有伊鳳閣用德文發表的兩篇文章。 院通報》,1911 年,831—836 頁;伊鳳閣于 1916 年在彼得格勒還發表了《彌勒上生經》,原文爲西夏文,伊 發掘物》,載《帝國地理學會通報》,第 45 卷,1909 年,463—477 頁;《西夏歷史的一 的著述《黑水城出土文獻 十三世紀的漢文私信》,載《帝國科學院通報》,1913年;《科兹洛夫的黑水城 頁》,載《帝國科學

- 參見 B.J. 科特維奇《中國元鈔樣式》,載《帝國地理學會通報》,第 45 卷,1909 年,474—477 頁;又見其 對黑水城所出蒙古文獻的介紹,載《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61—565 頁。
- 參見他對波斯文本《七聖賢》的介紹,載《蒙古、安多和黑水故城》,566 頁, 同書有對佛教塑像和畫像的
- JI.H. 緬希科夫(孟列夫)《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

夫《西夏文寫本與刊本》,莫斯科,1963年。

65)

64)

寫。

63

62

H.A. 聶歷山《 西夏語文學 研究與詞匯》(兩册),莫斯科,1960年。 3. M. 戈爾巴喬娃和 E.M. 克恰諾

#### Введение

Честь открытия уникальной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й коллекции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Си Ся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му географу и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у Петру Кузьмичу Козлову (15- X - 1863 — 26-IX-1935 г.).

П.К. Козлов родился в небольшом городке Духовщина Смолен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семье перегонщика скота на продажу.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местной школы он работал конторщиком на пивоваренном заводе г. Слобода. Случилось так, что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городке приобрел себе дачу знаменитый уже тогда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и географ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В 1882 г. произошла встреча П. К. Козлова с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м, определившая весь последующий жизненный путь П. К. Козлова.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вспоминал: "Тот день ..., когда я сам смело и искренне заговорил с ним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м — Е.К.) я никогда, никогда не забуду, ... тот день решил всю мою будущность, и я стал жить этой будущностью". При покровительстве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П. К. Козлов продолжил св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закончил Смоленское реальное училище (среднюю школу с уклоном в математику 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тех лет), а в 1883 — 1885 гг. совсем молодым человеком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четверт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ого в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Азию. В 1887 г.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канчивает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енное училище и получает офицерское звание. Последеующее участие П. К. Козлова в экспедициях М. В. Певцова (1888 г.) и В.И. Роборовского (1893 — 1895 гг.) подготовили его к тому, что ему были доверены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ервую из них он осуществил в 1899 — 1901 гг.

Кажется, впервые о заброшенном городе в устье реки Эдзин-гол (кит. Хэйшуй) узнал от монголов-торгоутов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и собиратель фольклора Г. Н. Потанин. В своем

отчете о поездке 1884 — 1885 гг. Г. Н. Потанин писал: "Из памятников древности (торгоуты — Е. К.) упоминают город Эрхэ-хара-бурюк, т.е. от самого восточного рукава Едзина; тут, говорят, виден небольшой кэрим, т. е. стены небольшого города, но вокруг много следов домов, которые засыпаны песком. Разрывая песок, находят серебряные вещи. В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кэрима большие сыпучие пески, а воды близко нет". В 1900 г. город в песках пытался найти геолог В. А. Обручев. Местные монголы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указали ему,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но и отправили ег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в другую от местонахожд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сторону. В том же году, П. К. Козлов, находившийся в Монголии, отправил на поиски развалин города своего спутника А. Н. Казанкова, тот тоже города не нашел. Причина была та же : сведения о развалинах скрывало мест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Собираясь в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 К. Козлов решил повторить поиски и учесть ошибки своих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поладить с местными монголами. "В тайниках души, — писал он позднее, — я лелеял заветные мысли найти в пустыне Монголии развалины города". ⑤

Проект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 разработан Советом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ри активном участии известного географа и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а П. П. Семенова-Тяньшаньского, и лично П. К. Козловым. 17 июня 1907 г.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лучил аудиенцию у царя Николая II. В "Дневнике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 1909 гг." сохранилась следующая запись: "Принятый в частной аудиенции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я подарил Государю три тома научных результатов Тибет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огда только что вышедших из печати), как никогда просто и ласково, я ушел от Государя очарованный. На мои последние слова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у): "По примеру Тибет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окончившейся столь благополучно, позвольте просить благословения и на этот раз!" — Государь заметил: "Я не прощаюсь. Я хочу вас видеть перед самым отъездом в ваше долг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едь еще предстоит масса хлопот и времени на снаряж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29 октября 1907 г. перед отъездом в экспедицию П. К. Козлов был принят царем и наследником-цесаревичем Алексеем вторично.

Проект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 утвержден царем 2 октября. На экспедицию сроком на два года из казны было выделено 30 тыс. рублей, ее состав утвержден в 14 чел.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выдано оружие — 12 винтовок с 15 тыс. патронов и 6 револьверов Смит-Вессон с 600 патронов.  $^{\textcircled{8}}$ 

Руководителю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выдано официальное удостоверение, текст которого гласил: "Божьей милостью, Мы, Николай Второй, император и самодержец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и прочая, и прочая, объявляем через сие всем и каждому, кому ведать надлежит, что по-

датель сего Начальник отправляемой Нашим Русски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обществом через Кяхту и Ургу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й Китай и Монголию и имеющий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затем через Ланьчжоуфу и Ургу обратно в Россию научн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Гренадер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Александра III полка 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 отправляется заграницу и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затем обратно в Россию. Его сопровождают десять человек прислуги. Того ради дружелюбно просим все высокия Области и приглашаем каждого, кому сие предъявится, Нашим же Воинским и Гражданским управлениям всемилостивейше повелеваем П. К. Козлова и 10 человек прислуги не только свободно без задержания везде пропускать, но и всякое благоволение и воспоможение ему оказывать. В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того и для свободного проезду дан сей паспорт с приложением Наше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ечати. В С-Петербурге Августа 12 дня 1907 года по Указу Его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Товарищ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Печать Подпись", 9

Внима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и и лично царя к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ддержками начинаний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 многом объясняется тем резонансом, который имели достижения эти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в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научном мире. Северные и западные области Китая не обследовавшиеся на месте китайскими научными силами на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для 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европейском научном уровне, привлекали внимание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ученых.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многочисленных научных экспедиций последней четверти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в. — английских, немецких, французских, русских, шведских, японских и т. д., были получены впечатляющие достиже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географи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истор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ботаники, зоологии и т.п.). Русское участие в это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м научном движении было весомым и весьма поднял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престиж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ауки. Было бы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 не принимать во внимание то, что такое научное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окраин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на фоне европе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о-японског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давления на Китай, что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съемки местности экспедициями, их отчеты о состоянии дел на местах могли быть использованы и в военных целях. Разрешая эти экспедиции, Цин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безусловно шло на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уступки. Но сейчас,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через сто лет, как так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имели мест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открытие и сохранение для науки только Дуньхуана и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алось ценнейшим вкладом в изучение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для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уки. Было хотя бы частично спасено и сохранено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то, что имело большую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погибнуть безвозвратно.

Хочется особ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они работали с ведома китайских (цинских) цен-

тральных властей и под контролем местных. Члены экспедиций получали разрешение на проведен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паспорта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йские паспорта, — писал П. К. Козлов о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907—1909 гг., — были получены от Пек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через посред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миссии при Богдо-хане".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Пекине "поставило в известность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е мест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власти, где должна была проходить экспедиция". 

Поставило в известность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е мест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власти, где должна была проходить экспедиция".

Так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Монголии до Урги(Улан-Батор) экспедиция передвигалась, пользуясь почтовой (уртонной) монгольской службой. "Благодаря кяхтинскому пограничному комиссару ... П. Е. Генке,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 снесшимся с китай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им управлением, персонал экспедиции хорошо проследовал н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почтовых лошадях ...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багажа экспедиции, везомого на верблюдах, специально нанятых экспедицией у монголов подрядчиков". <sup>(2)</sup> Нанято было 40 верблюдов.

Экспедиция не передвигалась по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произвольно. Так амбань г. Синин был заблаговременно уведомлен о прибытии экспедиции П. К. Козлова. В Архив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хранится черновик письма П. К. Козлова властям пров. Ганьсу, озаглавленный "В комиссию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Ганьсуйской провинции". В тексте письма говорится: "Вследствие письма Ком(итет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от 15 ноября 1908 г. сим позвольте уведомить, что я рус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 подполковник Козлов,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имел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Сининским ценцаем, так равно и с Гуйдуйским тунпанем о своем плане пути от Гуйдуй через Лабран в Сунпаньтин". Письмо датировано 22-XI-1908 г.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ледует подчеркнуть, что все передвиж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П. К. Козлова производилось с полного ведома цинских властей и никакого самоуправства не допускалось.

Что же касается обнаруж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и раскопок в Хара-Хото, то все это тоже было сделано с ведома и с помощью состоявших на цинской службе монгольско княз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и торгоутского бэйлэ, кокоторые управляли вверенной им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как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находившейся под особым управлением в составе империи Цин через Лифаньюань.

В начале марта 1908 г. экспедиция прибыла в урочище Уголцзин-тологой, ставку местного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княз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Когда разговор зашел о возможном дальнейшем маршрут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и князь узнал, что Козлов хотел бы попасть в устье реки Эдзин-гол, он спросил: "Почему вам во что бы то ни стало желательно идти именно на Эдзин-гол, а не прямо в Алаша-ямунь, куда и дорога хорошая и времени потребуется мень-

ше, а потому меньше трудов и лишений и меньше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издержек. Вероятно, — добавляет князь, — на Эдзин-голе у вас предвидится какой-нибудь большой интерес?" "Да! — ответил я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у, — вы правы: там имеются очень любопытные развалины старинного города!" --- "А вы откуда это знаете?" --- вопрошает мой собеседник. — "Из книг наших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и из писем моих друзей," отвечаю я. — "Вон оно что, — глубокомысленно протянул князь... — Хара-Хото от моих людей, они бывали там,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уществует город, обнесенный стенами, но он постепенно засыпается песком... Говорили мне, что там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бывают торгоуты и копают и ищут скрытых богатств. Слышаля, что будто бы кое-кто и находил кое-что. Вот пойдете, увидит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что-либо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е и сами найдете. Мне кажется, Торгоуты не стан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вашей дороге на развалины, как не будут препятствовать и самим раскпокам. ... Торгоуты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тщательно скрывают Хара-Хото и старинный путь в Алаша-ямунь". Это был итог бесед. А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и князь и два его советника, как писал П. К. Козлов 12 марта 1908 г. в письме секретарю ГО, "старались убедить меня, что в желательном мной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нет дорог". Помогли подарк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револьвер и ружье, угощение и слушание грамофона, и письмо в Российское посольство в Пекине с просьбой обратиться к цинским властям о присвоении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у более высокого чина "улусун-туши-гуна", что должно было в три раза увеличить размер получаемого им от богдо-ханского двора содержания". 7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без помощи Балдын-цзасака П. К. Козлов, как и его предщественники, мог и не найти Хара-Хото.

Вторым его помощником на пути к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ался князь торгоутов, торгоутбэйле Даши. Как отмечал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в публичной лекции, Даши "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й мере оказал содейств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да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найти Хара-Хото". После разговора с казаком-бурятом Бадмажаповым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поручил своему ... проводнику доставить экспедицию в соседство его ставки ..., и пообещал полное содействие ... по достижению развалин Хара-Хото".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подчинялс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Лифаньюань.

1 апреля 1908 г. пять членов экспедиции —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А. А. Чернов, Н. Я. Напалков, казаки Иванов и Мадаев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проводника Бата выехали к развалинам Хара-Хото из урочища Торой-онцэ. Бата "много раз бывал в мертвом городе". До Хара-Хото от лагер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ыло примерно 60 — 65 ли. "С половины пути уже начали попадаться следы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ой или оседлой культуры — жернова, признаки оросительных канав, черепки глиняной и фарфоровой посуды и проч. Но нас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зани-

мали глинобитные постройки, в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убурганы,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по одному, по два, по пяти вдоль дороги, исстари проходящей к Хара-Хото, этому памятнику прошлого, засыпаемому песком пустыни. По мере приближения к заветной цели, волнение наше все увеличивалось, все росло. За три версты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8 ли — Е. К.) мы пересекли древнее сухое русло..., на возвышенном береге реки стояли развалины цитадели Алтан-Хото, где, по преданию,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когда-то кавалерийский отряд-стража Хара-Хото. По сторонам высохшего русла раньше залегали, по-видимому, культурные долины с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им населением. Вот, наконец, показался и сам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на низкой террасе из грубозернистых песчаников. Над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ым углом крепости возвышался главный щпицеобразный субурган, из ряда меньших, соседних, устроенных также на стене и рядом со стеною вне крепости. По мере приближения к городу черепков посуды стало попадаться все больше, вид на город заслонился высокими песчаными буграми. Но вот мы поднялись на террасу и нашим глазам представился Хара-Хого во всей внешней прелести". Осудя по описаниям П. К. Козлова,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были строго ориентированы на север, юг, восток и запад, образуя правильный квадрат, каждая из сторон составляла около версты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2.5 ли — Е.К.). В запад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стенах города имелись ворота, защишенные Г-образным выступом, затруднявшим прямой подступ к ним, и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е не прямо одни против других, а восточные - несколько к северу, а западные - несколько к югу от центра стены. С запада на восток город пересекали две главнуе параллельные улицы, начинавшиеся от ворот. ... Мощные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высотой до 6 — 8 метров, в 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м его углу были увенчаны величественными субурганами. Стены постепенно сужались к вершине, и толщина их, достигавшая у основания 4 — 6 метров, уменьшалась вполовину ... Каждая стена имела по нескольку бастионов. ... Небольшие возвышения из песка, мусора и земли — остатки прежних строений — довольн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али бывшие улицы города". 2

При первом обследовании города члены экспедиции находили черепки глиняной и фарфоровой посуды, обломки чугунных, железных, медных, серебряных изделий, черепицы, монеты, бумажные деньги, "изредка и предметы культ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находилась в Хара-Хото с 1 по 13 апреля 1908 г.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и раскопки в принципе были лишены научн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основы. Как пис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он и его люди "копали, рыли, ломали, рушили". Не было строгой фиксации находок, хотя на плане города П. К. Козлов обозначил Развалины №1, №2, №4 в северной половине города, несколько восточнее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оси север-юг, Развалины №3 в южной части восточной половины города, субурган В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части

города и субурган А в его юго-западном углу, развалины кумирен близ южной половины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ы. Судя по разным упоминаниям, было найдено:

Развалины №1 — "буддийский образок, писанный на полотне", "тяжелые грубые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е чашечки и обрывки рукописей письма Си Ся".

Развалины №3 — "листки персидских рукописей, … отрывок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борника рассказов "Семи мудрецов" ("Китаб-и-Синдбид"), "мусульман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плет".

Субурган А — 3 книги и 30 тетрадей письма Си Ся, "образ на полотне" "Явление Амидабхи", "образ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ипа на шелку", "большая слегка улыбающаяся красивая маска и ряд других головок и масок", "голова Будды, позолоченная с темносиними волосами".

Субурган В — "несколько экземпляров стекловидных глаз, выпавших из глиняных статуй", "глаз из горного хрусталя или топаза, красиво отшлифованный", "большие плоские паца".  $^{20}$ 

Подводя итог первому пребыванию в Хара-Хо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отмечал: "В течение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проведенных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Хара-Хото, в общем итоге экспедиция обогатилась всевозможными предметами: книгами, письменами, бумагами,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ми денежными знаками, женскими украшениями, кое-чем из домащней утвари и обихода, образцами буддийского культа и проч. Переведя в количе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мы собрал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наполнивший десять посылочных пудовых ящиков (1 пуд — 16 кг — Е. К.), приготовленных затем к отправлению в Рус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ользуясь хорошим дружелюбным отношением к экспедиции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я тотчас же отправил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очтой в Ургу и далее в Петербург в нескольких параллельных пакетах известие о фактическом открытии Хара-Хото, находках в нем и приложил образцы письма и иконописи для скорейшего изучения и определения".

В декабре 1908 г., находясь в урочище Гуйдуй,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лучил ответ от заместителя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а.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пис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 в качестве помощник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извещал меня ... о моих работах, или результатах их в Хара-Хото. Оказывается это тангутская столица Си Ся,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ая с II по XIV век. Этим открытием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видимо, очень довольно и решается предложить мне на обратном пути завернуть вновь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город, ... поподнить его высокого интереса материалы, которые уже добыты и частью прибыли в Петербург". Дневниковая запись дублируется черновиком письма от 23-III-1908 г. секретарю Королев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Лондоне. П. К. Козлов

извещал Британское Королевское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что третий этап его экспедиции будет посвящен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м, более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ым, нежели прежде, раскопкам в мертвом городе Хара-Хото. Пока что мною получено письмо от помощника (замесдидель)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На основании знакомства с письменами и другими документами, отправленными мною в Петербург, он спешит порадовать меня, что открытый мною Хара-Хото есть Си Ся, столиц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его с II по XIV век. ... Когда Вы,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получите это письмо, Ваш покорный слуга будет на пути к Юж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и еще месяца через два уже и на своих любимых развалинах Си Ся".

При всем глубоком уважении к мои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м коллегам я до сих пор не могу понять, кто и почему решил, ч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нашел" столиц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 Ся. Еще в 1833 г. был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большая монография Н. Я. Бичурина (о. Иакинфа)<sup>®</sup>, в которой содержались обширны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 Ся, переведенные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и из них был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очевидно, что столицей Си Ся являлся для времени П. К. Козлова г. Нинся, современный г. Иньчуань. К сожалению, это заблуждение продолжает бытовать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вязанной с именем П. К. Козлова. Из тангутских первоисточников мы знаем, что Идзина (Хара-Хото, кит. Хэйчэн) не только не являлся столицей Си Ся, но был третьеразрядным городом, местом ссылки каторжан. Он погиб в 1374 г. в ходе войн Минского Китая с монголами, надеявшимися возвратить утерянную над Китаем власть.

15 октября 1908 г. на специальном заседан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были заслушаны три доклада —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а, А. И. Иванова и В. Л. Котвича о первых обследованиях находок из Хара-Хото. Было доложено, что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из развалин рукописи, помим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писаны на языке неведомом, по 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прочесть их никто не умеет, хотя образцы письма и известны". <sup>33</sup>

А. В. Григорьев известил П. К. Козлова, что "ввиду важности совершенного открытия, Совет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уполномочил меня предложить вам не углубляться в Сычуань, а вместо этого возвратиться в пустынь Гоби и продолжить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недр мертвого города. Не жалейте ни сил, ни времени, ни средств на дальнейшие раскопки". <sup>39</sup>

В конце мая — июне 1909 г. П. К. Козлов, выполняя вол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озвратился в район Хара-Хото. 27 мая он делает запись в дневнике: "Пишу ..., время пять часов, но жара дает себя сильно чувствовать и невольно наводит на размышление, как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в мертвом, унылом Хара-Хото". <sup>35</sup> 4 июня. "В десять час. утра мы через пыльную мглу увидели, наконец, знакомые серые стены Хара-Хото, а еще через по-

лчаса уже вошли внутрь крепости и недалеко от западных ворот и углового C-3 субургана расположили наши шатры".<sup>®</sup>

Широкомасштабное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города было бы невозможно без помощи торгоутского бэйлэ. В письме Секретар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от 8 июля 1909 г. П. К. Козлов особо отмечает эту помощь: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 долгий путь в жаркое время года экспедиция могла провести в пустыне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времени неизвестном уголку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благодаря лишь отличному отношению к нам местного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который да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реди его подчиненных нанять землекопов, водовозов, поставщиков продовольствия и проч.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временно ожил и установил связь с обитателями Эдзин-гола, ближайший из рукавов которого, восточный, протекает в двенадцати верстах от Хара-Хото. На этот раз наш лагерь приютился не в центре крепости, как прежде, а несколько ближе к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е подле руин большой фанцза". В книге он писал: "Я возобновил прияте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с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попрежнему главном на Эдзин-голе, ... заручился его содействием по найму рабочих-землекопов, а также подрядил тогоутов ежедневно доставлять нам с Эдзин-гола воду и баранов".

В свою очередь,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как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местной власти не оставлял без внимания работу экспедиции, он постоянно присылал в Хара-Хото чиновников из свое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чтобы "знать, как поживают на развалинах русские".

О начале работы П. К. Козлов записал в своем дневнике: "С первого дня стали находить письмена,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китайские, ассигнации, посуду, старые орудия и проч. Попался и маленький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й бурхан, докшит, найдена великолепного золотого письма маленькая квадратная тибетская книжечка".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рошлый раз наружно, покрайней мере, мы обследовали Хара-Хото довольно порядочно. Теперь уже не находим ни чох, ни бус, ни металлических украшений. Стоя на стене Хара-Хото, видишь, как красиво и удобно был расположен этот город. В С-3 районе: сам князь, вдоль северной, западной и южной стен расположились молитвенные постройки, субурганы. ... В Ю-В углу конюшни с гарнизонной частью. ... Главная проезжая улица проходила прямо от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высокого здания, которое огибалось поперечной улицей и вновь продольной до восточных ворот". Работа была организована двумя группами-нанятые рабочие-монголы под руководством казака-бурята "систематически исследовали развалины фанз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немногих улиц Хара-Хото, а иногда пытались рыть глубокие колодцы в указанных мною местах". Русская группа вела раскопки как внутри города, так и "производя изыскания вне хара-хотоских стен, в близком и далеком расстояниях".

Судя по его дневнику, П. К. Козлов сам регулярно не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л а находки, даже

интересные, никак не фиксировались на плане города. Думается, ч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представлял себе, как выглядит тибетское письмо, а иероглифику китайскую и тангутскую, кажется, не особенно различал. Для него все это была "китайщина".

9 июня. "Сейчас около четырех часов явлись ко мне рабочие, я поговорил с ними, и вот они уже идут на занятия. Интерес еще более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иду и я на раскопки. Трудно сидеть в юрте, когда слышишь голоса работающих и стук лопат о землю. ... Попадаются из рукописей чаще других китайские, не знаю, что они скажут нам. Более всего меня интересуют тибетские, как рукописи, так и книги, но ... на них нам пока не везет. Вот и сегодня китайщина попалась в целости, интересные же тибетские письмена оказались сожженными, уцелевшие знаки наводят на мысль об ином, нежели тибетск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 Узнаем в Питере". 11 июня к прежнему замечанию об отсутствии захронений, П. К. Козлов добавляет: "не попадается и одежд, обуви". Прохладная, ветряная, даже с дождем по началу погода, сменяется жарой. 12 июня П. К. Козлов пишет письмо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А. А. Достоевскому.

"Милостивый государь 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Двадцать второго мая (3 июня — Е. К.) экспедиция прибыла в Хара-Хото и расположилась бивуаком внутри е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тен, на интересных развалинах. В наше годичное отсутствие из древнего города в него никто не заглядывал: его развалины выглядели в том же положении, в каком мы их оставили. Нетронутыми оказались и те предметы,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нами из под обломков мусора, которые мы оставили как ненужные. Как и в первое пребывание, так и теперь, с приходом экспедиции Хара-Хото ожил: задвигались люди, застучали инструменты, по сухому воздуху полетела пыль. За истекшую неделю нам удалось пополнить прежние, уже отправленные 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сборы. И в этот раз мы добыли и продолжаем добывать и письмена,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и арабские, и денежные знаки, и предметы культа и прочее. На одном из выступов северной части крепостной стены мы натолкнулись на интересный храмик с глиняными выкрашенными бурханами против входа и любопытными на стене картинами, к сожалению, картины приклеены к глине 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ими 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ся возможным. Не только мои спутники, но даже и туземцы прониклись интересом к раскопкам. Мы только и говорим о Хара-Хото: вечером о том, что найдено в течение истекшего дня, утром, что предстоит найти. Время бежит быстро. После вечернего метеор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наблюдения, которое производится в 9 часов, мы быстро засыпаем. Просыпаемся чуть не с зарею и в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й прохладе ведем свои работы. Днем отдыхаем, а то и пуще томимся от изнурительного жара, так как в тени воздух нагревается до 37 с лишком, а земнея поверхность накаляется

солнцем свыше 60 С. Пыль или песок, поднимаемые горячим воздухом, положительно изнуряют. Но зато по утрам и вечерам мы дышим летко и свободно, чувствуя себя еще способными продолжать дальнейшие работы в Хара-Хото". 49

Поскольку за дни работы в развалинах города находки не были столь обильными, как бы это желалось, П. К. Козлов направил людей на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окрестностей и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вскрыть большой субурган, который находился примерно в 400 м от западной стены города, на правом берегу сухого русла реки. Субурган был высотой около 10 м и состоял "из пьедестала, середины и конического полуразрушенного верха, попорченного то ли временем, то ли охотниками за сокровищами", т. е. попытки вскрыть субурган, видимо, предпринимались и раньше местными жителями. Если бы им это удалось, очень вероятно, что наука лишилась бы той коллекции иконописи, скульптуры и книг, который она располагает сейчас.

12 июня начались раскопки субургана, того самого, в котором, как мы можем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находилось подавляющее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и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Обойдя работавших монголов, я отправился к моим спутникам, которые исследовали один из самых крупных субурганов отстоящих на запад от города в 200-х саженя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казало, что он богат бурхан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ими письменами, которых к 9 ч. утра столько нанесли на бивуак, что я тот час же ушел к ним, сортируя, очищая от излишней пыли и приготовляя к упаковке. Подобно тому, как в субургане прошлогоднем, в этом были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книги, тетради, свитки, иконопись. Папался очень старинный мандал. Надо 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крыша часовни субургана обрушилась и повалила бурханов или же они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были так брошены, куда бросали и книги, и свитки, и иконопись". (45) Работы по раскопке субургана продолжались девять дней и были завершены 20 июня. В огромном брезенте книги сносили к лагерю и там сортировали. Без знания языков эта "сортировка" по форматам или еще каким-то неведомым нам признакам и произвела, в известной мере, тот хаос, с которым покончить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нет сил и до сих пор.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постоянно за раскопками субургана не следил. О состоянии внутреннего убранства субургана есть в дневнике лишь запись от 15 июня. "Сегодня я прогуливался к субургану, посмотреть, много ли осталось в нем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добра, и пришел к заключению, что мои ребята справедливы, заметив, что взята только лишь половина.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тупы всё очищено, кругом сложены, сидя, крупные деревянноглиняные бурханы, а в середине книги, письмена, книги — большие, малые, в переплетах или папках, терадями или свитками". 46

Если мы сравним две дневниковые записи от 12 июня и 15 июня, то обнаружим, что

по мере раскопок Козлов пишет то о беспорядочно "брошенных" книгах, то о книгах, сложенных в известном порядке. Позже, когда известие о знаменитой находке, "перле в моих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ых работах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как писал сам П. К. Козлов, облетела мир и к Козлову пришла подлинно мировая слава, он склонялся в своих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даже к образцовому порядку в субургане: "Открыли знаменитый субурган. Он оказался весь набит сокровищами. Едва сняли его верхушку, как открылись книги, стоящие целыми сотнями на полках в полном порядке в шелковых переплетах. Более 2000 книг нашли". (40) В книге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П. К. Козлов подчеркивает, что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все лежало в беспорядке, а в нижей был какой-то порядок: "Все богатство собрано в знаменитом субургане: книги, образа, статуи и другие предметы ... лежали в крайнем беспорядке. Еще в нижней части хранилища намечалась некоторая система: часть глиняных статуй была размещена на одной высоте, лицами внутрь, наподобие лам, отправляющих богослужение перед большими рукописными листами письма Си Ся, сотнями наложенных один на другой". "Чем выше, тем хаотичнее группировалось богатсво субургана, книги лежали кипами и в одиночку, плотно прижатые друг к дуругу или к образам, свернутыми в отдельности на деревянных валиках. И книги, и образа были сложены в самых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х положениях, как равно и статуи, заключенные между ними. Только в основании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о отмечено несколько книг, тщательно завернутых в шелковые ткани". <sup>(48)</sup>

Пока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истинными являются сведения и о хаосе и о порядке. На дне субургана ("на полу", по выражению П. К. Козлова, площадью примерно 3 × 4 м, т. е. около 12 кв. м), где находилось захоронение, вокруг него "сидели" деревянно-глиняные бурханы, а перед ними "для чтения" были разложены книги — в дневниковой записи от 20 июня сказано, что статуи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возвышенном внутреннем полу субургана, вокруг площадки, в центре которой стоял столб". По стенам ниж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висели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кажется, в натуральную величину человеческого тела, была по признанию П. К. Козлова, превосходн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работы. Запись в дневнике от 19 июня: "Пишу и любуюсь всеми теми изящными головками бурханов.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них так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 исполнены, что стоят и смотрят словно живые. ... По лицам видно, что у художника-скульптура было чутье к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красоте". Извлеченные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иконы поражали живостью и свежестью красок, "все, — по словам П. К. Козлова, — утопало в нежно-голубом и нежно-розовом сиянии". Но стоило тронуть икону ... и краски осыпались.

Мы должны допустить, что в верхней части субургана книги и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вещи могли быть в беспорядке. Очевидно, весной 1226 г. накануне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шествия, в субурган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кое-что из городских храмов и, возможно, городской управы. Вряд ли такое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буддийских, да и иных текстов было положено в субурган изначально. Из записей П. К. Козлова, несмотря на то, что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о вскрыто два, и были находки "письмен"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города, ясно, что основная масса письменны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убургана".

19 июня П. К. Козлов сделал в дневнике следующую запись о находках — "все бы взял, да не имею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Часть того, что он не смог увезти, П. К. Козлов зарыл в песок. О том,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то место, куда все было упрятано впрок, в дневнике сохранились следующие записи: "Перед оставлением Хара-Хото оставшееся богатство наше мы вынесли из этой комнаты (в южной стене города — Е.К.) и спрятали его при спуске от крепости южнее субургана у самой стены, засыпав песком. Делал это я на всякий случай". Видимо, кое-что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и в самой южной стене. В дневниковой записи 11/23 июня читаем: "Сегодня мы отбирали и прятали все, что было принесенно на бивуак, т. е. все-все от субургана, и отнесли в южную (в стене комнату) внутреннюю часть стены, в нишу. Туда сложили несколько бурхано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 исполненных в большей или меньшей степени. Там лежат головы (до 30 с лишним фунтов весом, т. е. 12 кг и более — Е. К.) и проч. Там многие мелочи, в общем до полусотни номеров". Устя, возможно, то что было спрятано в южной стене, П. К. Козлов, хотя бы частично увез во время вторичного посещения Хара-Хото в 1926 г. В стенограмме доклада, который был прочитан П. К. Козловым 8- Ш-1926 г. мы обнаруживаем следующую запись: "Мы думали, что в этот раз ничего не найдем, но в совокупности нашли довольно порядочно, главным образом статуй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головок". 53

Но вещи, зарытые вне южной стены, кажется, у ее подножия, и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та великолепная скульптура,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в глубине субургана, так до сих пор и не найдены. Китайским археологам следовало бы произвести обследование и раскопки у южной стены.

Выше мы уже писали о том, что когда субурган был раскопан, то обнаружилось, что в центре платформы в основании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воткнут деревянный шест, вокруг восседали скульптур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монахов (?) лицами они были обращены внутрь субургана и походили на отправляющих богослужениях лам. Перед ними лежали книги, очевидно, книги-потхи коллекции СПб филиала ИВ РАН — большие листы рукописных книг, наложенные один на другой. Это были книги той формы, которая была широк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а в Индии и Тибете. У северной стены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обнаружен скелет в сидячем положении. В дневнике П. К. Козлова записано: "Открыли, наконец, голову сидящего человека, веро-

ятно, гэгэна, в честь которого и воздвигнут был этот субурган. Череп дает основание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ок(ойный) имел около 40-ка летнего возрастал и принадлежал к типу или племени тибетско-арий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Гэгэн был похоронен в сидячем положении, у сев (ерной) стены, на почетном месте, у подножья бурхана наиважнейшего и по размерам самого большого, лицами бурханы были обращены к центру, гэгэн на юг". Поскольку череп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был привезен в Россию, он был более тщательно обследован. Антрополог Ф. Волков пришел к следующему заключению: "Череп очень хорошей сохранности. Несколько суженное основание, округленные, очень слабо развитые костные выступы (гребни), очень мелкие зубы, небольшие размеры вообще и изящные очертания лицевого скелета заставляют склониться в пользу мнения, что череп этот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женщине, несмотря на довольно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для женского черепа развитие надбровных дуг, могущее наводить на некоторое сомнение. Судя по состоянию зубов и черепных швов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возрост покойницы близким к старости (более пятидесяти лет)." Череп хранился в Институте этнографии АН, где и затерялся, вероятно, в годы блокады Ленинграда. Во всяком случае, автору этих строк неизвестно, чтобы он обследовался еще раз.

Проф.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выдвинул романтическую гипотезу о том, что в субургане была погребена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Си Ся —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Ло, вдов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Жэнь-цзуна (1139 — 1193 гг.). Императрица Ло была вдовствующей императрицей при правлении ее сына императора Чунь - ю (1194 — 1205 гг.). После первого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вторжения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Си Ся в 1205 г. Чунь-ю не без участия матери импертрицы Ло был лишен власти двоюродным братом Ань-цюанем (1206 — 1211 гг.). Опираясь на то, что погребение, возможно, было женским, Л.Н. Меньшиков считатет, что "можно не сомневаться, что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сын ее был свергнут, а новый правитель не без ее участия получил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на престоле, она была отстранена о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дел. Ее дальнейшая судьба неизвестна, но некоторый данные ... заставляют предполагать, что она стала буддийской монахиней, была сослана в Хара-Хото 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погребена в 'знаменитом субургане'." Из этого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я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делает существенный вывод — "собрание в знаменитом субургане это ее лич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этой женщине мы обязаны тем, что книг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дошли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При в субургане потрабена в обязаны тем, что книг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дошли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При в субургане от тем субургане от от тем субургане

Гипотеза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 именно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остроумное предположение и не более того. Но опровергнута она может быть только в том случае, если череп из субургана будет найден и будь вновь будет проведена квалифицированная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экспертиза, твердо установлено, что это череп не женский (мы видели, что кое-какие сомнения в этом имелись и у Ф. Волкова), а мужской, к чему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склонялся П. К. Козлов.

Если же в субурган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ыла погребена женщина и, допустим на момент, что эта женщина была императрицей Ло, то допустимо, что часть книг могла быть из ее личн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Отметим только, что среди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имя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Ло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о всего дважды, оба раза как дарительницы книги (один раз это упомянуто в колофоне и один раз на книге проставлена печать о дарении). В том и другом случае это могли быть не её личные книги, а книги, которые были розданы ею, как и прочими другими императорами и жертвователями, о чем имеется много упоминаний. Книг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ялись по всему государству. Их, по стандартному выражению предисловий и послесловий, "раздавали чиновникам и народу". Наличие таких книг, строго говаря,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это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личные книги императрицы Ло или иного императора — распространителя тиража книг.

Перед отъездом экспеди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развалины города посетил торгоутский бэйлэ. "В день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дальнейший путь, — писал чуть позже П. К. Козлов секретарю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 лишь только зардела летняя заря на востоке ко мне прибыл с прощальным визитом торгоут-бэйлэ в сопровождении наследника, красивого симпатичного лет тринадцати мальчика и всего своего штата чиновников, молодецки восседавших на отличных рослых лошадях джунгарской породы. Я искренне был рад, что имел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лично принести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этому монгольскому князю, оказавшему нам вторично еще большее содействие и предупредительность пр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и Хара-Хото нежели в первое посещение экспедиции". 69 О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найденного и увозимого из "знаменитого субургана" мы узнаем из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убличного доклада П. К. Козлова от 8-Ш-1926 г. "С развалин моего Хара-Хрто 17 лет тому назад было вывезено тяжести на 40 верблюдах. Что они везли? Они везли великолепно сохранившуюся библиотеку, которая состояла из 24 тысяч томов. ... Я помню восторг китаиста А. И. Иванова, который найдя его (тангу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словарь 1190г. "Чжан чжун чжу" — Е. К.) громко завопил: "Петр Кузьмич! В вашей библиотеке я сделал открытие, открыл словарь, который дает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честь 700 томов книг. Если к эт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прибавить еще 537 картин, ... то будет понятно, как велико то богатство, которое составлял тот знаменитый субурган". 59

Осенью 1909 г.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были доставлены в Петербург и размещены в здани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В начале 1910 г. в Обществе была устроена выставка предметов буддийского культа и книг, найденных в Хара-Хото. Думая о судьбе привезенных из экспедиции уникальных находок, П. К. Козлов писал в конце зимы 1910 г.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у из Москвы: "Весь харахотин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пока хранится в свободных для

Общества комнантах, наверху. А. И. Иванов и В. Л. Котвич работают по его сохранности. Иванов разыскал словарь, дающи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расшифровать интересные письмена Си Ся. ... Вопрос, куда поступит Хара-Хото, еще не решен. Лично я имею тяготение к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му Азиатскому музею. Думаю в вас найти единомышленника — не правда л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так и вышло. Все книги,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были переданы в Азиатский Музей АН, прямым наследником которого ныне является СПб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 а иконы, скульптура, памятник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оказались в начале в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м отделе Русского Музея, а затем поступили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Эрмитаж.

Разборкой и отождествлением тангутских текстов в Азиатском Музее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о занимался проф. А. И. Иванов. Помимо словаря "Фань-хань хэ ши чжан чжун чжу" он выявил и тангутские толковые словари — "Гомофоны", "Море письмен" и тематические. В статье от 1918 г.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А. И. Иванов упоминает; 1.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х по начальным (губным, зубным, свистящим) звукам, без подробных объяснений. 2.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составленный по образцу извест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Гуанюнь и носящий название "Море слов". 3. Словарь, расположенный по материям (без заглавия)". (1) Речь идет о словарях "Гомофоны", "Море письмен" и "Цзы цза". К 1918 г. А. И. Иванов составил словарь (тангутско-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на три тысячи тангутских знаков. Словарь даже был сдан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В. М. Алексееву: "Жаль, что Невский не знаком с моей рукописью, которая пролежала в Академии с 1919 по 1922 г., когда я, взяв ее, решил больше ничего не писать. Рукопись у меня с пометками о приеме и возврате". Поскольку рукопись словаря находилась у А. И. Иванова дома, видимо, она исчезла во время его ареста летом 1937 г. Наряду с А. И. Ивановым, первичной обработкой хара-хотински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был занят монголовед и маньчжурист В. Л. Котвич<sup>©</sup>, а также буддоллог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 <sup>©</sup>

Позднее, изучение и публикац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и языке Си Ся осуществлялись раздельно. Об истории изучен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смотри монографию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а , тангутск . ... части — ряд публикаций разных лет.

После А. И. Иванова над разбором книг на языке Си Ся в разное время работали А. А. Драгунов, Н. А. Невский, 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Е. И. Кычанов, А. П. Терентьев-Катанский, К. Б. Кепинг. Автором этих строк подготовлено в рукописи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буддийской

##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С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м настоящего издания Шанхайски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 "Гуцзи чубаньшэ" памятников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китайская и мировая наука получит в свое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уникальный материал XI - XIV вв., безусловно проливающий новый свет на китайскую культуру и бытов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 Си Ся, а также на исчезнувшую культуру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Так случилось (об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х этого вкратце сказано выше), что часть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с территории Китая оказалась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страны — впрочем, это явление,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ное в судьба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многих народов. Ныне, когда возвращается данным изданием часть этих памятников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йскому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ю и китайскому читателю, и,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й мировой науч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я убежден, что китайские коллеги и все образованные люди Китая, все китайцы, любящие и гордящиеся своей культурой, зарубежные коллеги отдадут дань уважения русскому путешественнику, географу и естествоиспытателю П. К. Козлову, нашедшему, оценившему и передавшему в руки наук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уника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Я полагаю что заслуживают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и те российские ученые, которые в тяжелых условиях войн, революции, блокады хранили,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збирали и реставрировали ред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писали инвентарь и составляли первые каталоги.

Научна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ь знает и ценит труды китайских специалистов по Си Ся — Ло Фу-чэна, Ло Фу-чана, Ван Цзин-жу, Ши Цзинь-бо, Ли Фань-вэня, Бай Биня, Хуан Чжэнь-хуа, Не Хун-иня, Чэнь Бин-ина, Ло Моу-куня и многих других. Сделано немало, но предстоит сделать еще больше.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хватает средств на полную сплошную реставрацию книг из Хара-Хото, здесь пока предстоит еще большая и трудная работа. Следует отождествить сотни фрагментов, до которых пока еще тоже не дошли руки, нужны молодые энтузиасты, которые решились бы взяться за это дело. Но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сширятся круг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культуры Си Ся, мы видим интересующихся эт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не только в Китае, Японии и России, но и в США,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Франции, Швеции, Голландии. Автор этих строк убежден, что когда достоянием науки станут переводы, сделанные на язык Си Ся с тибе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к тангутским текстам возрастет интерес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тибет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тибетского буддизма.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Хара-Хото — неоценимый источник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центром которой являлась культура китайская, наглядный пример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культур местных и культуры китайской, с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а этой почве новых форм культуры как частей культуры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й. Можно быть твердо уверенным, что благородный труд работник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Гуцзи чубаньшэ", который откроет доступ к памятникам культуры Си Ся всем интересующимся ею, получит должную высокую оценку мировой научно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Е.И. Кычанов 23-VI-1994,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 Примечание

- П. К. Козлов, Н. М. Пржевальский, первый 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 природ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СПб, 1913, стр.
   84.
- ② Г. Н. Потанин, Тангутско-тибетская окраина Китая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Г. Н. Потанина, 1884 1885. СПб, 1893, стр. 464.
- 3 В. А. Обручев,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Северный Китай и Наньшань, т. II. СПб, 1900 1901, стр. 399 400.
- ④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Петроград, 1923, стр. 100.
- ⑤ Там же, стр. 3.
- ⑥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1909 гг., Архив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фонд 18, опись І, № 154. В дальнейшем: Дневник, фонд-ф., опись оп.,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аство-ГО.
- ⑦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 ®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00.
- У Там же.
- Шерновая рукопись книги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61.
- ① Стен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а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9 20.
- ③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доклад об экспедиции.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9.
-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49.
- ⑤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76 77.
- ⑤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46.
-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78.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95.
- 20 Там же, стр. 99.

- ② Там же, стр. 102.
- 2 Там же, стр. 102 104.
- Е. И. Кычанов, Звучат лишь письмена, М., 1965, стр. 27—28.
- ②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1909 гг.,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4.
- См.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08.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108 109.
- 2 Там же, стр. 112...
- 28 Там же.
- 29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І, № 156.
- 30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І, № 50.
- ③ о. Иакинф, История Тибета и Хухунора, СПб, 1833.
- От. Э. М. Мурзаев, В сердце Азии, М., 1990, стр. 12.
- 3 См. Е. И. Кычанов, Звучат лишь письмена, стр. 33.
- Э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406.
- ⑤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ьс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1907 1909гг,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6.
- 36 Там же.
- ③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55.
-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46 547.
- 39 Там же, стр. 547 548.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50.
-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сь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7.
- 43 Там же.
- ⑤ П. К. Козлов, Дневник Монголо-Сычуанськ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57.
  - **46** Там же.
- - 🕸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56.

  - 50 Там же.
  - Пам же.
- Там же.
  - ⑤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I, № 124.

3

- ⑤ П. К. Козло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55 556.
- ⑤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фонд П. К. Козлова), М., 1984, стр. 75.
- **57** Там же.
- 59 Архив ГО, ф. 18, оп. І, № 124.
- ⑥ Архив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РАН, ф, 208, оп. 3, № 274.
- ⑥ А. И. Иванов, Памятники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письма,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ерия VI, 1918, стр. 799 800. Кроме этого, см. публикации А. И. Иванова: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города Хара-Хото, I. Китайское частное письмо X II в.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3; Из находок П. К. Козлова в Хара-Хото,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XLV, 1909, стр. 463 477. Страница из истории Си Ся,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911, стр. 831 836; Сутра "Восхождения Майтрей на небо Тушита". Тангутский текст издал и китайским переводом снабдил А. И. Иванов. Петроград 1916 г.; К этому сдедует добавить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две публикации А. И. Иванова на немецком языке.
- © См. Котвич В. Л., Образцы ассигнаций Юань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в Китае, Извести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т. XLV, 1909, стр. 474 477; См. также ег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памятников монголь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61—565.
- © См. ег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у персидского текста "Семи мудрецов" в Монголия и Амдо и мертвый город Хара-Хото, стр. 566 и его описан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буддийской скульптуры и иконописи в этой же книге.
-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Опис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части коллекции из Хара-Хото.
- (6)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словарь в двух книгах. М. 1960.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Составители 3.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М., 1963.

## **Preface**

The achievement of discovering the unique St. Petersburg collection of manuscripts of Xixia writing belongs to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and traveler Peter Kuz'mich Kozlov (15, Oct. 1863 - 26, Sep. 1935)

P. K. Kozlov was born in the small town of Dukhovshchina in the oblast of smolensk, in a family which drove cattle to market. After completing the local school, he worked as a clerk in an ale brewery in the town of Slobod. It so happened that in precisely this town the by then already renowned traveler and geographer N. M. Przheval'skii had bought himself a summer cottage. In 1882 occurred the meeting of P. K. Kozlov and N. M. Przheval'skii that determined the entire subsequent course of Kozlov's life. Later Kozlov recalled, "That day..., when I myself began freely and frankly to speak with him (Przheval'skii - EIK) I never, never will forget, ... that day decided all my future, and I began to live that future." With the patronage of Przheval'skii, Kozlov continued his education and completed the Smolensk technical middle school (real'noe uchilishche), and in the years 1883-1885, while still quite a young man, took part in the fourth expedition of N. M. Przheval'skii to Central Asia. In 1887, Kozlov completed the St. Petersburg military school and received officer's rank. The subsequent participation of Kozlov in the expeditions of M. V. Pevtsov (1888) and V. I. Roborovskii (1893-1895) prepared him for being entrusted with independent expeditions, the first of which he undertook in 1899-1901.

It appears that G. N. Potanin, traveler and collector of folklore, was the first to learn from the Mongols-Torgots about the abandoned town at the mouth of the Edzingol river (Chin. Heis. ii). In his account of the 1884-1885 journey, Potanin wrote:

From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the Torgots - EIK] mention the town of

Erkha-khara-buriuk, i.e., from the most eastern branch of Edzina: here, it is said, a small kerim is visible, that is, the walls of a small town, but around [are] many traces of houses which are covered with sand. Digging in the sand, one finds silver objects. In the environs of the kerim [are] large friable sands, and there is no water nearby.<sup>2</sup>

In 1900 the geologist V. A. Obruchev tried to find the town buried in the sands. Local Mongols not only did not show him where the dead town was located, they led him in an entirely different direction from the location of Khara-khoto. In the same year, Kozlov, finding himself in Mongolia, sent his traveling companion, A. N. Kazankov, to search for the ruins of the town; he also did not find the town. The reason was the same: the local population was conceal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ruins.

Preparing for the Mongol-Sichuan journey, Kozlov decided to repeat the search an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mistakes of his predecessors, to make friends with the local Mongols. "In the recesses of the soul," he wrote later, "I cherished fond thoughts of finding the ruins of the town in the desert of Mongolia." [5]

The project of the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was worked out by the Council of the Imperial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famous geographer and traveler, P. P. Semenova-Tian'shanskii, and of Kozlov personally. On 17 June 1907 Kozlov was received in audience by Tsar Nicholas II. In "Diary of the Mongol-Sichuan journey, 1907-1909" is preserved the following notation:

Received in private audience (incidentally, I presented the Sovereign three volumes of the scientific results of the Tibetan expedition, which had then just come off the press), as never before simple and gentle, I left the Sovereign charmed. At my parting words to His Majesty: "On the example of the Tibetan expedition, which concluded so successfully, permit me to request a blessing for this one too!" – the Sovereign remarked: "I am not bidding farewell. I wish to see you right before departure on your long journey, for surely there still remain many affairs to attend to and time for equipping the expedition." "®

In fact, on 29 October 1907, before departing on the expedition, Kozlov was again received by the Tsar and by Heir-Apparent Aleksei.

The expedition project was confirmed by the Tsar on 2 October. For the two

years' duration of the expedition 30,000 rubles was issued from the treasury; its composition was confirmed at 14 persons. The expedition was given arms-12 rifles with 15,000 cartridges and 6 Smith-Besson revolvers with 600 cartridges.

The leader of the expedition was granted an official authorization, the text of which read:

May it please God, We, Nicholas II, Emperor and Autocrat of All Russia and so on, declare hereby to each and every one, to whom it is given to know, that the bearer of this the leader of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dispatched by our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by way of Kiakhta and Urga to North-Western China and Mongolia and to return thereupon by way of Lanzhoufu and Urga back to Russia, Lieutenant-colonel of the regiment of Royal Grenadier Guards of Emperor Alexander III, Peter Kuz'mich Kozlov, departs across the frontier and will return later to Russia. Ten persons as crew accompany him. On his behalf we amicably call upon all higher oblasts and invite each before whom they appear. Our Military and Civilian administrations most mercifully command not only to allow P. K. Kozlov and the ten-person crew to proceed in all places freely and without restraint, but also to show him every goodwill and assistance. In evidence of this and for smooth passage is granted this passport with the state seal affixed below. In St. Petersburg, on the day of 12 August in the year 1907 by Decree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Deput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Seal Signature<sup>®</sup>

The at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Russia and of the Tsar personally to the expedition, and their support for an undertaking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explained in large part by the impact which the achievements of these expeditions had in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world.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not undergoing investigation by Chinese scientific powers at the level of the then contemporary European scientific standar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European scholars. As a result, from the numerous scientific expeditions in the last quarter of the 19th and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ies – English, German, French, Russian, Swedish, Japanese, etc. –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were obtained in the areas of geography, history, and natural sciences (botany, zoology, etc.). Russian

participation in this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movement was weighty and greatly raised the prestige of Russian science.

It would be unjust not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fact that such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frontiers of the Chinese empire took place in the context of European – American – Japa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ressure on China, and that topographical surveys of localities by the expeditions, their reports on the state of local affairs could be used for military ends as well. In allowing these expeditions, the Qing government made definite concessions. But now, almost 100 years after such expeditions took pl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discovery and preservation for science of Dunhuang and Khara-khoto alone are a most preciou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ulture, as well as for Chinese science. That which was most likely to perish irretrievably was saved and preserved down to our day, however incomplete.

I wish especially to emphasize that the expedition operat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Qing) central authorities and under the control of local authorities.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s received permission to carry out research and passports from the central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passports," wrote Kozlov about the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of 1907-1909, "were received from the Peking government through the offices of the Russian diplomatic mission in Bogdo-khan." The Russian embassy in Peking "informed about the expedition those local Chinese powers through whose areas the expedition would be passing."

Thus through the territory of Mongolia to Urga (Ulan-Bator) the expedition moved, using the Mongolian postal service. "Thanks to the border commissar at Kiakhta...P. E. Genok, who communicated in a timely way with the Chinese-Mongolian authorities, the personnel of the expedition set out handily on Mongolian postal horses...accompanied by the baggage of the expedition, carried on camels specially hired for the expedition from Mongolian contractors." They hired 40 camels.

The expedition did not move through Chinese territory at will. Thus the amban of the city of Xining was informed beforehand of the arrival of Kozlov's expedition. In the archive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preserved a draft of a letter from Kozlov to the authorities in the province of Gansu, with the heading "To the Commission on Foreign Affairs of Gansu Province." The text of the letter says, "In consequence of a

letter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from 15 November 1908, I beg to inform that I, Russian traveler and Lieutenant-colonel Kozlov, in fact had discussions with the Xining qinchai as well as with the tongpan (vice prefect – RWD) of Guidui about our route of travel from Guidui through Labrang to Songpanting." The letter was dated 22 November 1908.

In this fashion, it bears emphasizing, all movements of Kozlov's expedition were accomplished with the complete knowledge of Qing authorities and no arbitrary actions were permitted.

As far as the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 of Khara-khoto are concerned, all that was likewise done with the knowledge and with the help of the Mongolian prince in Qing service, Baldyn-Dzasak, and the Torgot beila, who ruled the territory entrusted to them as Mongolian territory, a constituent of the Qing empire under speci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Lifanyuan.

At the beginning of March 1918, the expedition reached the borders of Ugoldzintologa,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local Mongolian prince Baldyn-Dzasak. When the conversation touched on the possible further route of the expedition and the prince realized that Kozlov wanted to gain the mouth of the river Edzin-gol, he asked:

"Why do you want so much to go to Edzin-gol, and not directly to Alashan-yamun, where the road is better and it takes less time as well, and therefore fewer difficulties and deprivations and also fewer material losses. No doubt," added the prince, "you expect something of great interest at Edzin-gol?" "Yes!" I answered Baldyn-Dzasak, "You are right: some very curious ruins of an ancient town are there!" "And how do you know about that?" inquired my interlocutor. "From books by our travelers and from letters of my friends," I replied. "Indeed there is!" the prince said slowly, plunged in thought. "I heard about Kharakhoto from my people, they have been there; in truth a town exists, enclosed by walls, but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covered over with sand ... I have been told that Torgots go to the ruins there and dig and search for buried treasures. I've heard something to the effect that someone even found something. Go and see, and maybe you will even find something remarkable. I don't think that the Torgots will block your route to the ruins, nor will they block even your

excavations ... The Torgots lately have been quietly hiding Khara-khoto and the old path to Alashan-yamun."

That was the sum of the conversation. But originally both the prince and two of his advisers, as Kozlov wrote on 12 March 1908 in a let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o [Geographical Society – RWD], "tried to persuade me that in the direction I desired there was no road." Gifts helped, foremost a revolver and a rifle, entertainment and listening to the gramophone, and a letter to the Russian embassy in Peking with a request to address the Qing authorities about conferring on Baldyn-Dzasak the higher rank of "ulusun-tushi-gung" which would have increased three-fold the upkeep that he received from the Bogdo-khan court. Hence Kozlov, like his predecessors, could not have found Khara-khoto without the help of Baldyn-Dzasak.

His second helper on the path to Khara-khoto was the Torgot prince, Torgot-beila Dashi. As Kozlov observed later in a public lecture, Dashi "to a significant degree rendered assistance to the expedition, and made it possible to find Khara-khoto." After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Kazak-Buriat Badmazhapov, the Torgot-beila "charged his ... guide to convey the expedition to the neighborhood of his headquarters ..., and promised full cooperation ... in reaching the ruins of Khara-khoto." The Torgot-beila was indirectly subordinated to the Lifanyuan.

On 1 April 1908, five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 Kozlov himself, A. A. Chernov, N. Ia. Napalkov, and the Kazaks Ivanov and Madaev accompanied by the guide Bata departed for the ruins of Khara-khoto by way of the margins of Toroi-onts. Bata "had been at the dead town many times." From the expedition's camp to Khara-khoto was about 60-65 li.

Halfway we began to encounter traces of an agricultural or settled culture-millstones, signs of irrigation canals, fragments of earthen and porcelain vessels, and so on. But pounded earth structures engaged us most of all, especially the suburgans, situated singly, by two, or by five along the rode, of old leading to Khara-khoto, that monument of the past buried in the desert sands. As we approached the cherished goal, our excitement mounted apace. In three versts [about 8 li – EIK] we crossed an ancient dry riverbed ... on the elevated band of the river stood the ruins of the citadel of Altan-khoto, where, according to legend,

was once situated the cavalry guard detachment of Khara-khoto. By the sides of the desiccated riverbed, it appeared, earlier had been tucked a valley with a farming population. Here, at last, appeared the town of Khara-khoto itself, situated at the bottom of a terrace of coarse sand. Above the northwestern corner of the fortress rose the main conically-shaped suburgan, in a row of smaller adjoining ones, built likewise on the wall and next to the wall outside the fortress. As we got closer to the town fragments of vessels appeared in greater numbers; the view of the town was hidden by tall sand dunes. But then we climbed the terrace and before our eyes appeared Khara-khoto in all its outward charm.

Judging by Kozlov's description, the walls of the town

were strictly oriented to the north, south, east and west, forming a regular square, of which each side was about a verst [approx. 2.5 li - EIK].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walls of the town had gates, protected by L-shaped projections difficult of direct approach, and situated not directly one opposite the other, but the eastern a bit to the north, and the western a bit to the south of the center of the walls. From west to east two main parallel streets bisected the town, starting from the gate ... The powerful walls of the town, 6-8 meters in height, were crowned by stately suburgans in their northwestern corner. The walls gradually narrowed toward the top, and their thickness, reaching 4-6 meters at the base, diminished by one half ... Each wall had several bastions ... Small remains of former structures, protruding from the sand, refuse, and earth, fairly clearly delineated the former streets of the town.

During the initial inspection of the town, the members of the expedition found fragments of earthen and porcelain vessels, scraps of articles of cast-iron, iron, copper and silver, bricks, cash, paper money, and "here and there cult objects."

The expedition remained in Khara-khoto from the first to the 13th of April, 1908. Overall the survey and excavation lacked a scientific archeological foundation. As Kozlov himself wrote in his diary, he and his people "dug, rummaged, broke, smashed." There was no precise fixing of the location of finds, although in the map of the town Kozlov indicated Ruins No. 1, No. 2, and No. 4 in the northern half of the town, somewhat to the east of the central north-south axis, Ruin No. 3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eastern half of the town, suburgan B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town and suburgan A in its southwest corner, ruins of idols [Buddhist statues-RWD] near the southern half of the western walls. Judging by various references, there was found:

Ruin No. 1: "Buddhist images, drawn on linen," "heavy, coarse metal cups and scraps of manuscripts in Xixia writing."

Ruin No. 3: "sheets of Persian manuscripts, ... fragments from the famous collection of stories, "Seven Sages" (Kitab-i-Sindbid), "Islamic manuscripts and artistic book bindings."

Suburgan A: 3 books and 30 notebooks in Xixia script, "an image on linen," "Appearance of Amitabha," "an image in Chinese style on silk," "a large, slightly smiling attractive mask and a series of other heads and masks," "a Buddha head, gilded with dark blue hair."

Suburgan B: "several specimens of glass-like eyes that had fallen out of the earthen statues," "eyes of rock crystal or topaz, nicely polished," "large, flat tsa-tsa."

Summarizing the results of the first visit to Khara-khoto, Kozlov remarked:

In the course of several days passed in the ruins of Khara-khoto, overall the expedition enriched itself with all kinds of objects: books, letters, papers, metal monetary tokens, female decorations, some household implements, images of the Buddhist cult, and so on. In terms of quantities, we gathered archeological material that filled ten 16-kilogram mailing crates, prepared then for shipping to the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good, amicable relations of the Torgot – beila with the expedition, I at once sent through the Mongolian post to Urga and beyond to Petersburg, in several concurrent packages, news of the actual discovery of Kharakhoto and its finds, and enclosed samples of writing and religious painting for immediate study and identification.

In December of 1908, while on the border of Guidui, Kozlov received a response from th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 V. Grigor'ev. Kozlov wrote in his diary:

A. V. Grigor'ev, as assistant to the chairman, notified me ... about my labors,

or their results at Khara-khoto. It turns out that it was the Tangut capital of Xixia, which existed from the 11th to the 14th centuries. Evidently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is very satisfied with this discovery, and it is decided to propose that I return again to the historic town on the way back ... to augment the materials of such great interest already obtained and partly in Petersburg.®

The diary entry is duplicated in a draft letter of 23 December 1908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in London. Kozlov informed the British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that the third stage of his expedition would be devoted to

additional excavations, more protracted than before, of the dead town of Khara-khoto. For the time being I have received a letter from the deputy chairman of the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On the basis of acquaintance with the writing and other documents that I sent to Petersburg, he hastens to gratify me that the Khara-khoto I discovered is Xixia, the capital of the Tangut state, which existed from the 11th-14th centuries ... When You, dear sovereign, receive this letter, your humble servant will be on the road to Southern Mongolia and within a further two months already at his beloved ruins of Xixia.

With all due respect to my native colleagues, to this day I cannot understand who decided, and on what basis, the Kozlov "found" the capital of the Tangut state. As early as 1833 the large monograph of N. Ia. Bichurin (o. Iakinf) was published, which contains considerable Chinese material on the history of Xixia, translated into Russian, and from which it was entirely clear that the Xixia capital was Ningxia, as it was called in Kozlov's day, the present-day city of Yinchuan. Unfortunately, this error continues to occur in the literature connected with the name of P. K. Kozlov. From Tangut primary sources, we know that Edzina (Khara-khoto, Chin. Heishui) not only was not the capital of Xixia, but was rather a third-rank town, a place of exile for hard labor. It perished in 1374 in a battle between Ming China and the Mongols, desirous of recovering their lost power over China.

On 15 October 1908 in a special session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were heard three reports, by S. F. Ol'denburg, A. I. Ivanov and V. L. Kotvich, about the initial studies of the finds from Khara-khoto.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manuscripts extracted from the ruins, were, besides Chinese, written in an unknown language, at least none

of them could read it, although the form of writing was known."

A. B. Grigor'ev informed Kozlov that "in view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esent discovery, the Council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has authorized me to propose to you that you not ensconce yourself in Sichuan, but rather return to the Gobi desert and continue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heart of the dead town. Do not begrudge either strength, or time, or resources on the further excavations."

At the end of May-June 1909 Kozlov, fulfilling the charge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returned to the Khara-khoto region. On 27 May he made a note in his diary: "I write ... the time is five o'clock, but the heat is making itself strongly felt and involuntarily induces reflection on how we will work at dead, melancholy Khara-khoto." June 4. "At ten in the morning through the dusty haze we saw, at last, the familiar grey walls of Khara-khoto, and within half an hour we had already entered into the fortress and not far from the western gates and the angle of the NW suburgan had set up our tents."

Large-scale investigation of the town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Torgot-beila. In a letter of 8 July 1909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Kozlov made special mention of this help:

The expedition was able to pass through the desert to a hitherto unknown corner of Central Asia, over a rather long road and at a hot time of year, thanks only to the excellent relations of the local Torgot-beila with us, which allowed us to hire, from among his subjects, diggers, water-carriers, provisioners, etc. Thus the dead town momentarily came alive and established contact with the inhabitants of Edzin-gol, of which its closest branch, the eastern, flows twelve versts from Khara-khoto. This time our camp took shelter not in the center of the fort, as before, but somewhat closer to the western wall beside the ruins of a large fangzi (house).

In the book he wrote, "I renewe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Torgot-beila, as before the chief in Edzin-gol, ... secured his cooperation in hiring digger-workers, and also engaged Torgots to supply us daily with water and sheep from Edzin-gol."

For his part, the Torgot-beila, as representative of local authority, did not ignore

the work of the expedition; he regularly sent officials from his government to Kharakhoto to "find out how the Russians are doing in the ruins."

At the start of the work, Kozlov noted in his diary:

From the first day we began to find writing, primarily Chinese, paper money, dishes, old weapons and so on. We also came across a small metal Buddha, dokshit, a small square Tibetan notebook of splendid gold writing was found.

One can say that last time, outwardly at least, we investigated Khara-khoto in a rather orderly manner. Now we have found neither sneeze nor bead nor metal ornaments. Standing on the wall of Khara-khoto, you can see how beautifully and conveniently this town was laid out. In the NW region: the prince himself, along the northern, western and southern walls were situated prayer structures, suburgans ... In the SE corner stables with the garrison section ... the main thoroughfare lead directly from a tall central building, which was encircled by a cross street and then by a longitudinal [street extending] to the eastern gates.®

The work was organized by two groups; the hired Mongol worker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a Kazak-Buriat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the ruins of houses along several streets of Khara-khoto, and occasionally tried to dig deep wells in places designated by me." The Russian group led the excavation both inside the town as well as "carrying out the investigation outside the Khara-khoto walls, at distances both near and far."

Judging by his diary, Kozlov was not present on a regular basis and the finds, even if interesting, were not fixed in any way in the plan of the town. It appears that Kozlov imagined he understood how Tibetan writing looks, but Chinese and Tangut graphs he did not much distinguish. For him it was all "Chinese stuff."

June 9. "Just now, at around four o'clock, workers appeared before me, I spoke with them, and now they have all gone to their tasks. Interest mounts steadily, and I will go to the digs. It is hard to sit in the yurt, when you hear the sounds of those working and the clatter of shovels in the earth ... the manuscripts we chance upon are most often other Chinese,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y will tell us. Most of all the Tibetan ones interest me, both books and manuscripts, but ... in those we have not yet been lucky. As for today it was entirely Chinese stuff, the interesting Tibetan letters turn up charred, those graphs

that were spared lead to the thought of origins other than Tibetan ... We will find out in Petersburg."®

On 11 June, to an earlier comment about the absence of any burials, Kozlov added: "we have come across no clothing or shoes." The cool, windy, even at first rainy weather turned hot. On 12 June Kozlov wrote a letter to A. A. Dostoevskyi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Dear Andrei Andreevich! On the twenty-second of May (3 June - EIK) the expedition arrived at Khara-khoto and has set up camp within its historic walls, in the interesting ruins. In our year-long absence from the old town no one has dropped in: its ruins look in exactly the same condition as when we left it. Untouched even are those objects extracted by us from beneath the wreckage of debris, which we left as unneeded. As in the first sojourn and so now,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expedition Khara-khoto has come to life: people started moving, instruments started pounding, dust began flying through the dry air. In the week just past we have succeeded in replenishing the previous archeological collections, already sent to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nd this time we have obtained and continue to obtain writing, including Arabic too, as well as monetary tokens and cult objects, etc. In one of the projections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fortress walls we came across an interesting little temple with earthen ornamented Buddhas opposite the entrance and curious wall paintings; unfortunately the paintings are glued to the clay and it is not possible to avail ourselves of them. Not only my companions but also the natives have become imbued with interest in the excavations. We talk only about Khara-khoto: in the evening, about what was found that day; in the morning, about what will be found. Time flies swiftly. After the nocturnal 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s, we go right to sleep. We awake practically at dawn and in the relative cool conduct our work. During the day we rest, otherwise we languish all the more in the debilitating heat, such that in the shade the air warms to 37 degrees C and more, and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becomes incandescent in the sun to above 60 degrees C. Dust or sand raised by the hot air, positively enervat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we breath easily and freely in the mornings and evenings, feeling ourselves yet capable of carrying out further labors at Khara-khoto.

Because after days of work in the town's ruins the finds were not as abundant as would be desirable, Kozlov sent people to investigate the vicinity and took the decision to open the large suburgan, which was located about 400 meters from the western wall of the town,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dry river channel. The suburgan was about 10 meters high and consisted of "a pedestal, the middle, and a conical, partially destroyed top, wrecked either by time or by treasure hunters," that is, attempts to open the suburgan evidently had been undertaken also by earlier local inhabitants. If they had succeeded, then it is very likely that science would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at collection of religious paintings, sculpture, and books which it now has at its disposal.

On 12 June bega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uburgan, the same in which, we may suppose, was found the majority of books in the Xixia language and in Chinese.

Passing around the Mongols who had been working, I headed for my companions who were investigating one of the largest suburgans standing west of the town at a distance of 200 fathoms [1 Russ. fathom = 7 ft.]. The investigation had revealed that it was rich in Buddhas and Chinese writings, so many of which had been carried to the bivouac by 9:00 in the morning that I at once went out to them, sorted, cleaned of accumulated dust, and prepared them for packing. Similar to what had been in the suburgan of the previous year, in this one were all kinds of books, notebooks, scrolls, paintings. A very old mandala turned up. Probably the roof of the suburgan's chapel fell in and overturned the Buddhas, or else they we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scattered about so, books and scrolls and paintings tossed every which way. §

Work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suburgan continued for nine days and was completed on 20 June. The books were carried to the camp in a huge tarpaulin, and sorted there. Without a knowledge of the languages, this "sorting" by format or yet by some characteristic unknown to us brought, to a certain extent, that chaos which it has not been possible to eliminate completely to this very day, Kozlov himself did not observe the excavations on a regular basis. Abou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interior furnishing of the suburgan there is only one notation in the diary from 15 June.

Today I strolled out to the suburgan to see if much remained in it of archeological goods,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my fellows are right, having observed that but a mere half has been taken.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stupa all has been cleaned, arranged round about, seated, large wood-earthen Buddhas, and in the middle books, writings, books – large, small, in bindings or boards, as notebooks or scrolls.®

If we compare two diary entries from 12 June and 15 June, we will observe that according to the excavations, Kozlov writes now about the disorderly "scattered" books, now about books arranged in a particular order. Later, when the news about the celebrated finds, "the pearl of my independent labors in Central Asia, " as Kozlov himself wrote, flew around the world and Kozlov attracted real world fame, he inclined in his recollections even to an exemplary order in the suburgan: "We opened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It was packed with treasures. Hardly had we removed its roof, when books appeared, standing by the hundreds all on shelves in complete order in silk bindings. We found more than 2000 books. "

In the book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Kozlov stresses that in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suburgan everything lay in disorder, whereas in the lower portion there was some order:

All the riches collected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books, images, statues and other objects ... lay in extreme disorder. In a still lower part of the storehouse was marked a kind of system: part of the earthen statues were positioned at one level, with faces to the inside, resembling lamas performing a religious service in front of the great sheets of Xixia manuscript writing, deposited by the hundreds one on top of another.

The higher up, the more chaotically was grouped the riches of the suburgan, books lying in piles and singly, tightly pressing against each other or against images, coiled up individually on wooden rollers. Both the books and the images were placed in the most diverse positions, like the statues, enclosed among them. Only at the base of the suburgan were noticed some books carefully wrapped up in silk cloth.

For the time being one can suggest that both the testimony of chaos and of order is true. At the bottom of the suburgan ("on the ground" in Kozlov's expression, a

square of roughly 3 by 4 meters, or about 12 square meters), where the buria! was found, around it "sat" wood-earthen Buddhas, and before them "for reading" were placed books – the diary entry of 20 June says that "the statues were found" on a raised interior floor of the suburgan, around a landing in the center of which stood the pillar." On the walls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suburgan hung icons. Sculpture in the actual proportion of the human body, it seems, was by Kozlov's admission superior artistic work. An entry of 19 June from the diary: "I write in delight of all and those graceful Buddha heads. Some of them are so artistically executed, that they stand and look as if alive ... From the face it is evident that the artist-sculptor had a feel for classical beauty." The icons removed from the suburgan were stunning in their vividness and freshness of beauty; "All," in Kozlov's words, "were flooded with a soft blue and soft pink radiance." Yet it was worthwhile to move the icons ... and the dyes crumbled.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books and icons, statues, things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suburgan could have been in disorder. Obviously, in spring of 1226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ian invasion, things from the city's temples were hidden in the suburgan and, possibly, the city administration. It is hardly likely that such a great quantity of Buddhist and other texts would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suburgan at the very beginning. From the notations of Kozlov, it is clear that, although there were two suburgans opened, and there were finds of writing in the territory of the town, the mass of written documents come from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On 19 June Kozlov made the following notation about the finds in his diary: "I would have taken everything, but did not have the capability." That part which he was unable to cart away, Kozlov buried in the sand. As to where the place is located where was everything was hidden for future retrieval, in the diary is preserved the following notation:

Before our departure from Khara-khoto we took from that room [at the southern wall of the town – EIK] our remaining treasure and hid it at the slope from the fortress farther south of the suburgan right along the wall, covered with sand. I did this just in case.

Apparently something was buried right in the southern wall. We read in the diary

entry of 11/23:

Today we collected and hid everything that was brought to the bivouac, that is, every last thing from the suburgan, and carried it to the southern [at the wall of the room] interior part of the wall, to the niche. There we placed several Buddhas, artistically executed to a greater or lesser degree. There lie heads [up to 30 or more Russ. pounds in weight, that is, 12 kilograms or more – EIK] and so on. There are many trifles, in general about fifty items. §

It is possible, however, that whatever was hidden in the southern wall, Kozlov, however incompletely, took away at the time of the second visit to Khara-khoto in 1926. In the shorthand notes of the report, which Kozlov read on 8 December 1926, we notice the following notation: "We thought that this time we would find nothing, but overall we found rather a lot, mainly statues and artistic heads."

But the things buried outside the southern wall, at its foot, and above all those great sculptures which were in the depths of the suburgan, apparently have never been found to this day. Chinese archeologists should carry out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s at the southern wall.

Above we have already written that when the suburgan was excavated, it was observed that in the center of the platform at the base of the suburgan was stuck a wooden pole, around which grandly sat sculptured representations of monks, with faces turned to the interior of the suburgan and who looked like lamas performing a religious service. Before them lay books, evidently the pothi-books in the collections of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many sheets of manuscript books, laid one on top of the other. These were books in that form which was widespread in India and Tibet. At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suburgan a skeleton was noticed in a seated posture. In the diary Kozlov writes:

We at last opened the head of the seated person, a gegeng probably, in whose honor the suburgan was erected. The skull allows one to say that the deceased was about 40 years of age and belonged to the type or tribe of Tibeto-Ari-Mongolian. The gegeng was buried in the seated posture, against the northern wall, in an honored place, at the foot of a Buddha of the highest importance and

greatest size, with the faces of Buddhas turned toward the center, and the gegeng to the south.

Since the skull from the suburgan was sent to Russia, it was more carefully studied.

Anthropologist F. Volkov came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 skull is in very good condition. Some narrowing at the base, rounding, very weakly developed bony projections, very small teeth, the overall small size and fine features of the face of the skeleton incline to support the opinion that this skull belonged to a woman, in spite of the superciliary arch, rather well developed for a female skeleton, which might raise some doubt. Judging by the condition of the teeth and the skull joints one can estimate the age of the deceased at close to old age (more than fifty years).

The skull was kept at the Institute of Ethnography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where it was lost, very likely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blockade of Leningrad. In any case,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does not know if it was examined a second time.

Professor L. N. Men'shikov has put forward the romantic hypothesis that an empress of the Tangut state, Empress Luo, widow of the Tangut emperor Renzong (r. 1139-1193), was entombed in the suburgan. Empress Luo was dowager empress during the reign of her son, Chunyou (Huanzong, r. 1194-1206). After the first Mongolian attack on the territory of Xixia in 1205, Chunyou, not without the participation of his mother the empress, was deprived of power by his cousin Anquan (Xiangzong, r. 1206-1211). Basing himself on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interred was female, Men'shikov considers that "we can be sure that after her son was overthrown, she was distanced from state affairs. Her further fate is unknown, but several data ... suggest that she became a Buddhist nun, was exiled to Khara-khoto and after her death was buried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From this supposition Men'shikov reaches a substantive conclusion: "the collection in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was her private library," "we are obliged to this woman for the fact that these books from Khara-khoto survived to our day."

The hypothesis of Men'shikov is a supposition, a clever supposition but nothing more. But it can only be refuted if the skeleton from the suburgan is found and if a qualified anthropological examination is carried out, firmly establishing that the skull

is not female (we saw that U. F. Volkov had some doubt of it), but male, which Kozlov was initially inclined to think. If a woman was really buried in the suburgan, and if we allow that the woman was the Empress Luo, then it is possible that some of the books could be from her personal library. We will note only that, among the books in Xixia, the name of Empress Luo can only be affirmed twice, both times as the bestower of the books (once it was mentioned in the colophon and once a seal recording the bestowal was affixed). In both instances these coule be not her own personal books, but rather books which were distributed by her, as by other empresses and donors, about which there is lots of evidence. Books were disseminated throughout the state. In the conventional expression of prefaces and colophons, they were "distributed among the officials and people." The presence of such books, strictly speaking, does not mean that these were necessarily the personal books of the Empress Luo or any emperor who disseminated the edition of the book.

Before the departure of the expedition from Khara-khoto, the Torgot-beila visited the ruins of the town. "On the day of the expedition's departure on its next journey," wrote Kozlov a little later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the summer sunrise had just reddened the east, when the Torgot-beila came to me on a farewell visit, accompanied by his heir apparent, an attractive, appealing thirteen-year old boy and his entire staff of officials, fine young fellows mounted valiantly on excellent great horses of the Dzungar breed. I was genuinely happy to have the chance personally to thank this Mongolian prince, who had repeatedly shown us more cooperation and consideration during the investigation of Kharakhoto than during the first visit of the expedition.

About the approximate quantity found and brought back from the "celebrated suburgan" we know from the notes of the public report by Kozlov on 8 December,1926.

Seventeen years ago 40 camel loads were brought out from the ruins of my Khara-khoto. What did they carry? They carried a superbly preserved library consisting of 24,000 tomes ... I remember the joy of sinologist A. I. Ivanov, who, upon finding it (the Tangut-Chinese lexicon of 1190, "Zhang zhong zhu" – EIK), loudly cried out, "Petr Kuz'mich! In your library I have made a discovery, I have found a dictionary which allows one to read 700 volumes." If one adds

another 537 paintings to that library, ... then it becomes clear how great is the wealth which comprised that celebrated suburgan.®

In fall of 1909 th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were delivered to Petersburg and placed in the building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At the beginning of 1910 an exhibition of objects of the Buddhist cult and books found at Khara-khoto was organized by the Society. Thinking of the fate of the unique finds brought back from the expedition, Kozlov wrote from Moscow to S. F. Ol'denburg at the end of winter, 1910:

All the Khara-khoto material is kept for the time being in spare rooms at the Society, upstairs. A. I. Ivanov and V. L. Kotvich are working on their preservation. After searching, Ivanov found a dictionary which enabled the decipherment of Xixia writing...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al with Khara-khoto is still not resolved. Personally I am inclined toward the academic Asiatic Museum. I think that you are similarly inclined, no? ®

In fact, in the end that is what happened. All the books and monuments of writing were given to the Asiatic Museum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which today is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whereas the icons, sculptures and monuments of material culture at first were located at the Ethnographic section of the Russian Museum, and then ended up at the State Hermitage.

Professor A. I. Ivanov was the first to undertake the decipherment and identification of Tangut texts in the Asiatic Museum. Besides the dictionary Fan han heshi zhang zhong zhu, he discovered both Tangut explanatory dictionaries, like Yintong ("Homophones") and Wenhai ("Sea of Writings"), as well as thematic ones. In an article of 1918, "Monuments of Tangut Writing," Ivanov remarks:

- 1.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arranged by initial (labial, dental, sibilant) sounds, without detailed explanations.
- 2.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composed on the model of the famous Chinese dictionary *Guangyun* and carrying the title "Sea of Words."
- 3. Dictionary, arranged by matters (without headings).<sup>®</sup>
  Reference is to the dictionaries *Yintong*, *Wenhai* and *Zazi*. By 1918 Ivanov had

compiled a dictionary (Tangut-Chinese-Russian?) of three thousand Tangut characters. The dictionary was even given to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s, but in the years of the civil war it was not published. In 9/2/1935 Ivanov wrote to V. M. Alekseev: "It is a pity that Nevskii is not familiar with my manuscript, which lay at the Academy from 1919 to 1922, while I, retrieving it, have decided not to write anymore. The manuscript is with me, with comments about its reception and return." In so far as the manuscript of the dictionary was at Ivanov's home, evidently it disappeared at the time of his arrest in the summer of 1937. Along with Ivanov, initial work on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was undertaken by the Mongolist and Manchu scholar V. L. Kotvich, and also S. F. Ol'denburg. Ol'denburg.

Later, study and publication of monuments of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in the Chinese and in the Xixia languages took place separately.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monuments of Chinese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see the monograph by L. N. Men' shikov; for the Tangut part, there are a series of publications over many years.

After Ivanov, at different times A. A. Dragunov, N. A. Nevskii, Z. I. Gorbacheva, E. I. Kychanov, A. P. Terent'ev-katanskii, and K. B. Kepping worked on the analysis of books in the Xixia language.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has prepared a manuscript of a short description of the Buddhist portion of the collection.

With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by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monuments of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Chinese and world scholarship will have access to unique material from the 11th-14th centuries, which without doubt will shed new light on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xiste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Xixia state, as well as on the vanished culture of the Tangut people. It so happened (the circumstances of which were explained briefly above) that part of the cultural monuments from the territory of China ended up beyond the borders of the country; however, this is a widespread phenomenon in the fate of the cultural monuments of many peoples. Now, upon returning through the present publication a part of these cultural monuments to the Chinese researcher and the Chinese reader, and indeed to the entire world scholarly community. I am convinced that Chinese colleagues and all educated people of China, all Chinese who love and are proud of their culture, and colleagues abroad will pay a tribute of respect to the Russian

traveler, geographer and naturalist P. K. Kozlov, who found, valued, and handed over to the hands of science genuinely uniqu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I suggest that those Russian scientists also deserve thanks who in the difficult conditions of war, revolution, and blockade preserved, gradually analyzed and restored the rar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wrote an inventory and compiled the first catalogues.

The scientific community knows and values the labors of Chinese specialists of Xixia, Luo Fucheng, Luo Fuchang, Wang Jingru, Shi Jinbo, Li Fanwen, Bai Bin, Huang Zhenhua, Nie Hongyin, Chen Bingying, Luo Maokun and many others. Much has been done, but even more must be done. Unfortunately, the means are lacking for a full and complete restoration of books from Khara-khoto, and here is where even more and difficult work needs to be done. Hundreds of fragments, which no one has yet looked at, must be identified; needed are young enthusiasts who will decide to set themselves to the task. But gradually the circle of researchers on Xixia culture will widen and we will see interest in this culture not only in China, Japan, and Russia but also in the United States, Great Britain, France, Sweden, and Holland. The author of these lines is convinced that when translations made in the Xixia language from Tibetan become the property of science, then the interest in Tangut texts of researchers in Tibetan culture and Tibetan Buddhism will grow. Th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are invaluable re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Far Eastern regional cultures, whose center was Chinese culture, a vivid example of the interaction of local cultures and the cultures of China, and of the formation on this soil of new forms of culture as elements of Far Eastern culture. We can be certain that the high-minded labor of workers at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which will open access to the monuments of Xixia culture to all who are interested in them, will elicit the deserved, great esteem of the world scientific community.

E. I. KychanovJune 23, 1994, St. Petersburg

Translated by Ruth W. Dunnell

### Notes

- P. K. Kozlov, N. M. Przheval'skii, first explorer of nature in Central Asia, St. Petersburg, 1913, p. 84.
- ② G. N. Potanin, Tangutsko-tibetskaia okraina Kitaia i Tsentral'naia Mongolia: Puteshestvie G. N. Potanin, 1884-1885 (The Tangut-Tibet border of China and Central Mongolia: the travel notes of G. N. Potanin, 1884-1885), St. Petersburg, 1893, p. 464.
- ③ V.A.Obruchev, Tsentral'naia Aziia, Severnyi Kitai i Nan'shan' (Central Asia, Northern China and Nanshan), vol. II, St. Petersburg, 1900-1901, pp. 399-400.
- 4 Kozlov,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Mongolia, Amdo and the dead town of Khara-khoto), Petrograd, 1923, p. 100. Hereafter: Kozlov 1923.
- 5 Kozlov 1923, p. 3.
- 6 "Dnevnik Mongolo-Sychuan'skogo puteshestviia 1907-1909" ("Diary of Mongolia-Sichuan journey 1907-1909"), Arkhiv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Archives of the Geographical Society), fond 18, opis' I, no. 154. Hereafter: "Dnevnik", fond-f., opis'-op., Geograficheskoe obshchestvo-GO.
- ① Arkhiv GO, f.18, op. I, no. 59.
- ® Arkhiv GO, f.18, op. I, no. 100.
- 9 idem.
- The draft manuscript of the book,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Arkhiv GO, f.18, op. I, no. 61.
- 1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 <sup>12</sup> Kozlov 1923, pp. 19-20.
- 3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 (1) Arkhiv GO, f. 18, op. I, no. 49.
- (5) Kozlov 1923, pp. 76-77.
- (6) Arkhiv GO, f. 18, op. I, no. 46.

- ① Kozlov 1923, p. 78.
- ® Shorthand notes of the expedition report,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9.
- 19 Kozlov 1923, p. 95.
- 20 Kozlov 1923, p. 99.
- ② Kozlov 1923, p. 102.
- 22 Kozlov 1923, pp. 102-104.
- 23 E. I. Kychanov, Zvuchat lish' pis'mena (Sounding only in writing), Moscow, 1965, pp. 27-28.
- 24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4.
- 25 Kozlov 1923, p. 108.
- 26 Kozlov 1923, pp. 108-109.
- ② Kozlov 1923, p. 112.
- 28 idem.
- 29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6.
- 30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0.
- (3) o. Iakinf, Istoriia Tibeta i Khukhunora (The history of Tibet and Koko-nor), St. Petersburg, 1833.
- 3 See Ye. M. Murzaev, V serdtse Azii (In the heart of Asia), Moscow, 1990, p. 12.
- 3 E. I. Kychanov, Zvuchat lish' pis'mena, p. 33.
- 34 Kozlov 1923, p. 406.
- 35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6.
- 36 idem.
- 37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5.
- **38** Kozlov 1923, pp. 546-547.
- 39 Kozlov 1923, pp. 547-548.
- M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4 Kozlov 1923, p. 550.
- W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43 idem.
- 4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4.
- (b)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46 idem.
- (17) Arkhiv GO, f. 18, op. I, no. 65.
- 48 Kozlov 1923, p. 556.
- (9) K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50 idem.
- (51) idem.
- 52 idem.
- (3)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24.
- Mozlov, "Dnevnik",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57.
- 5 Kozlov, 1923, pp. 555-556.
- 56 L. N.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fond P. K. Kozlov, Moscow, 1984, p. 75.
- 3 idem.
- (S) Arkhiv GO, f. 18, op. I, no. 55.
- 69 Arkhiv GO, f. 18, op. I, no. 124.
- Arkhiv Akademii Nauk, RAN, (Archiv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f.
   208, op. 3, no. 274.
- A. I. Ivanov, "Pamiatniki tangutskogo pis'ma" ("Tangut manuscripts"), Izvestiia Rossiiskoi Akademii Nauk (Bulleti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eries VI, 1918, pp. 799-800. In addition to this, see the publication by Ivanov, "Dokumenty iz Khara-khoto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the Chinese private letter of the 13th century", Izvestiia Imperatorskoi Akademii Nauk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3; "From the finds of P. K. Kozlov at Khara-khoto", Izvestiia Imperator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XLV, 1909, pp. 463-477; "Stranitsa iz istorii Si Sia"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Xixia"), Izvestiia Imperatorskoi Akademii Nauk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11, pp. 831-836; "The sutra 'On the rebirth of Maitreya in Tushita Heaven'", the Tangut text was published and a Chinese translation provided by Ivanov, Petrograd, 1916. To these should be added at least two publications by Ivanov in the German language.

- © See Kotvich, "Examples of paper notes of the Yuan dynasty in China", Izvestiia

  Imperatorskogo Geograficheskogo obshchestva (Bulletin of the Imperial Geographical Society), vol. XLV, 1909, pp. 474-477; see also hi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Mongolian writing from Khara-khoto in Mongol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pp. 561-565.
- See his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ersian text "Seven sages", in Mongoliia i Amdo i mertvyi gorod Khara-khoto, p. 566 and his descrip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Buddhist sculpture and icons in the same book.
-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 6 N. A. Nevskii, Tangutskaia filologiia: Issledovaniia i slovar' v dvykh knigakh (Tangut philology: the analysis and the glossary, 2 volumes), Moscow, 1960.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Tangut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Moscow, 1963.

理 部 值 的 很高。 俄藏黑水城文獻。 著録和拍攝工作。 重要的資料,此乃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出版界的一項壯舉。 俄羅斯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 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中國黑水城出土文獻 根據協議, 現在這些爲學術界所矚目的文化瑰寶將陸續公諸世上, 中方人員于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1993年、1994年兩次赴俄, 1993年與該所達成協議 卷帙浩繁 與俄 爲學術研究提供大量嶄 方專家合作, 合作編輯 內容豐富 進 學術 出 行 版 整 全

西夏文文獻, 俄藏黑水城文獻有八千多個編號, 也有相當數量的漢文及少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獻, 係中國中古宋、 夏、金、元時期的寫本和刻本 距今已有七百至九百年的歷史, 其中絶大部分是 均屬珍

本、善本或孤本

上。 市 今甘肅東部、 今寧夏、 子元昊時期勢力更加 不斷壯大。 五 州 , 唐初, 西夏是十一世紀初在中國西北地區建立的封建王朝, 主體民族是党項羌。 設治所于夏州(今屬陜西省靖邊縣 甘肅大部 宋初 党項族最強大的 寧夏和陝西北部一 臣屬宋朝, 陝西北部,內蒙古西部和青海東部地區。 雄 厚 南北朝時期, 夏天授禮法延祚元年(1038)元昊正式建國 拓跋部首領拓跋赤辭歸唐,被賜李姓。 被賜趙姓。後經党項族傑出首領李繼遷、 帶。 中和元年(881)党項族首領拓 党項羌主要分布在今青海省東南部、 開始了事實上的地方割據。五代時期 首都興慶府( 西夏共歷十帝, 中唐以後, 跋思恭被封爲定難軍節 李德明父子兩代的 稱帝, 後改名中興府, 四川 享國一百九十年。 國號 大部分党項人逐漸內徙 省西 大夏 夏州党項政 北 世 部 即今寧夏銀 發展, 稱 的 度 使 西夏 廣袤草原 權 前期與 至德明 勢力 管領 到 Ш

紛争 北 宋、 中 遼鼎 西 夏 <u>y</u> 盡 , 管 後 期 地 與 域 偏 南 狹 宋 金對 經 濟 峙 軍 , 事 在 中 力 量 國 較 中古 弱 時 , 期 但 它 形 往 成 複雜 往與第二 而 微 妙 國 的 聯合對 新 ٦ 了付第 三 戜 L 國 局 , 面 使 0 自己處 在 當時 各 或

足

輕重

一的

地位

1

特别 建于都府 番 是漢 文」 夏王朝 或「 州縣 族 文化 番 文化 , 書 又弘揚佛教 和 事 藏族文化 L 業甚爲發達 後世 稱西夏文。 9 完成了 境內通 0 1 行 國 用西夏文翻譯數以千卷計的大藏經的浩大工 前 西夏注 西 夏 夕 文 , 已 和 重党項族 漢 創 製了 文, 也 記記 的傳統民族文化, 使用藏 録党項族語言的 文。 西 夏 統統 同 民族文字 治者既 時積極吸 程 提 0 獨具 収其 倡 時 儒 稱 民 學 他民族文化 爲 族 番 風 學宮庠署 格 字 的 L 西

夏文化是中國中古時期歷史文化燦爛輝煌的

章

數 落 族之中而消亡 焚掠, 作爲一 民 和 族 末帝李峴 十三世紀初 建 個國祚 使大批 立 的 王 西 的 , 近二百年、 西夏文也因不再使 朝 被 夏文獻 殺 西 多知 夏經 而宣告滅 遼 有完備典章制 歷了新崛 文物遭到 金 Ļ , 用 毁損 ②蒙古軍 圃 起的蒙古帝國鐵 鮮 而變成無人可識的 度 知 0 元代修撰 西夏。 的王朝, 隊爲報復 元 遼 很多重要史料未能 騎的幾度衝擊, 明 西 死文字 宋 夏的 時 期, 金三史, 激烈抵抗 党項族 公元 西 保 勢力逐 在占 夏僅 存下來 1127 領 漸 作爲三史的 年 衰微 初 , 致使 期 , 進行 終 , 後世 最 以 附 首 後 7 1都中 對 殘 融合于其 傳略作 中 酷 興 古 的 時 府 叙 屠 期 述 戮 的 民 少 和 陷

光 對 罕見的 科學殿堂的 遺 現了著名的 登 于 址 居 以 堂人室,呈現于世 建 世 庸關 (今屬 立 九 , 從根 世紀 這是繼敦 雲臺 和 一發展 內蒙古額濟納旗 西 重大發現 本上 夏 門 初 的 文、 洞 , 煌 中 壁 最 改變了 漢文合璧的涼州感通塔碑 重要的基石 石室發現大批 國學者張澍 9 元代六體 人面 應是二十世紀初俄國探險家科兹洛夫(II.K.Kosnob) 西夏資料 前 蒙古語 文字石 以 0 自 珍貴文獻後國學資 匱 巨大的勇氣在甘 一乏的 稱「 此 刻 以 中 後 哈拉 狀況 西 夏 , 豐富多采的 浩 文字 0 特」 從 次 ·肅武 的 而 料 收獲數量 \_ 研 拉開了 的 挖掘出 威清應寺的碑亭中 究引 西夏歷史文化 又一 獲取新的西夏資料的 起了學術 次 如此 的大批 重大 巨大、 文獻 一發現 界 撩 的 開 内 和文物 0 重視 率領的考察隊 容如 啓封了 黑 7 朦 水 0 此 朧 城 0 4 序幕 豐 這些文 發 真 前 的 現 富 IE 面 人 的 対 紗 的 使 ③ 十 資料 八獻 在 西 砌 文獻 夏 和 西 九 以嶄新 的 世紀 夏黑 研 是 文物 壁 是十 西 究 壨 夏 的 水 步 末 的 9 發 姿 重 城

水 城 遺 址 位 于 今內蒙古自 治 品 額 濟 納 旗 政 府 所 在 地 達 蘭 庫 布 鎮 東南25 公里 的 荒漠之中 0 黑 水

戰 境 威 乃」之異寫 監 因 黑 1286) 脅着 争堵斷了 中幸存下來 失去了生存的 軍 古稱 司 意, 人們 弱 水 在 作 的 下 譯 此 , 爲 其源 的 生 距 曾流經巴 成漢 設 北 存 基 亦 亦 方 本條件 仍爲西夏語音 集乃城約 語 集 的 爲「 但高温乾燥却是保存古代 乃路 軍 一丹吉林 事 而 黑 總管府 減少 重鎮。 水山 10 沙 公里處的黑水河道, 漠 0 0 最後這座城 這是中國至今保存西夏語音的 西夏寶義 元代沿用 ⑤「亦集乃」爲西夏語音,「 灌溉着 農田草場, 元年(1226) 西夏舊稱, 文獻、 市終于成爲無人居 河 文物的 使這裏 水改道北 今稱額濟納旗 蒙古軍 最 好 成 條件。 住 流 重要地名 爲宜農宜 攻 的 亦集」 破黑 死城。 緑洲逐漸被沙漠吞噬 的 黑水城文獻就 牧 水 , 額濟 黑水城極端乾旱的自然條 十四世紀四十年代末 城, 的 即 緑  $\neg$ 納 洲 元 水 三三字 世 是 西 祖 意 在 夏 至 這 E 元二十 實爲 城中 種 朝 乃 特 于 的 此 殊 三年 居 由 的 亦 設 件 民

能 嚋 上 門 米 寬 段 相 明 大 的 類, 城 以 連 9 城 南 東 爲黑水城增添了壯觀景象。 這些古 內蒙古考古隊認爲小城即 痕 北長 門外 溝渠縱横 層 北 \* 1983—1984 迹 隅, 高 人留 此 拱衛 374 夯層 8 地 東、 下 10 10 正方形瓮城 米,牆基寬 12.5  $\infty$ 禾苗葱葱 的 北 公里之內無任何居民居住, 釐米。 釐米, 年內蒙古考古隊的 遺迹, 城牆與大城套合, 城 E 遥想當年寺 0 西北角矗 駝羊遍野的郊外畫 四 南設城門, 西夏所建黑水城, 城內街 面 米、 城 牆外側共有馬 立着佛塔羣, 道、 瀬林. 調査 頂寬4米左右,平均高度約 西 有瓮城、 官 <u>\frac{1}{1}</u> 南 衙、 如今在沙漠 • 兩 面 晨鐘 給人以荒 大城爲元代擴 面 馬面 寺廟、 面 城垣被元代居民改造、 其中 暮鼓、 19 凉 個 角臺等設施 店鋪、 一號塔高 戈壁中的黑水 車 死 北 水 建。 寂 馬龍 民居皆有遺存。 6, 11 10 小 南 神 0 城約成方形 OT -大城城垣 秘 米 米。東西城牆中部各設一對錯 街市繁華 的 城遺址有 東西各4。 利 感覺 ⑥高聳的 用 基本完好 的 城外依 , 憑吊 分解爲 :大城 城區 邊長 古塔雄 城牆夯築 這 圖 稀 和 238 景 座 不 小 可 古城 踞 相 東 見阡 城 在 西長 連 以 米, , 9 及阡 夯土 接 小 時 城 陌 牆 牆 的 城 421 之 還 基 畦 陌 數 在

黑 們 的 水 俄 讓科兹洛 國 城 有着動 即 四 引 川 起 人歷 夫 在 蒙古考察隊 國 史傳說的黑 黑水城 外探險家們 遺 址 其中 的 水城, 繼續尋找。1909 注 所 視 獲 使這一帶居民對此 的 最早踏上這塊神 當時 尚 年科兹洛夫探險隊在城外西邊 無人 可 秘 識的西夏文文獻, 城産生了 的土地 並 \_ 種 有所 莫測 收 引起了俄國學者的 獲 高深的崇敬 的 的 是 1908 座佛塔中 感 年 早 由 在 發現了 高 科兹洛 度 + 重 九 大 夫 世 視 來領 紀 他 文

獻 的 在 定 趣。1914 和 聖 艾爾米 一被得 文物 中國 北京 堡亞 塔什博物館( 年英國人斯坦因步科兹洛夫後塵, 相 洲 當 大學教務長徐炳昶爲首組 民 于 找 族博物館 到 7 冬宮) 個 9 後 中 0 文書 世 改名爲俄國科學院東 俄 紀 國 的 人 成 圖 在黑 書館 的中瑞 水 趕赴黑水城, 和 城所獲甚豐的 西 博 物 北科學考察團 方研 館 0 這些珍品 究所聖 掘獲不少文獻。 消 息, 彼 , 到 以得堡 旋即 也引起了其他國家探 額濟納河下 一分所 被運往 © 1927 文物 聖 游 一彼 年 公得堡 藝術品 以 黑水 以 , 城 瑞典 險家的 文獻資 則 爲中 存 人 放 斯 濃 料 在 心 文赫 厚 著 存 進 賱 放

險隊 難 以忘懷 九 ` 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考察隊 中國學術界同仁更是感到深 紛至沓來, , 中 中國的 國大批珍貴文物 深的 清 朝 遺憾, 政 府 政 都希 治 相繼流失海外。 腐 望這些國寶能早日 敗 , 國力孱 對于這段慘痛的 弱 列 重見天日 強 人侵 0 , 當 歷 回 史, 時 歸 祖 中 此 外 國 人民 或 的 探

考察,黄文弼在此又發掘出

批

書 調 年, 二十五身西夏時代泥塑像 百 年 中 查, 八十多處 和 或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曾兩次到黑水城遺址進行考古調 國家文物局 1949 1984 同 在 年, 距黑水城約 年後 年 中 出. 兩 |國 批准 土不少文物 次 黑 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組織的西夏考察組也初次赴黑水城進行考察和 發掘 水城 20 由 , 遺 和 公里的老高蘇木遺址 基本上將全城勘查完畢, 內蒙古考古研究所聯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進行 址 和多種西夏文、 少量文書。® 1976 所 在 的 額濟納旗 漢文和蒙古文文書 先 年甘肅省組成考古隊于黑水城遺址及其周 也采集得一 後 人劃歸 重點發掘 查。1963 甘 I肅省 些文書,1979 面 積 和內蒙古自治區 11000 年秋季的 多平方米 年又在 調查持續 管 黑 轄 水 揭 時 · 1962 訪 城 露路 間 圍 問 發掘。 較長 出 内 地 得 房 區進行考古 年 1983 到 屋基 經 和 少 發現了 年經 1963 址二 量 文

綜觀先後 出 土 的黑水城文獻, 仍 以 俄國所獲最稱宏富。其餘各次所 出文獻 無論從數量上 内 Ē

種

類上

學術價值

上皆不能望其項背

夏文專號)上 考證出 (А.И.Иванов) 開 始整 俄 國 此 理 學者對 一佛經名 研 0 當 究這些 俄 稱 他 時聶歷 藏黑 在卷帙浩繁的 文 同時編輯了西夏文字典, 水城 獻 Щ (H.A.Heвский)在日本工作, 文獻 從中 先 選編出四十一 文獻中 後 進 行 首次找到 7 多 次 種 實有開 文檔 7 整 西 理 目 夏文一 創之功。二十年代末, 和 録 著 他通過伊 録 發 漢 0 表在 文雙解詞 最 早 鳳 中國 着 閣等人 手 語集《 進 國 行 得到了部分文獻資料 龍果夫 <del>V</del> 整 番漢合時掌中珠 北 理 平 和 圖 ( А.А.Драгунов ) 研 書館館 究 的 是 刊 伊 並 鳳 西 進 並 閣

1984 作 第 最 的 行 中 的 勞動 的 研 大的 · 1963 西夏 個受命編造所藏西夏文文獻 究 漢文文獻作了詳 年蘇聯科學出 西夏文文獻作了認真的整理和著録。 , 發 文寫 很 年蘇聯東方文學出版社 高的 表了不少論著 本 和 學術造詣爲俄藏黑 刊 版社 細著録。② 本 出 · 1929 , 版了孟 這是在 多年來克恰諾夫、 清 年 出 列夫 (Л.Н.Меньшиков) 册 前 水城文獻的 他 版了戈爾芭切娃 0 人基礎上整理 П 他 國 在 後, 俄國學者不辭繁難、鍥而不舍的精神令人贊賞 清 開 理 整理做 的 始 克平(K.B.Kennur)又繼續對俄藏黑水城 對 同 的 時 俄 出了卓越的 比較系統、全面 ( 3.И.Горбачева ) 藏黑 對文獻 的《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 水 城 進行了拼 貢獻。 文獻進行科 的 合、 後來又有 俄藏黑水城 和克恰諾夫(E.M.Kычанов 摘 學 録 前 系統 多位學者參 和 研 西西 叙 的 究 夏文文獻 録 整 聶 理 加 文獻中數 歷 和 書 7 Ш 研 目録 整 以 究 對 理 辛 , 其 勤 並

世 量 一最 俗文獻和佛教文獻, 多 俄 藏黑水 約占 90% 城文獻有西夏 左右;漢文文獻次之,不足 其中佛教文獻占絕大多數。西夏文文獻就內容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文、 漢文 藏文、蒙古文、 10% .. 回鶻 其他民族文字資料數量較少。 文等多種民 族文字 類型 其 這些文獻又可 中 西 夏 文文 獻 數

### 語言文字類

貴 等 詞 中 少 文 韻 的 人獻反 數 其 的 的 書 典 7幾 他 西 0 西 ^ 俄 一映了 種 文海 西 夏語 藏黑水城文獻中 夏語言資料其種類之多樣 義 文獻資 夏 同 大 《語屬 是 寶 西夏學者對 批 (韻 料 , 漢 西夏語言資料 種消亡 湿 公藏語 (簡 如著名的 有 用 -有多 稱《 系藏緬語 的語言, 西夏語認識 西 夏文譯漢字 文海》 種記 西夏文一 的 出 對消亡的語言衹能依賴保存 録 族 現 和 內容之豐富、 0 研 描 漢文雙解詞 , 9 漢藏語 語音注釋西夏文字義 爲漢藏語言的 究的 述 西夏文字書《音同 系中 水準 解 釋 語言衆多 價值之高超足 西 語集《 對現在深 夏語言的 深層次研 番漢合時掌中珠 , 的字書 但 入研 字典 , 下來的 究開闢了 有 可 西夏文韻圖和韻表《 中 究 與 《纂要》 -古時 和 辭 同時期漢語文音韻 文獻資料進行 構 書 新 擬已消 期語言資 的 語 , 領 注 音 域 用 亡的 表 釋西夏文字形 藏 料 研 以 文注 Ŧ. 究 西夏 及 的 書籍 僅 音切韻 大 音 量 黑 有 語 的 無 漢 相 水 研 疑是 語 媲 城 究 西 音 美。 西 夏 西 , 藏 至 夏 文 同 夏 《語言 爲 資 這 文獻 義 義 此 的

六 種 十餘年 用 西 夏 範 文字的 0 童 西 廣 夏文字結構複雜 使 創製和 用 品 推 域 寬 行 是西夏文化史上具 延續 , 史書記載其「 時 間 長 的 實 筆 用 有劃時代意義的 畫繁冗 文字, 從 屈 創 曲 製 開 大事 類符篆 始 直 作爲西夏文化 L 0 到 作 元 爲一 明 種 靈 死文字, 前 魂的 後 使 用 西 其字形結構 夏 至 文字 少 有 四四 是 百

和 出 研 規律 究成爲文字學中 西 夏 文字構 這些文獻不僅 造 的 的 秘 密 是西夏文字學的基礎, 個 0 I 難 西夏文字構造既 題 0 俄藏黑 水城文獻中有 吸 收 也豐富了中國文字學的 了漢字的造字方法, 分 析 西夏文字構 又獨運 內容 造 的 匠 ^ 文海寶 心 創 造了 韻 等 特 資 殊 的 料 字 可 方 揭 示

### 一歷史法律類

禀帖 少 值 官階封號表 容, 經 濟 的 政治 爲西夏人自己 部 過 黑水 文化 去所能 分 的 城 軍 但 以 史料 副 見 事 内 將上 到 獨特的形 方 容 所 的 面 簡 撰, 例如 書等, 有關 稍 略 多 式記載西夏官制, 數種西夏文文書, 真實地反映了西夏的歷史和社會面貌 西夏的史料, 掛 , 通過典型的 經 濟 漏萬 文化方 0 其中 主要是史家編撰的漢文資料, 個案材料 面 西 是具有重要價值 像天盛年賣地文契、光定年穀物借貸文契 偏 夏與宋、 少。 9 反 黑 映了 遼、 水城發現的西夏文獻中 西夏時期政治 金交往的 的 稀見文獻 不僅 史料稍多一些, 皆非西夏人自己撰寫 有 政 ` 治 軍 事 有關 軍事 • 經濟: 歷 內容 史 西 情 夏 黑 況 法 本身的 也 水城守將告近 律 他 雖不乏有 包含着 方 如 史 西 面 實 夏 很 的 文 價 多 内

軍事 獻 社 謹 制 四 數 係 攻 富 的 守争戰 會家 百 民 西夏文木 條款分類 史上一 法典 堪 族文字印 細 餘 如 稱 夏立 庭 條 密 ^ 天盛 等 次 ^ 的 0 的 貞觀 規 部 大膽 它吸 刻 布 國 方 傳 定 行的 真 局 本, 後漸 面 改 統 的 收 玉 E 舊 的 , 要求 革新 法 鏡統》 諸法合體 很近于現代法律 這是中 新 並 了 有完備的法律,然而漢文史料失于記載, 重 主要內 典。 唐 定律令》(簡稱 且 0 ` 在 賞 等。 宋律 容 國古代繼印行《宋刑統》 在內容上也不落窠臼 原爲二十卷, 行 罰 的 政 等 另 其中最 的 法典, 法 如 精 具 條文形式 華 民 體 填 貞觀玉 重要、最完備的當屬《天盛律令》。 《天盛律令》), , 法、 而微 形式 補了漢文史料中所缺乏的 今存十九卷 經 鏡統》 和 濟 是 其系統性 内容 法 中 别 國 後又一 作爲西 樹 上 , 軍事法方 中古時期少見的頗具特色的軍事 卷內分門 又有自己 幟, 在其基礎上修訂 和規範性 夏 次公開刻印頒行的王朝 的專門軍事著作 不僅繼 黑水城發現的 面 的 比 門下 在當 特 西夏行政管理 承了 點。 唐 時 列 律》 的 唐、 在 是絶無僅 條,全書共一百 形式 這部法典現存一千三百 文獻中 宋律 新法 記載 上, 宋 軍 法 在 有 V 却 刑 事 綱 典, 刑 的 7 法 ^ 有 統 制 法 目 有關 , 多種 也 可 分 亥年新 V 四十七門 度 更 訴訟 以説 明 是第一 西 充 西 夏 經 **災將帥** 實 是中 層次 夏 法 法 濟 法 部 方 餘 賦 , 更豐 用 以 律 税 清 頁 國 面 法 千 晰 少 文 及

## 三 社會文學類

文 的 V 以 , 俄 民族共同 及 收録了 藏 對 黑 水城城 番 7 體 很 漢、 文繡 多有關西夏社會生活 了 藏 解 中有多 西夏境內各民 口 種 鶻 通俗蒙學讀 契丹等民 族的地位 的詞 語 族特點的 物 ^ 三才 和 其中 相 互關 雜字 記載, 有關民族 係極具 V 對 和 于認識 姓 類 價值 氏 似 漢 , 和 主要是番 文《千字文 研 究西夏的主體 姓 V 的 党項族 著作 民族番 姓) 《新集 和 族 是一 碎 漢 姓 金 個 置 的 複 記 掌

到 會 狀 西夏人對自然以及倫理道德 況 俄 藏 黑水 以 事 類帶 城 文獻 條 目 中 有一 條目下 種 大型 社 ·有詳 會制 類 細注 書 度 ^ 聖立 釋 ` 人際關係等認識, 共十五 義 海 V 一卷 , 以特 0 盡管現在 有 是研究 的 體 究西夏社會不可多得 裁 已不完整 比 較全面 但從遺存的部 地記 載 7 的 西 重要資 夏 的 分仍可 自 然 7 和 解 社

婚姻家庭 不少親屬 還 有 稱 準 調調。 種 確 西夏文文獻名爲 地釋讀其他 西 夏的親屬稱謂 西夏文獻中 ^ 新集慈孝記 有别于漢族, 有關親屬的 具有藏緬族系的 , 這是西夏輯 內容大有裨益 譯的中 特 點 凉 0 地區 這類文獻對 慈愍孝行故事集 I 確 地 理 解 其中記 西夏 社 會 的 了

要資 料 此外 還有醫 方 曆 書 占卜書等等, 皆爲研究西夏及同時代 的 中 原 王 朝 社 會 歷 史與民 俗 文化 的 重

經 理 的 辭 西 經 中 夏文詩歌集的 道 中 過 有 西夏的 很 德 觀 搜 祝願美好的 多發願 念 文學作品傳 集 了 諺 文和 寫本 大量 語 未 和 序言, 還爲了 多 來 世 種 刻本, 類 極 這些 多用對仗工整的駢文, 少 解 **処型的** 西 保存了數十首詩歌 一出 過去所能 夏文學 西夏諺語 自 西夏人手筆的 ,的對 見到的 偶 以 ` 醇 比 祇是漢文文獻中 厚 是研 作 喻 反映出 的 밆 民 究西夏文學特點的 引申 族風格展 以精妙的 西夏詩 韻 歌 尚 律等形式提供 示了 的 文采闡明 存的零星佚 面 西夏社 貌 重要資料 和特 佛學奧 會 點 文 了 風 有 0 情與党項 理 價 在 俄 1 諺語 值 藏 黑 叙 的 述譯 素 集 水 族 城 材 經 的 新 文 獻 民 集 西 绵 俗 印 夏 中 合 佛 有

# 四 古籍譯文類

古籍 私家 注 類 的 俄 書 藏 作用是不言 西 夏 六 黑水城文獻 韜 共十卷五十篇, 文 孝 經 而 中 喻 黄石公三略 的 的 發 除 佛經 失傳已 現 如西夏 能 外 重 文草 久 現 ١ , 這 有 ^ 書《 然而 部亡 類 以 林 西 孝經 佚 夏 它以西 己 文 翻 久 十二國》 夏文刻本 的 譯 , 古籍 譯自宋朝呂 的 ^ 論 0 等多種 的 語 又 形式 如 惠卿 ^ 原 保存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 ^ 類 注本 林 漢文典籍 孟 子 V 是 , V 唐代 而 ` 漢 , 文文《 這些文獻對 孝經 于 立 孝 政 ,經》 編撰 呂 孫子 校 的 通 注 訂 過 部 本 兵 早已 翻 重 整 譯 理

王 和 朝 統 理 治者 補 充 強調 , 能 使這 武 備 失傳數 重視兵法 百 年 的思想 的 重要古籍重 亦 有助 現 于探討西夏人怎樣 原 貌 0 黑 水城 出 土 理解漢文的經典兵法 的 幾部譯自漢文的 兵書反 爲中 映 或 了 的 兵 西 夏

度 反 西 映 夏 出 翻 中原、 譯 的 文化對西夏文化的強大影響, 很 多種 漢 文典籍 説 明 儒 學 在 是研究西夏文化與中原 西 夏 有 重要地 位 , 表現 文化關 7 西 係的 夏 吸 納 有價值 中 原 的 文 化 的 能 力 和

### 五 佛教經典類

7

增

添

7

新

的

版

本

佛經 藏 有關 的 内 的佛教制 不僅是了解十二至十三 同形式的 力修造寺 係 大力推行 中 西夏 方廣佛 帝 俄 爲中 的 師 藏 寫 廟 黑 的 度都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人自己編撰, 序 本和 華嚴 佛教 水城 國 記録 刻經史增添了 跋 印 刻 文獻 經 施 發願 佛 在 本 曾多次向宋朝 V 中 等 經 中 0 這些 如《 數 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文、 世紀藏傳佛教的重要文獻 量 有的譯自藏文經典 這些佛 新 一佛典珍品 依 題款等, 最多的 的重要篇章 金剛王亥母以淨 教文獻有 贖取大藏經 是西 如 多種西夏文佛經的題款 對研究和校勘佛教經典 對了解西夏佛 夏文佛經 的 譯 , 歷經 瓶 如 自漢文藏經 親 0 9 9 流誦儀 教 也是研究西夏佛教與藏傳 種咒王陰大孔 有 西夏文大藏經是中國第一 五十多年 的 四 流傳 百 軌 多 7 V 中 如 以西 種 有極爲重要的 ^ 記載了 譯 ^ 經 中 數 夏文翻譯大藏經 雀明王經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以 有身要論》 千 西 寫經 卷計 夏的 價 V 次用 佛教 兩位 印 值 經 等。 西 ^ 0 密 帝師 大密咒受持經 少數民族 大量譯自藏 夏王 , 切關 不少 並 施 經經 耗費大量 朝 /佛經 這 的 係 提 是中 文字 大寶 情 的 倡 文的 況 可 都 佛 刻 國 靠 以 有 積 人 法 **》**等 印 資 多 最 及 佛 力 早 西 料 經 種 在 , 的 夏 有 物 境 大 不

宏、 于 也 料 刻 印 是 風 表 印 俄 種 格 現 藏黑 度 文獻中 出 獨 有 類繁多 水城 特的 西夏 流 的 -有寫 行 則 書法 于藏 文獻 版 , 爲 本 不 畫 坊 族 特 湿 拘 和刻 刻 殊的: 爲了 地 保留了 本或 园 本 格 魅 解 的 私 書 其裝式豐富多采, 力 西 刻工姓名 梵夾裝 人 體有篆書 夏乃至宋朝 刻 西夏刻印 本 0 有些 很多西 版式也多種多樣 • 一文獻 楷書、 書 事業十分發達 籍 夏刻本 卷裝 有封 的 行書 書 套 寫 刀 和封 經摺 法 草 刻 9 , 嫻熟 規格 政府 書 裝 面 印 0 蝴 裝幀 形 不 設刻字司 有 印 蝶裝 式 的 • 製 多姿多采 書法精 精 大本 紙張: 美。 包背裝等皆備 , 等版 有 絶, 的 有 盈 的 的 尺 有 文獻 看 本 佛 的 情 到 經前 了這些 即 運 小 況 筆 明 提 本 書 確 隨 供了 此 的 還 冠 標 外 僅 意 以場 出 1 大 古樸自 湿 餘 爲 量 猶 刻 有 如 面 實 來 進 字 恢 物

源

資

司

人西夏書籍版 本的 大展 廳 , 想見中國中 古時期 書籍發展 的 各 種 形 式

語 此 刊 了 譯孫子 藏文爲西夏文注音的材 究 克恰諾夫著《 俄藏西夏文《 音:1966 (М.В.Софронов) А.П.Терентьев — Катанский ) 作 悉、 黑 西 布了原文;1990 詞法學 ^ 西 出了 水 作 夏 介紹 城出 夏國家的書籍事業》 爲多學 文文獻編 最 »··1988—1989 重要的 土 出 論語》 類林 研究 文獻 科研 新集錦合辭》 版 了克羅科洛夫( 著 和克 究對 貢 的著作陸續出 V , 年德國的 需 和《新集慈孝記 獻 的 《孟子》 料 家的 恰諾夫的《西夏語語 要有數十年如一 西 他們 研究西夏語音;1960 年克恰諾夫出版了《天盛改舊新定律令》 夏文字 , 俄藏黑水城 赫伯特• 利用俄藏西夏文獻研究了西夏有關書籍的問題;1985 的主要著作 俄譯並 ` 版就是明證 В.С.Колоколов) 典手 克恰諾夫著的《文海》,俄譯並刊印了俄藏《文海》;1974 ^ 孝經》;1969 **\*** 刊印了原件;1979 弗蘭克和克恰諾夫出版了西夏軍事法典 稿, 日堅韌不拔的 文檔 研究並刊印了三書的原文;1981 有:1926 同 0 , 音 其價: 面對 時 年又出 研究 發 浩 值 年出版了克平、 年 表 和 越 如 巨大勇氣和脚 版 聶 克恰諾 了 烟 來越引起學術 歷 第一次用 年、1983 1 他 海 他的遺著 山 的 的 寫 夫的 研 文獻 的 究著作;1964 ^ 俄藏西夏文文獻系統 年和 踏實 克羅科洛夫、 , 西夏文字抄 ^ 西夏譯漢文經典》 界 難以釋讀 俄譯並研究了這一重要文獻 唐古特語文學 (地的 的 1990年捷連基耶夫-注 科學精神 意 ^ 貞觀 年克平先後出 が贈り 的 0 年 多年 捷連基 文字, 玉 年克平 出 **\** , 鏡統 0 來 利用俄 版 , 地 , 俄 下 公布了他 耶夫一 了 研究 卡坦 出 介 決 或 索 紹 版 的 心 藏 此 版 弗 7 學者 卡坦 斯 年 並 了 了 去認 介 文 羅 西 出 獻 基 刊 利 紹 諾 同 西 西 斯 夏 們 版 出 印 中 用 和 夏 版 夫 爲 夏 俄 以 研

獻 成 的 静 館 成 見 深將 全· 漢 介紹 刊 .. 1986 ^ 如 番 文 ` V 中 第 漢 書抄寫 國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俄藏黑水城文獻的 和 聶 四 並 研 合時掌中 歷 年李範文的 作 究 Щ 卷第三 石印流 主 整 石 一號作 理 要著作有:1983 濱純 珠 和 行 ^ 研 爲 太郎等分别作了考釋。 一頁, 究 1935 同 音 西 .. 1985 研究》 夏文專號 深知該書的 年羅福 年 年史金波 , 陳 成又抄印 L 對 炳應 出 西 重大學術價值 版 夏 的 價值 近十幾年來中 白濱、 文 了俄藏西夏文字書《 介紹了 西 ^ 0 音同 夏 早 文物 黄振華的 在 V 此 研 1913 次年即借得此書九頁石印 作了 國的 俄藏西夏文獻的 究 研究;1988 年 西夏研 文海研究 内 , 音同 寓居日本的 中 究專家更加 也 介 · 1932 片斷 紹 , 年 將西 和 史金波 羅振 研 , 年《 羅 夏 重視 究 流 文《 福 玉 了 傳 的 或 對 萇 自伊 不 文海 立北 俄 少 1924 西 羅 俄 藏 鳳閣手 夏 平圖 西夏 福 藏 佛 年 全 西 成 教 文 夏 部 中 史 福 得 王 文

文; 年 陳 華 波 略 炳 史金波 同年 林 應 聶 白 利 鴻 的 濱 李範文的 音 用 ^ 1994 黄振 西夏 吳峰 俄 史 藏 **〈**諺語 金 黑 雲的 華 年史金波 波 《宋代西 水 聶 的 城 ^ 文熽 鴻 ^ 西 音的 番漢合時 夏文物》 新集錦成對諺語 、聶 北方音 文物 鴻音 類林 V 掌中 研究西 , 研 其中刊布了俄藏黑水城文獻、 利 白 珠 究 用 濱 夏佛教 的 俄藏夏漢對音資料 9 ^ 在中國第一 將西夏文《 將俄藏西 西夏天盛律令》 歷 史, 並 夏文諺語 次全部影印了原刻本, 類林》 重 新 研 整理了 究中國 , 譯成漢文, 《新集錦合辭 將 文物六十多種圖片;1989 西夏文《天盛 俄藏西 西 北方音 恢復了失傳 夏文佛 並作了索引;1993 全部 律令》 經 目 譯 [録: 已 成 全部 ) 久的 漢 同 文; 譯 漢 年 年 文 黄 史 成 金

分别對西夏文《五音切韻 西 夏語的研究》 著名的 年發表的 日 本西夏學專家西 西 夏語韻圖 依據俄藏西夏文文獻研究西夏文字、 V 和《月月樂詩 へ五音切韻 田田 龍 雄也 很重視俄藏黑水城文獻的整理 W 的研究》,1988 作了 研究 語音和 年 發 表的 文法 和 ^ , 並 西 研究。1964 [夏語 編輯了西 ^ 月月樂詩 夏文小字典;1981 年 , 1966 的 年 研 究 出 版

的

堡 期 告 劃 量 全 于俄藏黑水城文獻數量特别多 展 深 而 東方 卓有 部 的 訴 感 並 遺 中 各 他 出 能 俄 親臨 將使漢學研究的某些領域因獲得新的資料 甚至認爲: 研究所特藏部 國 成效的 版 憾 位 歷 中 學 史 查閱文獻的學者畢竟不多, 術 使 近十數年來 進行 界的 工作 日等國 專家們 深 同 的 利 刊布科兹洛夫所 西夏學專家爲介紹、 仁 足 人 研 用這些文獻中的珍貴史料 不出 書櫃中 究 這 西夏學悄然升温 , 個 户 也 即 願 已經 即對 很多具 能 望 就 查閱 面 黑 獲文獻, 要實現了 世 栭 有重要價值 水城文獻進行 的祇占全部文獻的極少部分, 整理、 且閱讀 研 究 這批珍貴文獻以其獨特的文化 乃是具有頭等國際意義 翻譯 而得到促 的時間 , 利 全 探尋遥遠的 的典籍長期不爲世 用 部俄藏黑 深層 和 0 研 也終究有限 聶 進 究俄 次 歷 的 水 Щ 第二 藏 西夏王國 城 生前曾擬定過刊 黑水城 文熽 一次開 9 因此 人 的科學事業 的 絶大多數仍 文獻 所 掘 的 出 知。 面 版 魅力吸引 學 貌 付 是西夏研 將 出 術界希望 專家們因 布 會 進 了辛勤 0 ·俄藏黑水 大 然默 而 L 大 13 着學術 對 究 推 現在 「難以 有 默 的 西 的 進 勞動 朝 最 夏 地 西 城 界 見到 終 乃 躺 可 文獻 同 至中 夏 目 H 在 以 學 它 仁 聖 的 作 欣 能 的 們 慰 將 7 的 彼 地 其 大 得 由 而

有 7 新 在 的 兩 次 收 赴 獲 俄 如 I 作 發現了 過 程 過 中 去未曾登録 我們 在 原 過 有的基 的 新文獻 一礎上 對俄藏黑 重 一要韻 書 水 文海 城 文獻 寶 韻 又 作 了 的 寫 次 本 整 書 理 一頁背 著 録 面 對 和 I 面 定

字 種 面 世 考 注 |釋形 究 界上最早的活字印本有重要的科學和文物價 使之更趨完 椹 酌 ١ 義 匡 ١ 音 整 Œ 過 的 刻 去定名 如 本 ^ 天盛律 ^ 音 不確者, 同 ÷ V 9 以 考定某些 及藥方 貞觀 一文獻 玉 ` 值 鏡統 告狀案等 0 成書年 這些成果都 V 代 0 對 類 等 林 0 將在我們的 些 同 時 等都增添了 已經整理 還發現了 出 過 版物中反 多 新 的 的 文 種西夏活 獻 內容 , 映出 又找 0 字 此 版 到 外 了 還 新 籍 對 的 這 文 葉

人員 彼 藏黑水城文獻 的 的 Л.И. Чугуевский) 得 充 0 爲中方人員提取大量文獻 分認識 上 目 海 相 前 古 出 (Ю.А.Петросян) 籍 版 没 出 的 有對 俄 版 出 社 藏 更是熱情合作, 版 學術發展 黑水城文獻 是享譽 I 作 海 9 的 實 内 的 支持 付出了辛勤 外 在是功德無量 熱愛和 V 的 這樣大規模 使 和 專 累 這一 業古 支持 心 的勞動 難度很大 籍 的 0 的 副 出 精 0 中 神 純 版 所 方 社 學術性著作 長 的 没 人員· 克 這 工作 恰諾 有豐富的編纂與出版 在 次 得 他 聖彼得堡工作 夫 們 以順利 和 是極 又當仁不讓 研 究員 進行 爲不容易的 孟 期 列 該所特藏部 經驗 間 夫 以 9 事 得 很 , 克平 是難 到了 大的 情 Q 没 東 的負責 魄 以 E 有對 方 力 承 古 擔 擔 研 耶 人和 這這 究 負 文 人獻 夫 所 起 項 斯 I 所 重 價 作 基 長 任 俄 值

類 版 0 歷 漢 史法 文 俄藏黑 文 律 獻 類 依 水 城 俄 社 文獻 藏編號 會文學類 派順 按漢 序 和古籍譯文類。 編印 文文熽 0 西 西 夏文世 夏文世 西夏文佛教文獻參照經 俗文獻參考傳 俗俗 文 獻 西 統 夏 分類 文 佛 方 教 律 法 文 按 獻 論三藏分類 內容分類 和 其 他 民 族 依 文 字 次 爲 文 獻 言文字 分 出

年 0 西 當 我們 夏文字創 把學 製是 術 界翹首 西夏 文化 企 一盼的 發展 ^ 的 俄藏黑水城文獻》 里程 碑 , 我們 相 信本 奉獻給讀者的 書 前 出 版將 時 成 候 爲 ٠, 西夏研 E 值 西夏文字創製 究新的 起 九 百 六 + 周

歐 艾 整 爾 理 亞 米 此 塔什 出 次 出 此 博 , 地 版 公諸 品 物 的 展 館 ^ 世 俄 覽 的 L 大批 藏黑水城 受到 , 使黑· 珍 少貴的 學 水 文熽 術 城 界 繪 出 和 畫 V 土 僅 藝 文物 術界 是科 精美 全 介的 的 兹洛夫獲自黑水城 部 青 雕 重 睞 塑 見 和 天日 我 器物等 們希望這批 則 , 學者幸甚 古物 也 是西夏 的 文物也能像 部分 文物 或 人 的 9 幸甚 另一 俄藏 菁華 黑 部分是藏于 其中 水城 文 部 獻 分 精 聖 樣 彼 得 堡 在

文獻 Ì 富 最 後應 有 成 分 該 效的 重 特别 視 I 作 將 提 此 出 使 列 的 之名得 爲 是 中 9 中 或 以 國 順 社 社 會 利 會科學 進 科 學 行 院 院 重 在 點 院 本 書 項 部 及外 Î 出 版 組織 事 之際 局 領 科 導 我 研 們 對 局 中 劃 對 安排 整理 或 社 會 編輯 並 科學院 一委派 外 出 的 領 事 版 填 局 ^ 楊 俄 和 建 有 藏 關 國 黑 部 同 水 門 城

表

示

衷

心

的

感謝

- 注 ① 九八《党項羌傳》。《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党項傳》。《宋史》 《北史》卷九六《党項傳》,中華書局校點本(以下正史同)。《隋書》卷八三《党項傳》。《舊唐書》卷 《遼史》卷一一五《西夏外記》。《金史》卷一三四《西夏傳》。清吳廣成《西夏書事》,道光五年(1825) 卷四八五、四八六《夏國傳》 (上、下)。
- 2 《元史》卷一《太祖紀》。

刊本。

- 3 清張澍《書西夏天佑民安碑後》,載《養素堂文集》。
- 4 威利《居庸關的古代佛教碑文》,1870年。戴維利《西夏党項碑文》11卷,巴黎,1898。
- 《元史》卷六〇《地理志》。

6

(5)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黑水城考古發掘紀要》,載《文物》1987

年第

7

- 7 向 .達《斯坦因黑水獲古記略》,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4 卷 3 號(西夏文專號)。
- 8 內蒙古文物工作隊《額濟納旗沙漠中古廟清理記》,載《內蒙古文物考古》1981 年創刊號。
- 9 岳邦湖、 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年。 陳炳應《我國發現的西夏文字字典〈音同〉殘篇的整理復原與考釋》,載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編
- 李逸友編著《黑城出土文書》( 漢文文書卷 ),科學出版社,1991 年

1

- 11) 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西夏文寫本和刊本》,蘇聯東方文學出版社,莫斯科,1963 年
- 12 孟列夫《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 ,蘇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編輯部,莫斯科,1984 年
- Щ 哈拉浩特西夏文獻出版計劃》,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東方學檔案,轉引自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西

13

夏文寫本和刊本》導論。

### Preface

The materials from the ruins of the Chinese city of Heishui, kept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re of great scholarly value because of their vast number and substantial content. In the year 1993,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reached an agreement with the Russian Institute to cooperate i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the entire Russian colle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at agreement, Chinese personnel went to Russia in 1993 and 1994, and worked together with specialists there on arrangement, registration and photographing. Now these cultural treasur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in academic circles, will be published in succession and will supply many important new resources for scholarly research. This is a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scholarly world and a magnificent accomplishment in the publishing world.

With more than 8000 numbered item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Heishui (or Heishuicheng) is comprised of precious, rare and uniqu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from the Song, Xia, Jin, and Yuan periods of China's middle ages, 700-900 years ago.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the collection is written in Xixia script;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amount in Chinese and some in scripts of other nationalities.

Xixia was a feudal kingdom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of China in the early 11th century. Its capital was Xingqingfu (later renamed Zhongxingfu, i.e. present-day Yinchuan city in Ningxia), and its main nationality was Tangut Qiang. In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Tangut people were located mainly in the vast grasslands of southeastern Qinghai and northwestern Sichuan provinces. At the beginning of Tang, the Tangut leader Tuoba Chici, of the most

powerful Tuoba tribe, attached himself to the Tang dynasty and received the family name Li.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Tang, most of the Tangut people had migrated successively to the region of eastern Gansu, Ningxia and northern Shaanxi. In the year 881 the Tangut leader Toba Sigong was granted the title of Dingnanjun Jiedushi and the authority to govern five prefectures, with the prefectural capital at Xiazhou (now Jingbian county, Shaanxi province), giving birth, in fact, to an independent local regime.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the forces of the Xiazhou Tangut regime grew steadily. At the beginning of Song the regime submitted itself to the Song dynasty and was presented the family name Zhao. With the later developments under the outstanding Tangut leaders Li Jiqian and Li Deming, to the reign of Yuanhao, the son of Deming, the regime's strength expanded. In the year 1038 Yuanhao made himself the emperor and established a state named Daxia, i. e. the Xixia of later histories. The vast area under the country's jurisdiction consisted of Ningxia, Gansu and northern Shaanxi, western Inner Mongolia and eastern Qinghai. With ten emperors, the Xixia regime lasted 190 years, coexisting with Northern Song and Liao in the earlier stage, and with Southern Song and Jin tn the later stage, which resulted in a complex and delicate situation of a new "Three Kingdoms" in the middle ages of China. Despite its narrower territory and weaker forces of economy and military, in the inter-state disputes of that era, Xixia occupied a decisive position by regularly allying with a second country to resist the third one.

The cultural undertakings of the Xixia dynasty were considerably developed. Before the state was established, native characters were created for recording the Tangut language, and were called fanzi, fanwen or fanshu at that time, and afterward Xixia characters. The Xixia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ts nativ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actively assimilated cultures from other nations, especially the cultures of the Han and Tibetan peoples. Xixia and Han characters were used concurrently in the country, as was the Tibetan script. The Xixia rulers not only advocated Confucianism by establishing schools in prefectures and counties, but also promoted Buddhism by completing the great work of translating the Tripitaka of thousands of volumes into the Tangut language. The Xixia culture of a unique native style is a brillian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In the early 13th century, after suffering repeated attack by the powerful troops of the newly arisen Mongolian empire,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capital Zhongxingfu and slaughter of the last emperor Li Xian, Xixia was declared destroyed. Taking revenge on the fierce resistance of the Tanguts, Mongolian troops brutally butchered, burned, and plunder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ir occupation, destroying a great quantity of Xixia literature and relics. When the Yuan dynasty compiled the dynastic histories Liaoshi, Songshi and Jinshi, Xixia was only briefly narrated in biographies attached to the three histories. Although a kingdom of nearly 200 years complete with its own decrees and regulations, many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Xixia have not been preserved. This fact makes Xixia less known than Liao and Jin of the middle age kingdoms established by national minorities.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the force of Tangut ethnicity became weaker and it at last assimilated to others, while the Xixia characters were no longer used and became unrecognizable, a dead scrip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Chinese scholar Zhang Shu boldly excavated the protecting wall of a stele pavilion in the Qingying Temple of Wuwei, Gansu province, and discovered the famous stele in Xixia and Han characters of the Liangzhou Gantong Stūpa. This discovery was the prelude to acquisition of new Xixia material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research on the portion in Xixia script of the six-script inscription at the gateway of Juyongguan Pass aroused attention in scholarly circles. The really significant discovery that led Xixia studies into the halls of science was the vast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ifacts excavated by the expedition headed by Russian explorer P. K. Kozlov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in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of Xixia (near present-day Edzina Banner of Inner Mongolia, called Khara-khoto in the Mongolian language). The reappearance of literary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situation in regard to the scarcity of Xixia materials. The acquisition of a collection simultaneously vast in quantity and plentiful in content is a rare occurrence, and it is the second-most important discovery of Sinological materials after the excavation of the treasure of precious documents from the Dunhuang cave. The material discovered at Heishui is the most important foundation on which Tangutology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From then on, the rich and varied historical culture of Xixia has been

shedding its veil of obscurity, and with a brand new bearing has advanced steadily and made itself known to the world.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lie in the desert wastes 25 kilometres to the southeast of Dalain Kob town, seat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Edzina Banner of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Flowing through the Badain Jaran Desert to irrigate the farmland and grassland, the Heishui River (anciently called Ruoshui) made the place an oasis suitable for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The Xixia Kingdom established a military district, making it an important military town. Mongolian troops captured Heishui in 1226 and the Yuan Emperor Shizu (Qubilai) set up the route command (Zongguanfu) of Edzina Route there in 1286. In the Tangut language, edzi means "river" while na means "black", in Chinese translation "Black River". The Yuan name Edzina, now Edzina Banner, is really a transliteration from Tangut, and is thus an important Chinese place name preserving the Tangut pronunciation. At the end of the 1340s, the Heishui river course, about ten kilometres from the Edzina city, was stopped up owing to warfare; the river flowed instead to the north and the oasis was gradually covered over by sand. The town's inhabitants declined in number because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living disappeared and finally the city became an uninhabited ruin. Although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extreme aridity at Heishui imperils human life, heat and drought are the best conditions in which to preserve ancient documents and artifacts. The Heishui collection was luckily preserved in such special circumstances.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the Inner Mongolian expedition in 1983-1984 at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now in the Gobi desert, there is a larger walled town and a smaller walled town. The smaller walled town is located at the northeastern corner of the larger walled town, its eastern and northern walls overlapping those of the larger walled town, while the western and southern walls were divided for use by the Yuan inhabitants into separate sectors. The Inner Mongolian expedition team maintains that the smaller walled town was the former Xixia city of Heishui, while the larger one resulted from Yuan expansion. The smaller city is roughly square, 238 metres long on each side; the base of its wall is 9.3 metres wide with rammed earth 8 centimetres thick. Its city gate is directly to the south with a small outer gate, battlements, towers and so on. The larger city is fairly well

preserved with walls 421 metres long from east to the west and 374 metres from south to the north, the base of which is 12.5 metres wide and the top about 4 metres wide; they are 10 metres high on average. There are two pairs of gates in the middl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walls; beyond the gates there are defensive square outer gates. Outside the four city walls there are 19 battlements, 6 at the north, 5 at the south, 4 each at east and west. The wall is built of rammed earth and the rammed tiers are visible, 8-10 centimetres thick each. A group of stupas stand at the northwestern corner of the city. Stūpa No. 1 is 11 metres high. Standing high on the wall, the ancient stupas lend grandeur to Heishui city's magnificent appearance. The ruins of streets, offices, temples, shops, and residences are preserved inside the city and the traces of roads, fields, and ridges are faintly visible outside it. No inhabitants live within 10 kilometres of this area and the place gives people a feeling of wildness, stillness and mystery. Paying a visit to the dead city, from the remains of these former inhabitants one can still imagine the numerous temples, daily sounds of bells and drums, heavy traffic, bustling markets on the streets, intersecting roads, crisscrossing canals, lush green seedlings, and sheep and camels dotting the plains in the outskirts.

A city of moving historical legends, Heishui instilled i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region a deep esteem. Early in the 19th century Heishui drew the attention of foreign explorers. It was the Russian Mongol-Sichuan Expedition led by P. K. Kozlov in 1908 that first reached the mysterious place and was duly rewarded. The Xixia materials, still unreadable at that time,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Russian scholars, and prompted Kozlov to go on searching in the Heishui ruins. In the year of 1909, the Kozlov expedition found vast quantities of written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in a stūpa to the west of the city, the equivalent of finding a library and museum from the middle ages. This treasure was sent immediately to St. Petersburg; the written materials were kept in the St. Petersburg Asiatic Museum, later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while the artifacts and art objects were kept in the famous Hermitage (Winter Palace) Museum. The plentiful information discovered by the Russians in the ruins of Heishui aroused keen interest in explorers from other countries. Following in Kozlov's footsteps, the Englishman Sir Marc Aurel Stein went to Heishui in 1914 and obtained much material. In the year

1927, the Sino-Swedish Northwestern Scientific Expedition headed by Sven Hedin and Xu Bingchang, Dean of Beijing University, went to investigate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Edzina River centered on Heishui city, where Huang Wenbi excavated a number of documents.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corrupt politics and the weak econom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incurred imperialist aggressions. One after another, some foreign "expeditions" came to China at that time, and lots of Chinese precious relics were lost abroad in succession. The Chinese people could not get the grievous history out of their mind and academic colleagues even expressed deep regret over that matter, they hope that the national treasure will be soon reprinted and sent back to their motherland.

After 1949, Edzina Banner, where Heishui is located, was first placed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Gansu Province and then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The Inner Mongolian Cultural Relics Preservation Team mad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twice in the Heishui ruins in 1962 and 1963. On a longer investigation in the autumn of 1963, they found 25 clay sculptures and several documents dating to the Xixia.<sup>®</sup> In 1976 an expedition organized by Gansu Province mad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Heishui ruins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and collected some documents at the ruins of Laogaosumu, about 20 kilometres from Heishui city. Other documents were found in Heishui in 1979. In the same year the Xixia Investigation Group, organized by the Institute of Nationality Studie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ent to visit Heishui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he approval the National Cultural Relics office, in 1983 the Inner Mongolian Archaeological Studies and the Alashan Center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jointly excavated the ruins of Heishui city. After two investigations, in 1983 and 1984, the whole city had been thoroughly reconnoitred, more than 11000 square metres of principal area were unearthed, more than 280 house foundations were excavated, and many artifacts and a number of documents in Xixia, Han and Mongolian scripts were found.®

A comprehensive survey all of the excavated Heishui materials shows that the Russian collection remains the most abundant; other collections are too inferior to bear comparison in quantity, content, variety and academic value.

Russian scholars arranged and registered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on several occasions. A. I. Ivanov did the first work of arrangement and investigation. In the great mass of literature, he first found the Tangut-Chinese glossary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identified the titles of some Buddhist sūtras, and compiled a dictionary of Xixia characters, a genuine initial achievement. At the end of the 1920s, A. A. Dragunov began to study these materials; from them he compiled a catalogue of 41 classifications of literature and published it in China, in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Volume on Tangut Studies). N. A. Nevskii, working in Japan at that time, received some materials from Ivanov and others, researched them, and published many studies. After he returned to Russia in 1929, Nevskii began his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study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becoming the first to receive instructions to compile a detailed inventory of Xixia documents. While working with the materials, he did a lot of arranging, excerpting and research. Through diligent industry and lofty erudition, Nevskii made a remarkable contribution to bringing order to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fter that numbers of other scholars took part in the ordering work. Z. I. Gorbacheva's and E. I. Kychanov's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published by the Orient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1963, is a comparatively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Tangut literature based on work of their predecessors.<sup>®</sup> L. N. Men'shikov's Opisanie Kitaiskoi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published in the Soviet Union by "Nauka" in 1984, is a detailed record of the Chinese literature. For some years, E. I. Kychanov and K. B. Kepping have continued conscientiously to arrange and to write about Tangut literature,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 Russian scholars' spirit of perseverance and dismissing hardship calls forth in us profound admiratio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ncludes the scripts of many peoples: Tangut, Chinese, Tibetan, Mongolian, Uygur and so on, of which the Tangut literary materials are the most numerous, approximately 90%, and Chinese materials come next, with less than 10%, while those in other scripts are comparatively few in

number. These writings can be divided into Buddhist and Non-Buddhist literature, of which the Buddhist are the vast majority. According to content, the Tangut literature may be divided more or less in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

### 1. Language and script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re are many varieties of dictionaries, glossaries, and phonetic tables that record, describe, and explain the Tangut language, and lots of other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the language. For example, the famous Tangut-Chinese glossary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the rhyme dictionary Wenhai baoyun (in short, Wenhai) that explains the structure, phonetics and meaning of Tangut characters, the Tangut dictionary Yintong, Tangut phonetic tables Wuyin qieyun, synonymy Yitong, Tangut glossary Zuanyao with explanations of transliterations from Chinese, Tangut materials with Tibetan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s and so on. Tangut is a dead language which can be studied only through the materials preserved. Being of great variety, plentiful content and high value, the materials on Tangut language in the Heishui collection equal the Chinese phonological works of the same period. These works reflect the standard of Tangut scholars in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 their native language, so they are undoubtedly very precious for our study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dead Tangut language. The Tangut language belongs to the Tibeto-Burman group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There are many languages in the Sino-Tibetan family, but only a few of them, such as Chinese and Tibetan, etc., preserve linguistic materials from the middle ages. The appearance of abundant material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have opened up the way to a deeper study of Sino-Tibertan languages.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were epoch-making events in the history of Xixia culture. As the soul of Xixia culture, Tangut characters were used throughout a vast region and wide scope, spanning no fewer than 460 years from their creation to the dynasties Yuan and Ming. Tangut characters present complex structures; historical chronicles record that the characters have complicated strokes, being as tortuous as the characters on seals and magic figures." Being a dead script, research on its writing structure became a difficult problem of philology.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materials such as the dictionary Wenhai analyze the structure of Tangut characters, and can reveal the secrets of Tangut morphology. The composi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assimilated Chinese methods of graphic formation as well as displayed ingenuity in creating particular structural methods and regularities. These documents are not just the foundation of studying Tangut characters; they are also a substantial element of Chinese palaeography.

### 2. History and laws

Historical data about Xixia known from the past were chiefly compiled in Chinese by historians, not the native works of Tanguts. Although they retain some value, the data were too sketchy to supply much detail. Historical data about the diplomacy between Xixia and Song, Liao, Jin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about the history of Xixia itself; materials about politics and military affairs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ose about economy and culture. Written by native Tanguts, the Xixia literature pertaining to history and law found in Heishui authentically reflect the historical and societal situation of Xixia not only in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y, but also in economy and culture. Several Tangut documents, such as a title deed for the sale of land in the Tiansheng era, a certificate for a loan of grain in the Guangding era, a report from the commander of Heishui petitioning for a transfer, a report the Heishui deputy commander, and so on provide everyday examples which reflect the political, military and economic situation in Xixia times. The Tangut "table of official ranks and titles" is a precious document of great value recording in a unique form the Xixia official ranking system.

Xixia gradually acquired complete laws after the nation was established, but they are not record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The materials found in Heishui city include several Xixia codes, such as Tiansheng gaijiu xinding lüling ("Tiansheng Code"), its revised editions Xinfa and Hainian xinfa, the military code Zhenguan yujing tong, and so on. The most important and complete of these is the "Tiansheng Code," which is a Tangut xylograph with more than 1300 pages extant. This is yet another dynastic code of ancient China, published and promulgated after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Song Xingtong, and it is the first code published in a national minority script. The "Tiansheng Code" consists of 19 extant volumes out of the 20 original; each volume consists of sections, each section of articles. There are 147 sections of more than 1400 articles in the entire code. It incorporates the essence of Tang and Song codes as well

as presents native characteristics both in form and content. In its structure, the distribution of provisions with clear outlines and a distinct arrangement closely resembles the structure of articles in modern legal codification; its systematization and regularization are unique for that time and may be termed a bold innov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w. As for the content, the code is unconventional and creative not only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well-knit and meticulous traditions of Tang and Song penal and procedural laws, but also in substantiating and enriching the administrative, civil, economic and military laws of Tang lü and Song xingtong. It may be judged a real code combining all others and supplying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 economy,taxes, society and family system of Xixia which are lacking in Chinese historical data. Moreover, Zhenguan yujing tong, as an exclusively military compilation of Xixia, records in detail the stipulations, requirements,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for Xixia generals and soldiers in battle. It is a rare and singular military code from the middle ages of China.

### 3. Society and literatur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re are several kinds of popular primers, such as Sancai zazi and the book titled Xinji suijin zhizhangwen, the latter resembling the Chinese Qianziwen, both of which record words and phrases concerning Xixia social life. Records such as those concerning ethnic family names, mainly Tangut and Chinese names, and the ethn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angut, Chinese, Tibetan, Uygur, and Qidan, are of great value in understanding and researching Tanguts as the principal nationality and Xixia as a complex ethnic community, and in understanding the positions and relations among various ethnic groups within Xixia.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contains 15 chapters, Shengli yihai, which in a special format comprehensively records the natural and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Xixia through detailed explanations in entries arranged under factual categories. Although it is fragmentary now, the parts preserved still provide important rare material for research on Xixia society and on identifying how Tangut people understood nature, ethics, social institutions, human relations and so on.

Another Tangut book, titled Xinji cixiaoji, a selection of Chinese stories of affection and filial piety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into Tangut, records many Tangut

kinship term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Chinese and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o-Burman nationalities. These sorts of materials help us to properly understand marriage and family in Xixia society and accurately to elucidate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kinship in other Tangut documents.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prescriptions, calendars, divination manuals and so on, all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social history and folk culture of Xixia and the contempory dynasties of the central plains.

Very few Tangut literary works were preserved, formerly glimpsed only in fragments found in Chinese writing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contains manuscript and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compilations of Xixia poems, which preserve dozens of compositions reflecting the style and features of Tangut poetry. The Tangut anthology of proverbs Xinji jinheci, gathers together many diverse Tangut proverbs which, in a rich native style, show the social circumstances of Xixia and the folk ethics and morality of the Tangut nationality. The proverbs supply valuable resources for understanding antithesis, metaphor, extended meaning and prosody in Tangut literature. Attached to Tangut sūtras are many vows and prefaces written by Tanguts, which explain Buddhist theories, recount the processes of translating and printing the sūtras, and pray for a glorious future in finely matched rhythmical prose of unusual literary quality.

### 4. Translations of classic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besides Buddhist sūtras, has Tangut translations of many Chinese classics-Lunyu, Mengzi, Xiaojing, Sunzi bingfa sanzhu, Liutao, Huangshigong sanlüe, Leilin, Shi'erguo; the usefulness of these materials for the collation of ancient texts is self-evident. The Tangut Xiaojing in cursive manuscript, for example,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long lost edition with a commentary by Lü Huiqing of the Song dynasty, so the discovery of the Tangut Xiaojing has restored a lost classic. Another example is Leilin, an important private encyclopedia compiled by Yu Licheng of the Tang, in 10 volumes and 50 chapters, which had been long lost but is preserved in the Russian Heishui collection in the form of a Tangut xylograph. This important classic, lost for centuries, can be reconstructed through translating, rearranging, and supplementing the Tangut version. Some military work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and unearthed at Heishui, reflect the considerations of Xixia rulers in their emphasis on military armaments and attention to the military arts. They also shed light on how Tanguts understood the Chinese military classics, and add new editions to Chinese books on the art of war.

:

As valuable resources for research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ut and Chinese culture, Tangut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clarify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Xixia, represent the ability and depth of Tangut absorp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estify to the great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Tanguts.

### 5. Buddhist text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re Tangut sūtras, which include more than 400 texts, thousands of volumes in total. Advocating and propagating Buddhism domestically, on a large-scale, the Xixia dynasty obtained the Tripitaka from Song dynasty on several occasions. Over more than 50 years the Tanguts translated the Tripitaka into Tangut and expended vast amounts of human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build temples and print sūtras. Some of the Buddhist texts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for example, the Mahāprajnāpāramitā-sūtra, are Māharatnakūta-sūtra, and Buddhāvatamsaka-mahāvaipulya-sūtra; some of them are translations from Tibetan, for example, Mahāmāyurīvidyārājnī and Mahāmantrānudhārī $s\bar{u}tra$ . Some of them are compositions of Tanguts themselves, for example, Yijingangwang haimu yi jingping qinsong yigui and Zhongyoushen yaolun. Many sūtras have variant manuscript transcriptions and xylographs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in researching and collating Buddhist texts. Great numbers of Buddhist texts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are not only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understanding Tibetan Buddhism in 12th-13th centuries, but also reliable resources for researching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Xixia and Tibetan Buddhism. The prefaces, postscripts, vows and commentaries are of great historical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Xixia Buddhism, the translation, transcription,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of sūtras, and Buddhist institutions in Xixia. Two Xixia imperial preceptors mentioned in the comments of various Tangut sūtras are the earliest references to imperial preceptors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uddhism. The Tangut Tripitaka pubished by Xixia is the first Buddhist canon printed in China in a national minority script. Xixia also printed a *Tripitaka* in Chinese, which adds a new classification to the Chinese *Tripitaka*. These new discoveries add important information to the history of *sūtra*-printing in China.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supplies much solid data for understanding the circumstances of production of various editions - styles of writing, blockprinting, binding and paper making - from the Xixia to Song dynasties. The extant materials include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n seal script, regular (clerical) script, running hand and cursive hand; some are extremely elegantly written, some wield the pen spontaneously, plainly and without restraint, conveying the particular charm of Tangut handwriting.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of Xixia was highly developed; some books clearly indicated that they were printed by thd Kezisi, a blockprinting agency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some of them initiated with blockprinted plates in vast envirment and unique style; some of them were blockprinted by firms or private individuals. Many Tangut xylographs were cut skillfully and printed elegantly; some have preserved the names of the block cutters. There are also many different styles of editions of various sizes; the largest book is over a foot in length and the smallest is only an inch or more. The number of columns and lines on a page also does not conform to one pattern. Various binding styles occur-scroll, butterfly, and stitched. In addition, there is the long narrow (Brahmī) book style which originated in India and circulated throughout the Tibetan regions. Some have varied and colourful bindings and layouts. Seeing these books is like entering an exhibition of Xixia publications; we can imagine every style of edition that developed in the Chinese middle age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s the object of multiple research endeavors, and its value increasingly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ly world, as evidenced by diverse publications year after year that introduce and study the materials unearthed at Heishui city. It requires the courage of an unwavering, longterm commitment, and a practical, scientific spirit to make the resolution to become familiar with and research the voluminous literatures and arcane scripts. Russian scholars have made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in this respect. Their principal works are as follows: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by N. A. Nevskii (1926) researches Tangut phonetics by using Tangut

material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1960 Tangutskaia fildogiia was published posthumously, making available Nevskii's manuscript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according to the Russian Tangut collection and his research works. Issledovaniia po fonetike tangutskogo iazyka (1964) by M. V. sofronov and E. I. Kychanov,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angut phon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making use of the Russian Tangut materials. Kitaiskaia klassika v tangutskom perevode (1966) by V. S. Kolokolov and E. I. Kychanov, introduces and reproduces the Tangut translations of Lunyu, Mengzi and Xiaojing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The 1969 publication of More pis'men by K. B. Kepping, V. S. Kolokolov, A. P. Terent'ev-Katanskii and E. I. Kychanov includes the Russian translations and facsimiles of Wenhai. Vnov' sobrannye dragotsennye parnye izrecheniya (1974) by E. I. Kychanov also includes Russian translations and facsimiles. In Sun' Tszy v tangutskom perevode (1979), Les kategorii (1983) and Vnov' sobrannye zapisi o liubvi k mladshim i pochtenii k starshim (1990), K. B. Kepping researches and presents the original texts. In Knizhnoe delo v gosudarstve tangutov (1981) A. P. Terent'ev-Katanskii used the Russian materials to investigate Xixia book editions. Izmenennyi i zanovo utverzhdennyi kodeks deviza tsarstvovaniya nebesnoe protsvetanie (1987-1989) is E. I. Kychanov's translation into Russia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Tiansheng Code", an important document. Tangutische und chinesische Quellen zur Militärgesetzgebung des 11 bis 13 Jahrhunderts (1990) is E. I. Kychanov's and Herbert Frank's publication of the Tangut military code Zhenguan yujing tong.

Chinese scholars recognized long ago the value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Early in 1913 Luo Zhenyu, who made Japan his home, was able to see one page of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from A. I. Ivanov and recognized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at book. The following year he borrowed nine pages of the book and lithographed it for dissemination; Luo Fucheng copied the whole book and lithographed it in 1924. In 1935 Luo Fucheng also copied and printed the Tangut dictionary Yintong from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1932, the Bulletin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 (Volume on Tangut Studies), Vol 4., No. 3, was published, introducing some of the Tangut literatur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with collaborative studies by Luo Fuchang, Luo Fucheng, Wang Jingru, N. A. Nevsky and Ishihama

Juntaro. In the past dozen years, Chinese Tangutologists have payed more attention to introducing and researching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Tangut materials. Their principal Wenhai Yanjiu (1983) by Shi Jinbo, Bai Bin and Huang works are as follows: Zhenhua, collates and translates the entire Tangut Wenhai into Chinese, and presents some accompanying essays. Chen Bingying also introduced and researched several Tangut materials from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n his Xixia wenwu yanjiu (1985). In 1986 Li Fanwen published his researches on the Tangut Yintong in Tongyin yanjiu. Shi Jinbo's Xixia fojiao shilüe (1988) presents hi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Xixia Buddhism using the Russian Heishui materials and artifacts, and a revised catalogue of the Tangut Tripitaka based on the Russian materials. Xixia wenwu (1988) by Shi Jinbo, Bai Bin and Wu Fengyun presents more than 60 photographs of documents and artifacts from the Russian Heishui collection. In 1989 Fanhan heshi zhangzhongzhu was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China, with facsimiles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an index, supplied by Huang Zhenhua, Nie Hongyin and Shi Jinbo. Xixia Yanyu - Xinji jin chengdui yanyu (1993) by Chen Bingying translates into Chinese all the Tangut proverbs of the Xinji jinheci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Leilin yanjiu (1993) by Shi Jinbo, Huang Zhenhua and Nie Hongyin, translates the Tangut Leilin into Chinese and restores the Chinese edition of Leilin lost long ago. Xixia Tiansheng lüling (1994) by Shi Jinbo, Nie Hongyin and Bai Bin in 1994 translates the Tangut "Tiansheng Code" into Chinese. Also in 1994, Li Fanwen published Songdai xibei fangyin, a study of the northwest Chinese dialect using Tangut-Chinese transliteration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Nishida Tatsuo, the famous Japanese Tangutologist, also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arrangement and research of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n 1964 and 1966 he issued his Seikago no kenkyū, an investigation into Tangut script, phonetics, and grammar, and a brief dictionary of Tangut characters, based o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His works Seikago inzu "Goin setsuin" no kenkyū (1981–1983) and Seikago "Yueyuele shi" no kenkyū (1988) research the Tangut Wuyin qieyun and Yueyuele shi respectively.

Tangutologists of Russia, China and Japan have devoted much hard and fruitful work to introducing, translating and researching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e ultimate aim of Tangut studies is to probe the face of the late Xixia kingdom through use of the precious historical resources in the collection, to study further Xixia and Chines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and to make yet another deep probe of the materials from Heishui city. The quantity of Heishui material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is extremely large, and only a few have been published;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rest silently in the bookshelves of the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in the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Specialists have deeply regretted not being able to see them. In recent decades Tangutology has flourished and this precious archive fascinates research colleagues with its unique cultural charm. Because only a few scholars have been able personally to examine the materials, and the time for reading has been limited, after all, scholars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hen they will be published in full for experts to consult, research and utilize without stepping out of the room. N. A. Nevskii once drew up a plan to publish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he even held that it was a scientific matter of prime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to publish the materials obtained by Kozlov. Now we are gratified to inform every research colleague that this wish will soon come true. The publication of the entir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ill enable further advances in Tangutology and promote some Sinological domains by the acquisition of new materials.

During two research trips to Russia, on the basis of our initial work we arranged, registered and identified work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and achieved some new results. We found new materials never before catalogued, such as the important manuscript of rhyme dictionary Wenhai baoyun, a xylograph of Yintong with 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 form, phonetics and meaning one by one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s, and prescriptions, law suits, and so on. We found new pages of some materials previously arranged and so made them more complete, such as Tiansheng lüling, Zhenguan Yujing tong, Leilin and so on. Through investigation and reappraisal of the materials, we corrected some incorrect titles and dates. Moreover, we found Tangut books printed by moveable type, which are of important scientific value as artifacts and as the earliest moveable type editions in the world. All of them will be refected in our publications.

At present,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to publish such an extensive scholarly work a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This weighty task cannot be discharged without full Knowledge of the value of these materials, or without the spirit of love and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ly research, or without abundant experience in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As a publisher specializing in classical texts and enjoying high esteem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makes an immeasurable contribution by bravely shoulder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ublish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hile working in St. Petersburg, the Chinese staff enjoyed the support and concern of Y. A. Petrosian,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The warm cooperation of Professor E. I. Kychanov, L. N. Men'shikov, K. B. Kepping and L. I. Chuguevskii made the difficult task proceed successfully. The head and personnel in the Department of Manuscripts of the Institute worked hard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staff in selecting material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is divided into the categories of Chinese texts, Tangut non-Buddhist texts, Tangut Buddhist texts and texts in other national minority languages. The Chinese materials are compiled according to the inventory numbers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The Tangut non-Buddhist materials are classified by traditional categories, i.e. language and script, history and law, society and literature, translations of classics. The Tangut Buddhist materials are classifie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sūtra, vinaya and śastra.

The Russia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hich the scholarly world has been eagerly awaiting, marks the 960th anniversary of the creation of the Tangut script [i.e., ca. 1035]. The creation of Tangut characters was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Xixia culture, so we believe that this publication will be a new starting point for Tangut studies.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published at present includes only part of the antiquities that Kozlov found at Heishui city; another part, the flower of Tangut artifacts, consists of large quantities of rare drawings, beautiful sculptures and implements kept in the Hermitage Museum in St. Petersburg. Some of these treasures have been exhibited in Europe and Asia, and were well received in academic and art circles. We hope that these antiquities, like the Russian collection of Heishui

materials, will be arranged and brought to light as soon as possible, for the publication of all the antiquities unearthed in Heishui city will bring great happiness to scholars and to the people of China.

Lastly, it ought to be emphasized th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ts Foreign Affair Bureau and its Scientific Research Bureau devoted much attention to the work of compiling, arrangeing and publishing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and approached it as a major project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y their favourable organization and preparatory, they created 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ject, and made Mr. Yang Jianguo of the Foreign Affair Bureau do a lot of remarkable work on assisting in the contact and arrangemen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we express our thanks to the related leaders and organizatio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 Jinbo March 1st, 1995, Beijing

Translated by Nie Hongyin Revised by Ruth W. Dunnell

### Notes

Dangxiang Chronicle", Beishi 90, Zhonghua Shuju punctuated edition (the same for all dynastic histories cited below); "Dangxiang Chronicle", Suishu, 83. "Dangxiang Qiang Chronicle", Jiutangshu, 198. "Dangxiang Chronicle", Jiuwudaishi, 138. "Xia state chronicle" (part 1, 2), Songshi, 485, 486. "Supplementary Chronicle of Xixia", Liaoshi, 115. "Chronicle of Xixia", Jinshi, 134. Wu Guangcheng (Qing), Xixia shushi, 1835 pub.

- 2 "Biography of Taizu", Yuanshi, 1.
- 3 Zhang Shu (Qing), "Shu Xixia Tianyoumin'an bei hou", in Yangsutang wenji.
- 4 A. Wylie, "On an Ancient Buddhist Inscription at Keu-Yung-Kwan in North China". JRAS. 1870. G. Devéria, "L'écriture du royaume Si-hia ou Tangout", Mémoires prés. par divers savants à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vol. XI, pt. 1 (Paris 1898).
- ⑤ "Treatise on Geography", Yuanshi, 60.
- 6 Neimenggu wenwu kaogu yanjiusuo & Alashanmeng wenwu gongzuozhan, "Neimenggu Heishuicheng Kaogu fajue jiyao", Wenwu 7, 1987.
- Xiang Da, "Sitan'in Heishui huogu jilüe", Guoli Beiping Tushuguan guankan
   vol. 4, No. 3 (Xixiawen zhuanhao).
- Neimenggu wenwu gongzuodui, "Ejinaqi shamozhong gumiao qingliji", Neimenggu wenwu kaogu, first issue, 1981.
- Yue Banghu & Chen Bingying, "Woguo faxiande Xixia wenzi zidian 'Yintong' canpian e zhengli futuan yu kaoshi", Zhongguo minzu guwenzi yanjiu,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84.
- ① Li Yiyou, Heicheng chutu wenshu (Hanwen wenshu juan), Kexue chubanshe, 1991.
- ①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Tangut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zdatel'stvo vostochnoy literatury, Moscow, 1963.
- ② L. N. Men'shikov, Opisanie Kitaiskoy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Description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NAUKA, Moscow, 1984.
- (3) N. A. Nevskii, "Proekt izdania pamiatnikov tangutskoi kul'tury iz Kharakhoto" ("Plan to publish the Tangut manuscripts from Kharakhoto"), Arkhiv vostokovedov Instiutan narodov Azii AN USSR, quoted from Z. I. Gorbacheva and E. I. Kychanov, Tangutskie rukopisi i ksilografy.

世界學人面前 作爲中俄兩國三方學者合作的結晶 俄藏黑水城文獻》 經過多年的精心準備 現在終于呈現在全

高 黑水城文獻的 供了大量歷史、文學和藝術研究的新材料。這兩大發現已經吸引了無數學人, 域的遼闊, 殷墟甲骨、 中國古代文明史以及世界文明史作出新的結論。就以上世紀末本世紀初來説,重要的考古文獻發現就有 古代文明的重大考古發現,都曾深深地震撼着學者的心靈,驅使他們找回曾經中斷的文化信息, 因,被自然的或者社會的強力淹没乃至毁亡的中國古代文化遺産實在太多了。在廣袤的中國大地上 學術價值和研究現狀,已足以給人啓迪;我的序言,擬對其中的漢文文獻作些簡單的介紹 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 久遠的歷史長河中, 如此豐富多采, 均差可同敦煌文獻媲美。和敦煌文獻相似,黑水城文獻還具有濃鬱的地方風貌 克恰諾夫( E.M.Kычанов )和史金波兩位主編的長篇序言,分别闡述了黑水城文獻的 綿長、 敦煌吐魯番遺書和黑水城文獻三大宗,這無異于掘出了三個地下書庫, 博大而又精深的中國古代文明,具有永久的魅力,吸引着全世界的學者。盡管中國文化遺存 均爲其他同類發現所不能比擬。十五萬片甲骨卜辭的發現,把中國有文字記載的信史提前 發現, 人們仍不滿足,仍在不斷努力尋求新的發現。因爲衆所周知, 不知有多少凝聚于建築、器物和文獻中的豐富知識得而復失。 則展示了 數萬件敦煌遺書重現了從兩晉到宋初傳抄時代卷軸裝書籍的多采多姿的風貌 遼宋夏金元特别是西夏時期的文化資源, 其數量之多, 形成了專門的學術領域 反映歷史的長遠 所以每一宗有關中國 由于戰争、灾害等原 内容之廣, 發現經 質量 從而 地 在 提 之 對 到

宗教色彩和多民族

代 文字特色。 民族各王 決 朝間 不能 的 認爲黑水城文獻原屬 文化是交流 的 相 通的 西夏王 黑水城 朝 的 文獻從 個城市 所 個 有 側 面 其價值 反映了當時中華文化的 因 此 而有. 相應的 局 一發展 限性 水

子兵 文文獻, 天盛律令》 法 黑 V 水城、 等 更表明了 文獻 其中有些 中 中華傳統文化的 聖立義海 有直接從漢文移譯的古代重要典籍, 宋人注本, 》及自 不可分割 編的一 漢文原書已佚 批佛學著作等 性 , 有西夏王 , 這些無不與漢文化有關, 比 如 朝和 論語 》 文人學者纂寫的 ^ 孟子 而黑水 V 法 ` 典 ^ 孝經 城文獻中 類書 的 如 孫

獻 少在 分是被用 中漢文文獻共有四百八十八件,實際上這個數字還不是全部, 江 尼 文獻序列 研 佛說法 出 據孟 亦有少數是孟 究 版 , 列夫(JI.H.Meньшиков) 1984年出 圖、◆362A《 來裝裱 可 俄藏敦煌文獻 現已收入《俄藏敦煌文獻 與英國 或修補「新書」的) 列 藏 夫未及描述的 斯 師資相録儀》 坦 因 的編輯過程中 從 黑水 未計 城發現的 如 等。 V 問 ^ 人。 六十 -得到 世 而Φ229V《景德傳燈録卷第十一》殘抄本, 有若干件黑 0 另一 四卦 版 其中 7 ,澄清 的 圖 個殘抄本KK. II.0238 (k) 的 《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叙録 , 抄本即是其中頗有意思的 部分已經在孟 比如●211《大乘人藏録卷上》、 水城漢文遺書被弗魯格(K.K.Фиуг) 尚有不少時代較早的零星寫本殘片( 列 夫《 叙 相 録》 V 互銜 統計 件 中得到釐 接 ◆360版 據北京大學榮 俄 此 藏 編人了 黑 次 E 出 畫 水 也 釋 版 城 大部 迦 敦煌 的 有 文 牟 獻 文 不

表 這數百件 現簡述其價 文獻 值 中 如 次 衹 有 劉知 遠諸宮調 等少數幾件曾經正式公布或整件披 公露, 絶大多數 均 、爲首 次

### 填補空白的 獨特文

發

填

補

空白

宋 西夏官 在 黑 水城漢文文獻中 府 軍隊的檔案材 有直接從宋金傳 料 黑水城漢文文獻中有一 人西夏的基本書 批獨特的文獻引人注 籍 亦 有 西 夏刻 印 目 抄 寫 將爲歷 的 書 籍 史學和文學史 , 還 有 不 少

的 制 西 北 文書 鄜延 兩宋之交宋朝 俸 路 的 背 軍 面 環慶路等地軍事 糧 是西夏文辭 制 西 度 父等等 北 邊境軍事 典《文海雜 有重要的 部署 文書三十餘件 人員 價值 類》 (調動 的印本, 其 中許多具體 軍糧供應 計109紙 可 知當年經過宋金戰争以後 而 涉 捕 微的記録 及 逃懲貪等等方面 政 和 人 年 是史籍語焉不詳或者没有 (1118) 對于研 至 夏金又發生戰争 建 炎 究 北 元 宋末 年 (1127 的將兵 這 及

宋龍 稱 批 版 雙 文書爲西夏 影 舒 印 本 問 世 王文公文集 所 即 獲 ^ 西 宋人佚簡 夏 V 録 ( 王安石文集的 少少 ノ紙張 0 黑水城文獻 , 遂 用 以 印 個 中 書 重 一要版 的 0 這一 此 本 類刻本書 大宗軍事文書 的 頁 内 頁內文書 文牘 9 與 近 , 前 ^ 年已經 人已 王文公文集 有記 由 E 一海古 載 , 最 籍 内 出 爲 公贖 版 出 名 社 的 以 堪 珂 是

文書 究者 上生 元宣 社 生與流傳的文獻、器物得以幸存 從年代 會 典麥契 光二 活 的 關 盡 如 可 出 知 係 捕盜呈文及批覆, 土 管十四 重 上 年 一説 視 的 黑水城最終成 的 夏神宗光定十三年(1223) 社 在三十多年後的北 (1372)局 0 世紀四十年代末 除了 最早的是北 部 會 文書 的 Ė 原始記録 年款的毁房提控案牘, 述宋朝 雖然有零碎雜 **ベ爲** 一 刑房令,亦集乃分省糧斛 宋端拱二年(989)智堅等四人往西天求取菩薩戒的誓記 座 西北邊境軍事文書外 9 死城 比 元 時 起歷 戰争使黑水河 亂 , , 黑水城 經文人整理的 這是當地人民 千户釗亭申報的處決注户狀。 不易辨識 地方 提調糧 改 道北 政 ` 人權依 的一 不 黑水城漢文文獻中還有各色官私 收支檢單, 食公文等。 史書記載更加貼近 成 流 場灾難 系統等先 然在有效地 黑水城未能 屬于 發放粟麥、 9 天的 然而 西 行使着職能 社會 缺陷 高温與乾燥的 逃脱被沙漠吞噬 更多的則是有元時代內容紛繁 夏遺物 出典土地、 9 的 接近真 但它們畢 有 , 老百 夏 桓 質 自然條件 9 社會文書六十餘 最 的 姓仍然 宗天慶年 竟是當時 回貸之類 ii 結局 晚 因 的 而 越益 在 是多件 又使那 這 但 的 間 當 受到 從 契約 塊 裴 地 這這 的 松 土 有 各 等 北 地 文 此 研 種

蘇 胡應麟贊爲「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 水 聯交還中國, 城文獻中的金刻本《 諸 宮調 在金代是民間 現藏北 劉知遠諸宮調》 京圖書館。 文學的大宗 由于它早已爲 在 , 證實了這 也 出現如此 是中 國 人所知, 成 文學史上的 熟的 論斷。 作品之前 現在已經成爲文學史家不可忽略的論題 這部文學作品的原件 重要 環。 必曾有過許 著名的 多同 ^ 董 已于本世紀二十 一解元 類 型 的 西 作品 廂 記 奠 基 代 明 黑 由 人

清 王 灼 話 紹興中爲幕官 金 刻 雖爲殘本 本《 新 雕 但王灼 文酒 所著書已引 清話 所引唐封舜臣索《麥秀 V 是 文酒 部有趣的宋人筆記, 清話 兩歧 則《文酒清話 曲 書 事亦在其中 目無載 當 , 刻于北宋時 而王灼 且較王灼引文爲詳 的 ^ 碧鷄 期 黑 漫志》 水城 發現的 曾引 述其 文酒 文

但是, 如 本 果從民間文學的 六十四 卦 圖 角度去考察,也許其意義更爲重要。此卷扉頁録有關于五代史的民間唱詞:「 未見 別 本著録 作 爲術數 類 的 占 1 書 當 然有助于了 解 彼 時 彼地 特 有 的 民 創

皇帝 業開 尋 間 至 及和「諸宮調」的 河 拞 , 分别 上源 與葉静 代 基顯朱〔 後 標 周 唐三藏去西國 能 志 歸 Ŧi. 梁) 看月宫, 于柴氏 行干支和妻財 流行 ,定亂平妖復李唐。 互爲印 0 雖有好事 E 取經 文先 證的筆 列 官鬼 武則天稱帝、 必不達」。其他還有姜太公遇文王、孟姜送寒衣 頌 記 日」,然後爲釋 小説話本的 父母等相應關係; 石晉異圖因 安史之亂等語。 題材 姑嫂 - 義, 敦煌 其後爲 下注該卦出處 劉漢逢義爲蕃 變文的 可 以 贊日」, 從 題 個 材 , Ī 比 再後爲 側面了 , 這些 如「觀卦」下標明「此 郭周社 一講 解當時的 歌 唱 漢高 日」。 稷 文學 成 祖 柴氏 從 困 民 在各卦 間 唐 代 卦是玄宗 圖 張 的 , 以 唱 Ŧi. 爻

## 雕板印刷的寶貴史料

廣

代

宋而至西夏王朝

仍是家喻户曉,

久盛不衰

上 被 獻 中 泛使用的 傳抄時代綿 與敦 已有 煌 文獻 印 刷品 時代 延最 不同 出 現 久 的 9 , 是,黑 敦煌 而黑水城文獻從時代來說, 文獻最大量地展示了傳抄時 水城文獻 中刻本多于抄本。 恰與敦煌文獻相銜接, 代中卷軸裝形 這是時代進化 式 的結果。 的 這一 風 貌 時代是刻 0 在 唐 中 五 國 代 古 印 宋 文 書籍 初 獻 的 成 傳 敦 熟并 播 煌 文 史

餘件 種 定爲北宋刻本的 或者相當于北 所罕見 元 現象不能 刻本十 在 金刻本有《 當今全國 中 0 件 明 國版 末 簡 尚 宋 單 以 刻 有 時 乃 地 來 史上 即 至 Ŧī. 孫真人千金方》 有 期 以 代 一海外 好古佞古目之。 藏書家即視宋元本爲瑰寶 的 《呂觀文進莊子義 , 刻 遼 宋元刻 本數件, • 金、 藏有中國古籍 本最受重視 西夏刻本 其餘爲唐 《新雕文酒清話 因爲無論是從文物還是從文獻價值 **>** 的圖 的則寥寥可 , ^ 與宋先後并存 宋、 廣 書館極多, , 藏書品位之高下, 韻 僞齊 數了 ` V ` ^ 西夏、 曆書》 《六壬課秘訣》 的 但藏有宋元本的 0 據孟 遼 金 元寫本文獻 刻 及佛教文獻共十餘件 列夫研 常以 本 , 自與宋本等價 判 的 有 等 角 無宋元本及藏有多 , 圖書館不多 八件 度 在 黑 而 論 水城漢 西夏刻本一 宋 , 9 收藏 文遺 南 元 而 宋 刻 西 刻 有北 少 本 夏刻 書 百餘 本 中 確 爲 宋 實 有 判 本 四 刻 高 可 0 + 這 本 世 以

早的 本 的 的 尺幅 刻 這批早期 I 大多 姓 手 和 氏 很 的 刻 大 印 同 I 樣 本 0 的 在許 圖 姓名 書理所當然是研究中 由 多叙 于 有 西 述刊 夏雕 的 佛 板 經長卷 刻緣起并 印 書 的 貫穿于從卷軸裝到 紙 強 國 調 張粘合處 雕板印刷史的首選資料 施印 佛經· 也 功德的 就是雕板板片的交界處 方 洲( 發願文、 蝴 蝶) 0 刊 題記 裝的 刻 體 中 制 全部演變過 基 本 往往 保留 F 湿 是 程 能 着卷軸本的 見到 紙 又結合了 附 板 録 , 最 的 木

刊

板

豐 富 多采的 版 畫 創 作 其體 制 形 式 書體等的 多樣性 9 也是非 常常 值 得 注 意 的

圖 包 種 背 形式 《獻爲中國中古書籍史的 書從卷 的 在 一裝幀 在 敦煌 軸 俗 裝 方 稱 向 遺 蝴 面 書如 蝶裝 方 册 有卷軸裝 裝 俄 , 包背 藏 寶庫 從抄 ^ 社 的 • , 寫 經摺裝 稱 司 絶不爲過 轉帖 向 包背蝴蝶裝; 印 刷 蝴 轉 中已開 化 蝶裝等。 的 始出 又包背 特殊時 其中 現 期 而 , 到 穿綫的 蝴蝶裝形式表現得 其裝幀形式表現了多樣化 了黑水城文獻中已被較多地采用 向 無命名 最 可 爲充分 以名之爲包背穿綫 和完 的變異 全 在 故 如 稱 西夏這 黑 裝 般 水 有 此 不

累 露 著名學者周 基 所 密 五 李」、「秦」、「郎」,衹著姓。 不避 廣韻 一礎 作長篇前 + 必 宋仁宗時, 琰 , 試與存 黑水城漢文遺書中 將引起學 而 是一 現在能見到的 去聲十三祭至五 廣 祖 世 言中補 之北 部 韻 謨曾作 在 陳彭年曾建議由朝廷印一些版面緊湊的常用書籍 術界的 中國 又同 宋、 校 ^ 廣韻 南宋 有《 廣泛關注 鉅 音韻學史上占有極高 ^ 北 宋 説文解字 宋刻本書籍大多頁面較大,行字疏朗 十八陷 廣 廣 校 及元明 公韻 (韻 避宋諱至仁宗, 本 ,共三十 殘本一種 , 以後刻本相 V , 詳校所見各本 可 惜 樣 未能目 9 是必 地位 八 9 校 頁 刻 而英宗父、英宗、 本 須爛熟于 睹黑水城所 的重要典籍, , 行款 蝴 , , 後又在 存下平 蝶裝, 無相 胸 聲 一 的 出 同 爲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卷心高15.5釐米 | 者 舊時 教 , 廣韻 科 神宗、 先 此本刻工精 治國 書 異文頗 以便寒士 至 四四 0 學, 黑 徽宗、 宵 , 多, 水城出土 否則不知 文字音韻 亦能購 九 整 欽宗、 顽 麻 寬23釐米, 大略視現存各本爲 而 + 北 道 出 置 頁 高宗 宋 訓 他 版 陽 , 面 刻 詁 此本或與其事 會 的 較較 是 上 如 <u>^</u> ^ 、孝宗之名 中縫記 必 小, 鉅宋廣 廣 何 聲三十 不可 興 韻 行 奮 刻 少 韻 字 了 的 小 的 有 至 I 披

北 載 便 金 九 法 宋 呂 張 刻 提 中 , 本 惠卿著 本 呂 期 又 惠卿是北 旬 有 政 他 , 而 呂 治 有 們 黑 史 對 氏 水 孝經傳 ^ 莊 于 城 宋王安石變法中的 的 儒佛 研 **今**孝 子義 文 獻 究熙豐變法人物思想的 道 中 經義》 , V 或作《孝經義 ,「元豐七年 又發現了 三家的學 早已失傳 更早 重要 術 和 義理 人物 的 先表進 0 北 黑水城文獻中竟有其西夏文譯本出 呂 不 宋 重要資料。 0 刻 變法派 氏的解經之作, 存門户之見,凡其可取之處, ^ 本 內篇》 , 題 在王安石本人的 呂氏的 呂 其餘蓋續成之」( 觀 不僅在經學史上占有 文 《莊子義 進 莊 倡導 子 義 下 陳 世 均 ^ 比較 振 四 曾編撰 令文獻學 庫 這簡直是奇迹 孫 全書 公允 ^ 席 直 許 家 之地 多 齋 地 未收 深 經 書 加 感 録 以 注 興 也是 解 吸 9 蓋 今存 以 題 取 呂 研 爲  $\forall$ 氏 有 卷 史 變 究 順

,

知 延州 鎮鄜延, 在 西北邊地爲官多年, 其著作在西夏頗有影響, 因 以 流 傳 也

# 三 刊本大藏的初期典範

經 華嚴 **\*** 在 經 黑水城漢文文獻中, 妙法蓮華經 V 卷四十《人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 ^ 般若心經》 占大多數的 ` 是佛教 瑜 伽師 文檔 地 , , 論》 有 ^ ^ 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阿含經 《釋摩訶 V ` 衎 ^ 論 大般 等 公若波 重要佛教經 羅蜜 等印 一多經 一行最 論 V 其 金 中 以 剛

會 朝 集》卷二三五《賜西夏國主乞贖大藏經詔 高 (1030 要輯 曾 麗 或 多次向 本佛經肇始于唐五代, 稿 部 最 外國和 後 真宗天禧三年(1019)贈東女真 宋大韶令集》 次爲神宗熙寧五年(1072) 周 邊并峙 政 權贈送大藏經。 大規模有系統的刻印 等記載 宋 朝 (國 0 太宗雍熙元年(984) 向 現特引熙寧間宋帝韶令一 部, 西夏 則始于宋初的《開寶藏》 或 仁宗嘉祐三年(1058) 回賜大藏經有六次 贈 H 本國 通 , 0 贈西夏國 以見其詳情 第一 部 據《佛祖統紀》 端拱 次 爲仁宗天聖 一部 元年(988) ^ 另據 宋大韶 載 八 宋 年 贈 宋

賜近 命, 詔 軍移牒宥州, 夏國主: 令有司點勘, 年宣 給」事具悉 省親「 差人于界首交割, 乞收贖釋典一 無至脱漏卷目, 所 請 贖經 至可領也 大藏, 所有印造裝成紙墨工直, 文, 并簽帙 已指揮 所有馬七十疋,更不用進來 • 複 印經所 帕 前 , 應有經本 後新 并依例進馬七十 舊翻譯 并 經 文 如 法印 , 惟 产, 造 覬 給賜 聊 宸 慈 充資費 令保 特 降旨 安 早

宗太平興國 翻譯經文」。 西 夏所得之宋刻大藏經, 八 年(983) 板運開封 爲《 開寶藏》 存印經院 無疑。 , 曾經修訂補充 開寶藏》 于太祖開寶四年(971) 故夏國上表中特别提出要包括「 始 雕 于 ,成 前 都 後 新 太

宗 六年 原 宗天賜 流 通 卷 準 寧宗之際 , 大 備底 説明西夏所得 禮盛國慶 開寶藏 延壽寺刻的 本 》早已散佚, 羅皇 黑 五年 水 后 城 , ^ (1073 -華嚴經 必藏于其都興慶府 爲超度仁宗 文爛中 現存世者僅有十一 當北宋熙寧六年 的大量 等 而 0 漢 仁宗天盛 施印者尤 文佛 典, 夏國求取漢文佛藏, 多 卷(其中四卷在日本), 乾祐間 陸文政 多爲西夏自刻 0 這些 品品 施印 當 種豐 南宋孝宗時 的 富 ^ 其中 心經 不僅 刻 印 **\*** 大多又出于官刻 爲持修研讀 黑水城文獻中未發現 精 審的 所刻 大安十 佛 和桓宗 經 年(1083, 也 是中國 天慶初 是爲翻刻 時 代較早 [現存早期 當 ^ 當 開 北 南 宋 的 翻 寶 宋光 譯 藏 有 元

本藏經的遺珍,是漢文大藏經刊刻史上的重要環節。

佛教 期 著爲 尚 宗 多 這 宋 出 + 領 相 刻 年 勘 的 餘 河 繼 自 此 文獻 本 懸 年 一經 歷 化 確立完 隨 西 長 代 着 開 中 典 文 而 水 , , 也 的 蘆 未 的 藏 控 城 寶 大藏經 有 善, 決 傳 傳 文 陸 成 制 , 1 藏 西 還 佛 播 獻 和 的 續 功 回 尚 地 此 所 中 夏刻 有身兼華嚴 問 悉數 鶻 過 教 題 程 未 劫外録 組織了三千五百餘卷漢文佛經 後 但 的 的 提供 吐 漢譯 本 收 刊 漢 流 系統 , 傳 蕃 文 , 布 包括與梵文本 0 佛 無論是西夏本 可 活 唐 地將大藏經從漢文譯成少數民族文字,這畢竟是第 末宋 必 具備了党項、 動主要集中 信的資料 翻譯藏 教著作 五 凈 將 祖 土 有助 初 和定慧禪 一宗 文佛 的 顯 的 于中 來 0 至于 經 教 源 土 藏文本 ^ 在密宗典 漢 雕 師 土 的 經 尚 通 比 板 的 理 黑水城 典 不 • 宗 的 的 重逐 大師立 西 口 止 , 籍 的 漢譯 夏 密 于 鶻 源 還是從 遺 所 翻 流 方 漸增大。 ^ 一志銘 吐 譯 吐 關 書 己 開 注 面 中 的 中 蕃 係 大體完成 寶 蕃等多民族的 0 土 乃 藏 心 時稱「番大藏經」。 其底本 性海 些 黑水城文獻的漢文佛典與數 至今没 傳 清 至西域佛教史綜合研 V 罕 凉 0 人 不 見 來源 解 心 漢 脱三 有 少 都 要》 流 得 傳 傳 新 譯經人 , 可 制制 到 佛 譯 的 既 和 以 從中 有 (佛 律 比 教 雜藏類 華 梵 雖然這 才與經 較 的 經 V 窺測 嚴 清 文本 各 • ` 次 密宗 的 法 個 究水平 ^ 晰 界觀 0 階 宗 驗 的 西 鎮陽洪濟禪院 中 而 夏佛 段 也 派 經 梳 , 國 的 有 典及 門 量 理 且 的 在 的 撰 藏 提 龐 在 理 教理論 翻 前 述」, 等等 大 譯 西 文本 論 中 西 高 期 夏 夏 體 底 統 土 , 的 慈覺 依 比 爲 Ŧ 本 治 I 佛 西 系 探 主 既 朝 朝 亦 教 有 如 夏 的 要 Ë 文 後 的 有 Ŧ

許 見 救 金 的 就就 苦 刻 初 刻 本 是 經 基 道 本 家 傳 0 此 經 道 南 世 後即 經 典 華 的 模 真 始 的 最 仿 早 于 經經 與佛家經典沉浮榮辱 匯 刻 録 五 千佛名 代, 本 9 道 發端于南朝宋時 ^ 孫 家 全藏刊 經 真 經 V 人千金方 典 的 刻則在宋崇寧政和年間 形式 或 與 同 彼 , 刻 時 消 陸 印 代刊 修 此 了十 静 六壬課 長 廣收 刻 大道家天尊圖像 黑水城文 的 秘訣 經 宋 戒 ^ 稱 政 △熽中 等 方藥 和萬 ^ 萬壽道 , 也 有 壽 爲 道 符圖等書 寫 件 我 藏 藏 本 們 雕板印 道教文獻 了 0 相 黑水城所 累 解道家著作 本 分爲三洞 0 另 ^ 在 太 外 敦 出 E 火煌 法結集 的 黑 洞玄靈 在 遺 這 西 水 書 夏 城 中 文 的 寶 遺 此 獻 并 書 天 乃 流 尊 道 傳 中 不 罕 或 説 的 藏

般傾

向

因

而十分引人注目

## 四 超越唐宋的版畫成就

提

供

1

綫

消

息

西 夏雕板書籍 的版 畫 , 在美術史上具有特殊 的 意義 目 前 我 們 所 能 見到 的 具 備 完整意義 的 版 畫

版 曹 首 畫 氏 推 唐 成 繪 江 刻 通 南吳越 밂 九 位 年(868) 之高 王錢氏的大批版 留 Ŧ 存數量 一玠造 ^ 之多 畫作品問世 金 剛 , 經 足 V 以 卷首 填 , 補 表明早期版 畫 以 0 往 到了 所 有 五 版 畫 代 畫 創 宋 史圖 作 初 的 籍 • 成 雕 的 熟期已 板 空白 印 書 經 被 足 到來。 廣 以 泛 改 應 寫 而 中 時 用 隔 或 敦 版 不 久的 煌 畫 史 歸 的 義 西 有 夏 軍

關篇章

良好 化 式 如 然條件 在 涵 義的 黑水 契 由于發生和發展 西 機機 . 夏 和 泛交匯 雅 城文獻 戰亂等 特别 板 温點上 印 原 中 是 書 保 西 事 , 因 也 的 夏 業的 存了大量中 , 就 政 地域條件 民間 更加 權積 發 藝術 展 П 極 , [現了 造 的 品品 原 汲 成 特殊性 包括版 地 取 其重要的 中 品 7 版 刊 原 畫 的 畫 刻 , 存世 傳 藝 由于揚棄了 的 地 圖 統 術 位 文化 書 日 不多。 益 和 成 版 , 熟的 在 推 既 畫 有 動 西 , 物質 的 夏 就 了邊 書 一時 是 期 遠 畫 個明 和中 技 和 , 石 版 術 窟 證 原 書 和 壁畫 地 市 由 0 于 品 場 相 之間 是 基 的 比之下 傳 礎 統 種 廣 , 形 泛的文化 比 成 較 中 使之處于多 新 原 了 蓬 穎 地 的 品 交 勃 藝 因 流 發 重 術 爲 展 文 自 樣 比 的

書 籍 清 涼 黑 插 國 水城版畫主要有兩種形式: 圖 師答皇帝問 其 中優秀者有 等佛經卷首畫 ^ 華嚴 經 \_ 是單幅的 ^ 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招貼年 畫 , 如 ^ 四 美人 圖 • ^ 法 ^ 華經 義 勇 武 V • 安 ^ Ĩ 轉女身經 圖 等 是

就 寬 和 由 度 在 方 于 圖 册 客觀上 , 装式 更加 **語** 書從卷軸裝向經 版 對 的 畫 適合展 畫 適應性 主要有 面 提 示 諸 出了匀稱 卷軸裝卷首 如 卷軸裝版 摺裝和 紀説法 方 , • 均 變相 册 畫在 版 布 装的 畫 和節 的 寬度上 • 經摺 過 宏偉場 奏的 渡 較較 装卷 9 要求 面 版 少受到 首 畫 同 創 畫 限 時 作 和 制 方 常常帶有對卷軸 , 册 由 , 于要考 常常占據一 書 扉 頁 '慮到 畫 改 紙 種 傳統的 成 (約30-經摺裝後使 其 承襲 中 以 45 卷 , 釐 軸 又需要顧 主 米 裝卷首 像 甚 避 開 至 及對 畫 更多 摺 爲 經 多 的 摺

第 表 中 I 化 性 繪 生」等 心 紙榜題爲「 的 畫 西 避畫 夏版 榜 的 題 延 第三 有「 式構 伸 畫 在 紙有一東南 教主釋迦牟尼佛」和「諸大菩薩衆」、「四部弟子衆」等; 諸居士婦 圖 構圖 特别是宗教版 有 上是壁畫 如TK8 施 方淨 佛 ^ 纓珞化成寶臺佛會之處」、「諸居士婦轉 佛説轉 住世 畫 幡 畫 界無垢稱 當然就更多地繼承了其脱 女身經 的終結, Ï 卷 佛 又是書籍 V 、「得 卷首 畫 聞 插 此 圖 此 胎而 版 經信解歡喜」、「供養父母師長處」、「懷子 畫全長 畫 來的那 的 先 59釐 驅 女成男出家之處」、「從母 第二紙 個 0 米, 早 藝 以 術樣式的 期 版 占三紙 佛在耆闍 畫 毫 無疑 許 分 多特徵 崛 八爲三 義 Щ 地 説經 右脅忽 個 應 較 當 部 處」爲 是 有 手

左上 身生得受大苦痛」、「女人爲他所使搗藥舂米若熬若磨」、「 角題「佛説轉女身經變相」。實際是爲此三紙全圖之總題 厭 離女身供養佛菩薩處」等。二、三紙終了

經的 單 的沿襲, 情 常明 節等, 類, 而是逐漸地找到了版 都是從壁畫變相的形式轉换而來 這幅變相的滿版 畫的自身語言, 布局 通過分割的平面來展開 的 表現爲獨立于壁畫 0 但 在改變壁畫爲卷首版 故 事 和一般繪畫樣式的 的 時 間 過 畫 一的 程 時 • 候 采用 不同 更多 榜 題 的 來 已經 説 明 對 不 是簡 應 佛

兩 視覺印象就應當 進人石窟寺 種 不 首 同 先 的 廟 藝術 把主題的空間 相當于進人佛寺一開始時所看到的主尊形象 先 形式所 看 中 央, 決定的 性 後看 的 0 (中央對稱 壁畫 兩邊; 一展 但 開 | 卷首畫 , 布局 常常是中軸綫對 却是從右至左 改變爲時間性的(流水過程) 稱 展開 形 式 看畫 這是由 有個時 觀瞻者的 布局 間過程 0 視覺路 這是由 所 以第 綫 壁 决 畫 定 和 的 眼 版 的 畫

照 作 致 變 相 0 變相: 包 冉冉展開了 轉女身經變相》 括變 次 故 事 卷首版 相 的 這部佛經的背景、 發 忠實于經典原 展 畫 的 的三張紙幅 展開 應當同 過程同 信 意的表現 徒們耳熟能詳的押座 情節 佛經「 ,正好對應了佛經的「三部科分」 和功德結局 序分」 也是創作者對讀者長期形成的審美過程 ١ 的 ٦ 程序, 正宗分」 文、 講經文直至俗講 完全遵循了 • ٦ 流 的程式 通分 讀畫者的 的進程 L 的「 當打開 心理期 三部 相 審美 致 經卷的 科 分 0 心 這既是 理 時 的 的 候 程 必 版 序 要關 畫 相 創

這批 世 皇俄 留 目 界格 異 域 國 而 在 聖 局 的 水 , 貢獻各自的智慧與力量時, 但 城 彼 也 公得堡 文獻 魂歸 有 中 ·國學人至今念及猶感刻骨銘心之痛 7 中 東 及其藝術品是在 重大的 土 方研 , 而且: 究分所特藏部珍藏了近一 改 變 化身千百展現于世 0 如 今, 本世 雙方的感慨是很多的 當中俄雙方的學者、 紀初中 國 , 最 爲海內外學 個 後 世紀的寶貴文獻的意義取得共識 近百年 個封 0 出 來, 建 《俄藏黑水城文獻 術界所共有 Ŧ 版家友好平等地坐 滄 朝 海桑 田 清 朝 , 其 中 處于風 (意義: 國 日發生 的出版使這批珍品 在 的巨大是不言 雨飄搖 起 了 并 研討 天 翻 的 爲實現這 年代裏流 地 對 覆 而 全 的 雖 變 面 的 一然身 共同 化 刊 人 布

文獻 者的努力 黑 以漢文爲主, 水 城文獻的影響 西夏文這種本已消亡的 對于大多數研究者來說比較 目前暫不如敦煌文獻 歷 史文字已經被基本解 , 其研究程度也遠不如敦煌 容易人手; 讀 而黑水城文獻 但 畢 竟能 以 文獻那麽深 熟練掌握西夏文的學者至今爲 西夏文爲主, 人。 盡管經過幾 這是因 爲 敦煌 代

還是不多;另外,黑水城文獻原件的刊布滯後于敦煌文獻,也是原因之一。

版。 將重新編人本書。關于西夏文的世俗和宗教文獻,史金波主編的前言已經作了全面介紹, 引。爲了保持黑水城文獻的完整性,對于已經收入《俄藏敦煌文獻》的、已經確認的少量黑水城文獻也 的各卷卷首,也都將分别提要説明。 漢文部分共分六大册,作爲獨立的一大部分,將在第六册中附收文獻叙録、年表、分類目録和索 《俄藏黑水城文獻》擬分爲「漢文部分」、「西夏文世俗部分」、「 西夏文佛教部分」三大板塊出 同時在各部分

原始文獻的寶庫獲取第一手資料。 可以預期, 隨着此次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全部發表,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掌握西夏文,親自從這 對黑水城文獻的研究也一定會像敦煌學一樣, 成爲漢學領域的顯學

之一。

九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于上海

### Preface

As the fruit of joint labor by three organizations in China and Russia, the Heishuicheng (Khara-khoto)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is at last presented to the scholarly world after a long and painstaking preparatory stage.

The excavation process, academic value and research history of the Khara-khoto collection have been described in the lengthy prefaces by E. I. Kychanov and Shi Jinbo. My preface will present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llection.

The old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long standing is both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ts perennial attractions appeal to scholars all over the world. Although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s both rich and varied, people are still not content with it, but always seeking new discoveries. As is well-known, through wars and disasters, much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was buried or destroyed under the power of nature and society. Throughout the vast expanse and long history of China, an unknown quantity of the knowledge preserved in buildings, utensils and literature was lost, so every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bout ol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made a great impact on scholars and prompted them to retrieve lost cultural information so as to draw some new conclusions about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world. Take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for example, which brought the significan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and tortoise shells of Yinxu, of the extant documents at Dunhuang and Turfan, and of the literature at Khara-khoto. These three discoveries are tantamount to the excavation of three underground libraries; their extensive coverage of a long period and a vast region, and their rich contents make them incomparable with other similar findings.

The excavation of 150 thousand pieces of bone and shell inscriptions advances the accurate record of Chinese history to the Yin Shang period of three thousand years ago. In the thousands of extant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appear a rich array of manuscript scrolls from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up to the early Song dynasty, providing lots of new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literature and art. These two great excavation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a great many scholars and define new fields of academic expertise. The excavation of Khara-khoto materials displays the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Liao, Song, Xia, Jin, Yuan, and especially Xixia. Its great quantity, rich contents and high quality almost rivals the Dunhuang materials. Just like those from Dunhua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strongly reveal the flavour of local life and religion, as well as being polylingual. One should not imagine that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belonged to only one city in the Xixia kingdom, which might limit the relevance of their value. The civilization of every nationality and kingdom at a given time is mutually interacti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n also shed light the developing level of Chinese cultur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cludes such ancient classics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as Lunyu, Mengzi, Xiaojing, Sunzi (some of them are from lost commentaries by Song scholars), codes and anthologies written by Xixia officials and scholars, such as Tiansheng Codes, Shengli Yihai, as well as some Buddhist works, all of them cognate to Han culture. The literatur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Khara-khoto represents especially the continu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According to L. N. Men'shikov in his Opisanie kitayskoy chasti kollektsii iz Khara-khoto in 1984, there were 488 texts in Chines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Khara-khoto, but this sum does not include some fragments from earlier times (most of them used to mount or mend later books). Some Chinese documents form Khara-khoto, entered by K. K. Flug into the ranks of Dunhuang materials, are now included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Some of these were acknowledged in Opisanie by Men'shikov, and some of them were clarified in the process of editing and publishi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such as Dacheng ruzanglu uanshang ( $\Phi$ 221), illustrations of Shijiamuni shuofa tu ( $\Phi$ 360) and Shizi xiangluyi ( $\Phi$ 362A). The manuscript fragment of  $\Phi$ 229V (the 11th chapter of Jingde chuandenglu),

as pointed out by Rong Xinjiang of Beijing University, can be connected with another fragment KK.II.0238(k) in the Stein's collection from Khara-khoto in London. A few materials published here are not described by Men'shikov, such as an interesting manuscript of *Liushisigua tu* (Diagram of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In the hundreds of materials, only a few, for example the *Liuzhiyuan zhugongdiao*, have been published in full; most of them are published here for the first time. Their value will be briefly recounted below.

### I. A Unique Literature that Fills in the Gaps

In the Chinese materials from Khara-khoto, there are basic works passed directly to Xixia from Song and Jin, books block-printed or transcribed in Xixia, and a number of files and records made by Xixia and S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military leaders. Worthy of note is the unique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Khara-khoto that supplies new materials to the fields of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Thirty odd military documents of the northwest border area from the tim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109 pieces of paper in total, concerning the military deployment, troop movement, provisioning, pursuit and punishment etc. of Fuyanlu and Huanqinglu in the northwest area from 1118 to 1127, are of great value for studying the institution of garrisons, payment and supply at the end of the North Song. They contain detailed records that were rarely described or even lost in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se documents in the block-printed Tangut dictionary Wenhai zalei, which shows that there was a war between Xia and Jin after that between Song and Jin, and these documents were obtained by Xixia and used to print books because Xixia was deficient in paper. Documents preserved within the sheets of block-printed books, as recorded by our predecessors, the best-known are the documents within leaves of the Wangwengong wenji in the Longshu edition in Song times (an important edition of Wang Anshi's collected works), which were printed in collotype by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i.e. the Songren yijian. The great quantity of military documents from Khara-khoto ought to be of the same value as those in Wangwengong wenji.

Although the excavated social documents suffer the defects of being scattered, disorderly, incomplete, and difficult to read, they are after all part of the original

record of the social relations at that time; they are closer to the society and reality that the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compiled by scholars, so student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m. Besides the military documents of the Song northwest border area, there are sixty odd various official and private social documents, of which the earliest is the pledge by Zhijian and three other friends to seek Buddhisattva precepts in India, dated to 989 (Song, Duangong 2nd year). The latest ones, dated 1372 (2nd year of Xuanguang of the Northern Yuan), are some files of interrogation concerning the destruction of houses and documents about the allocation of foods. Among Xixia documents, there are contracts for borrowing wheat by Pei Songshou in the Tianqing years of Xia emperor Huanzong, and a report of the sentencing of some subordinates by the qianhu (chiliarch) Zhao Ting in 1223. Even more numerous are the various Yuan dynasty documents, such as reports and replies regarding the capture of bandits, decrees of sentencing to punishment, grain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bills of Edzina province, contracts for extending wheat, pawning cultivated lands, borrowing money, etc.. Although the fighting at the end of 1340s made Edzina River changed its course to the north, Khara-khoto did not escape the fate of being engulfed by the desert at last. But it is known from document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Khara-khoto, during the North Yuan thirty years later, still effectively exercised its authority, and people still lived there. That Khara-khoto finally became a dead city was a disaster for the local inhabitants, but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heat and aridity preserved the literature and utensils the originated and circulated therein.

The "Zhugongdiao" is the principal element in Jin folklore and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amous Dongjieyuan xixiangji was praised by Hu Yinglin of the Ming to the effect that "the whole literature of the Jin dynasty is comprehended therein".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such a mature work, there must have been many earlier works in the same style. This conclusion is confirmed by the Liuzhiyuan zhugongdiao in a Jin edition found amo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 original of which was returned to China in the 1920s and is now kept in the Beijing Library. Because it was known earlier on, it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oint of discussion for historians of literature.

The Jin xylograph Xindiao wenjiu qinghua is an interesting Song sketch-book not

described in any bibliographies but quoted by Wang Zhuo in his Biji manzhi. Once a subordinate in a prefect's office in the era Shaoxing (1131-1163), the fact that Wang Zhuo quoted Wenjiu qinghua in his work, means that the Wenjiu qinghua was probably printed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Although the Wenjiu qinghua found in Khara-khoto is only a fragment, it includes the Tang story of "Maixiu liangqi" quoted by Wang Zhuo and is more detailed than Wang's version.

The manuscript Liushisigua tu (Diagram of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 is not found in other bibliographies. As a divination text, it certainly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unique folkways of that time and place. It may have greater significance, however, if investigated from a popular literary point of view. A folk song reciting Five Dynasties' history is written on the title page, explaining tha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Five Dynasties, through the Liang, Tang, Jin, Han, and Zhou, the text were ordered in song (eulogies), followed by commentaries, then zan (praises) and ge (songs). In every divinatory symbol are indicated the relations of Wuxing (Five Elements), Ganzhi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wives, material goods, officials, ghosts, fathers and mothers etc., references to the position of the said symbol are given below. For example, it is indicated under the symbol guan that that symbol means the "Tang emperor Xuanzong enjoyed the sight of the moon and nothing would be gained though there might be something good". Besides, there are also stories about Jiang Taigong (Ziya) meeting Wenwang (Zhou dynasty), Meng Jiang sending the cotton-padded clothes, Gaozu (Han dynasty) being surrounded in Xingyang, Zhang Qian searching for the source of the Yellow River, Xuanzang (Tang dynasty) seeking the Tripitaka in India, Wu Zetian ascending the throne, the armed rebellion led by An Lushan and Shi Siming, etc., from which one can learn the popular beliefs of those time and the themes of literary sketches, storytexts and Dunhuang transformation tales which circulated along with "Zhugongdiao". These literary recordings were well-known and flourishing throughout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Song and Xixia eras.

### II. Precious Materials of Block-printing

Distinct from the Dunhuang materials, the block-printed books from Khara-khoto are more numerous than manuscripts, a result of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the propag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period of hand copying of

texts lasted the longest. The Dunhuang literature represents, in their greatest quantity, the various scroll and book binding styles of that time. Printed texts appear in Dunhuang materials of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and the early Song. The dates of Khara-khoto materials overlap with those from Dunhuang; this is the time when block-printing became a mature and widely-used techniqu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Song and Yuan dynasty receive the greatest attention; the contemporary Liao and Jin printings are certainly of the same value as those of Song, but the printings of Xixia are seldom mentioned. From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bibliographers have noticed the Song and Yuan printings as gems, and the ranking of a library has been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its Song and Yuan editions. This phenomenon cannot simply be seen only as lavishing praise on antiques, because the value of Song and Yuan editions proved to be higher than others in both material and literary terms. Today in China and overseas, a great many libraries collect ancient Chinese books, but only a small number of them possess Song and Yuan editions, even fewer are those with Song editions, and fewer still are those possessing Northern Song, Liao, Jin or Xixia xylographs. As Men'shikov shows,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there are more than ten Northern Song xylographs, such as Lüguanwen jin zhuangziyi, Guangyun, Lishu and some Buddhist texts; more than forty Southern Song xylographs; eight Jin xylographs, such as Sunzhenren qianjinfang, Xindiao wenjiu qinghua, Liurenke mijue; over one hundred Xixia xylographs; ten Yuan xylographs, and also a few printings of the Five Dynasties; the rest being the manuscripts of Tang, Song, the Jin puppet state of Qi, Xixia, and Yuan times.

These ancient block-printed books are naturally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 The specifications of cutting blocks are basically one block for one piece of paper, and the size of the blocks is mostly large. In many postscripts describing the process of printing and distributing the sūtras, sometimes one can find the name of copiers and block cutters. Where sheets were glued together in some Buddhist scrolls, i.e. at the joints of blocks, are preserved the earliest names of block cutters. It is also noteworthy that the Xixia block-printings go through the whole evolutionary process from scroll form to the square butterfly

binding, and combine with various block-printed illustrations, thus their specifications, styles and handwritings are diversified.

Binding forms include the scroll, accordion, and butterfly styles, in which the butterfly binding emerges us the most comprehensive. For example, there are common butterfly styles without binding up the spine, other styles with binding up the spine, and butterfly styles with spine binding and stitching. This style appear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Shesi zhuantie* in the Russian collection from Dunhuang, and is widely used in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 Xixia, as books evolved from the scroll to the square form, from manuscript to xylograph, the specifications of binding show the various divergences, so it is not an exaggeration to extol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as a treasure in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the Chinese books from Khara-khoto, there are fragments of Guangyun, blockprinted, preserved from the first rhyme xian to the fourth xiao, ninth ma, tenth yang of the second part of the even tone, from the thirtieth xiao to the fiftieth yan of the rising tone, from the thirteenth ji to the fifty-eighth xian of the departing tone. It is 38 pages in all, bound in butterfly, 15.5 × 23cm for the text, and the surname of cutters, Li, Qin, Lang, are recorded at the middle seam of the block. There was a taboo on using the name of Northern Song emperors up to Renzong, but the names of Yingzong and his father, Shenzong, Huizong, Qinzong, Gaozong and Xiaozong were not tabooed. Most of the block-printed books of the Northern Song now extant are comparatively large in page size and sparse in columns, but this edition is well printed, and has comparatively small pages and denser columns. In the time of Renzong (Song dynasty), Chen Pengnian suggested that the court print some widely used books with small blocks that the poor scholars could afford. Maybe this edition has a bearing on that. Compared with edition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and the Yuan, Ming and later times, this edition is not the same as others in form and content, but is roughly superior to present-day editions. The famous scholar Zhou Zumo worked out a critical edition of Guangyun by carefully collating all the editions he saw, later he also made some additions to Jusong guangyun in his long preface to that book published by th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It is a pity that he did not see this Guangyun edition of Khara-khoto, for his delight could not be imagined. Guangyun is an important tex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onology. In the past, paleography, phonology and semantics were the principal basis for classical studies, and *Guangyun*, as the *Shuowen jiezi*, were textbooks that had to be learnt by heart. The Khara-khoto publica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edition of *Guangyun* will draw the close attention of all academic fields.

Lü Huiqing wa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political reform led by Wang Anshi of the Northern Song. Led by Wang himself, the reform school compiled lots of textual commentaries to propagate their ideas of political reform. They had no sectarian biased in the scholarship and ideas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and were ust and fair in assimilating their useful points. Historical records note that Lü Huiqing wrote a Zhuangziyi, "in the 7th year of Yuanfeng, he first offered up the Inner chapters, the others were evidently continuations" (Chen Zhensun, Zhizhai shulu ieti, vol. 9), he also wrote Xiaojingzhuan or Xiaojingyi. Lü's commentaries to the classics not only took thei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onfucian studies, but also proved to be important materials for studies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s in the Mid-Northern Song, and the ideas of political reformers in the Xining and Yuanfeng years. Lü's Zhuangziyi was not collected in Siku quanshu, and today only a Jin edition survives. However, an earlier edition of the Northern Song is foun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titled Lüguanwen jin zhuangziyi, which is of great interest to scholars. It bears noting that Lü's Xiaojingyi had been long lost, so it is marvelous that a Tangut version of it was foun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Perhaps because Lü was the magistrate of Yanzhou and Fuyan, occupying official positions in the northwest for years, his work influenced and spread to Xixia.

### III. An Early Model of Block-printed Tripitaka

The vast major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Khara-khoto is Buddhist, including the important sūtras and śastras, Dīrghāgama-sūtr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Vajracchedic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Saddharma-pundarīka-sūtra, Mahāprajñāpāramitā-hṛdaya-sūtra, Yujia shidi lun, Shimoheyan lun etc.. Among them the most popular works are the 40th chapter, the Gandavyūha, of the Avatamsaka-sūtra, and the Guan milepusa shangsheng doushuaitian jing.

Block-printed sūtras appeared at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but the systematic

printing on a large-scale began with the Kaibao tripitaka at the beginning of Song. Fozu tongji records that the Song kingdom repeatedly gave the Tripitaka to other countries and neighbour regimes; the Tripitakas were present to Japan, Korea, East Jurchen and Xixia in the years of 984, 988, 1019 and 1058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Song huiyao jigao and Song dazhaoling ji, the Song kingdom gave Xixia six Tripitakas, the first in 1030 and the last in 1072. I now quote an edict from Xining years (1068 - 1077) by the Song emperor (Song dazhaoling ji, vol. 235):

Edict to the Xia lord: I learn from your memorial that "I beg you to send me a whole Tripitaka with bindings, bookmarks slipcases and sūtras translated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I hope Your Majesty will issue your decree with kindness, and order the department to check and sort out the volumes without omission. As for the whole outlay for printing, binding, paper and ink, I pay tribute to you seventy horses as usual ... As for sūtras you have asked to buy, I have already ordered the Department of Sūtra Printing to print all the sūtras for you, the garrison Bao'anjun to pass its official document to Youzhou and send someone to deliver them at the boundary. You can get the sūtras there and need not pay the tribute of horses.

The Song edition of the *Tripitaka* sent to Xixia is undoubtedly the *Kaibao tripitaka*, the blocks of which were cut in Chengdu in 971, then sent to Kaifeng in 983 and kept at the Department of Sūtra Printing. The *Tripitaka* was revised and expanded, so Xixia remarked in the memorial that it should include "sūtras translated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The Kaibao tripitaka has long been lost, at present there remain only eleven volumes (four of them kept in Japan). That there are no originals of the Kaibao tripitaka in Khara-khoto indicates that they must have been kept in the Xia capital Zhongxingfu. Xixia sought the Chinese Tripitaka was not only for Buddhist practice and studies, but also as a basis for reprinting, translat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 vast number of Buddhist works is mostly block-printed by Xixia itself, and many of them were printed by the government. The comparatively earliest ones are the Hrdaya sūtra, printed by Lu Wenzheng in 1073, and the Avatamsaka, cut at the Dayanshou Temple in 1083. The most popular sūtras were printed by Renzong in the years of Tiansheng

(1149-1169) and Qianyou (1170-1193) and by Empress Luo in the beginning of Tianqing (1194-1206) of Huanzong's reign for expiating the sins of Renzong. These various excellently printed sūtras are the heritage of the earliest printed Tripitaka preserved today, and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history of the block-printing of the Chinese Tripitaka.

Chinese Buddhist works from Khara-khoto literature did not only originate from the Kaibao tripitaka; there are many newly translated sūtras, Tantric texts and Buddhist works by Chinese not included in Tripitakas of past dynasties. At the end of Tang and the beginning of Song,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was nearly complet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s of each Chinese Buddhist School were perfectly established. After that the work of Buddhist translation concentrated mainly on Tantric texts, the originals being either in Sanskrit or Tibetan.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these text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Chinese, Sanskrit and Tibetan editions, has not been clearly described. Controlling Uigurs and Tibetans in Hexi, the Xixia regime possessed the qualified translation personnel and experiences of Tanguts, Chinese, Uigurs and Tibetans, and successfully organized the translation work of more than 3500 volumes of Chinese sūtras (then called the Tangut Tripitaka) in the first 50 years of its rule. The originals for translation in this period came mainly from the Kaibao tripitaka, but it was the first systematic translation of the Tripitaka from Chinese into a non-Chinese language. In the later Xixia period, along with the spread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number of translation from Tibetan sūtras into Tangut gradually increased. The publication of the Chinese and numerous Tangut Buddhist texts from Khara-khoto will surely contribute to raising the level of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history Buddhism in China, Xixia, Tibet and Central Asia, and supply certain materials for investigating long-standing problems. As for some rare Chinese Buddhist works among the Khara-khoto materials, such as the Changluliao heshang jiewai lu of the Chan School, the Tonglidashi lizhi mingxin xinghai jietuo sanzhi lü, Zhenyang hongjichanyuan cijue heshang quanhua wen of the Pure Land School, and Qingliang xinyao and Huayan fajie guanmen annotated by Zongmi who was both the fifth patriarch of the Avatamsaka School and Dinghui Chan master. The block-printed edition are from Song and from Xixia;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general tendencies of the Buddhist theories in Xixia can be seen from either local printings or texts from the central plain.

The compilation of the Daoist texts began with Lu Xiujing's collection of scripture, prescriptions and incantations in san dong (Three Caverns) during the Song era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fter that time Daoist texts rose and declined with those of Buddhism. A block-printed book in the Khara-khoto collection, Taishang dongxuan lingbao tianzun shuo jiuku jing, is modeled on the Qianfoming jing in printing the portraits of the ten main gods of Daoism. Daoist manuscript texts are not rare among Dunhuang materials, while block-printed texts appear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The Daoist Canon, called the Zhenghe wanshou daozang, was printed in the Chongning (1102-1107) and Zhenghe (1111-1119) eras of Song. Perhaps the Daoist literature found at Khara-khoto is either the earliest edition of Daoist texts extant today, or is related to the contemporary Song edition of Zhenghe wanshou daozang. Furthermore, the Jin editions of Nanhua zhenjing, Sunzhenren qianjinfang, and Liurenke mijue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supply information on how Daoist works spread to Xixia.

### IV. Achievements in Block-printed Pictures Surpassing Tang and Song

The plates in the Xixia Block-printed books are of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art. The plate in the complete sense that we can now see is that in the title page of Vajracchedicā by Wang Jie in the year of 868. In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beginning of Song, block-printing was widely used, and a great many block-printed illustrative works by the Cao family of the Guiyijun at Dunhuang and by the royal Qian family of the Kingdom of Wu Yue in Jiangnan heralded the arrival of the mature period of early plate production. But the nearly contemporary Xixia plate-printings, high in quality and abundantly preserved, are enough to fill in the previous gaps and to revise the relevant chap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late-pri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Xixia block-printing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gradual maturation of materials, techniques and markets in the art of plate-printing, and allowed it to flourish. Especially the active assimi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the Xixia regime pushed forward the large-scale cultural interaction among the Central Kingdom and border areas. Clear proof of this are the many books and plates printed in the Central Kingdom and preserved in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Owing to

natural conditions and warfare, the folk arts, including plate-printings, are less well preserved in the Central Kingdom. Because plate-printing was a new style of art in the Xixia period, because regional conditions favored its appearance and development, because the former traditions of drawing and cave-mural painting was abandoned, Xixia plate-printing become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mingling of multiple cultures.

There are two principal forms of Xixia plate-printing. One is the pictorial poster for the new year, such as Simeiren tu and Yiyong wu'anwang tu. The other is illustration to books, with excellent examples found on the title page of sūtras such as Avatamsaka, Guan milepusa shangsheng doushuaitian jing, Saddharma-pundarika, Zhuan müshen jing, and Qingliangguoshi da huangdi wen.

The plate-printing in Xixia books occur in three main varieties, i.e., plates in openings of scrolls and "harmonica" bound books, and on the title page of square notebook-bound books. The plates in scrolls are the most numerous. Following the transition in books from scroll binding to harmonica and square notebook, the production of plates frequently followed the scroll tradition as usual, but also had to adapt to the harmonica and square notebook binding forms. Scroll plates were relatively unlimited in size, usually occupying one piece of paper (approximately 30-45cm) or an even wider sheet so as to depict the vaster scenes of preaching the dharma or transformation tableaux. At the same time, the requirements for symmetry, equal spacing and rhythm arose in consequence of the need to assure that the main portrait avoided the seam after the switch to harmonica binding.

The composition of Xixia plate-printings spelled the end of painting on wall and banners and the beginning of book illustration. Without doubt plate-printing in earlier periods must have developed out of hand drawings. Especially in religious pictures, they of course carried forward more features of the art from which they originated. A representative composition in the style of a wall drawing is the picture on the title page of Foshuo zhuannüshen jing (TK8), the overall length of which is 59cm, occupying three sheets and consisting of three parts. The first sheet has the titles "Jiaozhu shijiamuni fo" and "Zhu dapusazhong", "Sibu dizizhong" in horizontal cartouches. The second sheet has the title "Fo zai qishejueshan shuojing chu" in the middle; other

titles in cartouches are "Zhu jushifu shi fo yingluo huacheng baotai fohui zhi chu", "Zhu jushifu zhuannüchengnan chujia zhi chu", "Cong mu youxie huran huasheng". On the third sheet are the titles "Dongnanfang jingzhu shijie wugoucheng wang fo", "Dewen cijing xinjie huanxi", "Gongyang fumu shizhang chu", "Huaizi zaishen sheng deshou dakutong", "Nüren weitasuoshi daoyao chongmi ruo'ao ruomo", "Yanli nüshen gongyang fo pusa chu".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sheets, at left upper corner is written "Foshuo zhuannüshen jing bianxiang", as the general title of the whole triptych.

It is clear that in this pictur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hole block, the use of separate planes to illustrate stories, the use of horizontal cartouches to label scenes from the  $s\bar{u}tra$ , were all adapted from the wall painting style. But in the transition from wall painting to block-printed plate, people did not simply follow the former, but gradually found the distinctive language of plate illustration, which displayed many differences from the style of wall and ordinary painting.

Firs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ubject gave way to a temporal distribution. This resulted from the different forms of wall painting and plate-printing. The exposition of wall painting often shows axial symmetry; this results from the viewers' line of vision: entering a cave temple, people first see the central portion of the painting and then the two sides. But in a scroll, the pictures unfold from right to left in a temporal process, so the first object of vision shoule be the main icon, comparable to what one first sees upon entering a temple.

Next, the stages in the unfolding of a scroll picture parallels the stages of reading a sūtra in three parts: xufen (introduction), zhengzongfen (main section) and liutongfen (circulating se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formation tales should parallel the process of Buddhist questions and answers, text explanations, and folk sermons known intimately by disciples. This indicates the creation of block-printed plate remains true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ext, and the creator's necessary attention to the reader's aesthetic process and psychology, which were shaped over a long span of time. The three sheets of illustrations to "Zhuannüshen jingbian" are correspond precisely to the pattern of the three-part division of sūtras: when the scroll opens, the background, and the final result of the sūtra are gradually presented in the whole transformation

tableau, following the readers' psychological expections.

The literature and art works of Khara-khoto were taken to Tsarist Russi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precarious years of Qing, the last dynasty of China. Up to now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en deeply distressed by this. The situation in Chin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has changed in recent decades as greatly as if "oceans had turned into mulberry fields". Now when scholars and publishers of both China and Russia sit together in friendship and equality to discuss and affirm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cious literature kept nearly a century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respectively to contribute their wisdom and strength to reach a common goal, all sorts of emotions well up in their minds. The publication of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will make the souls of these precious items return to the East, although their skeletons stay abroad. They will unfold before the world's eyes through thousands of transformations and be shared with great signification by the academic world at home and abroad.

\*

The influence of Khara-khoto literature can yet not compare with that of Dunhuang, and its level of study is not as thoroughgoing as that of Dunhuang. This is because the Dunhuang literature, mainl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easier for most scholars to deal with, whil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s mainly written in Tangut. Although Tangut as a dead script has been fundamentally deciphered by the efforts of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there are still few scholars who have mastered Tangut language skillfully. Another reason is that the publication of Khara-khoto literature falls behind that of Dunhuang.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will be published in three parts: Chinese works, Tangut non-Buddhist works and Tangut Buddhist works. The part containing Chinese works consists of six volumes. As separate parts, the description, chronological table, classified catalogue and index will be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To preserve the Khara-khoto literature in its entirety, this publication will include a few newly confirmed Khara-khoto materials. The Buddhist and non-Buddhist materials in the Tangut language have already been introduced by Shi Jinbo in his preface, and will be described separately in each volume of both those parts.

It should be expected that along with the entire publication of the Heishuicheng (Khara-khoto)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there may be increasing numbers of scholars trying to master the Tangut language, so as to use first-hand materials from the original treasure. Studies on Khara-khoto, as those on Dunhuang, are sure to become one of the remarkable academic field in Sinology.

Li Weiguo

Aug. 20, 1995, Shanghai

Translated by Nie Hongyin

Revised by Ruth W. Dunnell

### 編

例

《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共六卷,按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入藏號順序編排出 版。已被編入該所敦煌文獻序列(Φ、Дx)的黑水城文獻亦予檢出,收入本書。

凡同一文獻的各種寫本與不同刻本全部收入本書。同一文獻有多號完全相同(同版同印次) 相應部分配補。 選收其中印製最精良、保存最完整者,其餘不再收録。遇殘缺污損葉面, 在第六卷所附《叙録》中對所有人藏文獻均作外觀與內容的簡述,並指出未收刻本 以同版同印次的他號文獻 的刻本

= 凡配補的文獻, 以入藏最前的編號居首, 他號按順序以斜體排印附後。 配補葉面起迄在《叙録》 中

對應參見的文獻編號與部位

加以説明。如:

俄 TK 42 TK 44 TK 46 TK 48 TK 49 TK52TK54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四 每一 文獻圖版均有文字説明。程式爲:藏家簡稱與原人藏編號, 文獻題目 圖版總數與序數。若本

如 :

俄 TK 133 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録 (38-1)

號圖版僅一幅,則總數與序數一項省略。

俄 A2 六十甲子歌

五 同件文獻中有多項不同內容時,以1,2,3……標識。

TK 137 佛說業報差別經 2 佛說無常經 <u>ယ</u> 大佛頂白傘蓋心咒 4. 聖六字太明王心咒

如

同 藏號中有內容不相統屬的多件文獻葉、 片時, 以 A, B, C····· 標識。 如:

TK63A 大方廣佛華嚴經人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俄 TK63B 佛經

俄

俄 TK63C 佛經(西夏文)

文獻背面有文字、圖案、印章等, 以原人藏號後加 V (verso) 標識。

俄 TK6V 粉蝶兒詞

文獻附屬的字條紙片等,以原人藏號後加 P(piece) 標識。如

俄 TK49P 裴松壽處典麥契

七 六 本書正文圖版係據原件直接拍攝,電子分色製版影印。 誤者,予以補正;原件無題者,據其內容及相關研究成果予以擬題。 要作通欄排列。 文獻的命題,若原件前後多處有標題者, 通欄片以不超過文獻原大爲限。 以完整、 通行、 一般作上下雙欄排列, 規範爲原則,擇采其一;原件標題缺損訛 命題依據在《叙録》 少量因內容或識讀需 中述説

人 本書每卷卷首均印有彩色圖版。 彩圖主要用于本卷精彩篇章的欣賞介紹 , 兼及特殊情況(彩繪、 朱

筆、印章、字迹不明等)的顯示。

九

本書第六卷附編《叙録》、 《年表》、 分類目録 索引》 以利查閱研究

### **Editorial Notes**

- I. Consisting of six volumes, the Chinese part of the Heishuicheng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is published and compiled in the numerical order of the collection in the St. Petersburg Branch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Khara-khoto materials already compiled in the Dunhuang series  $(\Phi, \Pi x)$  are taken out and included in these volumes.
- II. Each manuscript and different edition of one and the same work are all included in these volumes. Regard the identical block-printed editions of more than one number of the same material (of the same edition and page), the best printed and preserved numbers are included, others are not. Regarding fragmentary and blurry pages, other corresponding pages of the same edition are included as supplements. Descriptions of the forms and contents of all the literature are given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the numbers and parts of corresponding references not included are also indicated there.
- III. The supplementary materials are noted by marking the preceding number at the beginning and other numbers enclosed successively in italic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the supplementary pages will be indicat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e.g.,

俄 TK42 TK44 TK46 TK48 TK49 TK52 TK54 TK5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IV. Each plate is labeled in this order: the abbreviated name of the collector and the original inventory number, the topics, the total number of plates and the ordinal number. If there is only one plate of one number, the items of the total and ordinal number are omitted. e.g.,

俄 TK133 真州長蘆了和尚劫外録 (38-1)

俄 A2 六十甲子歌

V. Different content in one and the same item are indicated by 1, 2, 3, ... e.g.,

俄 TK137 1.佛說業報差別經 2.佛說無常經 3.大佛頂白傘蓋心咒 4.聖六字太明王 心咒

7

Fragmentary materials differentiated from each other by their content in one and the same number are indicated by A, B, C... e.g.,

俄 TK63A 大方廣佛華嚴經人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

俄 TK63B 佛經

俄 TK63C 佛經(西夏文)

Writing, designs and seals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per are indicated by adding V (verso) after the original number. e.g.,

俄 TK6V 粉蝶兒詞

Written pieces of paper enclosed with the material are indicated by adding P(piece) after the original number. e.g.,

俄 TK49P 裴松壽處典麥契

VI. Regarding the topics of the materials, if there is more than one headings in different places in the original, one of them will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veness, currency and standardization. Gaps and errors in the original headings will be completed and corrected; where omitted, the original headings will be reconstructed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nd relevant research. A concordance of headings is described in the *Bibliographical Notes*.

VII. Facsimile plates in these volumes are photographed directly from the originals and printed with electronic colour scanners. The plates are arranged in two sections of the page, upper and lower; some are arranged in one section in regard to the needs of the content and coherence. The one-section plates are no larger in size than the originals.

VIII. The colour pl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volume are printed for the reader's appreciation, a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lendid chapters in the volume, and to demonstrate the documents' special conditions (coloured drawing, red ind script, seal, blurred writing).

IX. Bibliographical Notes, Chronological Table, Classified Catalogue and Index are appended to the sixth volume for the reader's reference.



一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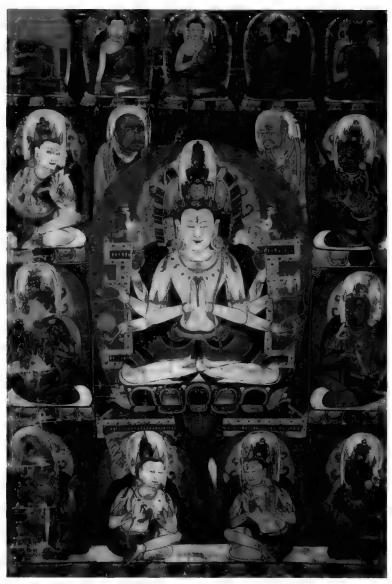
二 東方研究分所閱覽室



四 東方研究分所庋藏黑水城文獻



三 東方研究分所手稿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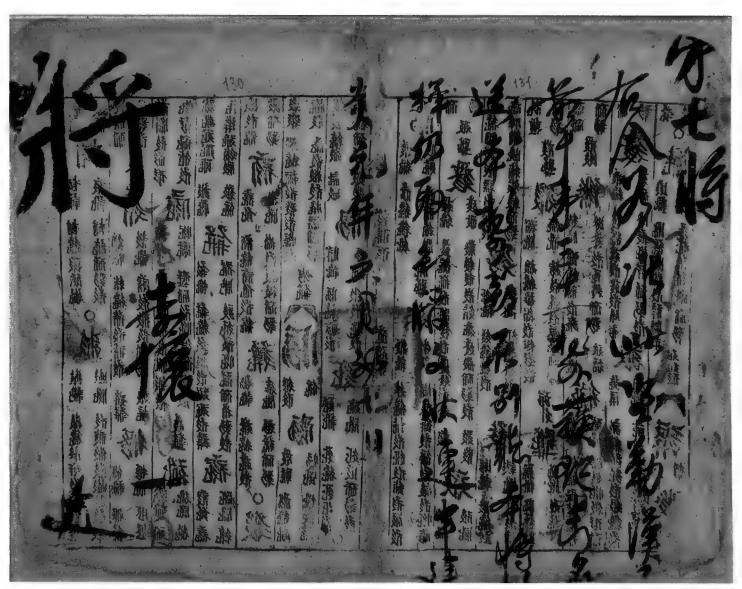
六 絹本彩繪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



五 絹本彩繪大勢至菩薩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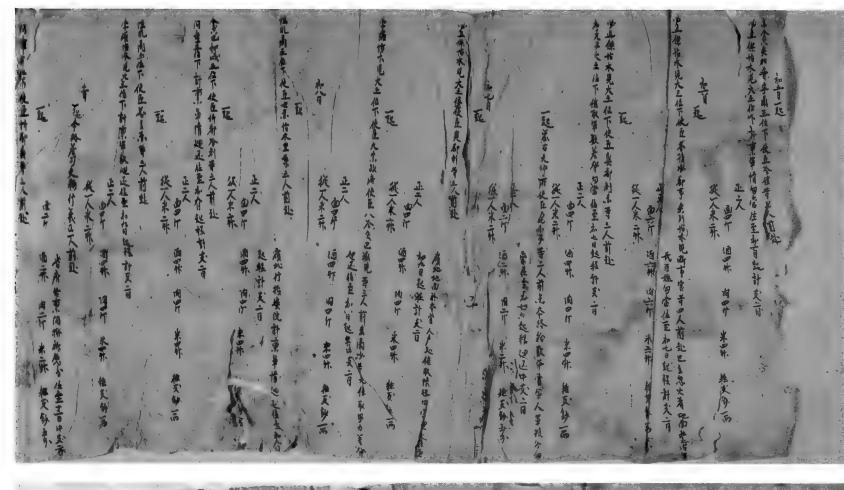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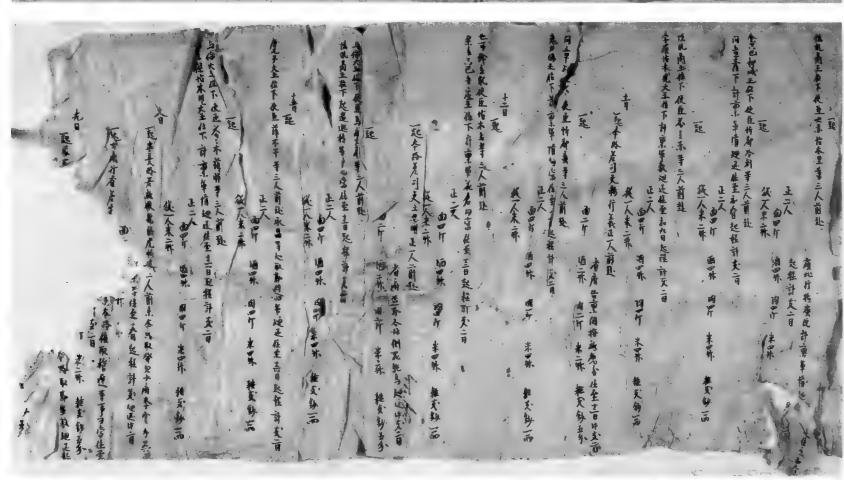
七 木板彩繪西夏文陀羅尼曼荼羅圖





一二 TΦ14 宋西北邊境軍事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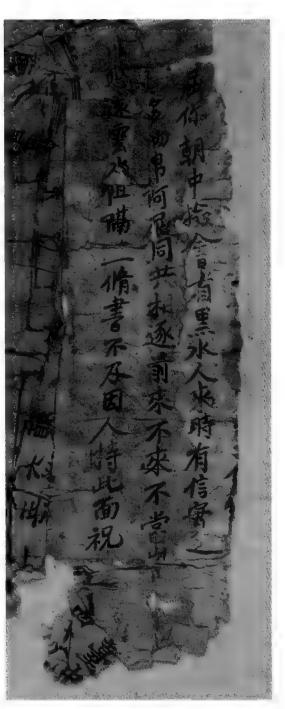


\*

一三 TK248 元甘肅行省寧夏路支面酒肉米鈔文書



一五 TK264 至元通行實鈔貳貫



一四 TK300V 有關黑水人的信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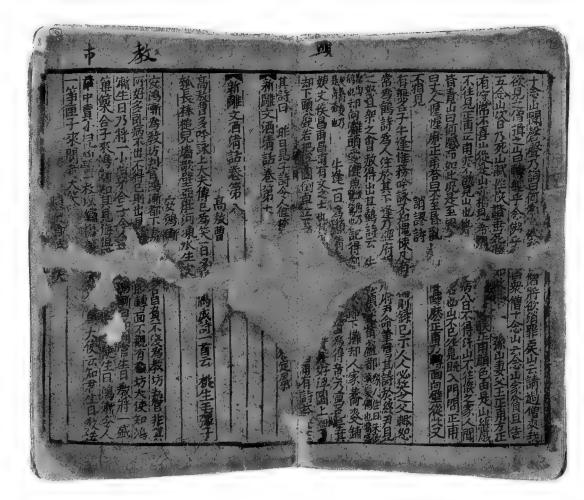
一七 TK322 元寫本六十四卦圖



一八 TK153V B60V 朱寫本卜筮要訣

| 二大一水土刑傷 家中鴻乱出非常 二十一水上東京東子孫樂王山課內東京市之外 一一大一水土刑傷 家中鴻乱出非常 一一大一水土 門 |
|--|
|--|

一九 TK172 金刻本六壬課秘訣



二〇 TK288 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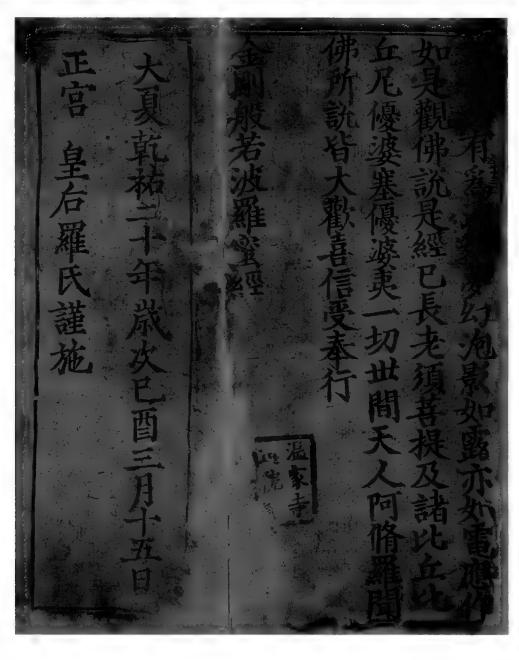


二一 TK6 宋刻本吕觀文進莊子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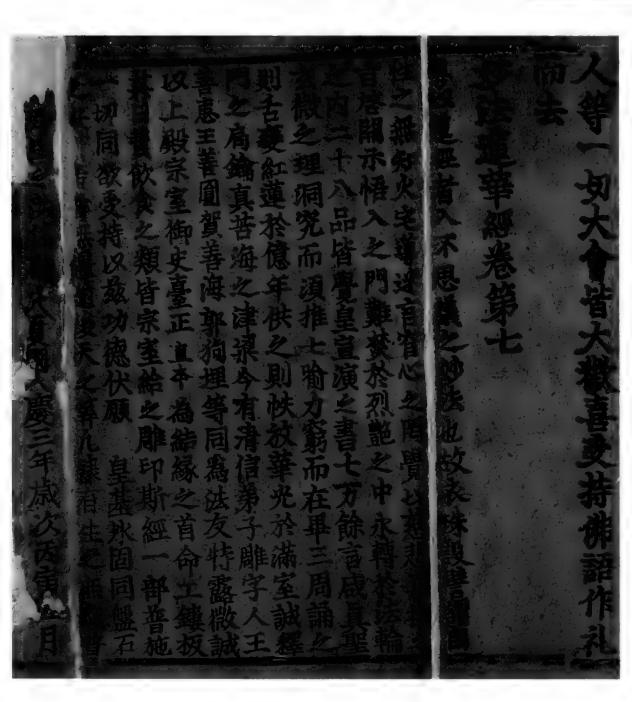
二二 TK151 宋刻本太上洞玄靈實天尊説救苦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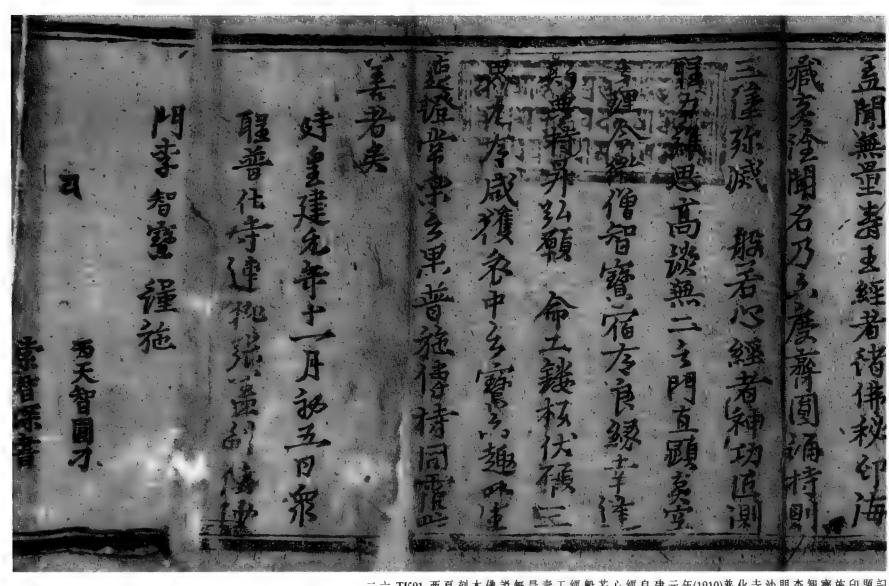
二三 TK14 西夏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乾祐二十年(1189)羅皇后施印題記

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大多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大多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大經濟寺演妙大德沙門 守瓊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 守瓊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 守瓊

二四 TK8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



二五 TK1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人慶三年(1146)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等 施印題記



二六 TK21 西夏刻本佛説無量壽王經般若心經皇建元年(1210)普化寺沙門李智竇施印題記

向頌云数讚甚 金剛 来諸佛 福田法界生靈普點益 鹏 称雪 卸奶 庭宴需率 岸 徳 積 两 廣大 福 依 飛 時大中祥存九年四月八日服果 深 如 走 行 徽 法 霊 豊 水 空 陆带角枝毛俱冰良因 登 兖 理 勾 竟 先 當者實相 如法 界 通 种 加持 助縁 週

二七 TK149 宋刻本金剛般若經鈔第五 ´ 大中祥符九年(1016)知丹州軍州梁某施印題記

भार

毗盧現相稱性演百千 一個之大經彰生佛也無二如

時兩甘苦自分

曼殊化身隨機設二 法界則方通相虚萬象性實一百 **波河淺深各異是故** 簡以科注釋其義引學者擊其門至于悟入大經 定慧祖師歎 妙門明階降也非 龙也 云青哉 相國蒙公製序指示

**在文上有科三者備矣一經顯馬使諸修觀之徒講宜之侣** 稍勞披覽故有先賢移其科格以就明 為河渡人天魚置 /網若但科 而不注如無 温解於生此之 出凡要 網之綱科注別 路意備詞存簡 文旣觀下有 組

而不

恐煩眩目移

**能** 等於皇家曜

於官庶道如堯舜之風國等

一真不問冤親將來無對溥異舍情悉如我願

鏡中欲垂慈照者也

星朝天盛四年歲次手申八月望日河道沙門釋為西斯

然州開元寺僧西安州歸義劉德真雕板中文謹就

聖師日散秘

或聞功齊種智仰此上乗遍嚴法界延

工螻板印施

傳寫者句文脱謬致罪學心必成大失是以恭捨

流通備諸學者若持若誦情

百遇良規始欲修習終難得本以至口授則立

殿者讃斯法門都可謂入

尤竹舉網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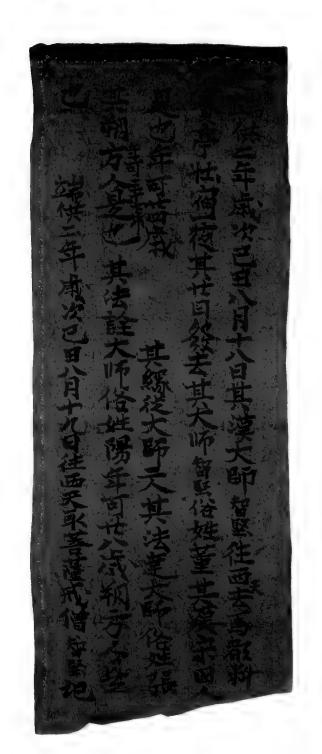
二八 TK242 西夏刻本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下天盛四年(1152)沙門法隨等施印題記

毎思 早超十地之因速滿三身之果仍 漢共三萬餘卷并彩繪功德三萬餘 福宗親延萬葉之複武職文臣恒祭 慎散施國內臣民普令見聞蒙益所 此 性大權應跡右脇化生權天帝不受 六趣四生咸捨生死法界含識悉證 顯於禄位黎民士庶克保慶於休祥 龍圖水覇等南山而崇高 仁宗聖德皇帝拋離獨境安住淨 鳩勝善伏願 仁宗之厚德仰憑法力以應資遂於 珠衣挫聲聞直談妙理慈親獻蓋報 無相無名之妙心顯非男非 末世去聖時遥宿植良因幸逢真教 他聞經歡喜定轉女身信樂受持速 **於聞兰乾大覺特開甘露之玄門** 一周之是晨命工鏤板印造斯典番 出之洪思諸婦轉形酬多生之育 父身經者上来秘典了 齊北海而深廣 皇太后羅氏發願謹施 天慶九卯二年九月二十日 皇太后羅氏自惟生居 ·, 皇女事千春之 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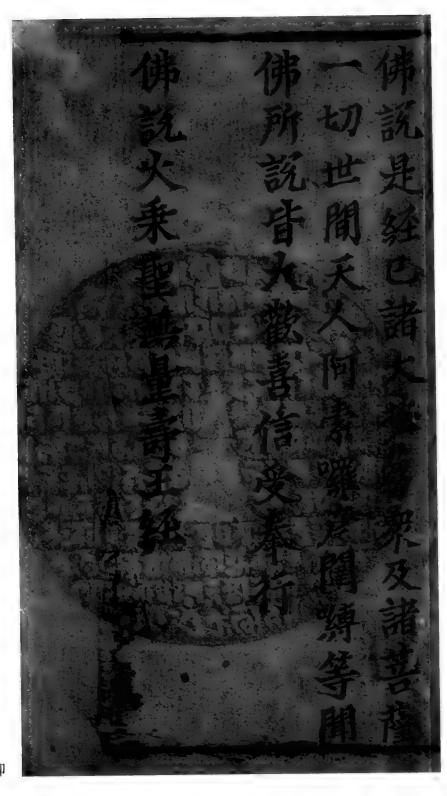
卷天慶二年(1195)羅皇后施印發願文 二九 TK12 西夏刻本佛説轉女身經

清乃超流轉於多生超 萬古恒清朝美 我無依無属無思力成 心廓小如空隨根利 根力成大事然復遇縁施作 曾有悠無為而濟不作而她有力 恩無思可議盖日月也無有作者 中求索何作何依不知何物 名也 理大 不以世名是貴但 師製 則 性 具 可置

三〇 TK134 刻本通理大師製立志銘心誠



三一 B63 宋端拱二年(989)智堅等三人往西天求菩薩戒記



三二 TK76 刻本佛說聖無量壽王經梵文印

三三 TK148 刻本觀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文翠野樓記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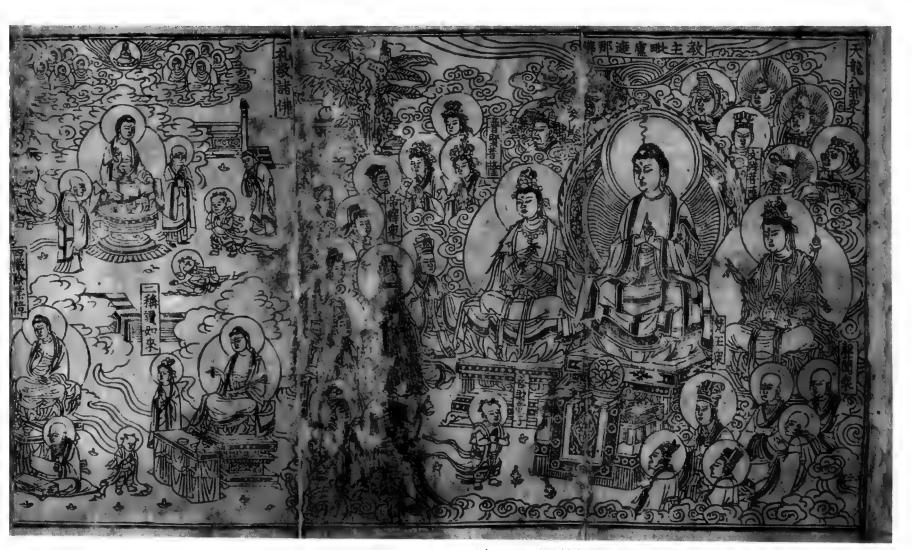
三四 TK186 刻本注清凉心要李醜兒宅經記印



三五 TK1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一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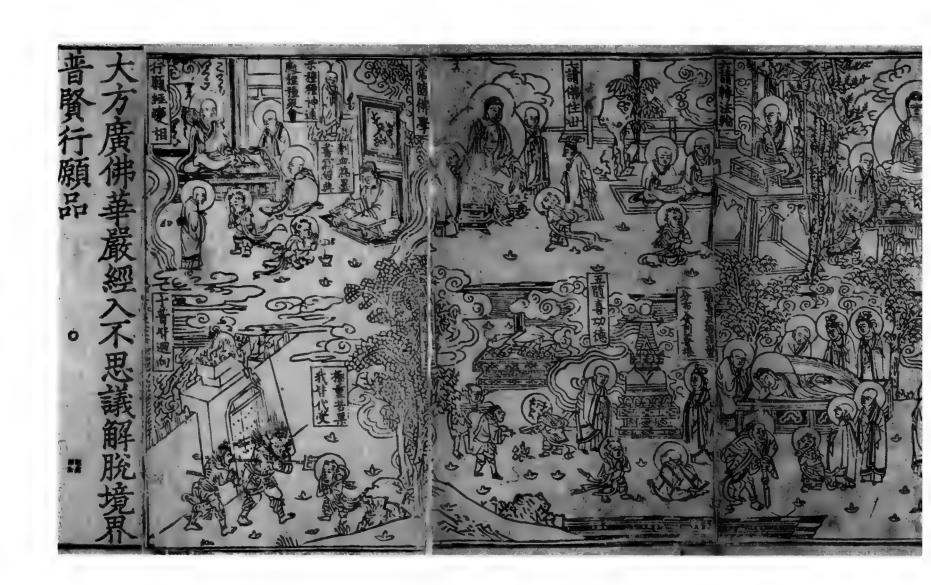
三六 TK81 西夏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版畫刻工姓氏



三七 TK98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人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때品版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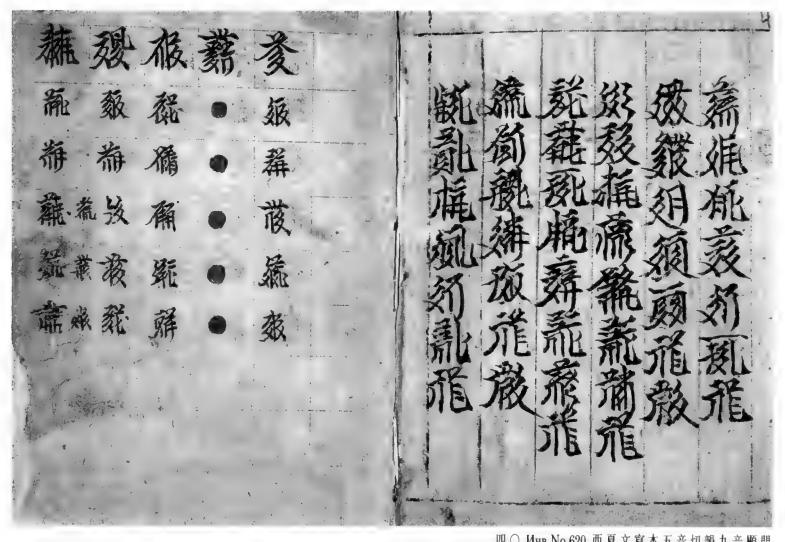


三八 Mms.No.212 西夏文刻本文海實韻平聲





三九 Инв. No. 209 夏正德六年(1132)西夏文刻本音同牙音



四○ Инв. No.620 西夏文寫本五音切韻九音顯門

四一 Инв. No.214 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刻本番漢合時掌中珠序

四三 Инв. No. 2616 西夏文刻本貞觀玉鏡統第二



四五 Инв. No.741 西夏文寫本新集碎金置掌文



四六 Инв. No.210 夏乾祐十八年(1187)新刊西夏文三才雜字

各所引成炒 从好痛然 好孩必然概形例处 城或編俸城以流祖和移於以為答義就不 **对湖州南班城州科科外所到南部城州州山 建梅根我似则都致胸数河流或外对** 多於紅風對班城什成公科城到外到外都 1日の新路以及州和及外海南及名 州所外於城城以及此以及成為的北東的 次於不再及以外外政政 我好外外的清後 到我明新成好在新城原 何を新的為不到不到華到拜四有 美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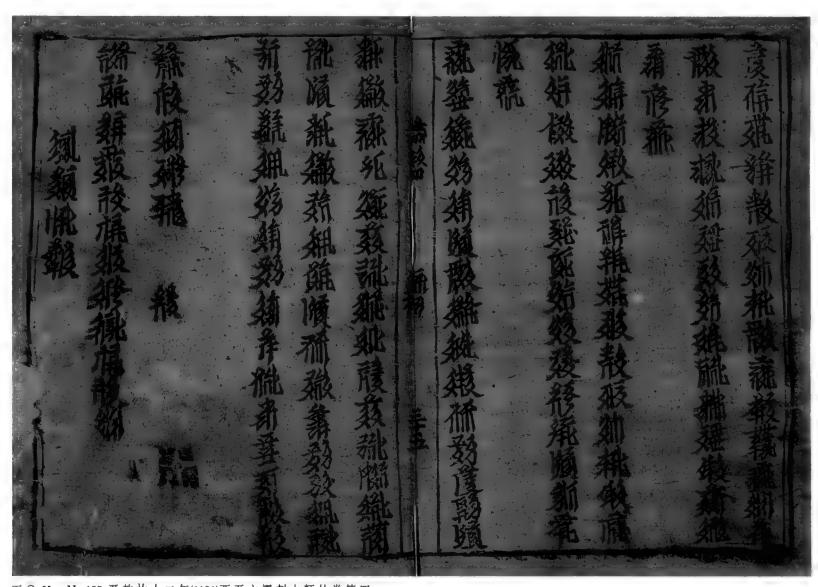
四七 Инв. No. 2627 西夏文譯朱筆校點寫本吕惠卿孝經傳



四八 MHB.No.148 西夏文譯刻本陳祥道論語全解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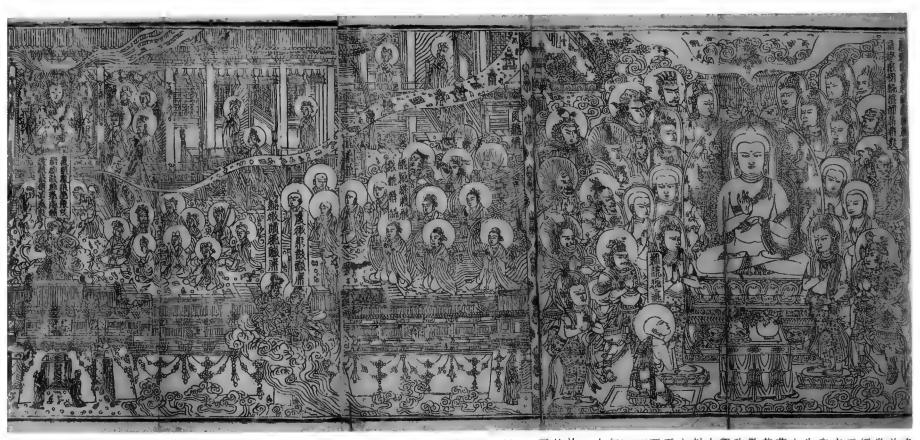
**私養點紛熱幼和解改收滿粉收繳雅 雅絳嶽鏡**教 **死熊顺竟降在食熊然 依你而整依執私或称維我被獨** 一教都維彩 而脱脱 散 散 能 我 教 都 我 改 如 私 雅素乳機係授恭版 粉雜我版那酸張敬 私有課與我能给新能福孤機錢施稅條 **耕業編辦多級 鹿藏殿 新教 歷教 新** 桜 胤剃鄉刻言設熱幼科 維 輟 維死 贪幸 店 改 敬 敬 職 義 恭 衛 爺 節 行 統編 樂 養機 粉鄉 納納 纲 旅 推 和 毛織推義我而 **乖** 作 飛 作 松 幼 我 一般 雅 照 样 夏蘇新 動鄉 解 新統統 **希** 解酸 明新 被 縨 類 圆

四九 MHB.No.579 西夏文譯刻本孫子兵法三注下



五〇 Инв. No.125 夏乾祐十二年(1181)西夏文譯刻本類林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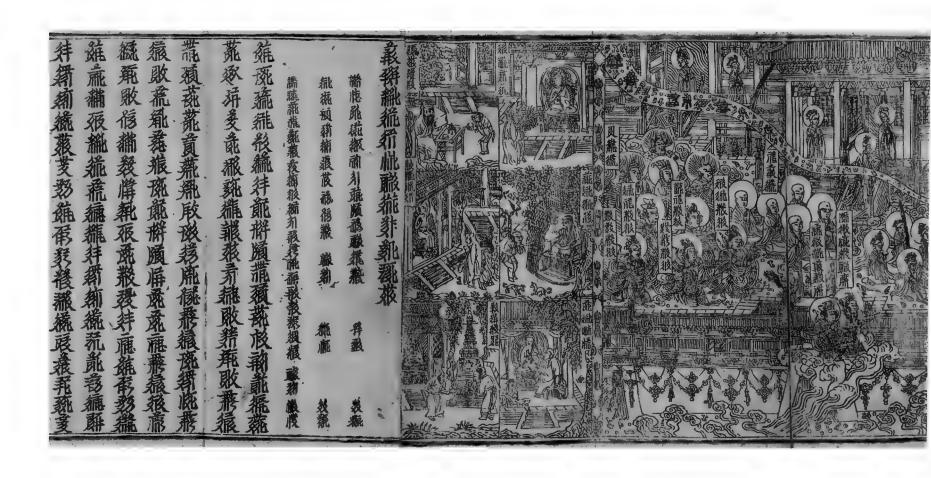
五一 Инв. No.132 西夏文譯刻本十二國



五二 MHB.No.78 夏乾祐二十年(1189)西夏文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卷首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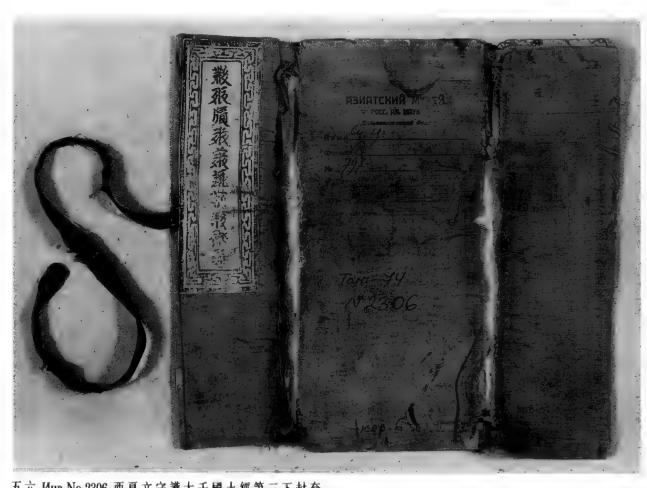
五三 MHB.No.87 夏天慶年間西夏文寫本佛説實雨經卷第十版畫及羅太后寫經牌





五四 Инв. No.940 西夏文刻本繪圖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五五 Инв.No.4166 西夏文活字版三代相照言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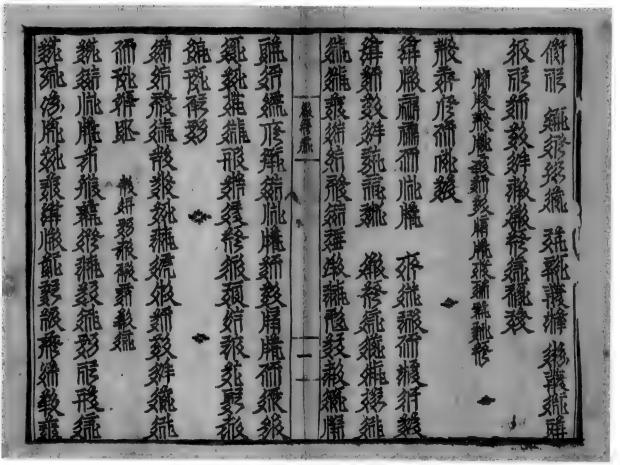
五六 Инв. No. 2306 西夏文守護大千國土經第三下封套



五七 Инв. No. 7038 西夏文刻本佛説大威德熾盛光佛諸星宿調伏消灾吉祥陀羅尼經版畫

विश्वातः । यञ्चलाकियः वर्गान्तिः श्वात्ते । वर्गान्तिः श्वात्ते । वर्गान्तिः श्वात्ते । वर्गान्तिः श्वात्ते । वर्गान्तिः श्वाद्वे । वर्गान्तिः । वर्गानिः । वर्गानि

त्रार्टा ते के ता सम्मान्य दे की दे व खुर हे दे कर सम्मान स्तर के दे व खुर हे दे कर सम्मान स्वार के दे व खुर हे व खुर हे दे कर सम्मान स्वार है व खुर हे दे कर सम्मान स्वार है व खुर हे दे कर सम्मान स्वार है व खुर है दे कर सम्मान स्वार के दे के दे





五八 Инв. No. 6510 夏應天元年(1206)西夏文刻本發菩提心及常作法事題記

स्वीत् निर्देश हर प्रकर ता. । स्वीत् र्यो श्रेस्य स्वार नेर ता. । श्रिय प्रक्रिय स्वीत् स्वी

ण.चेर्र.तथुं जुरुशःस गु.चरःस्व ग्रेर्ट्यः ग्रेर्ट्यः भ्रेर्ट्यः

चर्रम्भन्यत्तः। इक्षान्यक्षकान्त्र स्वात्तेव्यक्षकान्त्र स्वात्त्र स्वात्तेव्यक्षकान्त्र । देन्यक्षिये देन्यक्षिया विद्याः वि

बर्द्री विश्वभारत्रेत्वाश्यक्ष्यक्षेत्रस्त्रीयश्चित्रस्त्रीत्रभावे विश्वभावे । क्ष्यं प्रतिस्त्रात्र विश्वभावे । विश्वभावे ।

六〇 Tuber 3 藏文寫本辯法法性論





六一 Yŭryp 21 回鶻文寫本佛經

## 俄藏黑水城文獻第一册目録

TK1-TK20

| 5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三一〇                 | TK 15 |
|--|-------|
|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TK 14 |
| 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 TK 13 |
| 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 TK 12 |
|  | TK 11 |
| )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二四一                                 | TK 10 |
|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二二五                                   | TK9   |
|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 TK8   |
| 廣韻 一六一   | TK7   |
| Ⅴ 粉蝶兒詞   | TK6V  |
| 呂觀文進莊子義 五一                                     | TK6   |
| 平水韻  | TK5   |
|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三]                                   | TK4   |
|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一七                                    | TK3   |
|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一六                                    | TK2   |
|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 TK1   |

| TK16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  |
|--------|---|--|
| TK16V  | 雜寫  |  |
| TK17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三七                                  |  |
| TK17P1 | 佛經 三四七  |  |
| TK17P2 | 佛經發願文(西夏文) 三四八                                |  |
| TK18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三四八                                  |  |
| TK20   | 金剛投告皮羅蜜經 三五四                                  |  |

## 彩

| VIII     | 一份然多原了(可写了)                                  |
|----------|--|
| K18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 K20      |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          |  |
| 必色圖      | 画版目録   |
|          |  |
| _        |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外景                          |
|          | 東方研究分所閱覽室                                    |
| Ξ        | 東方研究分所毛稿部                                    |
| 四        | 東方研究分所庋藏黑水城文獻                                |
| 五        | 絹本彩繪大勢至菩薩像                                   |
| 六        | 絹本彩繪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                                |
| 七        | 木板彩繪西夏文陀羅尼曼荼羅圖                               |
| 八        | 泥塑彩繪釋迦牟尼佛雙頭瑞像                                |
| 九        | 西夏文解説白畫相面圖                                   |
| <u> </u> | 麻布彩繪毗沙門天王                                    |

ТФ14

TK7

宋刻本廣韻

宋西北邊境軍事公文

元甘肅行省寧夏路支面酒米肉鈔文書

**TK**248

| 境界普賢行願品版畫             |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脱境界普賢行願品版畫            | TK98          | 三七       |
|-----------------------|---------------------------------------|---------------|----------|
| 刻工姓氏                  | 西夏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版畫刻工姓氏                 | TK81          | 三六       |
|                       |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一版畫                        | TK1           | 三五       |
|                       | 刻本注清凉心要李醜兒宅經記印                        | TK 186        | 三四       |
| 印                     | 刻本觀無量壽佛經甘露疏科文翠野樓記印                    | TK148         | 11 11 11 |
|                       | 刻本佛説聖無量壽王經梵文印                         | <b>TK</b> 76  |          |
| <b>芦薩戒記</b>           | 宋端拱二年(989)智堅等三人往西天求菩薩戒記               | B63           | 111 1    |
|                       | 刻本通理大師製立志銘心誡                          | TK134         | ===      |
| (1195)羅皇后施印發願文        | 西夏刻本佛説轉女身經一卷天慶二年(1                    | <b>TK</b> 12  | 二九       |
| 年(1152)沙門法隨等施印題記      | 西夏刻本注華嚴法界觀門卷下天盛四年                     | TK242         | 二人       |
| (1016)知丹州軍州梁某施印題記     | 宋刻本金剛般若經鈔第五大中祥符九年(1016)知丹州軍州梁某施印題記    | TK149         | 二七       |
| 元年(1210)普化寺沙門李智寶施印題記  | 西夏刻本佛説無量壽王經般若心經皇建元年(1210)普化寺沙門李智寶施印題記 | <b>TK</b> 21  | 六        |
| (1146)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惠等施印題記 | 西夏刻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七人慶三年(1                    | <b>TK11</b>   | 三五       |
|                       | 西夏刻本大方廣佛花嚴經卷第四十                       | TK88          | 二四       |
| 年(1189)羅皇后施印題記        | 西夏刻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乾祐二十年                     | TK14          | -        |
|                       | 宋刻本太上洞玄靈寶天尊説救苦經                       | TK151         | <u></u>  |
|                       | 宋刻本呂觀文進莊子義                            | TK6           |          |
|                       | 金刻本新雕文酒清話                             | TK288         | <u>-</u> |
|                       | 金刻本六壬課秘訣                              | <b>TK</b> 172 | 一九       |
|                       | V B60V 朱寫本卜筮要訣                        | TK153V        | 一人       |
|                       | 元寫本六十四卦圖                              | <b>TK</b> 322 | _<br>七   |
|                       | 金刻本孫真人千金方卷第十三                         | TK166         | 六        |
|                       | 至元通行寶鈔貳貫                              | TK264         | 一<br>五   |
|                       | V 有關黑水人的信札                            | TK300V        | —<br>四   |

三人 Инв. No. 212 西夏文刻本文海寶韻平聲

三九 Инв. No. 209 夏正德六年(1132)西夏文刻本音同牙音

Инв. No. 620 西夏文寫本五音切韻九音顯門

四一 Инв. No. 214 夏乾祐二十一年(1190)刻本番漢合時掌中珠序

Инв. No. 114 西夏文刻本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第十二

四三 MHB.No.2616西夏文刻本貞觀玉鏡統第二

夏乾祐十三年(1182)西夏文刻本聖立義海第一

四四四

Инв. No. 143

四五 西夏文寫本新集碎金置掌文

Инв. No. 741

四六 Инв. No. 210 夏乾祐十八年(1187)新刊西夏文三才雜字

四七 MHB.No.2627 西夏文譯朱筆校點寫本呂惠卿孝經傳

四 人 Инв. No.148 西夏文譯刻本陳祥道論語全解第八

四九 Инв. No. 579 西夏文譯刻本孫子兵法三注下

五 0 Инв.No.125 夏乾祐十二年(1181)西夏文譯刻本類林卷第四

五 Инв.No.78 西夏文譯刻本十二國

五二 Инв. No. 132 夏乾祐二十年(1189)西夏文刻本觀弥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卷首畫

五三 Инв. No. 87 夏天慶年間西夏文寫本佛説寶雨經卷第十版畫及羅太后寫經牌記

五 四 Инв. No. 940 西夏文刻本繪圖本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 品品

五五 MHB.No.4166 西夏文活字版三代相照言集文

五六 MHB.No.2306 西夏文守護大千國土經第三下封套

五七 MHB.No.7038 西夏文刻本佛説大威德熾盛光佛諸星宿調伏消 灾吉祥陀羅尼 經版版

五 人 MHB.No.6510 夏應天元年(1206)西夏文刻本發菩提心及常作法事題記

五 九 Тибет6 藏文寫本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六〇 Уйгур21 Тибет3 藏文寫本辯法法性論 回鶻文寫本佛經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3)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5)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7)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9)

月 欣 佛道 晤 自 和 子 爾 上如可 124 吹如 龍朦 仁者 佛 說 知知 法尊 見 此 狼 欽 光瑞 並 阎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1)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3)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5)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7)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19)

舎於故得現云尊解言所不時是 於何唯唯詞以虚 名以有 海 而 大佛譜 卅 因 數佛汝 欲难 随华 令以故之非方 刀 綠趣所墨利 流鋒弗 言花如利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1)

五中 教化 羅 不丘 阿 信且 如有 切 康 此 \_\_\_\_ 四增 衆上 身 法 弟 比 以知 其數有五人 提 上 當涅 比 非 虚 丘 丘 阿 知 如 因 如 此 方 utt 出世皆辭 而有心佛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3)

自 7]\* 夷比 若充心 提末切知 說 班 便貞 其 E 佛經 亦或以若 修找而有 我不鈕 郑诗記行 設行根說說 佛所彼诤如深 弗 於值線請眾 土說心戒是妙 生其佛方妙小因 故此 武此 开 生 亦 閸 O 所 乱邓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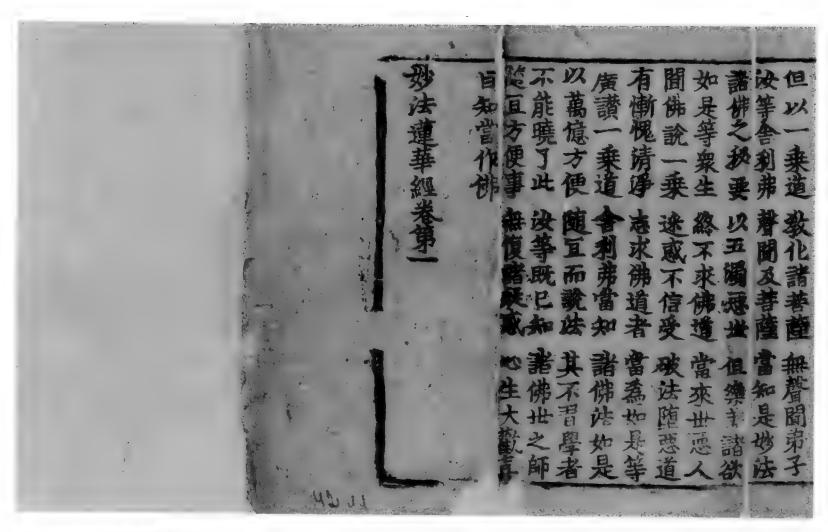
皆彩 或供 暂但漸或 人度此復養巨以琶使像 化谢以已畫 善功爪佛佛 華脫足書 至福走 木以立是 大作 衆吹香無 角 妙 如若自智 已是草作已必新雕已 成諸末若成膠赤成成 以一次医而於 小供整供塔 入 及使 佛 漆 日 佛 产養挨養廟道等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7)

和以随及深 諸無於無弗生種方根之種如如方 那所五福當性法個利之, 入腹者窮利衆種應諸心示說數師 5 見見欲慧知欲門 生以使示我種 大牛死佛說於亦種 意服謝佛如因者 叛世供 網六令以陰喻 性聚 下架断愛苦道得智泉亦精生便 猴 力生方 巴生苦目不聚歡 生育進 予放法蔽断生喜力故詞力行

走法住法住 业間相常住 於道紫知思古海清祖是法 皆已成佛道 未來出書佛 華武百千度語佛本誓願 我所行佛道 普茲令眾生不同得此道 未來出書佛 雖說百千度語佛本誓願 我所行佛道 普茲令眾生不成佛本誓願 我所行佛道 普茲令眾生不成佛本誓願 我所行佛道 普茲令眾生不成佛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29)



俄 TK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31-31)



俄TK2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2-1)

俄 TK2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2-2)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

(29-3)

偈 雨所及 有 猩 何 相 N 味 各得生長 地 两 随 Th 評少大雲 分受相 所 自 想 即 以 知 以種種經經 一世 故 垂布 相 佛知 胁 性 宜 业如 性 此 随 諸 隨 if. 知 相 宜且切 足樹 究是林有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4)

求獨知或 如我 我 切聚別演 大衆說等天人衆 潤 如 雜世 直無佛尊山緣 坐 間中 見 E 生 立 而各越 利 普甘平等 稻如大 各得生 持然不 持 聚多亦然 無能及者 我根 露净法 法建毁波者根戒默 派限蘇 佛作禪建聚道佛定聚 在了 切 技 王 世充我問潤為 **大**諸 一如业干如體 典世 住於諸 轉不退 平愛 出 及 如 而 無等情作成現無是 諸現衆於 不 雨無 裡搞 具 佛草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6)

無諸介數比時 住名間 數學列正節 世光解 劫丘世無 金有 **普為高**穢 足佛得以 欲 漏大有泉列成 算世作佛 數後神丘名道為 悪 事隆繩下 佛眼 宜雖無以坑瓦 此 土智佛於是 亦佛夫 千道堆 來她而 設應 遇 潜諸瑪利 昔聞寶為不小小

医由丘 同 即 TA 住天間 册 敢 世眼 王王露 正 王夫遍康 心涯 类 後神 數 4 热知釋 蒙佛 势和身 我 法奉 敢疑涛 王将 15 當之 顯詞 貧遊佛 目她 敢 間 百 尚 日 即飢 延 無 史 亦 捨等 記 如便國 小可 食來者 即皆 劫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 - 8)

於其中 後身數 大弟子 法共通八聲聞 及 比 解 住合變 利 在 土夫遍 可思 可 不無 净 正 誦 皆 國 由 生正 撒地尊地佛 寶梅 则 珎 脱 住 於六 少 不 在 嚴 閣地 小小姐無神 知 而 諸曆周無國上

正

劫

雪

法國人四 脱軍佛迦以而 光無後城旃丘說 佛諸 亦 住 偈 身後延 正 地 能像佛世四一 鬼地地 五 正菩 周 為等以好 号十正華供所 供清舍 養淨利佛異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0)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2)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4)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6)

時五 焚天王 天龍 因 百萬億諸姓天王與 名日大 佛而諸恭 散 76 出 北 面 址 那羅 **梵架而談偈** 我 以大慈悲力 古日 望 時难 諸願 間

 天 尊時愍 道大轉 王京 五大 益歸滅 同切王 於如來嘿然 生活諸 佛於明 百甚 此法 福一 於有希伽 以 法相 非 松 世之作 是 因 王 算父眼牆現 相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18)

以禁 畤 共 大飾 威五 筱 自 因 天 是介時 基 見 而 面 业妙官 所止 方 古品 名 宫有 正 百萬 日 西 所 4 未 山市 明 伽師 聞明 億 見明 即轉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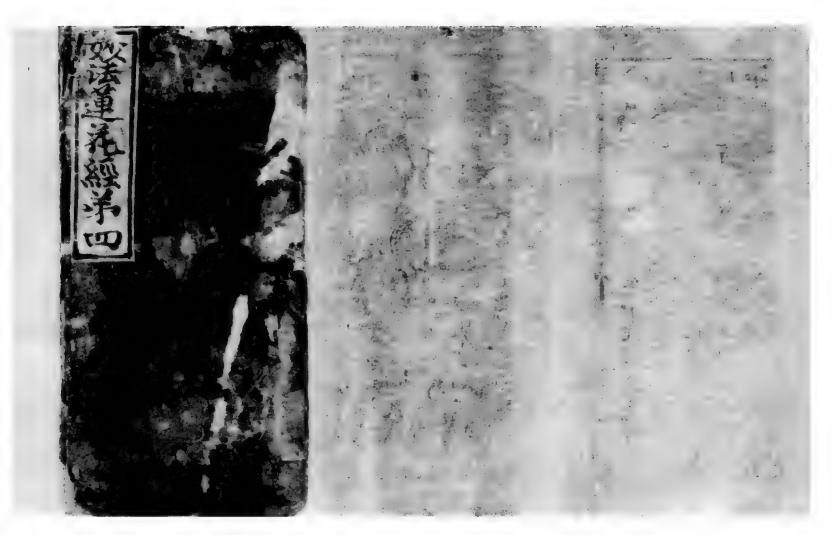
力 過 出 脫 及樂 佛 及 轉 难 時 五 來 諸 有 諸 願 百 所 曾正 乃 作 萬 以垂 切算 是 陽納 即時三轉 **华** 願受我請 億諸姓天 阿 領鄭 度 世 难見 B 未於 皆 見法 宫族 农两 哀愍饒益我等 姓天王即於佛 生受敷 皆願蒙及故佛 共以光餘現 為 三 已成此故-一於 因 业 萌 轉 佛功嚴切出 開儀 所 獄 德飾衆間 眼則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2)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4)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6)

俄 TK3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29-28)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封面)



俄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

第一个於我所說法人中亦為第一於對人中亦為第一人於諸佛所說法人中亦與其種種別之,其一人。 

一文學 

一次 

一次

俄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

和而所 心若又少断度 持不自來諸諸以說 現欲當脱諸 故可比 法可淨亦干根助無 佛供億利佛 佛行疑迟見生作量 衆釓 所道感說相死佛 **熊** 聚土 養 其成常無令常 現宜今種我 就以量住說度令 **居議此種弟自秘** 成切方數乗淨神歡 佛智便佛法法通喜 子供說護兩名養法助自 聞求昔 暢 四。 曾 有庆 日諸無宣淨如無 時 住 B 法如所正佛是领

俄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4)

德有相 题 **悉諸莊諸**/ 無 名法可淨 成女嚴聚解 事 莎夷迦天知然 七其成常無 今得無喜欲四滿數寶後就以量 漢 但斯諸禪皆無其無所得一諸無 羅百佛世心 成陳 略淨惡悅已礙國量合成切方數 默逸业毒為如三阿知真 土道食断智土億 成佛智便佛 雜葉算逝佛比 富更紙以聲皆 得婆那其世号丘三 劫号 阿多提五間日當 心搜 勝劫迎百解音供提今之 日 亦 其比食化為 多實葉阿無明養配富所如 法如所正佛 丘想生僧數通明明來 羅那迩羅上如六於現念餘我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6)

俄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8)

自 恆阿當世 河縣 3 一块口 阿 山持 三 諸御供世 丈正 自 上在 3 法人明 師行 琉 璃三千然佛足山直掌

復無 如 法 倍有恒 自 成 是量 佛 日 汝 将 立山 决 佛復過 因 禄等 知世 阿毒 安無 -进 住量 法 行得 勤 多 化在 足作 於諸 三與諸何 善佛 佛 阿化 两進 佛 逝号 道法 難成阿是藪阿菩因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0)

千知 **承世不** NI 為心未脏 同塵巴佛 下我 求來 排相時 可長佛世長 此 方如 住示睺無 御供國 如師行 於諸羅量 正各 察億 武 法生行佛道 偈 三此法佛 天知成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2)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4)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6)

若柔劇應 證無佛說和衆入知了聞定見 自故此及無如此產 唇所來 千人法為於 歷空分如 法四義億口為別來智之甚 法土罵座說 **此若現加處大面若聞若如漸穿是** 淨刀此慈 坐人已闻 丘我 悲如說諦是 諸比滅 表此思深人 東丘度固瓦說 足後身 座經惟經等涯 石法室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18)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0)

由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詗

(35-22)

去世官 何尊此此經告 四 即門 大羊以結時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此 **胚** 名 中讀於使以說量擲 不此姓人遊此餘他佛此難如光十供 諸世是及得 為為為為為為為為人化界經多久此 置如諦為 **业演千他恒思晃** 法 乾批甲書 化

(35-24)

如此誰若從如錐無問餘 有始斯 佛 畏度來 能 至經是無 國 劫 义 世後世戒人特持持今典益數趣是 足王 求 誦持 햩 更共此施所持此佛諸為為 聚 經 勤無無 為我何人 基於 《催布誓 從施提 心心於 目無不 經無能六千 大 始退 過 **基神萬此神法此** 直腦惜轉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26)

方於肉 不心 白為 言 此此已 喜行 使法 解 丘法身 不仙為 致以爲 時便當 王 成欲聚散仙汝妙效四 白 今故動情供時 业册 從 故為求存給 間有有 此故座頂說我 数 於聞 為大於 精身採王有 目 所阿 毌 鼓命 仙汝國大法所仙希私 聞 级 宜無 國 大 勤心 人說王法故頂 說給無液仙乗 言有 仙者 重腦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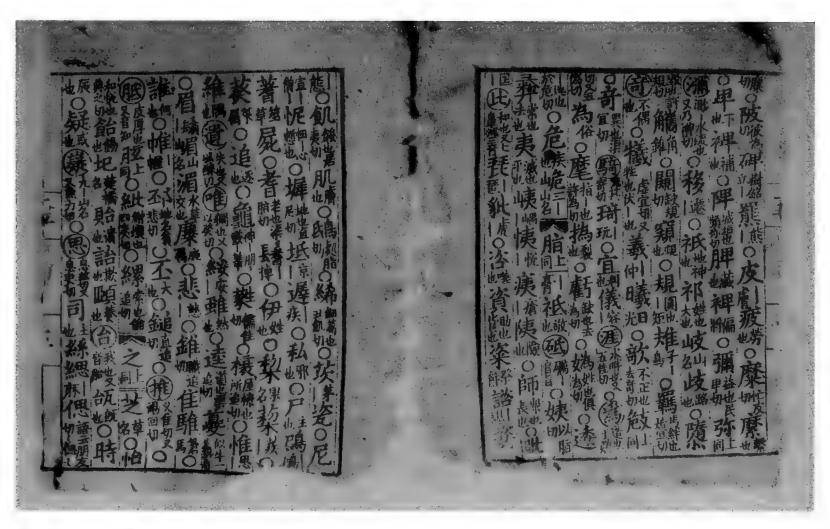
(35-28)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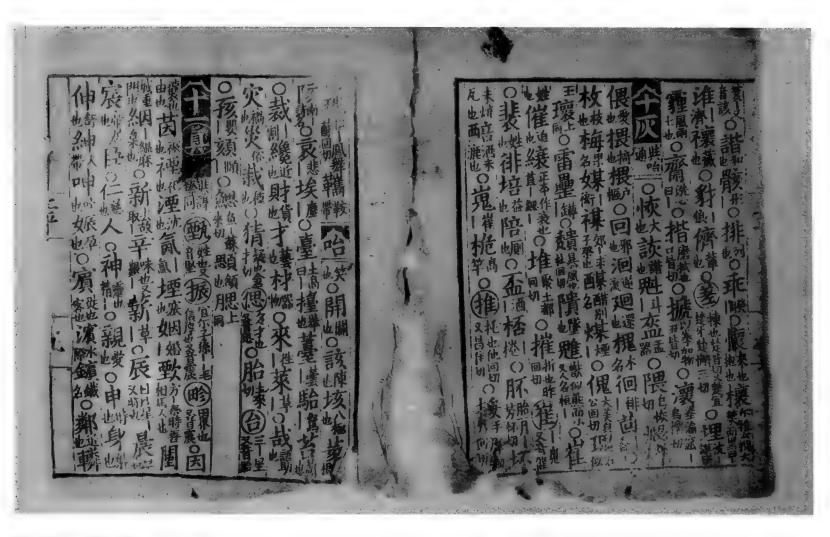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2)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4)

俄 TK4 妙法蓮華經卷第四 (35-35)



俄 TK5 平水韻 (2-1)



俄 TK5 平水韻 (2-2)

न्या 着三五不之者 学之何是以 之事、作到一个通知。 何是以轨 **温明道者非言縣之所** 能子之不, 和所擇觀之則以為則 道之行者固非也以為是與死以與此是以夫子雖當言之而盡之以為孟懷之言也與則自見 人間而常孫全塵者之外 其无謂乃所以有謂他方其有謂乃所以无謂 害故不敢利不違害无不足也故不善求无然 全得 巴西後 建炭不從事於 用其言以未之則未免於為蒙也改其萬 言則藏其处理以為孟便之言而望去者之 首言故學者所聞特其文章而已性與天道非 心者之ि百九天子前廢公而用形其以聖智 而集之則以如而入道者之語言也長橋不知過長傷所國之所傳也謂而集之為我其

節者具且書獨之也錯點聽

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無犯亦无疑化難之相待無不然是其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無犯亦无疑他雖之相待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无辯然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那何調和之以天佩日是不是之為同中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中我與若去是惡能正之使同中我與若者正之與同事我矣惡然能正之使同中我與若者正之與同事我是就就是之數國者為一點即與其為其為其其其其其其之則則人國受其難聞吾誰便正之被同乎我也其或其也其或非也那其過去是與其成非也那其

是則物物不相待而莫爾怪不能通而為一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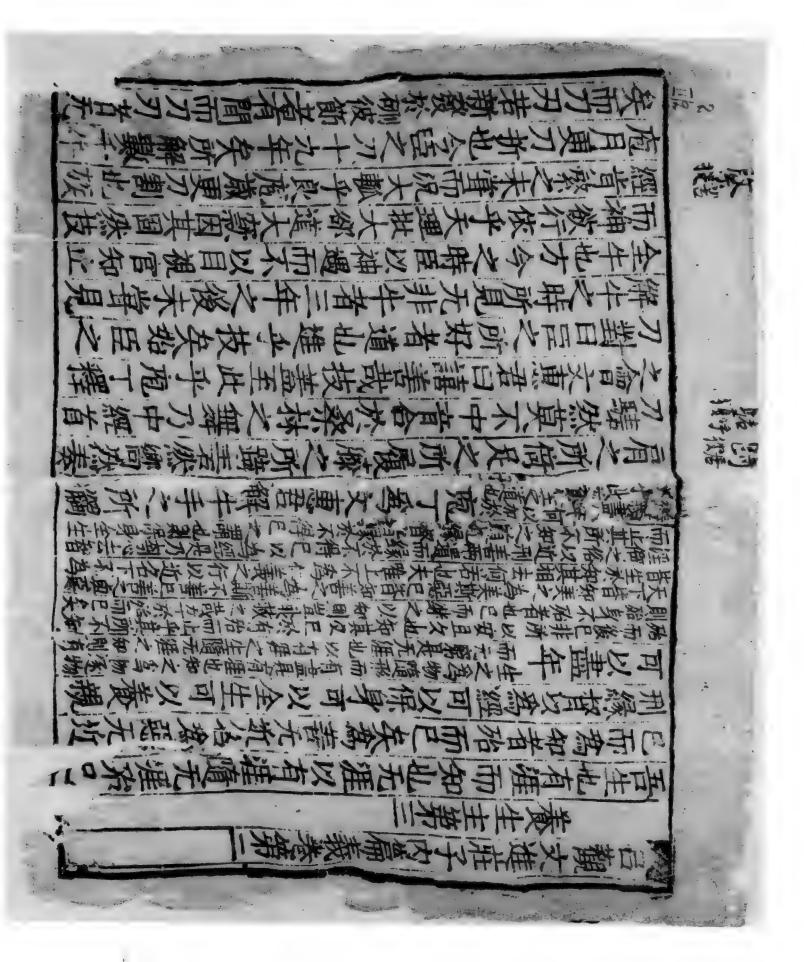
以不審者以其有我年言此者以明的物



## いまう内容備主教養金の一

沿其視則其有不齊者中為其個物物不用如而各此其所以方殊而不衛也進其東我而反是則之由能有我分響是非則大小美院被聽傷堡之不相知不知知則各明直視矣凡物之所以為且徇不自知則物之化而異形而能相知平有處別謂之養處處也至人之視出人其身類盡私也方言為問過廣遠幾不見百殊也實書學

练則少有外矣此之謂物化



(為能) 頭天下之志改值與如於前人前人門衙等者是四部者也 也解然已解如主奏的提刀而 之所異不可不見者也 道而城万物之間逍遥而不 如其刀刃之无厚少以无侵入有間改其於 如其節之有聞少生之為生也其 學也凡物之有形所具者不能无関也 而四月若新語於例則視天下之事无適而不通不以傷其生,而更刀也更乃則傷其生之雖后如臣之刀十百九年所解數十世層成更刀割也疾而月更刀折心則所見无非牛者故不免割以 兵良道之 見人而已 が一百丈 不中言自会於桑林 即免无非道之雖自此者然 觸信之所信息

該生者必知止其所不知而不以有經門不罪則以与以形也是此則知生之所以為生者不實有死也必受與之 火之在此新僧被新出其傷皆具有盡也哉人雖言則生力 人矣若然若古者謂之帝之與解刑者天之所影解 則國去而已矣知其適來而致之河其適 此其然是出之東京龍羽 口信您其公司、郑、利 國界而已矣其去 下,之刑天公具,居地不,通而非君而避之,則不免刑而之矣於陰陽之皆情去,即以文也皆造明如人死矣,斯皆之皆皆狀,者占者謂之過 以所受以天其性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裏樂是通天何以以以不其姓命之情未始有物而為之裏樂是通外以會而之祖成不得不如此是所以會之人也是祖安時與順京縣不能入也不能安時處順必有 者买之如哭其母此所 如哭其子の 河有老者架之 兵战老無皆皆律解之道也而今其也盖以弟子所以録其非友而吊焉若此為不 (主出出三號則 哭死為不處天所入主出出 而大有禮哭死而用生也 一郎同天婚而傷矣性命之雖言也不 町見而隨之與其為人也

人開出等四

生当和甘太王也就在以姜克很多是人以绝

與則死生言為不能入而未當有死也此差差之主也而出之久內而物道理於外而天全年矣內无知外无物則獨而无過何而无

वा 惡之也夫使周好名矣而已難之似名波回好僧矣而以此而遭以仁義無聖之言開道於是人之前者則是有不至於己疑則彼氣和而心說而後可與有言此今回 廣之不至於副係於用爾門門之不至於副係於關不爭見信正及以達人氣而使之不至於副係於關不爭則之之為而非所以無也若爭之路也幾各動之微 古之先見則行之也也故以明是名也首相則也智出本章則該亦以智與我哲不能天安而軍則智之所為出也德護命子名則成之所事名益而成名則德之所為出也德護命子名則成

居已以從人者則 你不容常人之前九所事勉矣夫以 上之記碑前 所不能勝地為 若固好名而本實者之於見稱一者 人能化其惡而以至也則 二君三國者早皆久名僧皇白也 也故其君因其慘而猶之亦好名而也矣死攻盡張下而拂其上則疑於骨首矣盖未信而為此則其也慘其身則有民之為主矣以下而個掛人之民例外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絕附人之民以

不正與民意於言而非我之有則是改入以法者也兩為至近如孫大知民患在於不能无心而後為三者之變此,所以為於之。也夫以霍耳以較无所往而不得以所守者為而所應者博改也公見非得一而无心者也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故可以由了以姓可用上土則非直外合而己雖然,有内有外有言有今以此健物則此上者應與,在其天至故執而不 化出内直到非内不害者也外也內直與 天亮候外出與人為後成所出出與百萬後周以謂以出內直與 天亮

人書之與不善之而處者放其聞或者就者人謂之重子畫子之與己國不及不有所謂及真故也自道雖之則如大子強師以者此天則可以及此就其因不不罪雖然止是可是大胡可以及化徒若是則可守伸足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亡者為我其言雖教調之實也白之有此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調之實也白之有此為我此言雖教調之實也人亦无疵為是之調與人為徒成而上此為我人言與人為徒从由者與人為我人為我外由者與人為我也學既由東之謂與天為徒外由者與人為我也學既由

失給亦易无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傷為天使難己不得己者乃其所以動也則之間之出職難為以此以之以

其公者直有触載家然不動舊之頭而已矣京所觸更也樂之之大飛山東以事親刑不權數之東酸轟者則不撰事之難之所逃於天地之間則所以與大衛而非君夫強不同解於心民適而非為之國人國人與之國有者也成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盖也養人 自己有一十者國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為人臣子者國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為人臣子有國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如子前如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總之至地提事而安之忠之成如自事其以者实 樂不為現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對者有不

知其所以獨其然若五天不之何不能商而生之也故之為有方則危百身其知獨正人為五人之遇而不以與之為五人為此其國與日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五方則危五國與其難而與關其之而事之情律之大何作為以報改雖致命盡獨以也以養中也則令之使於齊也其若為致命而已致命而已致命則不以犯其也而然舊則深於不得也非不無之那是為不過不過以此是其也而欲舊則深於不得也非不無之則之為而已致命則不以死其以之出有物殊之非物殊之則以不是是為而以此是是不可以不得到充傷,因此是於不過之數之則是獨立所以為國後后為數也上則居實而以不慎也甚自畢其之而以為國後而為關也之則是獨國也上則居實而以不慎也為同數之則以為國人之以與國人之則以為國人之以與國人之以與國人之以與國人之以與國人之以與國

也无所可用故能告是之壽鄉數此訴以及鄉班對政人為相關以為推測盖與不材之本數不也以為相關則述以為相關則連廣以為認即其我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那日已矣勿言之矣不曰自吾教於人以隨美人以隨天子未當見村如此其如小正仍不顧遂行不觀黃千華見柱如此其不數十個不過遂行不數第一十個而後有被其可以為丹其不數報者

がいる。 法矣言此者外國者吾若義以求之 以主我與是首先則各百匹養以來之此者非與之司得以之則皆非與之司皆以東之 苦谁淡之所併也衆之所保以有保為保而彼之保頭架栗非可和夫成之所以不聞替在放不材則雖不為社豈有前子則為社是不關也是以真寄之无用而已不然依安知其无用而題取之用者置向之不知已替以已持為美而不知其不利之所以為大 其以為社者固非夫无用者固不知 趙取无用則為 200 € 15 而物與物案何我其相物也 為神,也使其可 大用者也大用則其引 提答片而觀之如南京以為不体而格之則變死乃今得之為子 終其天年而中猶失自将擊於世俗則以文威其質之意也 ったた質者也則相衆猶抽果動之品

をはない

角を

大政

## 於仰尼曰王點元者也從之遊者與天子中八間自有元者王點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委問

者其有最多中の本共見而し

其也撰在於應記之時遭乱而免之則效給无難失凡苦以者內所以為无用之用也遊华人間者則不免有世有世別自治學面也以與京人之人之人之是是不有用之用也坐屬卻由皆如於如本自發也原見父自愈也其可食效代之樂可用故則之皆吾行於即不傷為是死性田乃所以全也則異夫之才已今日之以獨矣否則有已而已矣非以即與下人者也則異去之事是如而被到不知即如住赐而載之則桑與重於此也而人者文知選也已少已今歲人以獨如非過也則獨為大於是而其為物也而人為文知選也已少已今歲人以復如非過也則獨為大於是而其為物也而人為文知選也已少已今歲人以復知其為與與

**唐禮鬼剛生乃所以顧愛也大下之至表至書且卖如道也則因為國物也大下先衛妻之妻生則以全其生而已矣方今之數者如此之國者國外國人國等國力國籍之國之人民也有所以以與衛馬行司司者往世不同選出可食故伏之嫁可用故劉之人皆知有用之用社司会故快之嫁可用故劉之人皆知有用之用有五行初由无復吾足山太自寇也高見火自則也行去於公知載獨直于地主文之知違己子已中歸打大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子與上不同待往世不可追也大下有道聖人成馬大** 

下而飲之雖言酒之在天下難則谷之與丘侮无不屬之者也為不不不不不知之以為國門不以為不如神尼方因以文行也治為皇者的被後獨問國人也難而軍動而主內而聖外而王王德而點則藉而內之之無也常委則為獨立日後者也是以知己失復命日常季則人之難也常查則為其不數坐而之數在形而以成者也則如民三點相為表表而他實不能不能不管也被其不能行為如此不數坐不滿齒而性實所然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者則立不數坐不滿齒而性實所然行而不知從其所不能行者也則雖全會與之與不能與有所是獨有數學可以以不能行者則且有數學之就不能與有所能與其所不能行者也則且是為不能行者也數則王德而點者也點則王德而點者也點則王德而點者也點則王德而點者也點則王與而與在一個人也一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窓口之教則苦其所以去見公 申徒嘉欽外其限以悉人之數則從其師者也人也伯民員无人則道之曜名也由徒壽子産俱公 伯剛長者也民里則否不知誰之所自出也去日初能之子象帝之先則長於上古物无以長 知而心未違死者也與物雖寡之彼且何肯以為上中 申徒則象人之樂也納視其所一不見其所喪則一知无所 申徒則別何然去然六勝非有也屬之而已耳目无知也象之而已象則可術矣若然六勝非有也屬之而已耳目无知也象之而已象 其生者視之則可官矣乃物雜果皆備乎我者也自其同者規之 事則九其深厚堅緩兩難入者也天沙雖大直定而不出所位自万以入也一而為九替也或謂之九軍或謂之入陣其違八也九 而為九團以六包一万為七九軍副 方之制陣者が以入包一年以別物之所以最之也 少也保佑者始以 四自名欲保之而弗德 名而同要自也所以一身之事強入於土之以勇自名而欲見其保恐之難的 主意王影則亦思

前既犯患出是失雖今亦何及矣无此具魔角目有元者叔山无趾随勇和死仰尼白子不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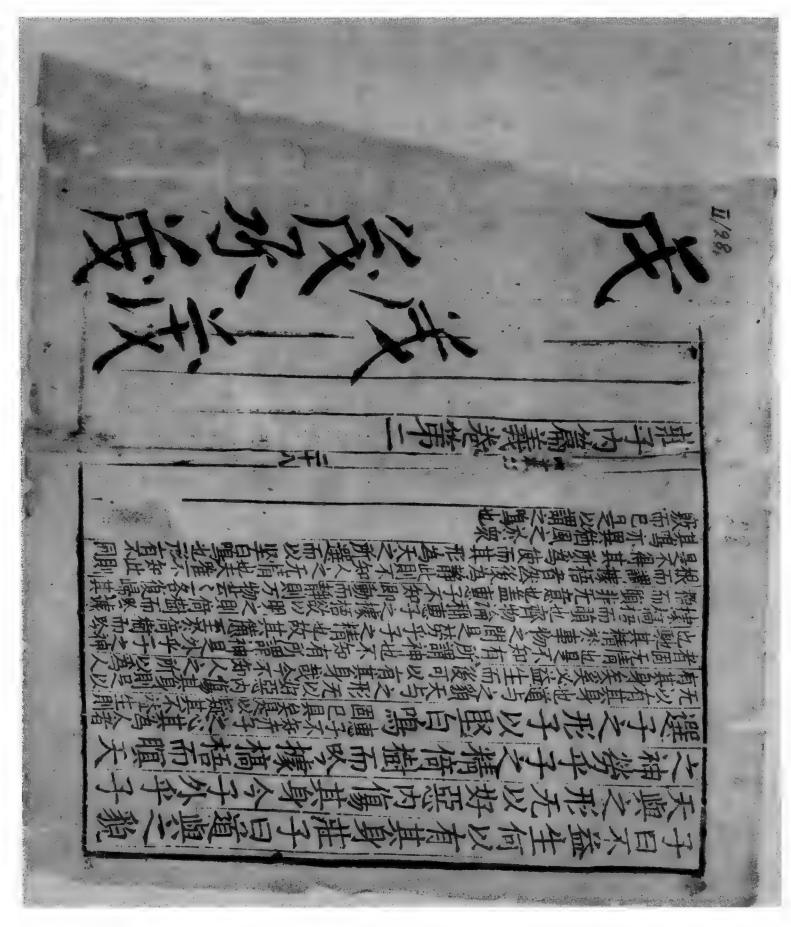
性別相其遊水門 歐大内者他伯至无人則久離香心病已而陰陽二數而造其原則以能而其我也子達望主無俱發伯賣他人為以為不知其所以然而改者 也十九者陰獨之後義於也可有為如果如此之為我以益郡道之必數則於如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言 山西蘭先生之 於則壓變則以與之於疾而可以是是是東東失禁線以言從與之數不可奈何而安之者命亦是是有東失禁線以言發與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亦是是有那大致中中更為也則不是是有此以不是是有心,不管自此其過以不當三者也狀調之納之的一方。

而反不如先生之法我以善知書與我送於形成者與不不鄉土之所我人人以其外五數大之然就是就然而過失生之所則發然如此此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是或其言不全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罪之動中中央者中立過以不治固行者高分和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其過以不治固行者高分和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其過以不過其所能養養與其人其過以不當之者跟不此其國以不能是無不數與其過以不當之者不敢

文以用仗意仍以无趾舌若則明外以立治不同也夫王朝之几只是明明外以立治不同也夫王朝之几只是明其立傷而非不知仰尼而其言之或異者以內外之去則真亦同曰而人刑之失以可解也則可解此若未過天悟情无其對之五者謂

也而演業之外地形。衛不足以合人也不 門不知其所

可以實 省也改日。祖京大 不愿者也因者大學問也大強用也道太急也不会可以不完者也不能是明不然者也不能是然用商反之則不學歷明不可 東府无際剛不敢各地无後惡用得及之則不然過阿望矣 一者軍人不得嗣用皆以得則等致之 以為器者也所 學出得是而猶





母於自然而然生焉則是以人勒天他一古外犯其死之所然不能受而甚之恭而復之去而復之士而為其史即謂謂於有剛是以心怕道首也受生而而其生力所顯也知有生而說之死而不然之出生則漸入 公司と見入州利之飛水空市 助天县一 古こうり見れ 知於主不知語死世 納觸則發來俱之无房體之元夏食之者其致之言,何治生也,未見之以望不 なまえておれい。

ははまるできる。

はまれる。

はまれ 其元矣 際之大係者也深之又深則至於无思也勢八之友所自起為國軍以及軍事下者名之也夫 帶氣平而息深則傷事媒之而以過 矣 随至自氣之无而自之所自 她也身以且為領囚外家完是必員死之无常見的則其食其不其矣其與與其 者也故不為問屬隆自好之所役而與意思人心之妻五末婚有物者也是人不得野 謂真知者不 用真智子馬學人名英丁 主線且與大知圖非前也而,買人文內為也屬所我所為也得難陳入我,因也何難陳入我,因也何難以入我,則如何自得,之有大雅万我則物報死我則雖將也理之不得不過也何

然生惡死者情也未做有死生者道出聚竟而非然亦得 而義之國法不若病 恶於道術之紅湖而不知首死生東歐北華相惡於紅翎則性命之泉溫而數乎人街之陸相向相遇以剛無之元及視 明妄 泉溫鱼相与顏於照相的以螺村選以漢死之而仍其至其字則其具者而是百百百百世也看為如其員者而還更者而寒之則生之元及 前明矣人锋以有君為与中口而自 次へへかと甲世日士三十大名 無之於·草苔言矣傷亦而作俱 照見富之而為生之所自進之而為生之所自生主則於其閉故 被特以天為父天則吾所自而以且之則之故於命 与天則人之育 可不得与此物

(與則依万物者皆存而未其土也物不如有極也其為官因可聞計報故臣日特紀人之思而獨善之前俱善大前得其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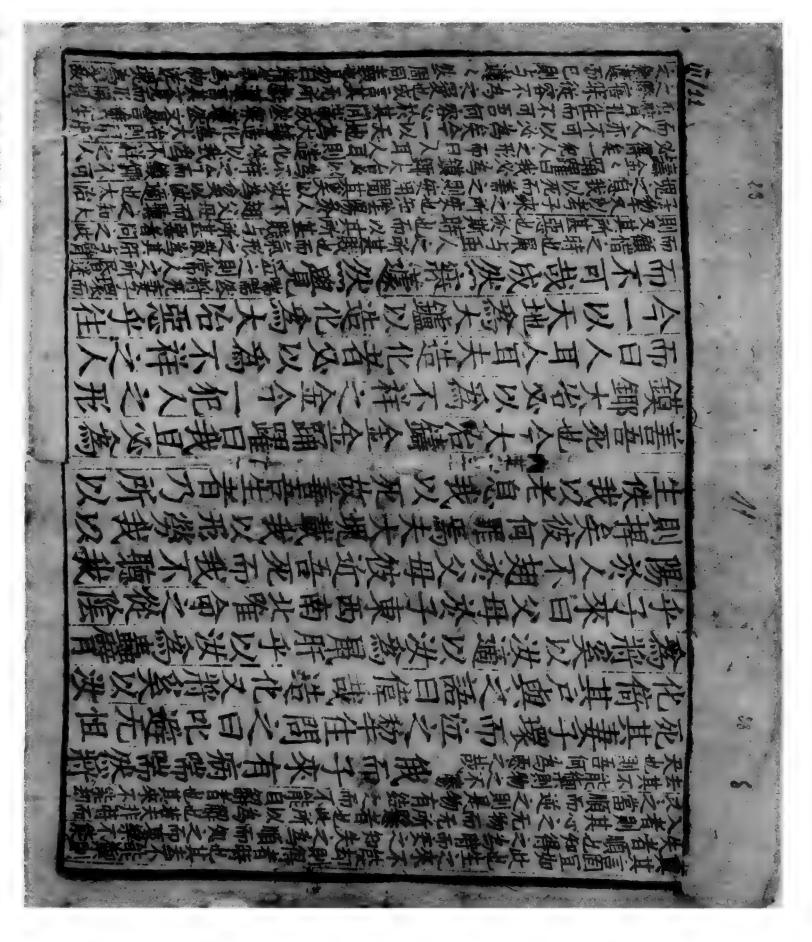
では名ま

以其所以為太不見此二者亦 隨用墨而未始有差馴終者不 信之所剛供不思得這而 之廣至台以至彭祖之自有廣不因及 故其教之能交明母進城上在東原順備馬東之首天川。官五百之 獨與出數人与維十日內 下卡有不得通而 是道的母以為聖有此非特強皇及以是古之聖人成隱成騙班雖不同未 為高際人看也此所谓首 大極力,先六極之下先天地生長於之也一人也又者老者以其時而名之也而 生者也我則不生雖今日猶為又極也凡高者置帶傳統以神春也我則不神經鬼帝傷无虚矣了為之存有天地而俊有也而此則去有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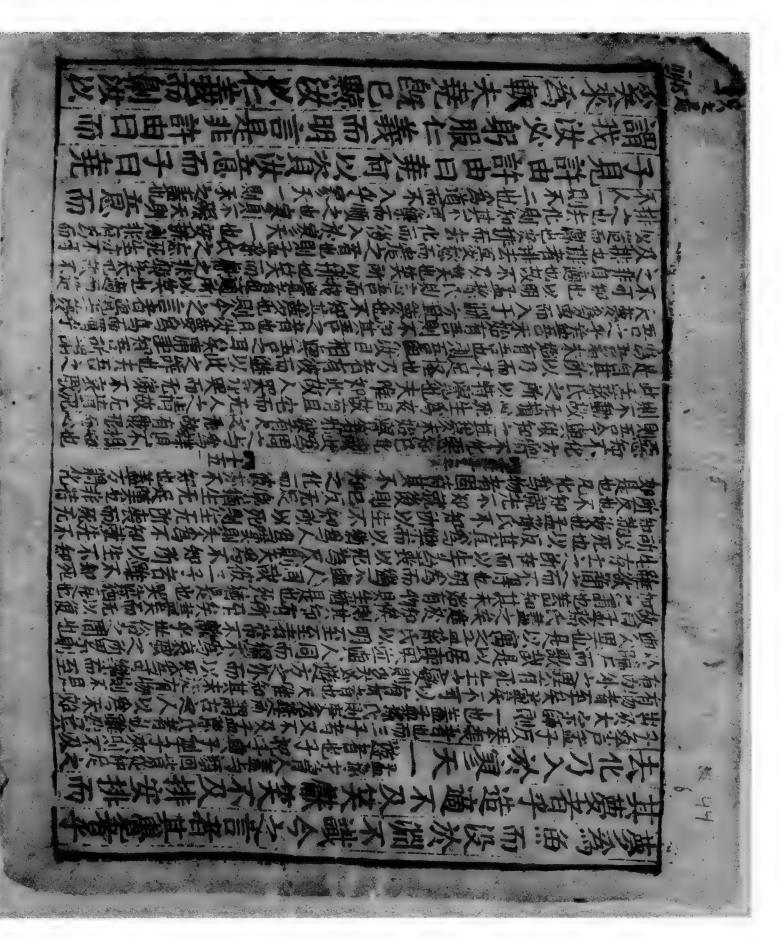
京城公司區面問期不能无所依如即及以前知而力及以任重是以納問道也女則不應而不有与者他屬之言顯則獨所者也關於問題之則之人不知之也有人不知之也不不如之也不不到也不不成也其,名或獨而後此五方不至我生生者不生其為物 无不定生生者不生其為物 无不定之一百令人而後能到衛期間與則以外生人而後能到衛期衛期衛期衛期衛和後能不完在今元古今而後能入於 不 死生女子而後能到衛期衛和後能到衛期衛和後能外生人而後能到衛期衛和後能外生人而後能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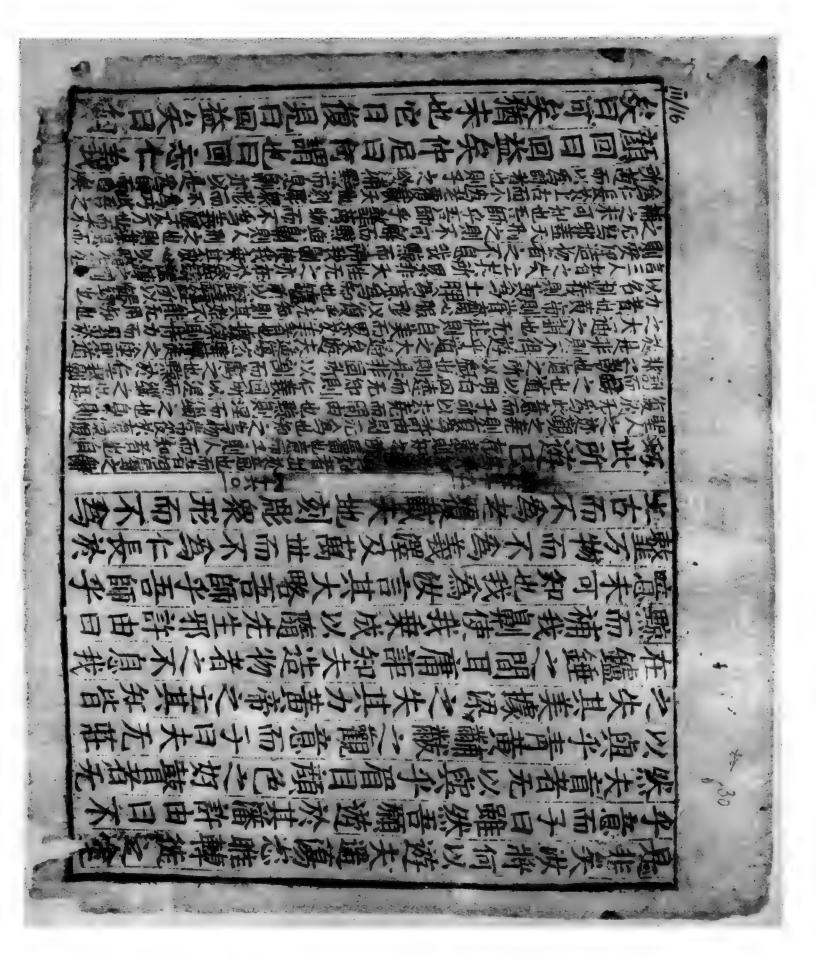
比公問道看事而行之 道之行同所謂見即而求 墨九傳而送得之缺怨何也 了女偶六夏而後 の之親相翼站者の万山 寶至中元 鄭不可得則疑其為始而其人知其為始乃其為國司元者則非入於 夏天一者 也全夏而已矣以曰予然元和 至具則无見无知之謂也改曰 改羅聞之玄真 然此病 後足以為道之幹也則否 真免員強組是出於至於縣之者也與其為為素及以為道之軟也无見也不到國聖以至於體明則 李而見之者也自事許以至於於 (京龜於語者·差異之不見而就胃之內所 一至也效日常設圖之票校許索物而位之則例 則可以震物而從之矣故日旦明許聞之寒 当义和政教中都是 東之言歸出題而 行之之謂也許 未而至炎過故日副里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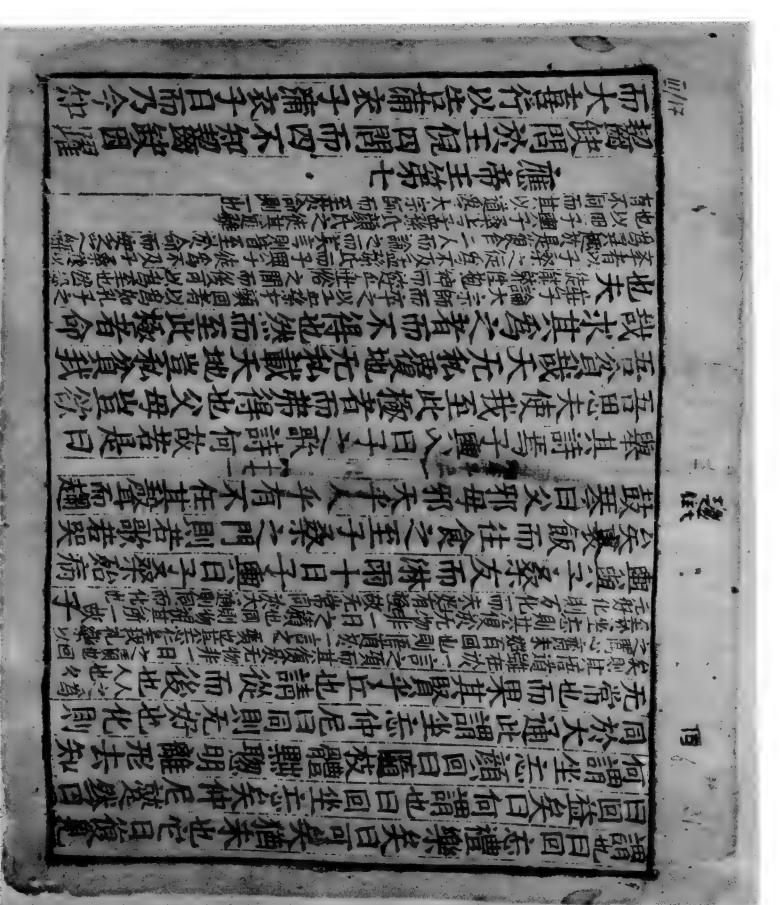
Ar Mg 拘章而可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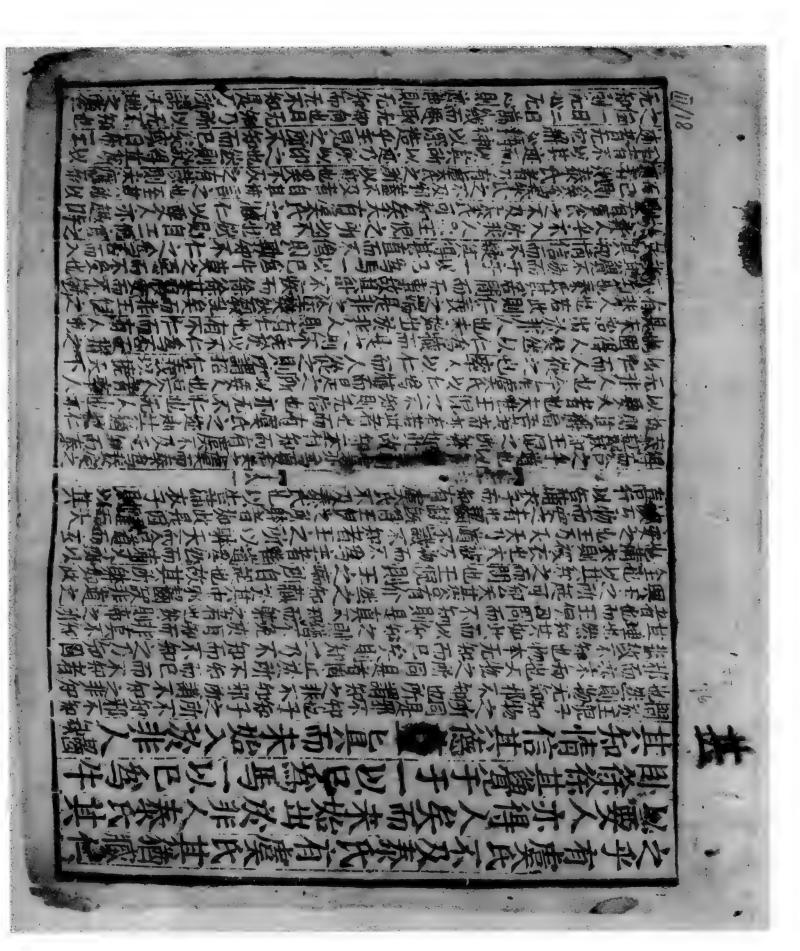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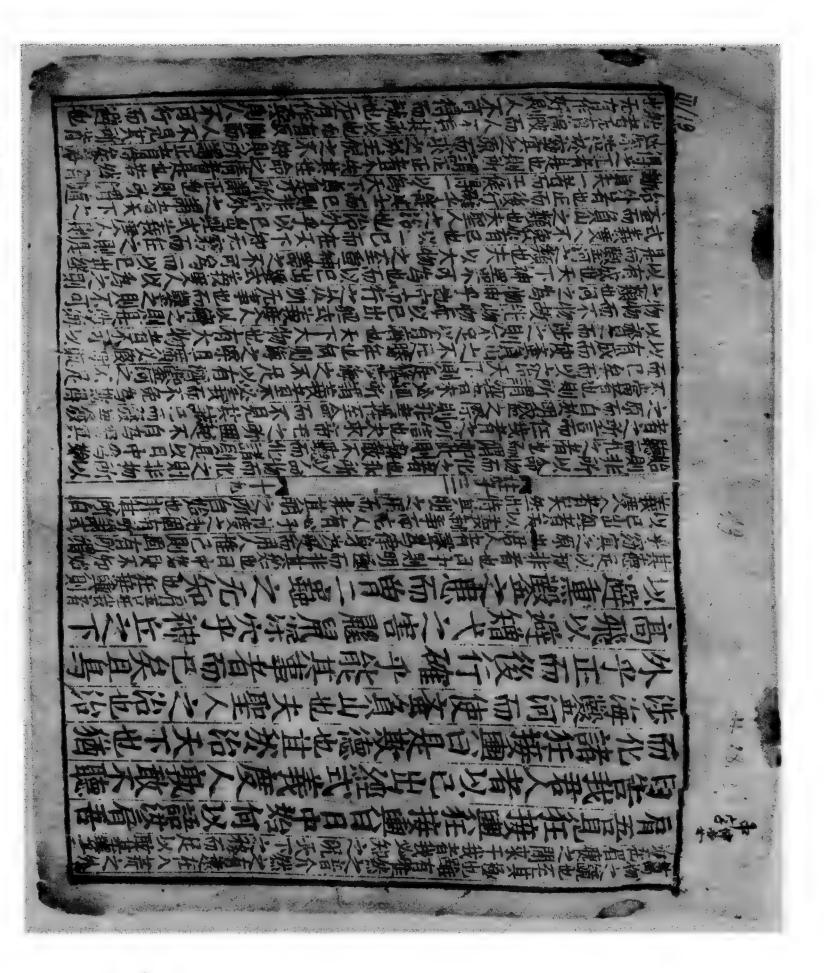
記知五分所謂否之中且做甚及為具 元事何生心、而识相去於道 相志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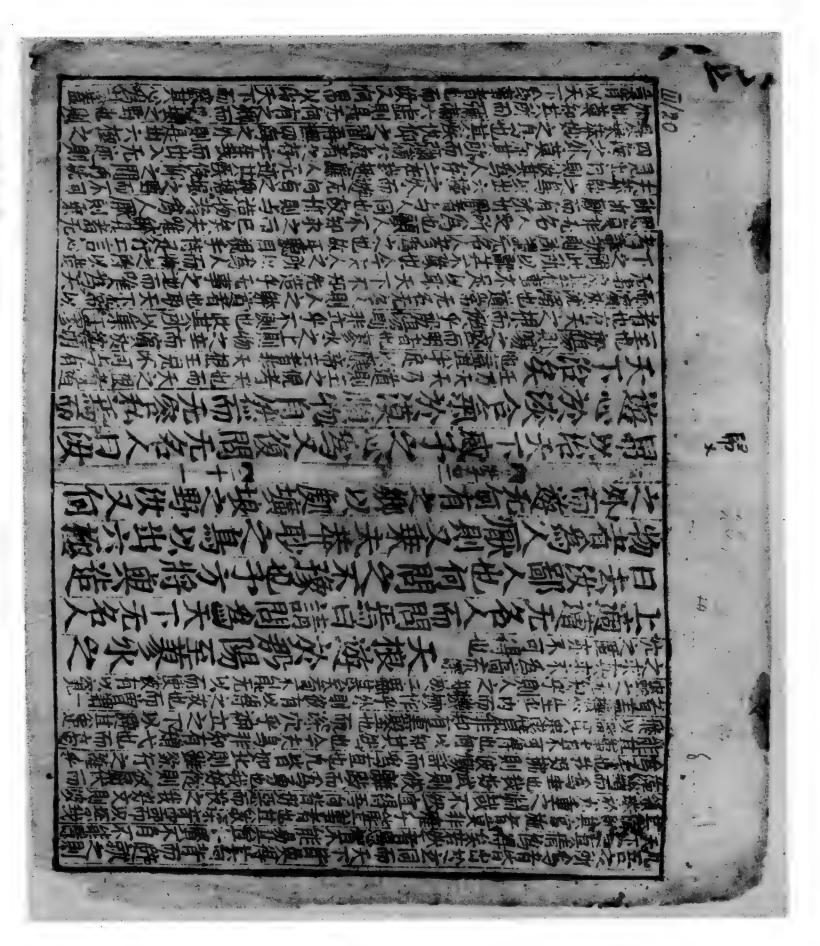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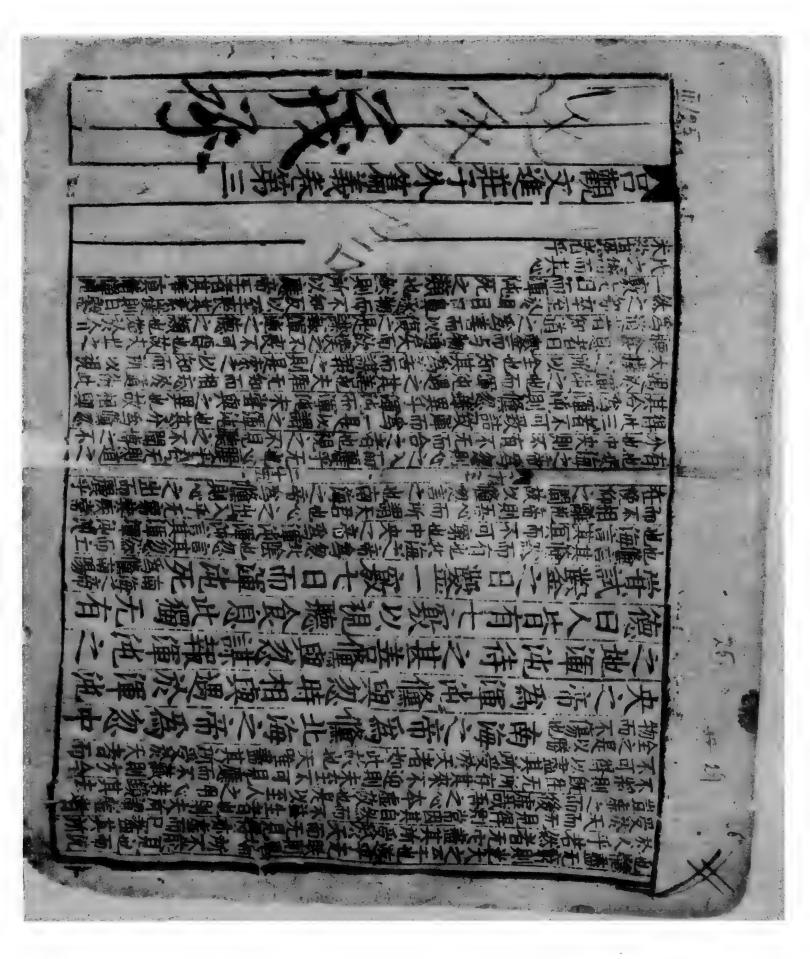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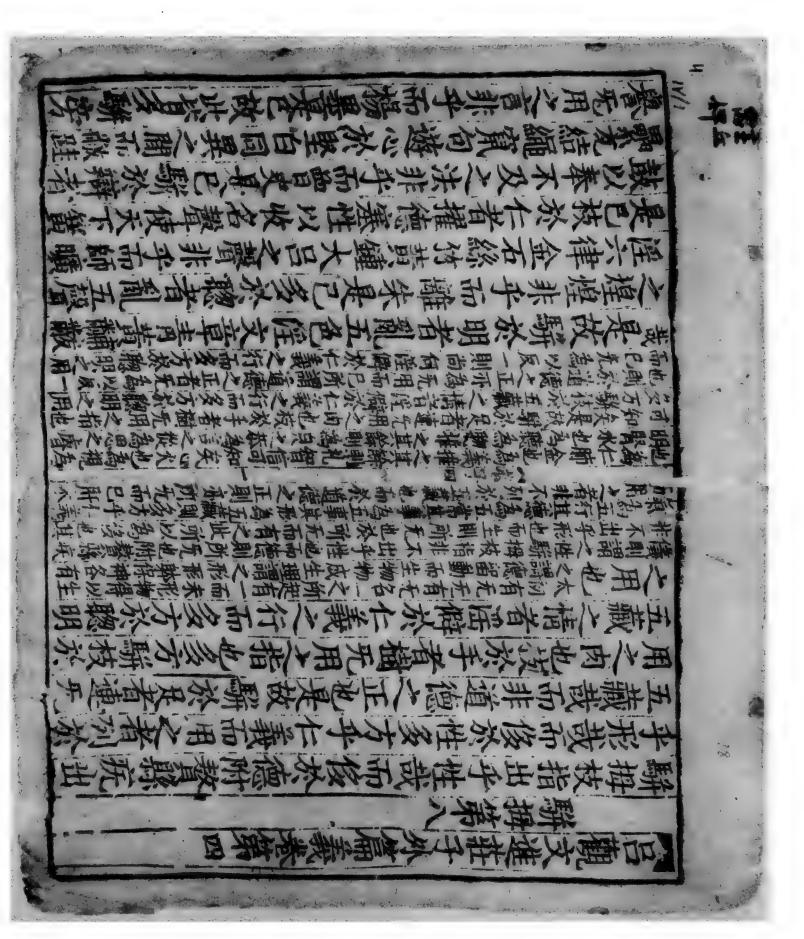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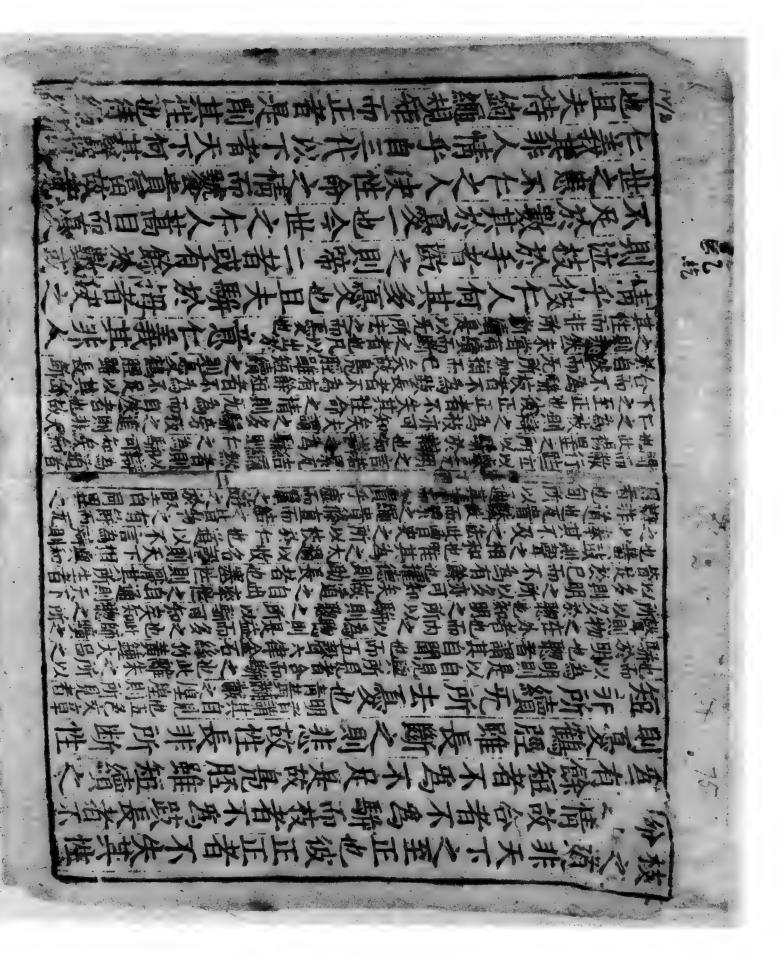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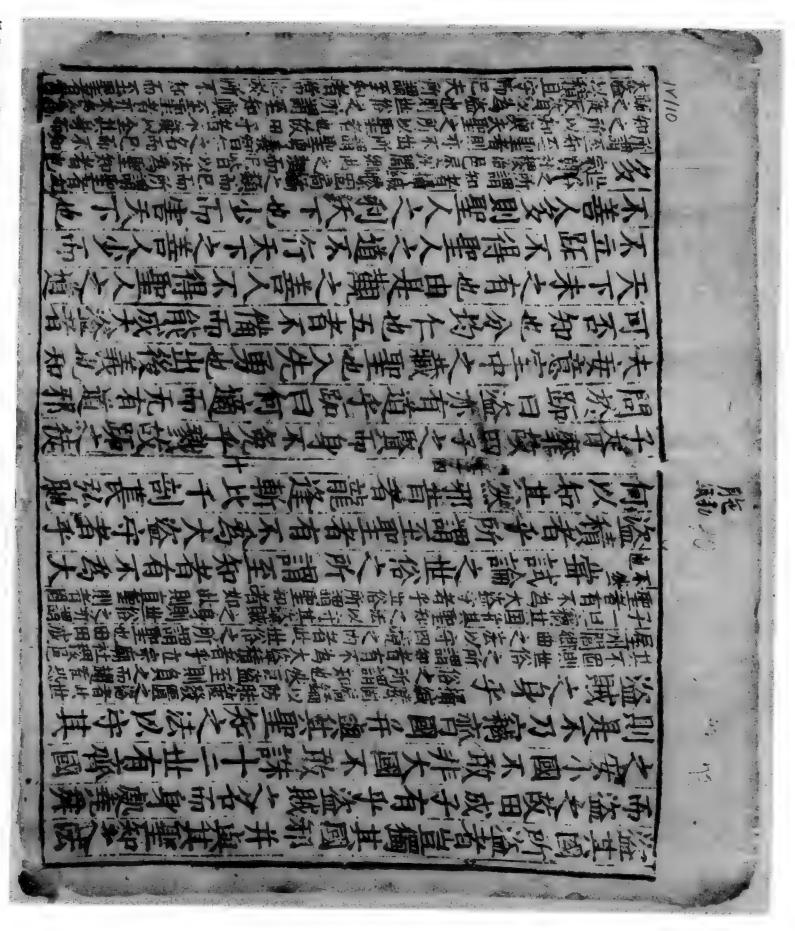


## 馬錦布九

钱汇者则失其常就,首机為天下而华者中矩底人曰我,喜俗太曲者中鉛直,方首不以作出其性之自改而已今間始外之雙后天下有常然曲首不以知期,乘灾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天剛爛 之鬼之鄭之於之。骨之前有懒舒。有十二三矣剛徹及謹及為上與其者仍馬敬之劉之劉之強之強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故而及耕而食足以自樂而正公以未動足而陰此等之自臣此雖有馬民司以蒙我君妻美可以傳聞 火下 光報之雖言也創之傷之馳之數之數之數之數無馬事緣之以早被馬之死首十二 三美別美外高明之雖高如伯樂·曰我,著問馬強皇路履死所用之則民,有貧貴緣而衣



所所以立宗團社稷治臣星州間鄉由名息之所布表縣之所則法稷治臣星州間鄉由名息之所有表縣之所則了二千餘里聞四境之不前間聖者有不為大途守者中何以知其然故事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精者也與即向之所謂如者不為大盜精者也則有匱揭齒機盡表而竭唯死減縣局獨之不為其與其他後之所謂如也然而巨盜至即為服官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縣為熊篋探重奏復匱之直而為守衛則以



則谷處而齒不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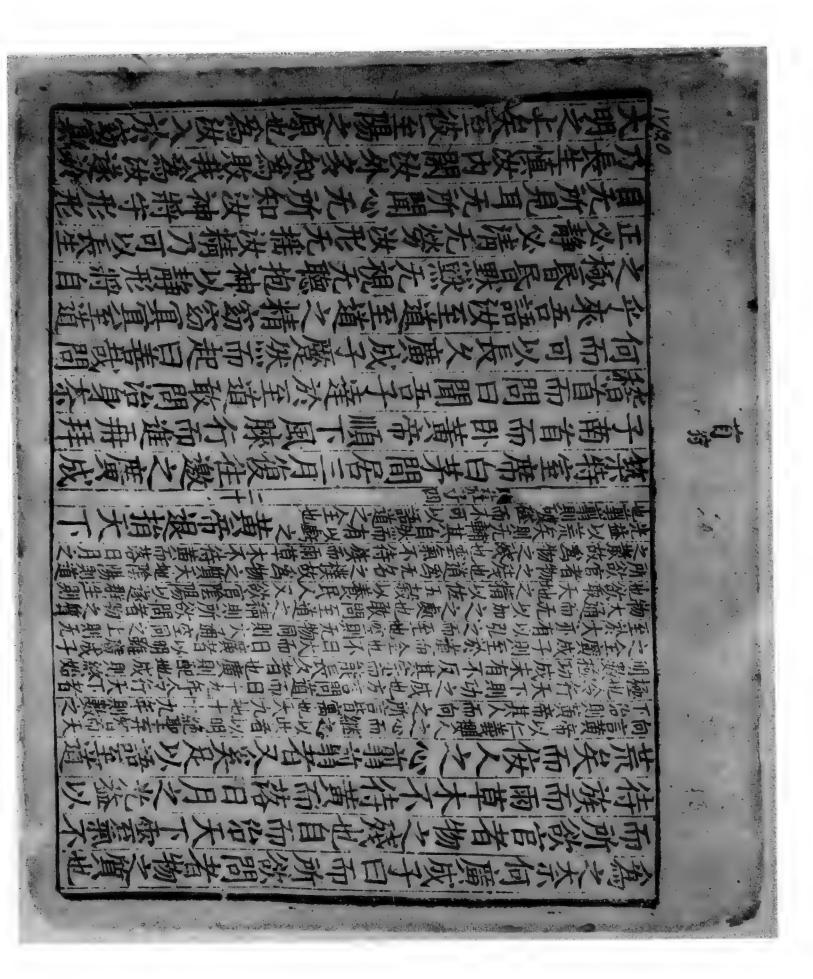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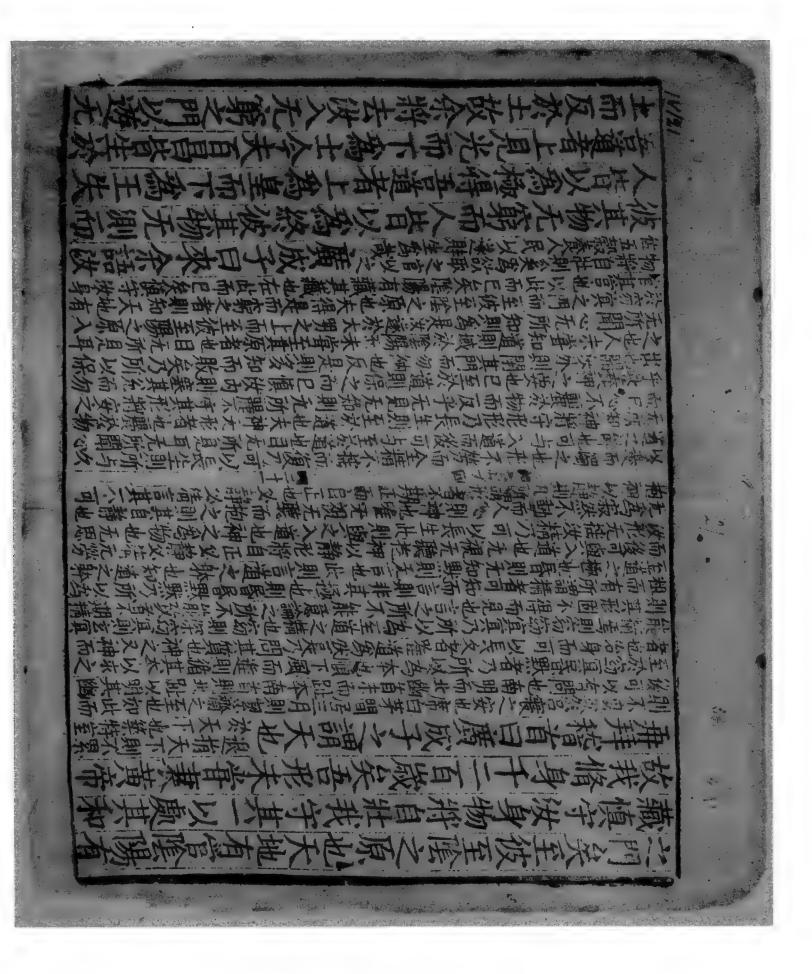
来 所有監察川盖或是不不相然 人用以後 學天母宗 具至老 死死 打 所謂至經之世也而以以容成氏至神輿民民之言有明明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王帝書所謂高下不理為不知往來而王帝書所謂高下不明祖太真相關民主然也故其是鄰國相獨一也是人之治常便民元為无致无數元即也故結ঃ而出

立然泛信仰 僅其性表有不 憑 並德 者也不 居不偷見乃選其院而 計創也人生而 蘇則性未治有樂苦也而使之樂苦則是陸 於馬人樂其性是不怪也等則使天下原原馬人告以有治天下者也則不免逆其性遷其繼而已矣以表之子其關則所謂義策之是非不可得也誠有所謂悉究死我則治天下者其、誰故夫死寫而已矣而不容有此 者恐天下之還其德也性則不逞遭則不遵无為而已矣无為以為者他為之則應矣放之而不殺所以守其優也故日寄之也固之有物深之為刑皆故之而不欲之者也得則其自及而下之是其性也何謂有之使不慶有之為言也成之而不殺之 看也益生則淫人有之而不之所以防其淫也故曰亦,也有犯以不是在之為言也在之而不工之謂也住則其自致而不盈生 門以在宥天下山何謂在住是也其德則我態是也 獲而天下自治矣然此治大戶為有常性性有常總在之使不定者 以去和含言为望人大盗首和

以男女指在於經至意 買者伏觑乎大山堪嚴之 繩墨殺馬雄壓強張馬天下背青大副 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平 評信相談而天下美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 畢起於是乎喜然問疑愚知相欺善言相非 而天下大數矣下有桀敗上有曾史而儒墨 流共工於幽都此不購天下也夫施及三王 不勝也弄於魔放離東於出宗山投三苗太三 五藏以為仁義於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 於是争脫无股脛无毛以素食天下之形愁其 以出之而已兵然則如何无為則无機不規則則其籍祖則操行舍土者也不可係則并所即其對此數而天則價歸而不可係者此間而 崔 少 其 宴 與 然 而 陰 聞 之 冤 无 与 為 大 也 若 吐 則 剛 谓 而 万 物 真 之 龍 歸 也 無 則 以 利 其 鎮 康 項 以 至弱不放不生而回殺之則至弱而无有者也說火其果将、才若此即非所且搜者也回則不成我 犯其鄉看也上下回發則即的无人心地致治而家之則是壞之也

以佐五穀以素是民人吾又欲官陰陽 至道敢問至道之精音欲取 新也久之有僧夫則以完養養而飲之也以明今後沒官為此是其無人人也其為其此是其而彼之也非得之接得在此つ之職至 華不可及之間 是懷過天之 們增因而不得解而重到禁惡情而已今於我 之而不反其性命之情而重之以有知之聖知仁 為死罪而不犯耻之甚者也失世之所以至是者以失其怪命之故不然也而傷里乃始雜改模替於罪人之間而改異之論為果 问题、唱孽則又非替三代之初而已矣國天信馬此則三代之未而莊于之時也殊死相、祠所傷祠 当日实之不為禁節價矢也故日經重華智而 天四氣以親法僕則所謂以身何天下一有如四去之也既无故肥太乞以盖矣不下之形然人以前有必則有迎之宋不能不以身向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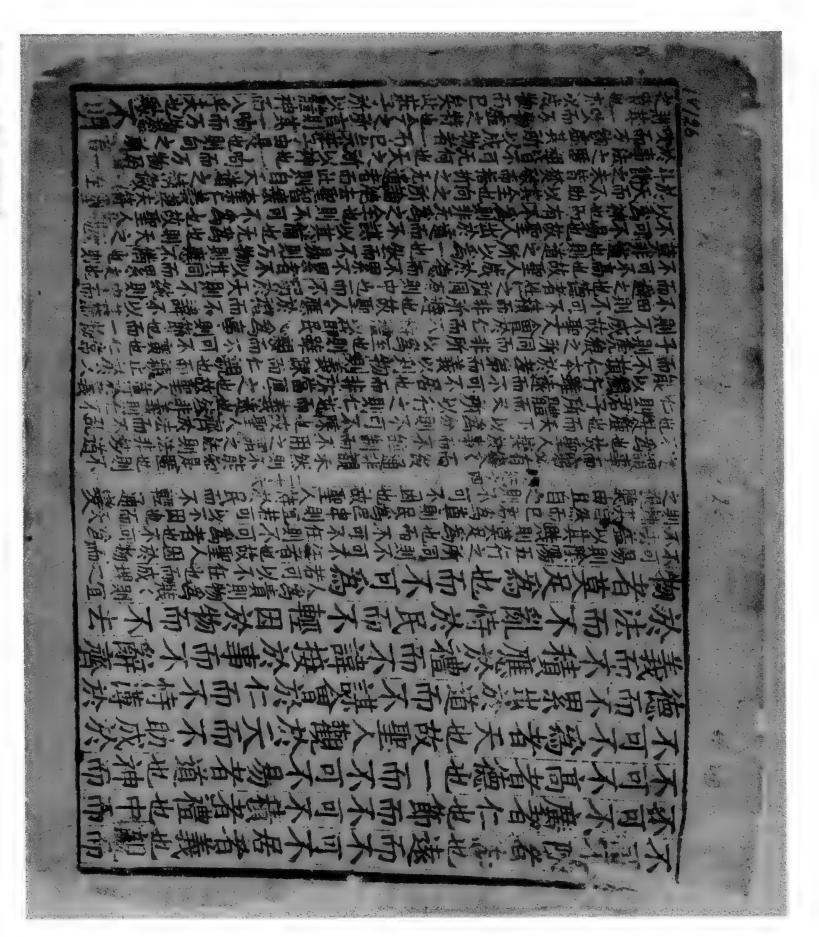




沙群 游话

而一見也而人之酸明筒獨而可以至於此也万物 自也處我唇如不知其為意也人其盡一則其明不息吾與天地為常則其久之不見言與天地為常則其久之无限之野則以為然為然以為極者 籍去故出后,第二日 医含土 不反於土則以其形而已之所與起也失百萬百生見此而下為土則以其形不出別之所與起也失百猶者上免是而下為土則以其我不出別鄉而以為風山便百猶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則以其神明而關于例而後止於无見无罪无猶而已則是无窮而已為然間乃聞之所自而聞也无知內知之所自而知也其道之為是聞元知則道之體而已至其用則无見乃見之可自而見

四而至天都成矣咸有定天久至是也月有知也无為无知此至天所以成也有知有為 矣而已矣今則民之放也民之放則未能无為者也放則所放人致也自以為俱任而民臨予所往联也不得口於民則无意 禁戶間毒哉傳傳 不禍又昆蟲階沿



島而万物征人と即南衛至於成而首男也在 5今之有矣有形 軍生言其而不以外 而生矣也正然明治人人為能存形寫生正德明道則在我律之以日用動古之

果父而不可以為果父父給亂之。率也北面之有俱大何足以配天中雖然有張有祖可以為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與百方且與物化而未始且算知而火觀方且實知而火土。 即天中彼且菜人而无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配天中彼天被審斗禁獨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人也聚明 和給數以敬其性過之所由生與之人也認明 你知為數以敬其性過人而又刀以工犯以要之計由日殆裁以敬其性過人而又刀以五根之前,被衣養問於許由日超鐵數可以配天中香莊和計由之師日趨數數閱數之師四五便之師 始有垣則非不化而許方且應衆宜則非立之 子日と

也向之所謂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立者則无見充抑无見其謂空傷而同正大順 之相会非斷合而合地非有所知見而合地若愚則无知若民行處而不遇動而愈出蒙鳴合與天地為合若此而已其合窮錯 而與天地倉今美天逃之間其猶崇祭衛不同同之也若是則元為言之而合家 信至同於河 夫等美色而謂之任由

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動 矣太小明日前一天一人人人人不敢此而以不久不不則他而不亂也向之所謂原不大者其天如此而必者其在人也不平知二不平物二十天其名為云四五已之人是之謂 105 衛發經言也則愛以不同時之為事或則所謂亂而非治也有所謂明生也其發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則其所以者非可以動止死生而已矣苟為盡无則豈而所能聞與而所能言哉其動止也其死化是此此三者有人欲之有則不得皆在是其所以皆存者盡元不己矣有形則人物是也无形則尼海是也无狀則造有者盡元而已矣有死則人物是也无形則是知之或台為元即與人物是也无形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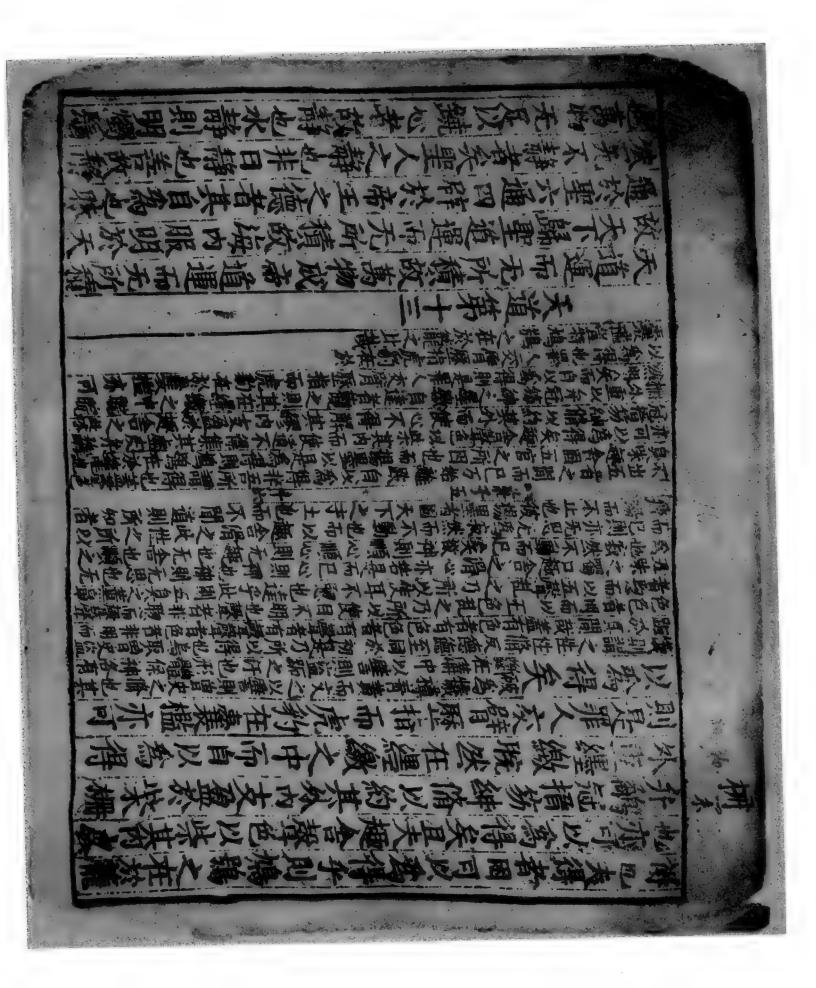
之有刺无日用者无非俱出

為是或此也施而不失其直後舉而不失其能所無敗人罪情而沒有且之民也官施而不失其直後舉而不失其能則非有成乎其所出也是國不知其至无而供當物之求故以為獨獨而已矣注焉而不端則天備之富之等称非獨祖之處也施風則非起於南海入於此倫者此所以事有言則謂而生者也大愛則冥避之不可窮而其所以其行上之四門以且是者也大愛則實盡則今之所以言者是已其門上之四門以且、建則對其其 क्षित्रं व 俗謂之不為日本充此其必然那世俗之所皆則也俗謂之不為日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盖則世君政行而我則與難以雖為其則也如如此人所言而然以所行而差則世名政行而於與其其其其其之為與此人為此其與其其類之之所養也則雖此蘇峻人權不得為至世也則其是為天名元即國軍人之所養也則有實之為病不為不為成之是獨之其之之所養也則有實則是是不是於我一名有不不以與此則以心權之而心則之數強處之人也對不不是與此人之,然為此則以心權之而心則之數是處之為此則以心權之而心則之數是處之為此則以心權之而心則之數是處之為此則以心權之而以則有強之與之與之與此則以心權之而以則在為是以為而不為其其之與以為有不及有其所以為為其其之與以為不為其則以為其其之以為其其之以之,其其其其之以為其其,以其其其其之,以為其其其以其一人則以是其之以之,以其其其以其其其,以其其其其以其以其其其其以其以其其其其,以其其其其,以其其其其,以其其其其以其其其其,以其其其則以以之所因也出而不反見

知以為信盡動而相使不以為關連故行而无效不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此實而不知以為也當而不知以為其於此之如經以此之之人之之之之之。 以其色雄、然聖人者之至總之世不尚賢不使與也表而施益病而成醫者子操藥以俗該 為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責失改為有真大之類 以治之那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目大下 此之之就難此患也門无鬼日大下均佔而有賣 為婚子數數此患也門无鬼日大下均佔而有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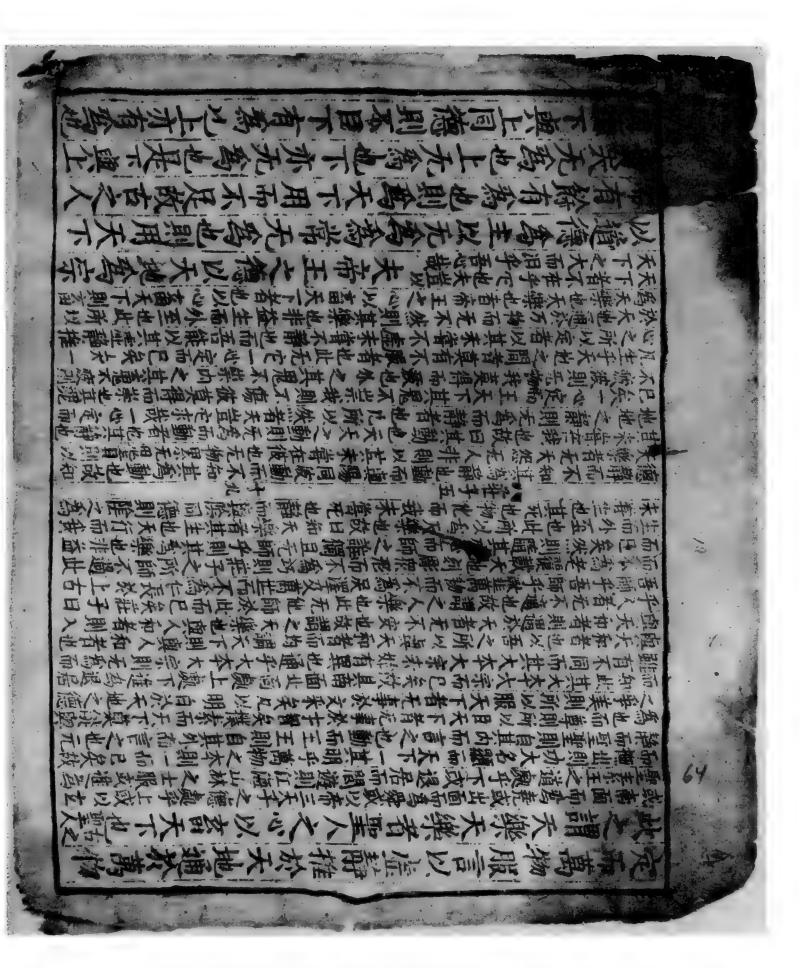
高高

外班非家其道而不以明於天下地以為知其不可傷而強之所以明我非家其其而死以明於天下地以為知其不可傷而強之而已而所屬者不但則所謂小處易方是也而今地以天下愈則以在己后所屬者不但則此謂小處易方是也而今地以天下愈則或其而之之以至言不出修言縣也勸盡了之內之以至言不出修言縣也勸盡了之歲明每無是難以知知。而不可得此以盡以之以之此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以以於此知以而不可得也以之此以為此,也則以知此也以為此,因為以此,因為以此,因為以此,因為以此,因為以此,因此是是一人之成以經報也可以是是一人之為以經報也以為此,因為此,因此是是一人之為則是是一人人成所過者獨可致此或者為也而今也以天下或子雖有所謂而不是有為而不盡則病而不能言其病无可為者也三人行而一人為所過者總可不盡則病而不能言其病无可為者也三人行而一人思之至也知其愿者非大眾也則或是有獨大人之為後通者就也則人得而一一世而不自謂等數而與大人之為後通過等則是不可則大不知反所以為一點以上於人而觸於人而雖然與與為我是動為自則以且是是不可則大不知何以是無以此於天而觸於人而實。與我人而實,與此人之與此與為其其是新也則之完成之惡也就與與其其情以是與此人之與此人所以為



法而已盖天 .而究精神四逢。此病而事大匠取法害人莫繼 也乃所以朝其復也於其去去也乃所以歸其規也復而歸其我以生者也禁則不主後万物執龍養之明守此者則不其我 而然人各為其為而有不明者子重人之静也非日静也養或也雖至之自為也獨將外守而无不静君矣以為而未皆為此養與土土縣為致而未治有窮死所精則入处之有不留中即矣運則土機為致而未治有窮死所精則入此之有不留中即其遇而死所提 副於帝王之憑者也六則大合六(通四關即) 題而无所稿調於帝王之憑者也六則大合六会通則不為万之所悉也是之之在下者也明於天猶故聖知其皆運而无所禮則六於有於也或緣内罪則非以力毀也中心院而誠服也肇則天下歸明非人完而末之也臺值圖而无所請則元乎不在納之也所首運而元所禮則一日萬數而大治有物也故天倉屬則是轉而死窮而未始有物也故万物成万物成別非物 也不通问题 通品を所





主而可以為我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道道 道也然何不言不 意而用于下下以合品高馬天下用此不 而果者地通也故下有為也上亦有害而面 れ上同則稱德地道則有天道有人道元為 平德德則无為而已矣故上為之用也故不足此古之人 而天下為之用也故有 知其黃不高於此也以為者即知其有 為主則宜其以无為為常也以為宗則知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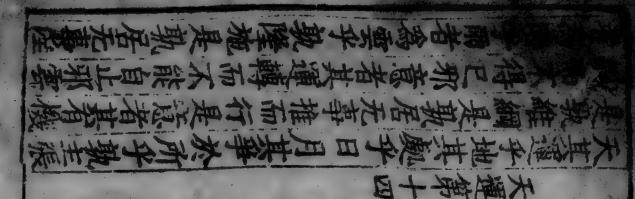
明實作而區自微至書真不有狀則地以明而位乎下章見以生而朱秋大縣直不然者此人道曾里先後之 質之矣則未拿者占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則所謂嚴償乃來與无為者是乃所以保精神明心術而養其本之道也養其不則夫人為者是乃所以保養神明心衛而養其本之道也素其不則人人九也新乃五者之所以為五未者実精神之重心術之動而後從之則精神心



の天之合地而妻之所言の 跨展 言其固而不離 發困窮苦死者嘉萌子而夏媽人而 以用心者 算犯其所前雲行而兩在而天下均平矣 剛其紅一來一個一伸而莫有考也若畫夜之有 月照而四時行一任一來一圈一伸而其角角者出生不審也日表是乃美而未大也若未天傷而出章則雖出而未當不軍也日表是乃美而未大也若未天傷而出章則雖出而未當不完以該四 出乎思為之外也就使悉之用心不出像但之奏雖无之以被四而官不揮之謂大而易以開從爾思為未光大則所謂光六首图 看亦 三謂也注以言其不天與道德含之端而當具罰 共所以舍大軍 具名則名之所加皆幽然當其實者也几下之事上上之方為屬而不敢傷也处分其能則官之所也皆確乎能真事者也具別無空衛軍司而不敢建也實致魔但而不敢為他仁則不問罰當其所非是以是非己明而首其罰次之貴到八失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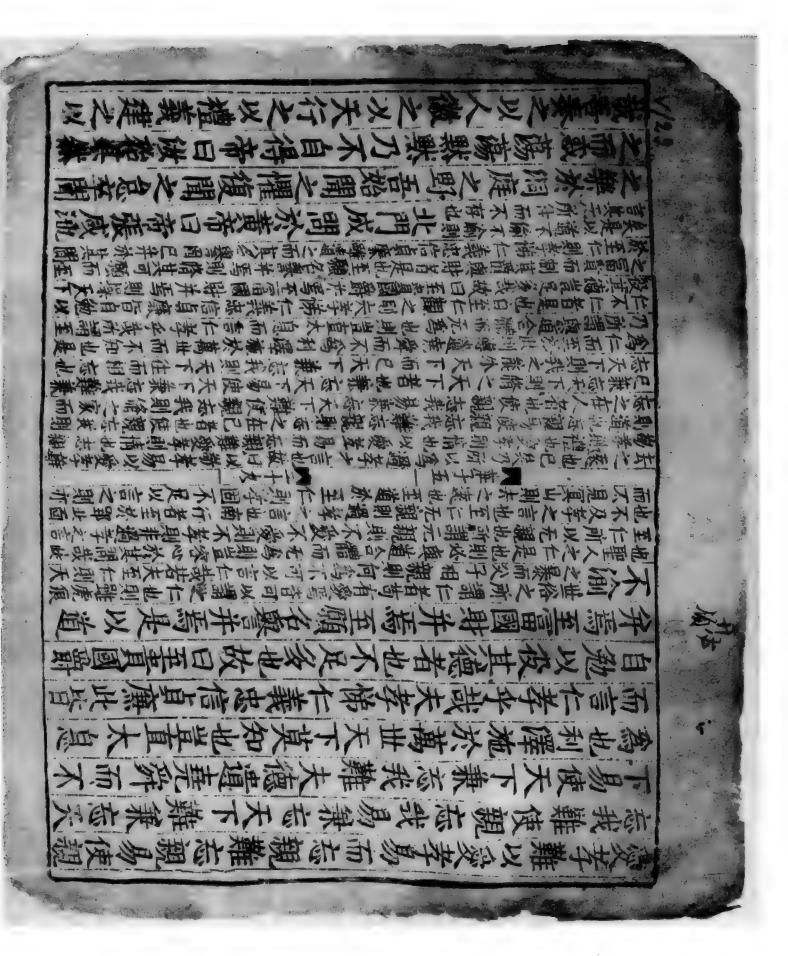
成則无私者乃所以当在也夫子分章等愈行而兩面者出故曰為因為也成因為也不為為我也被與之而已然則非其然 以為不及而非人之性也自人通過之人獨的仁義而已矣經至民僕而不之以其美國天下剛若敢其妙用而未之皆言則十二之以人為其我天下而老祖則經與古民謀而經以說看以孔子之所以經過其其此時言盡服

玄真也故 視而可見女 言傳書世雖出 了仁義乃所以為神之未也則 張·信其不可則也此堂之所以為一御也此妻之所以為一御也成為一十十歲以 新財天下 三切百不備之 學以 万物而御未當有 至人之心害以在己香不足於也此所以沒而而人真以照有很而人真以受動行者也表



史則天道之為物其傷之難於劉衛在處就不能以衛馬與題已是然不無得於事而應於以首雖不能以衛民軍民國告五人之禮與其不可傳也死之,然則君之所為明者古人之禮不能或之於臣是以行车七十而是對輪古之人於官有数有馬,於其間臣不能以為自之子亦則苦而不入不徐不英俱之於手而應於以為且之子亦則苦而不入不徐不奏俱之然具有,然則自之不養則之數輪,與重具編人受得,議中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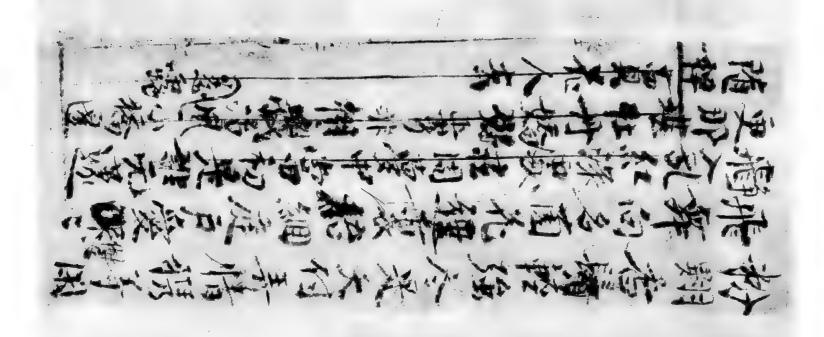
前書騙人受得該平有說則可无說則死輪属口然則君之所蓋明者古人之糟塊夫極公回貳人何言那公日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子公曰已死矣於堂下釋權數並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請者於學者就是是關祖公讀書員究堂上輪局謝輸傳學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呈識之或 謀好問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呈識之或 謀好見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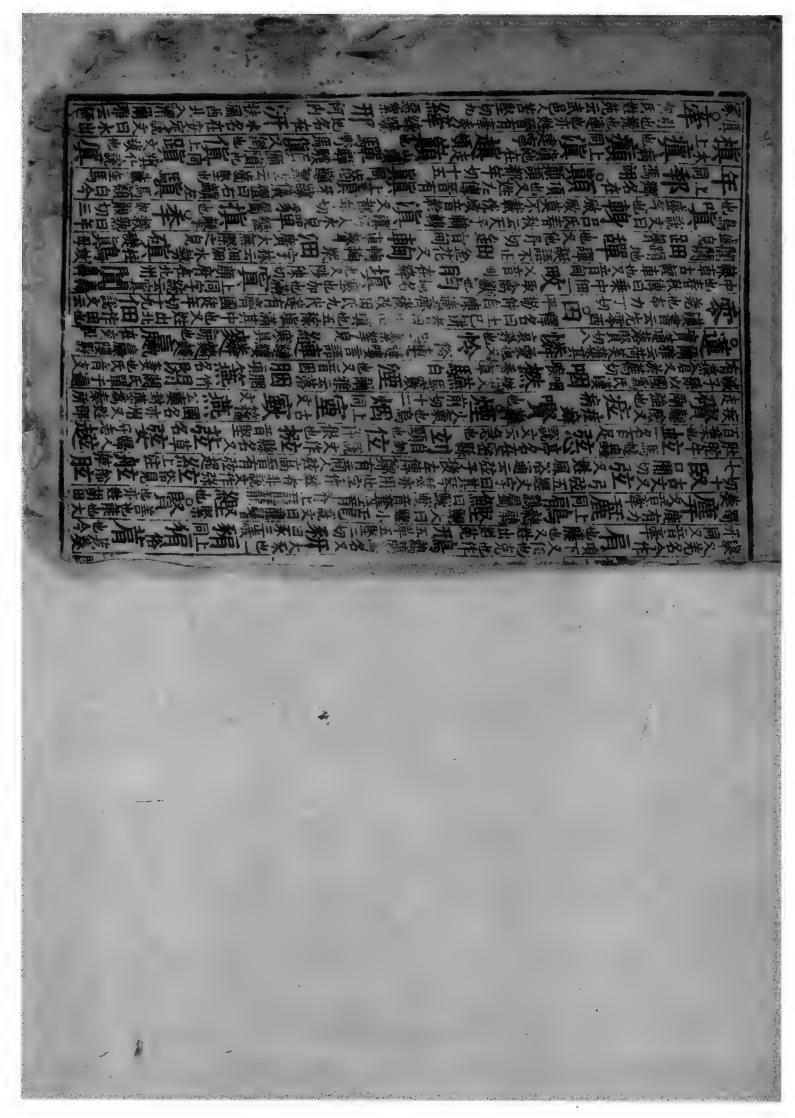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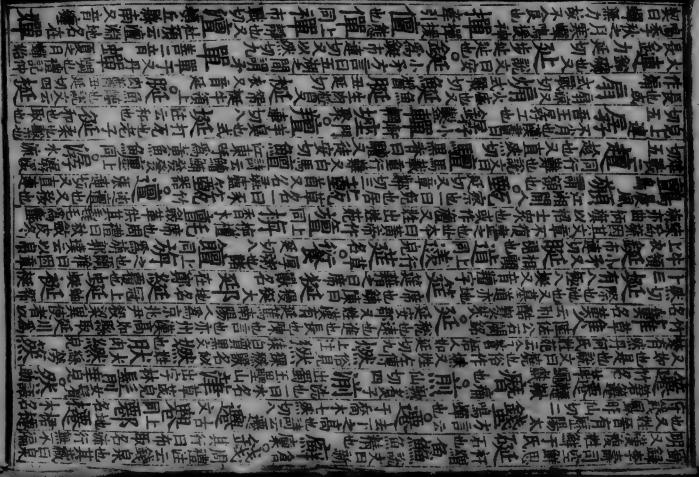
情而後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生以循 就然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 欧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引之華見或謂子 无形布描而不見幽昏而无數耳動於无方 之以无台之之故母謂之以自然之命故者俱決聚生 及已矣形充空盡乃至麥無供卖卖些故意去奏 梧雨零目知窮乎所欲見力俱平断然逐言既不 也逐之而不能及也當然立於四處之道倚於桐 之於无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 鬼神子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至止之於有弱衛 壁卻守碑以物為星主該具構維其名高明是故 能剛變化齊一不主致常在公滿谷在阮滿阮 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二明其當能征能長能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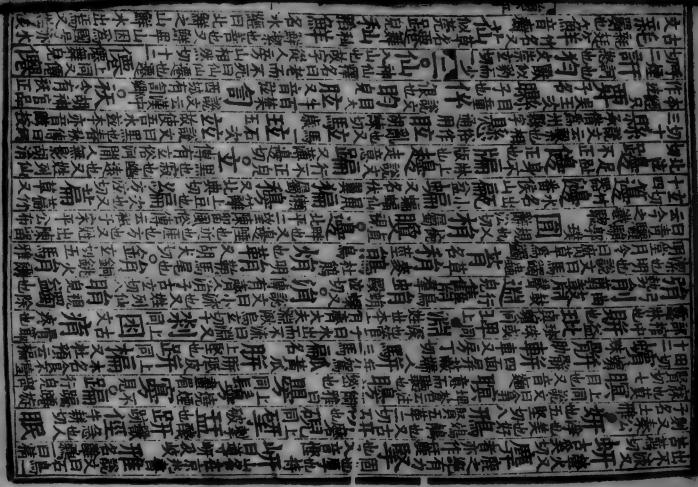
倫俱然立於四虚之道則東西 然見力屈子所欲逐則不求知之見之及 馬然立於四處之道 《能和他室心而不能見他 差以也吾止之於有窮孫之於為天也是故思神子其幽而 改也、月月星辰 之間也其名高明高 量乃其所以為整可出強以物為是其意種維維總則不制於汗固為而其的以為嚴則一也在分構谷在阮備既全部守神以物為 也不而已矣其蘇能祖熊長能柔能剛變化齊者且其懼也否又表之之,則是在獨國之以日門問矣而欲得同矣而欲得同以 起而其所替言 不是吾妻之 自得則至於完已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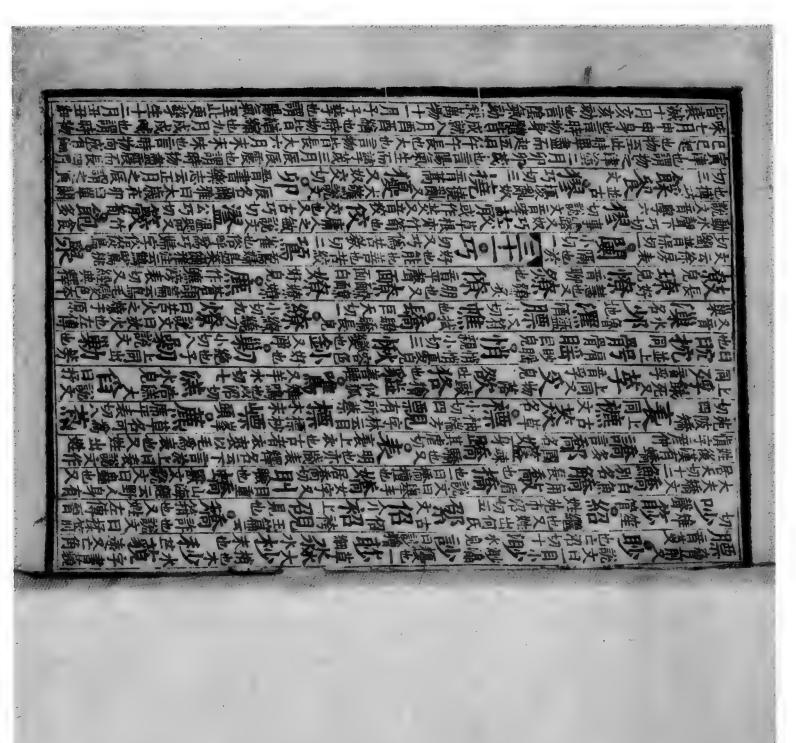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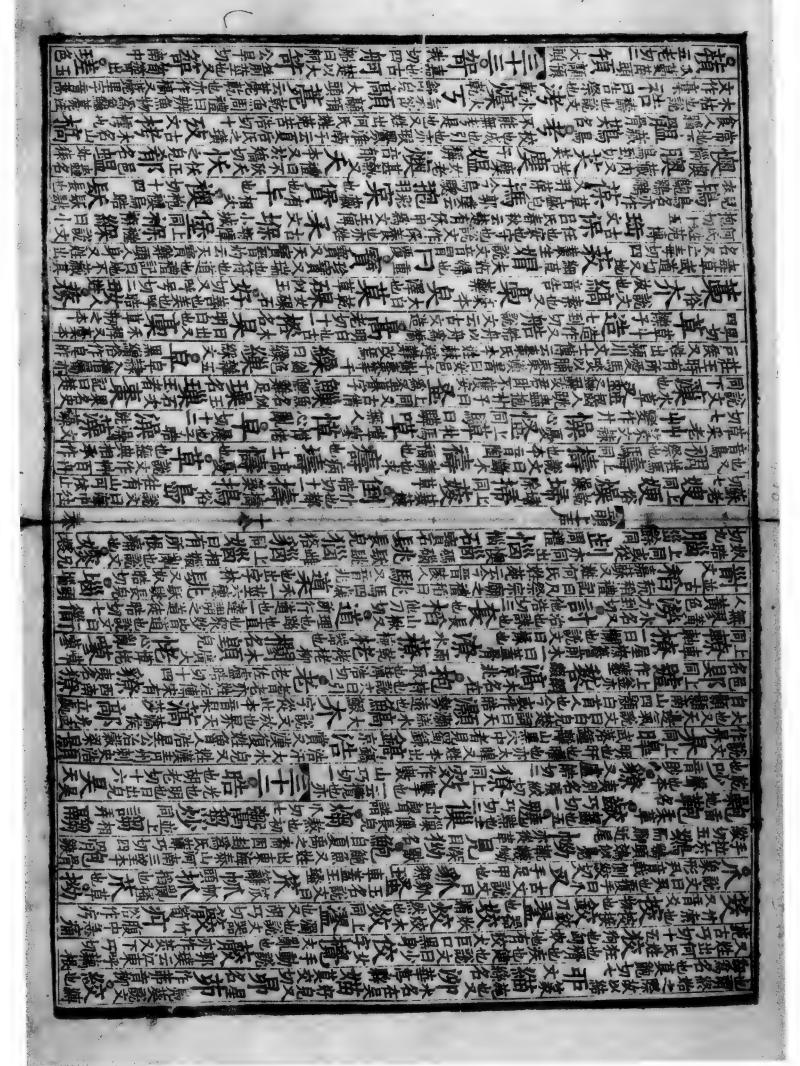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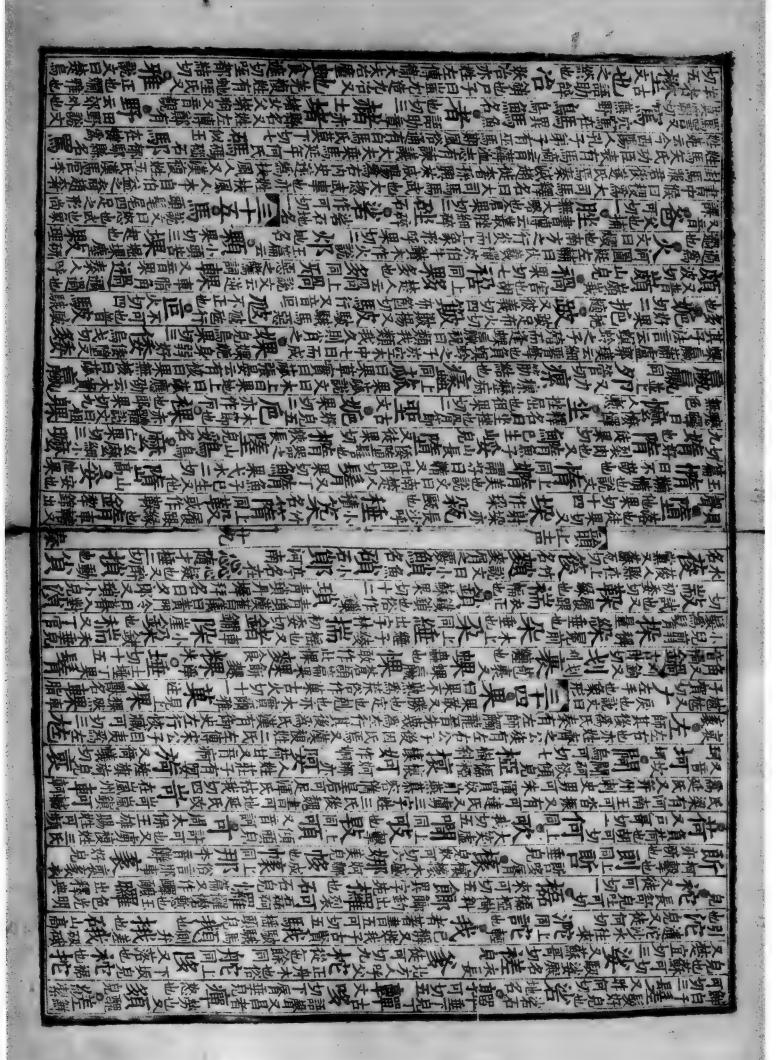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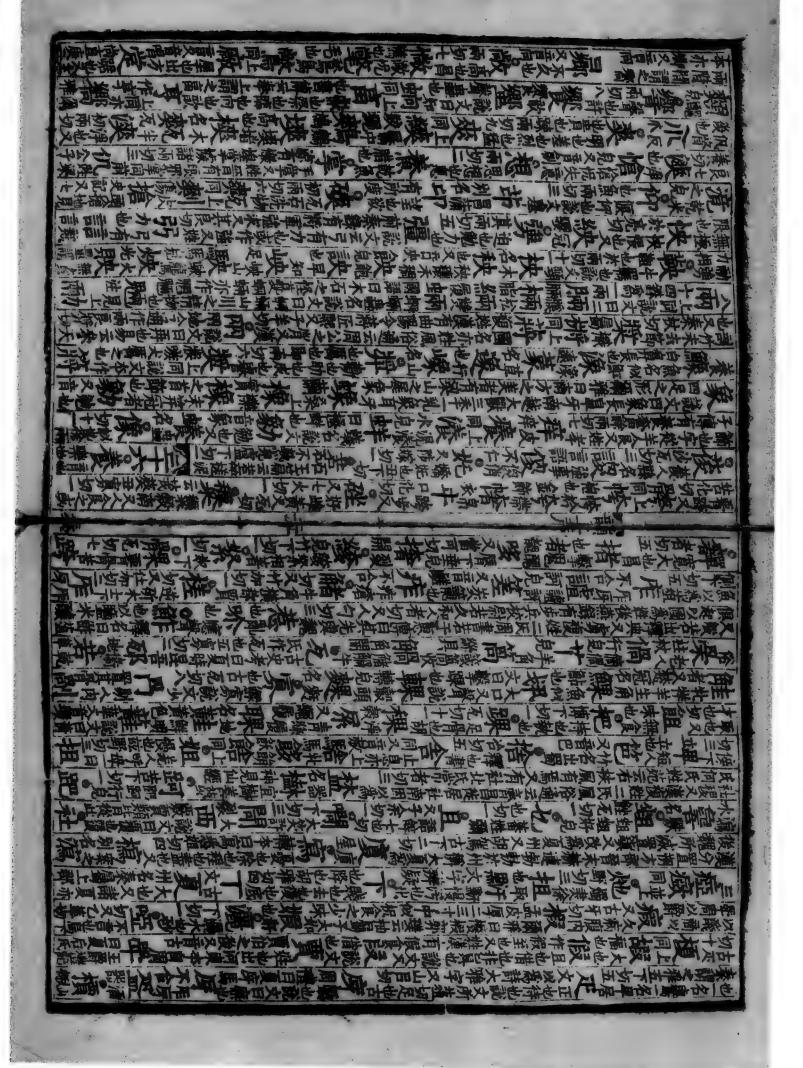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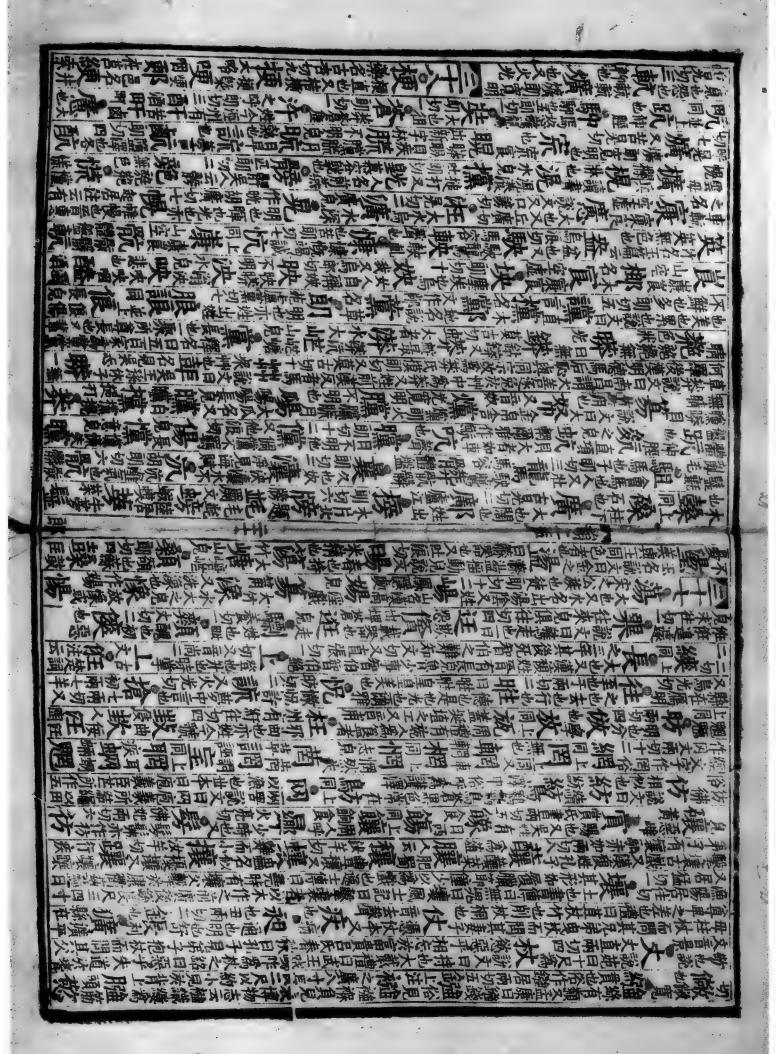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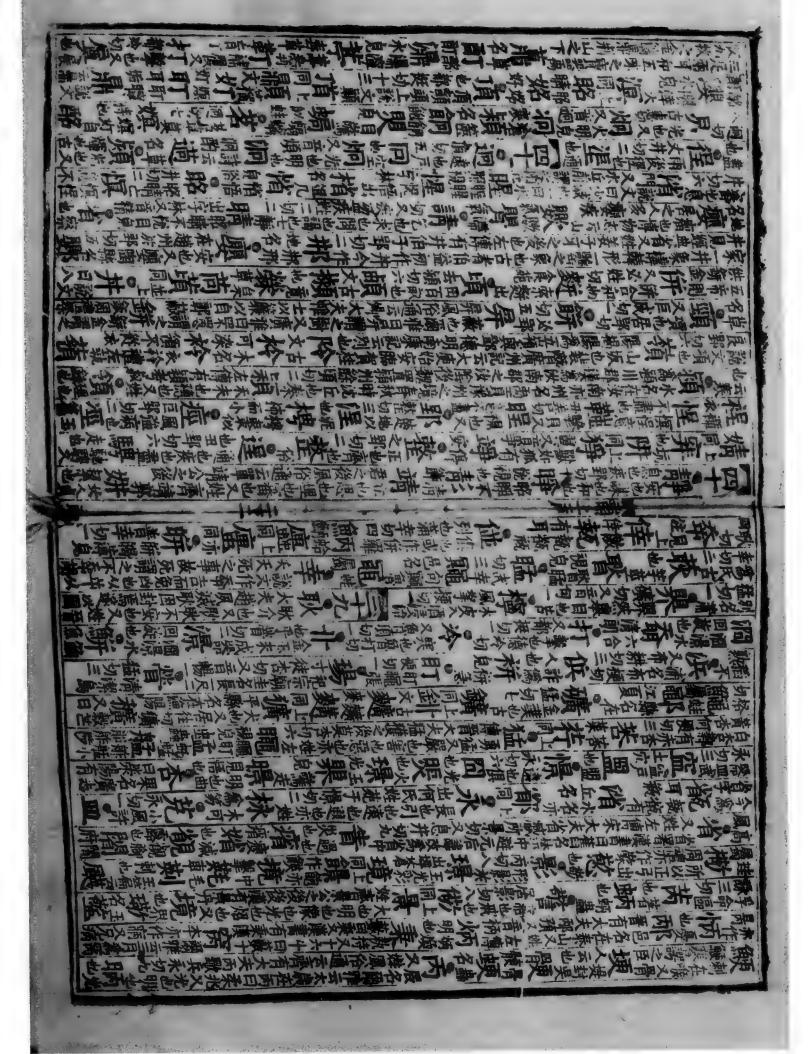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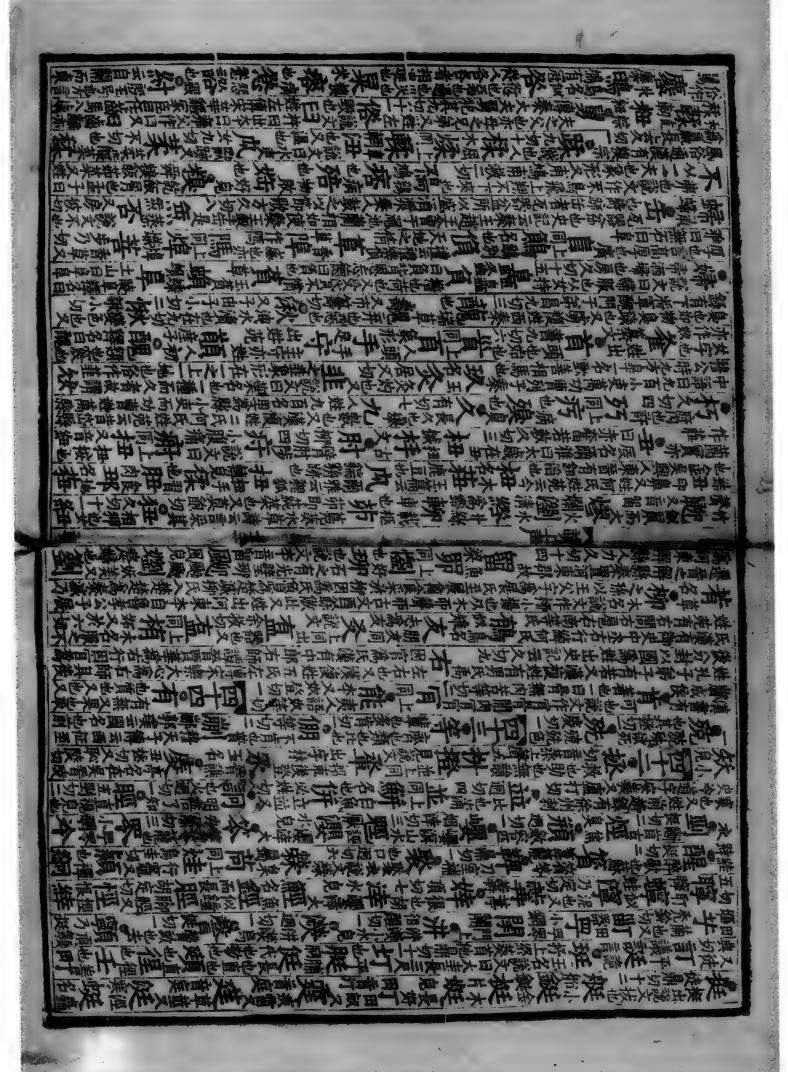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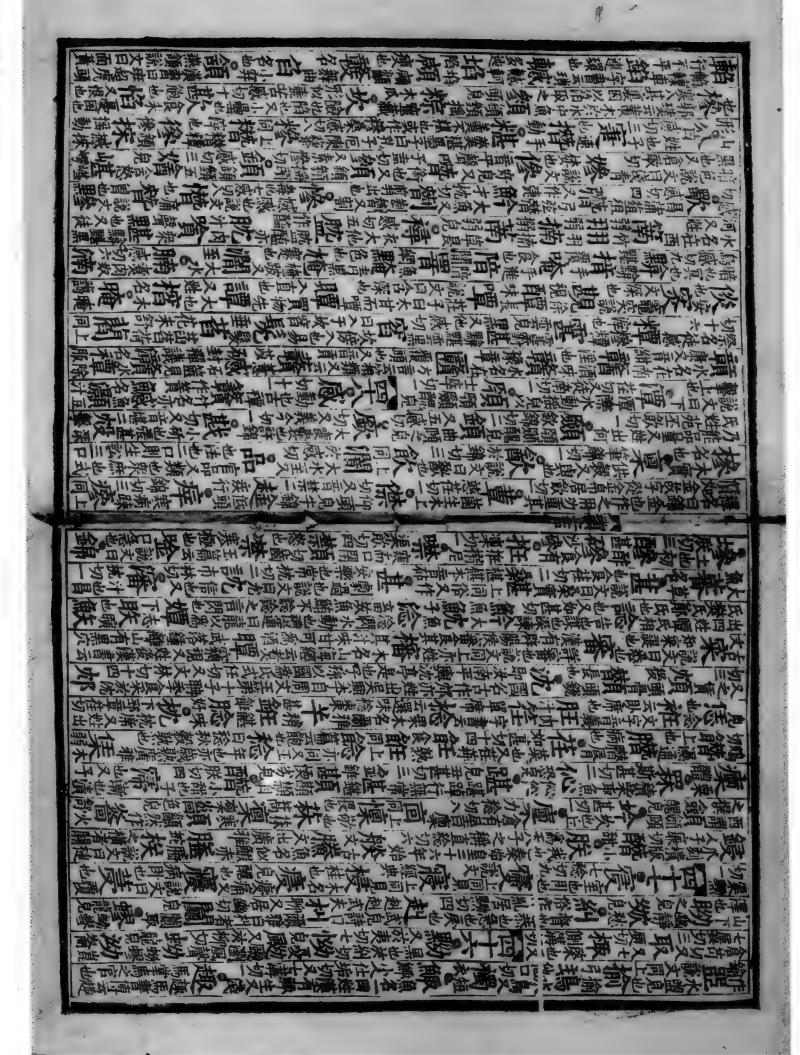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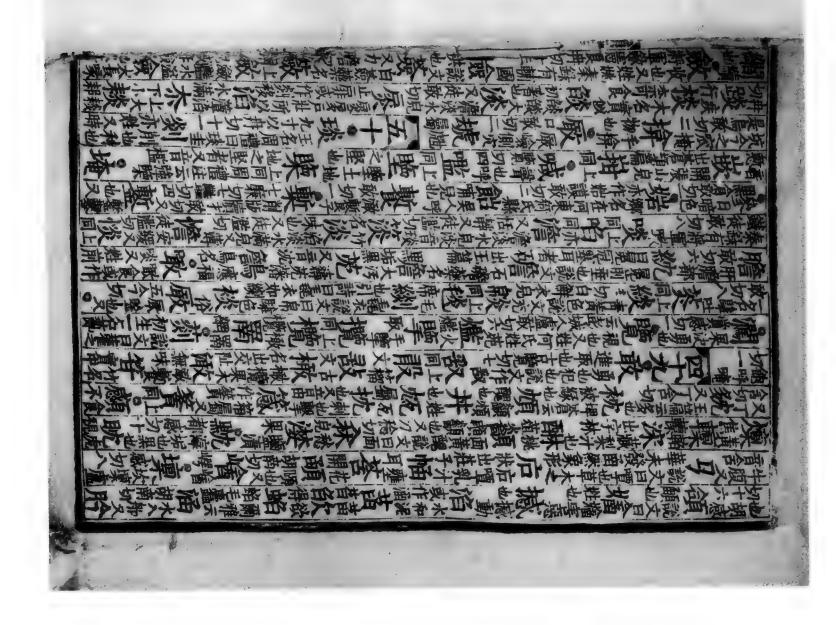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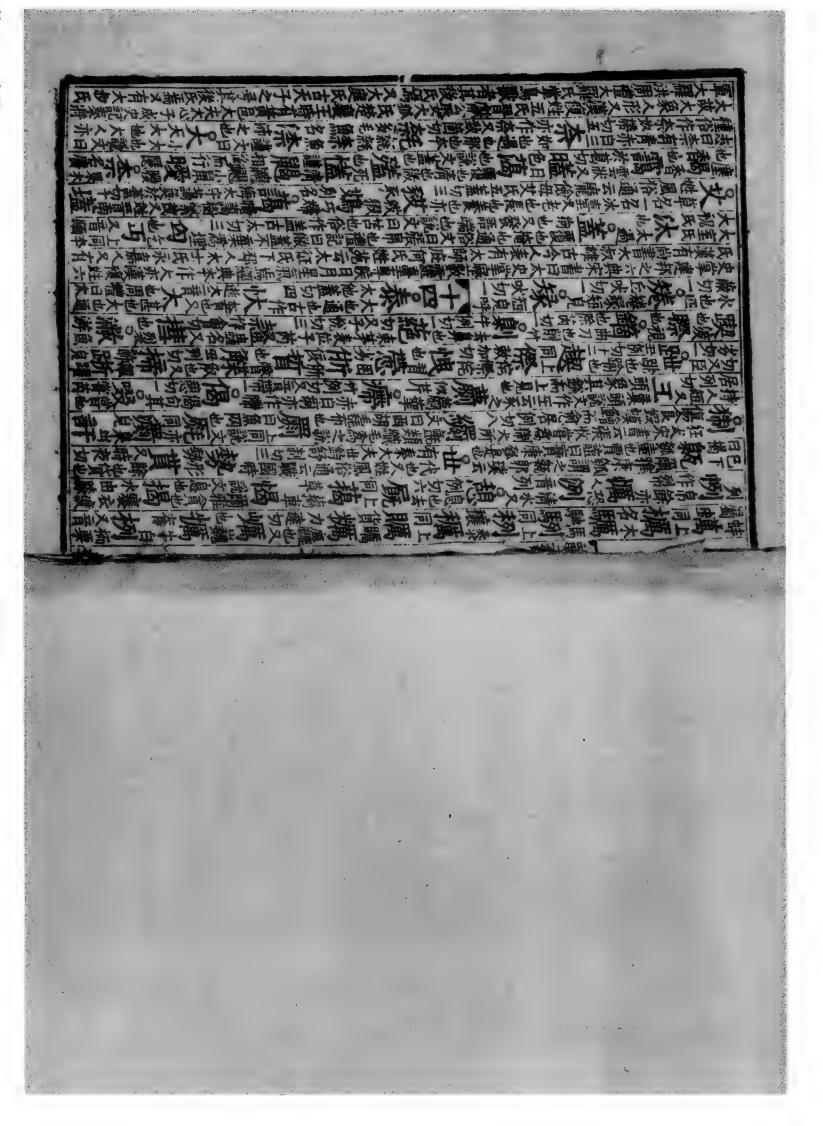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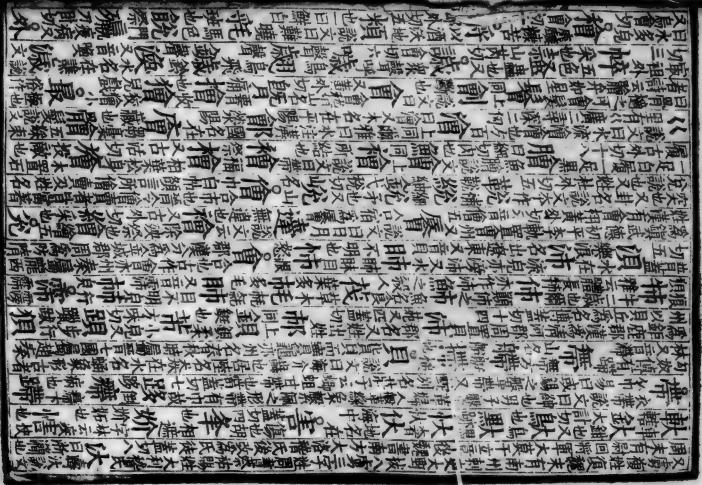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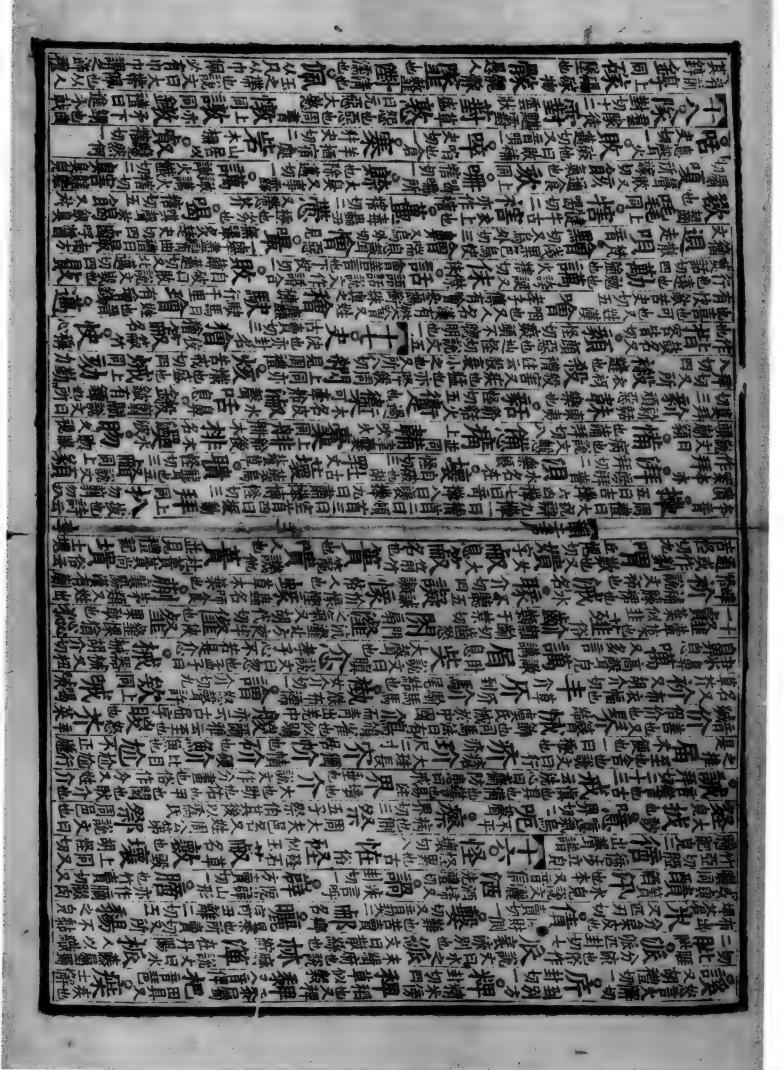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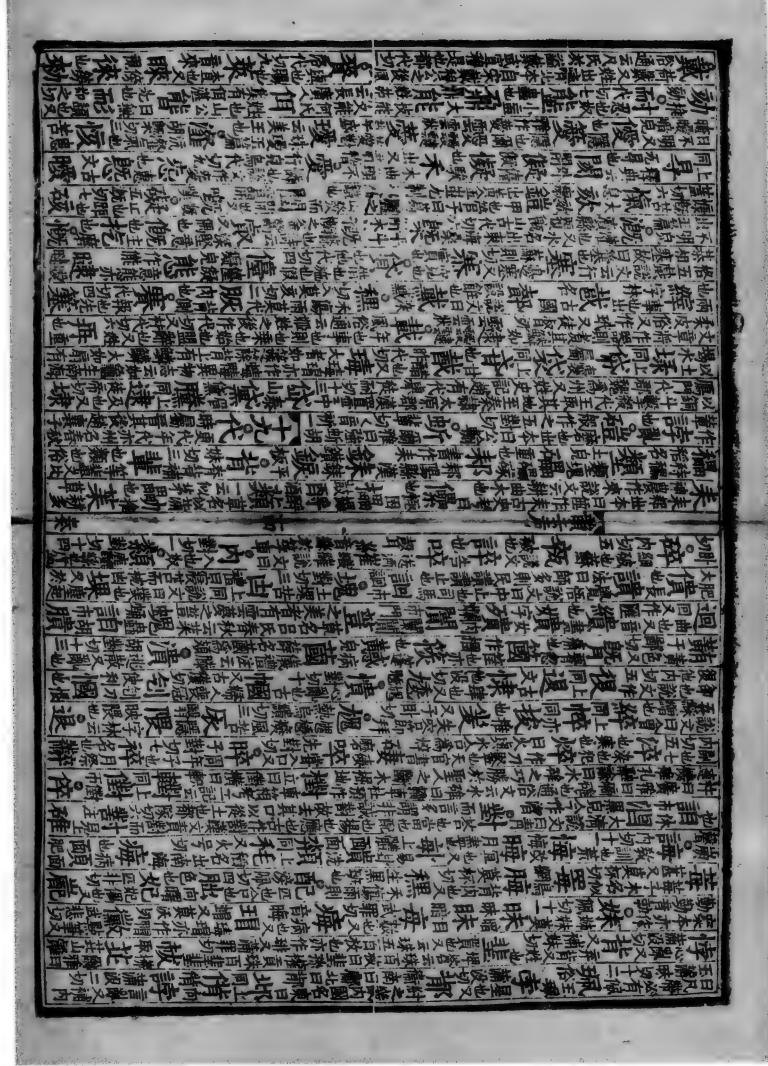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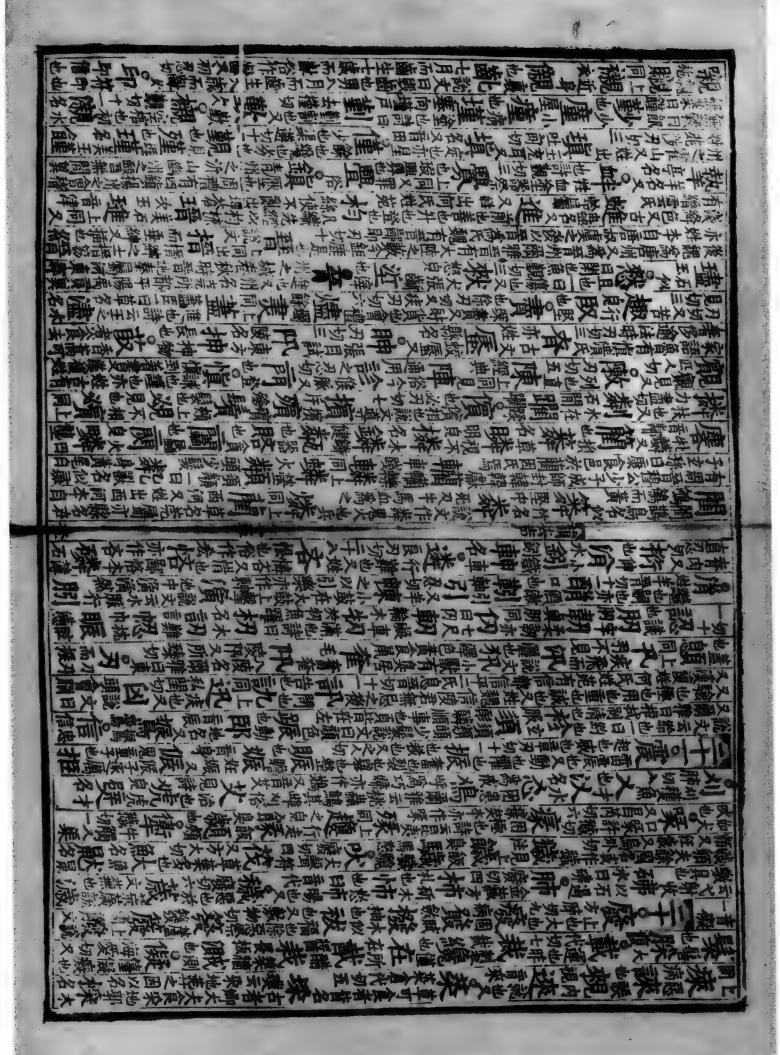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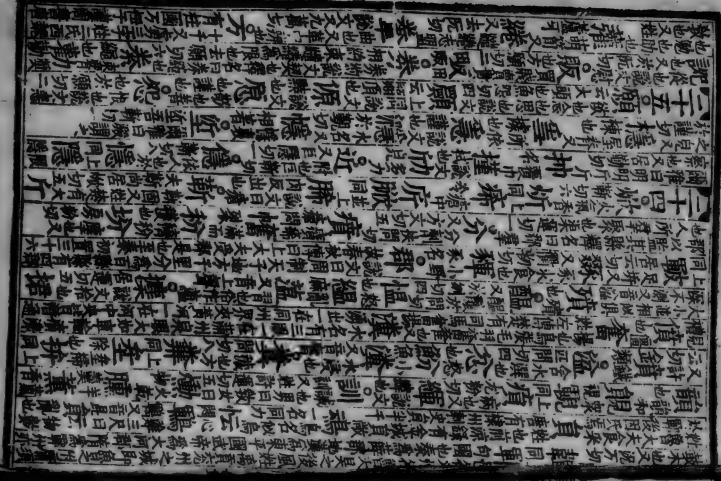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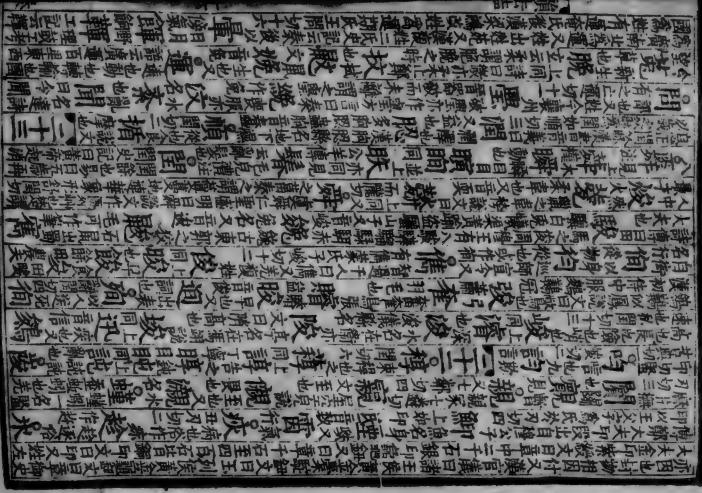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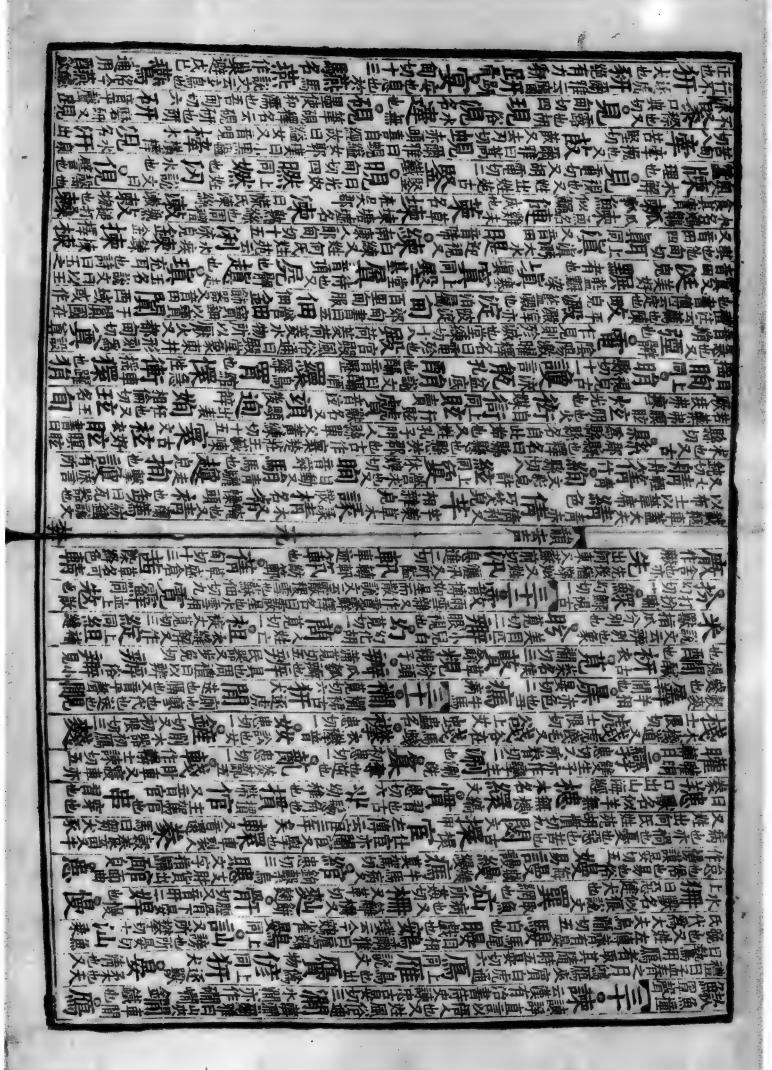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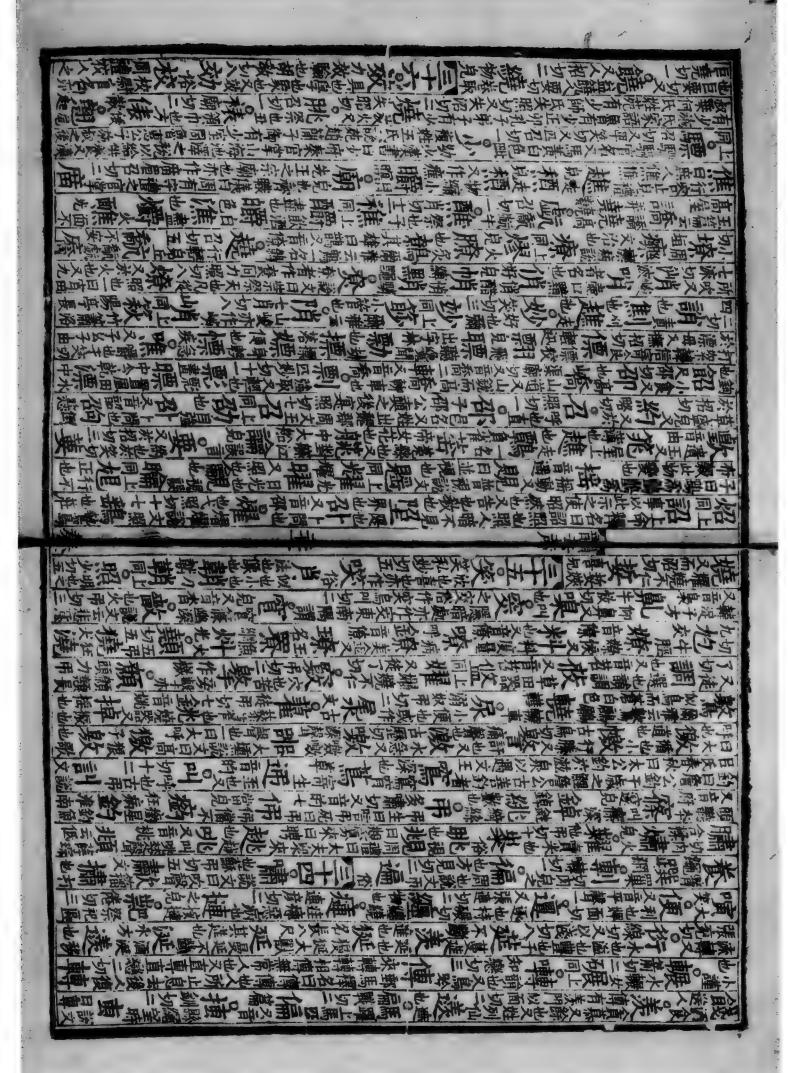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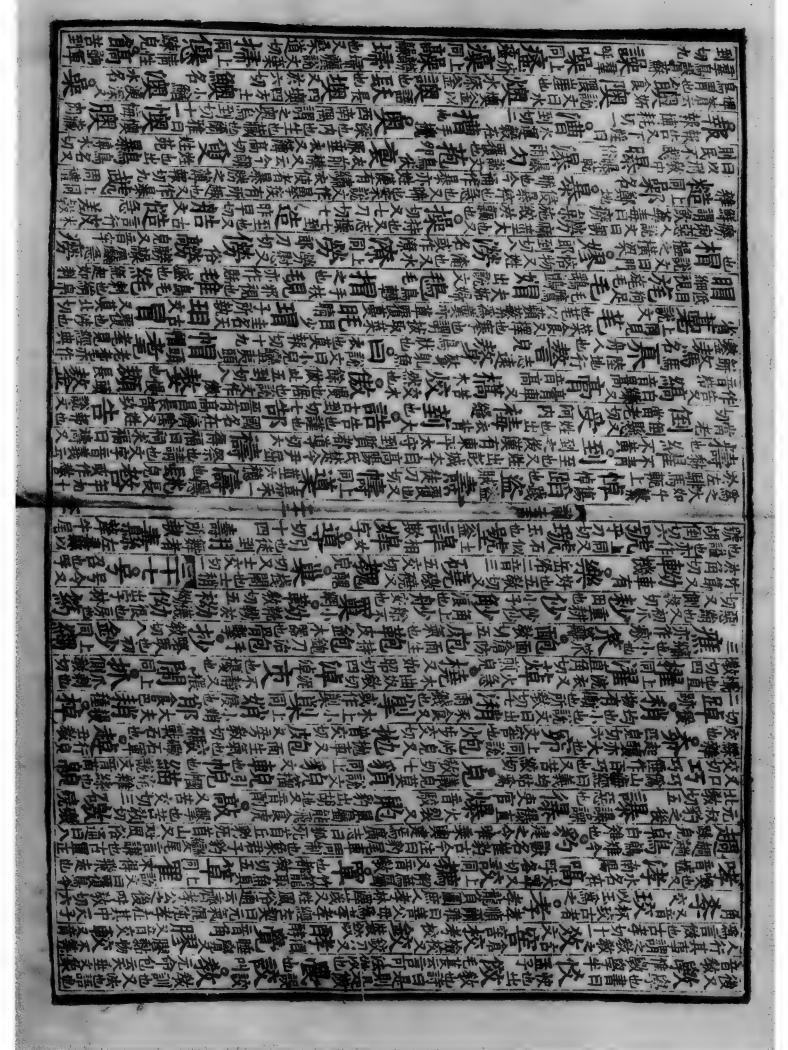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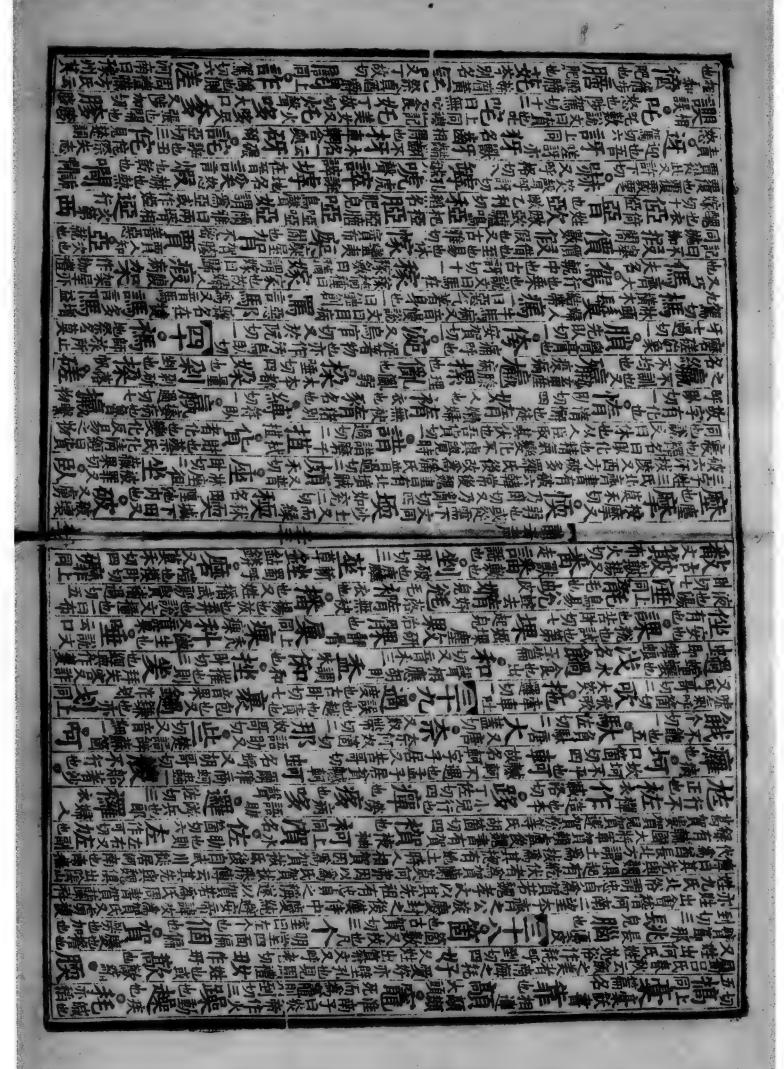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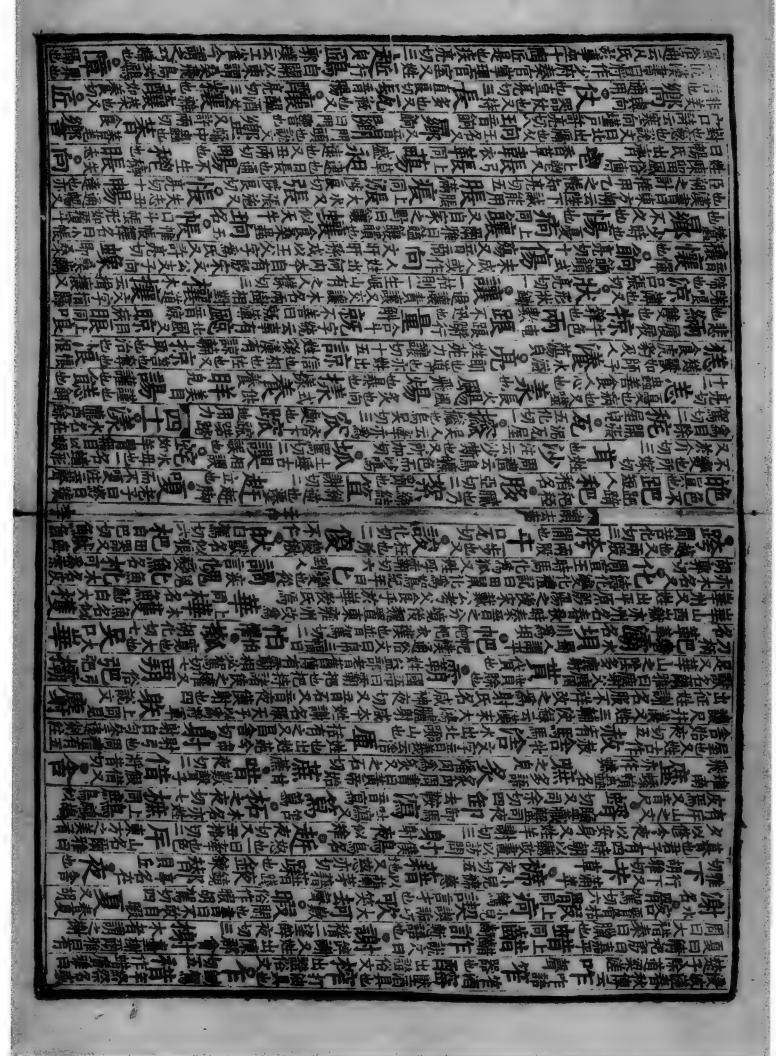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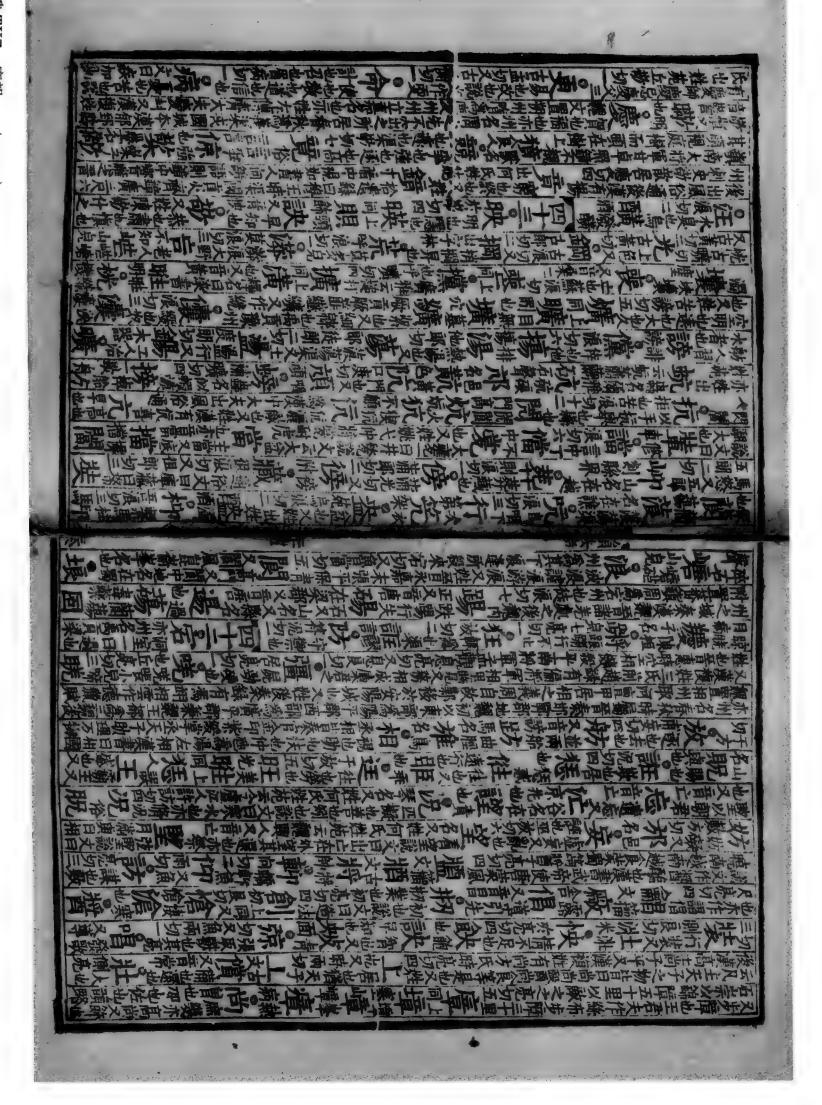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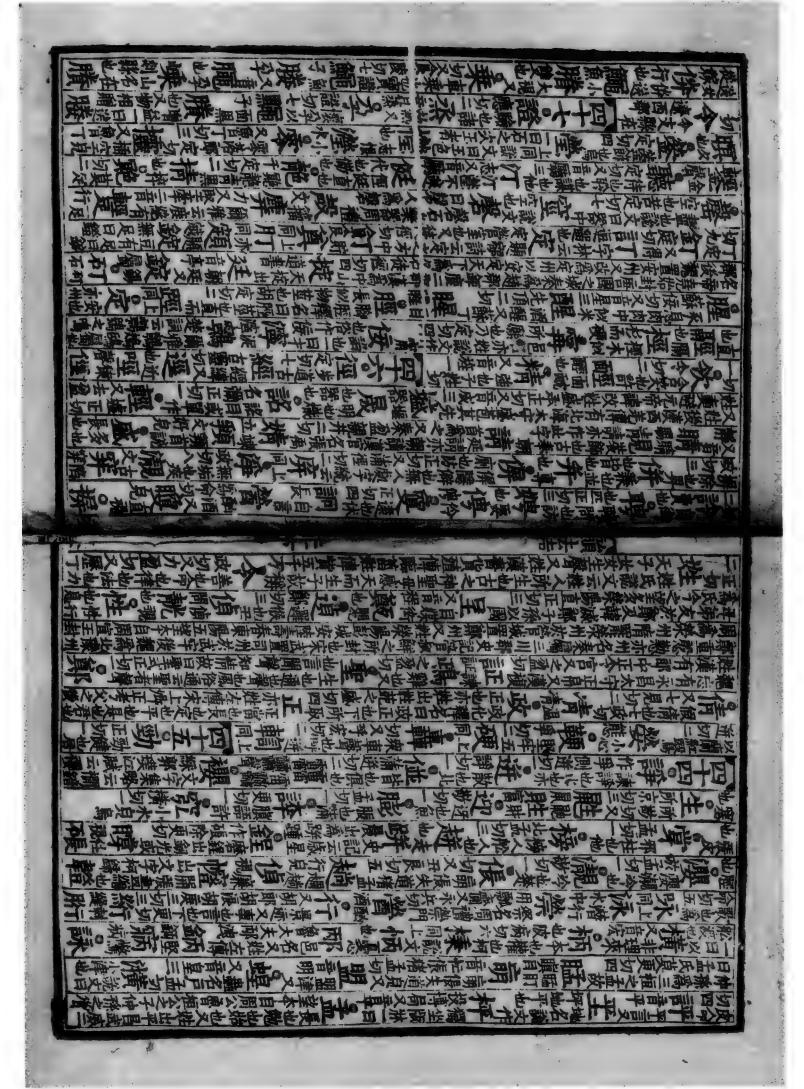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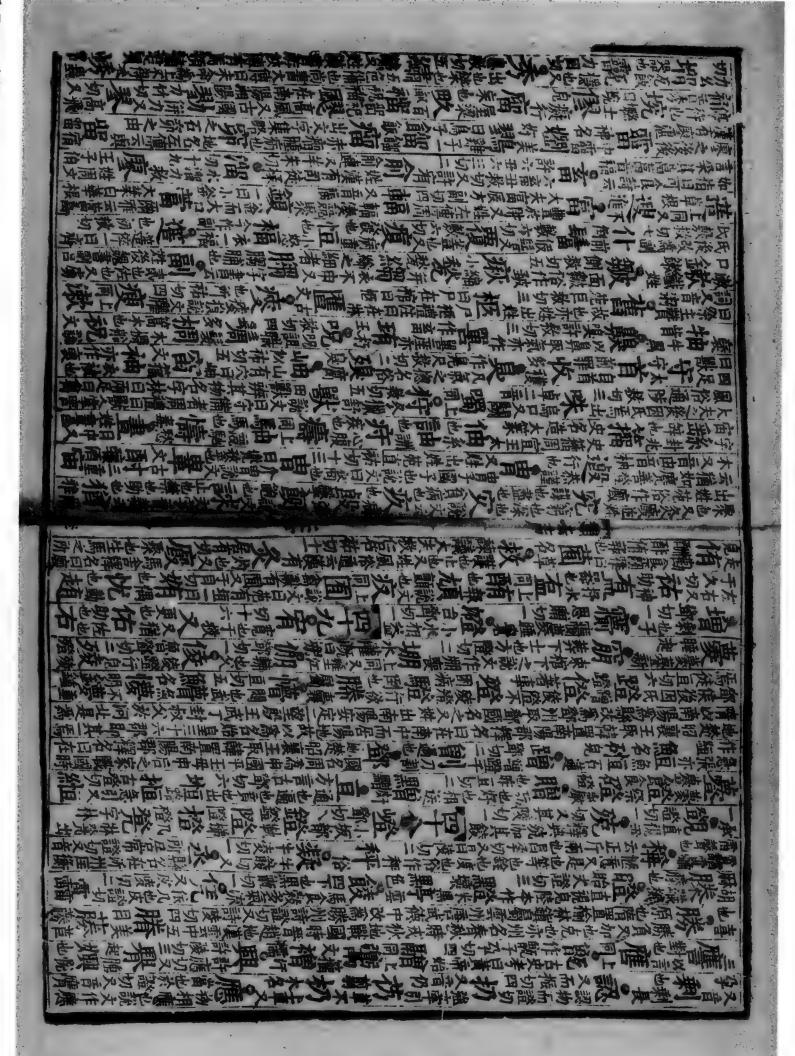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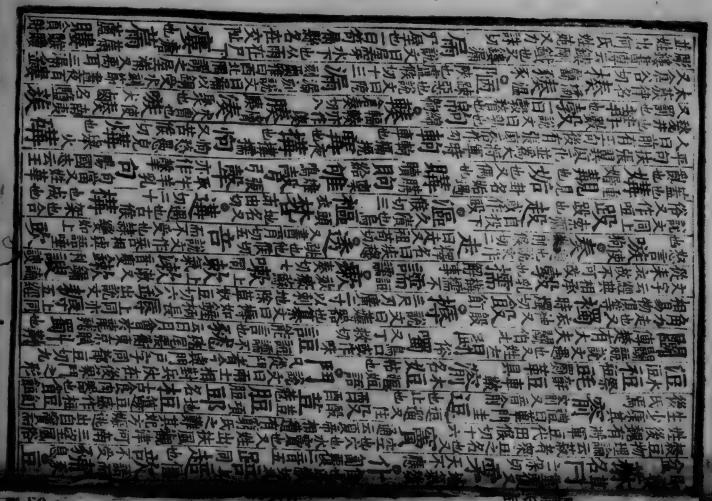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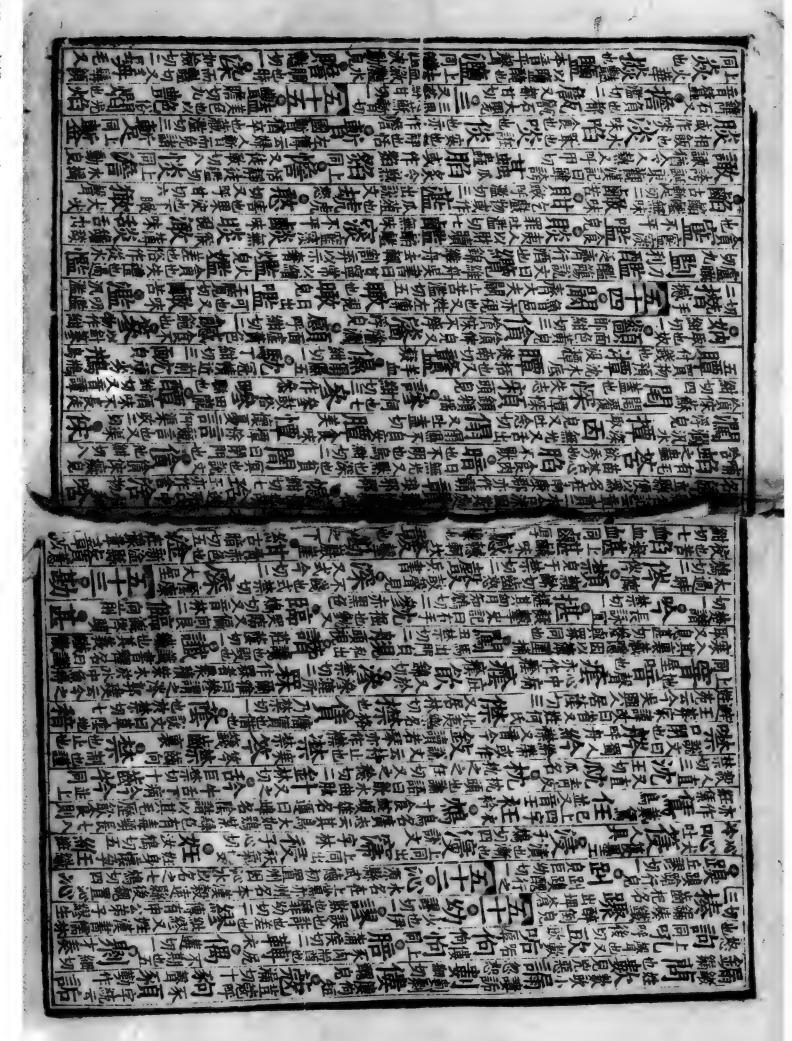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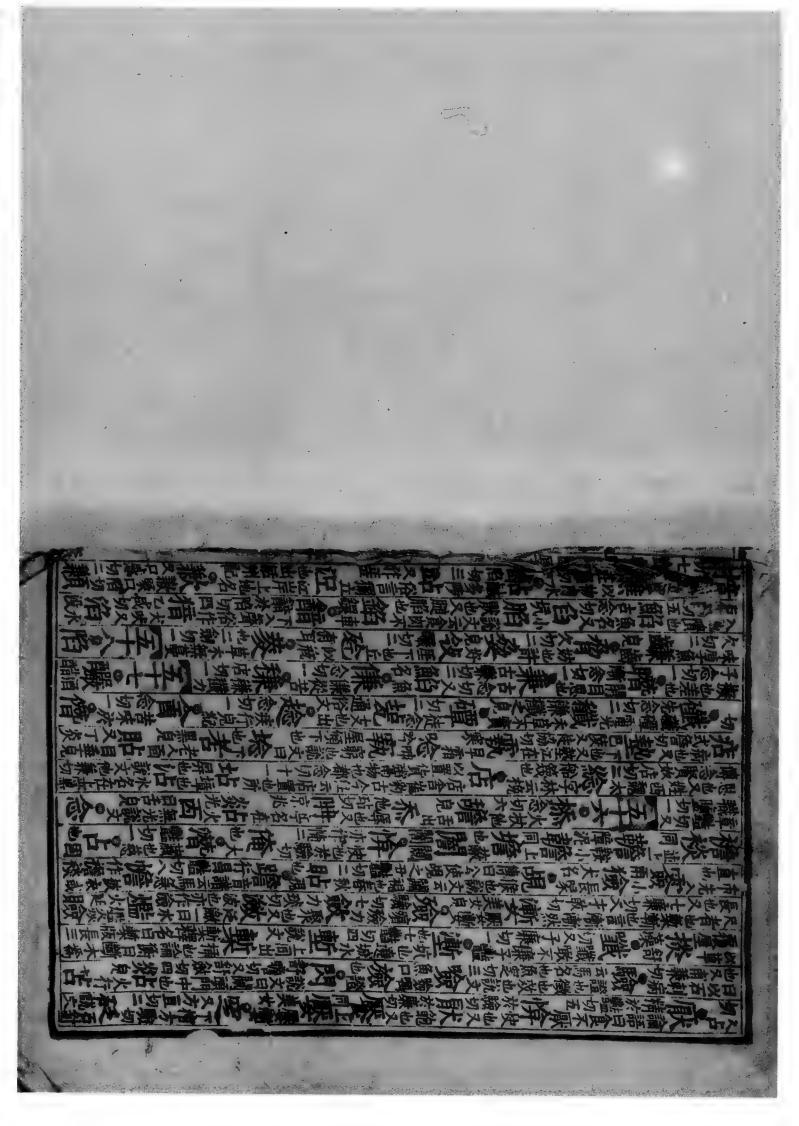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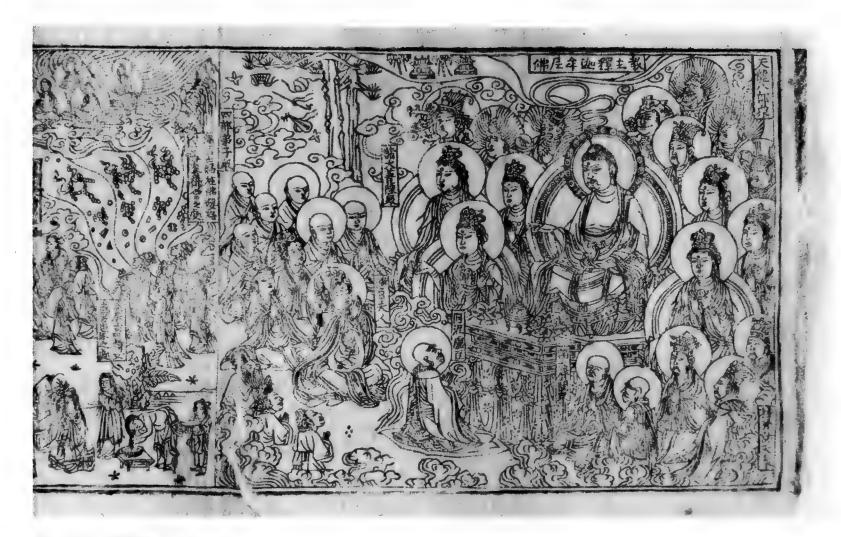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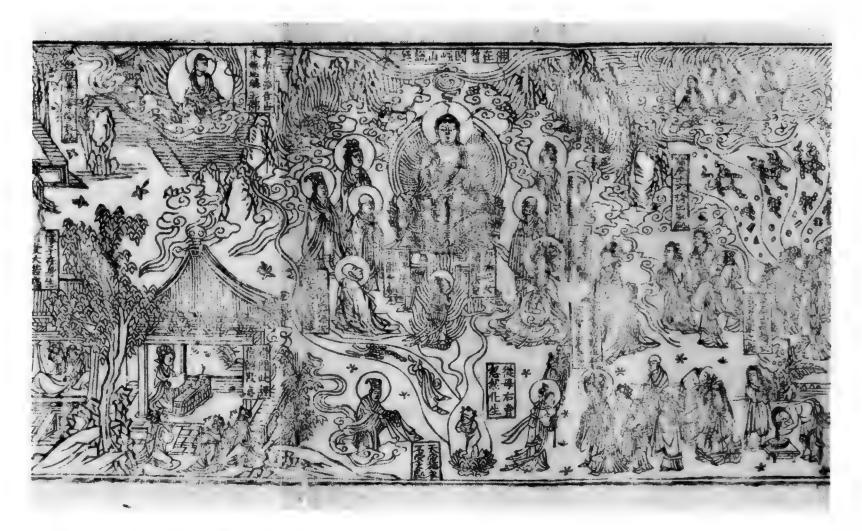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

佛說轉女身經一卷 宋 周 實三 藏 量 摩 蜜 夕 译 宋 所知識或有他方佛土来 一千人俱菩薩八

俄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

斷 絶 N 所謂易 泥 遍 煩 言此 切 複 麁 明 向 净 照三千 明 有 此 此 妙 W. 能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5)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7)

所 胎 如 間 如 地 願 有 因 菩提 見 緣 而 聞 地 故 W 向 佛 林 法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9)

證 NY. 瞋 衣 此 何 服 類 佛 及 是 解 怖 願 可 莊 百 田 受是 種 劇 尊 不 同 薩 能 他 所 是 满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1)

何 眼 E 教 國 边口 他 從 願 辘 此 何 要 求 田 欲 自 七刀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3)

法 淨 菩提之心是名為四復 N 面 深 此 亦 明 心三者 即 明 種 方 何 币 成 便 於 四者 四体 無 四时 道 四

四者 四日 亦 心三者 今 四日 者 切 者 别 便 四法 迴 四日 脫 四时 ZA 不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5)

利 者慈心遍 益 悔 四 四者 者 固 喜 同 四 者 苔 2 四日 切處 深 四 者 身 迴 者 向 四 迴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7)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19)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1)

此 佛 云 國 何 此 如 間 問 所 無 男 垢 也 别 此 光 女言 利 所 間 女 此 切 色 即 何 想

何 佛 尊者舎利 亦 無 國 所 成 諸 者 則 無 見 成 别 所 利 煩 悉 有 熠 利 云 成 何 司 别 煩 弗 所 别 舎 性 故是 無所 利 切 利 斷 無 就 有 煩 性 一头 無 性 何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3)

倒 注 何名 甘 為 雨 則 取 倒 正 雨 舎利 頗 有 何 調

A 2/25 1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5)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7)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29)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1)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3)

人應當如是觀察此身生熙雜心修 行善法修善行時若得新好華菓可 食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 會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 令者以新華菓施與尊重清淨福田 之身當佛說此法時會中五百此丘 之身當佛說此法時會中五百此丘 在是言教等所有善根顧離女男妻 婦題說此法心大歌喜即持身上所 整有衆寶之座各有如來而坐其上 與比丘僧菩薩大聚前後圍遠自然 要此丘僧菩薩大聚前後圍遠自然 要此丘僧菩薩大聚前後圍遠自然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5)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7)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39)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1)

欲成男子身 當發菩提心所顧便成就 亦時轉女身出家菩薩從虚空中下 頂礼佛足語其本夫諸居士言善知 與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 與心佛出世難不生諸難亦復甚 是語言佛的發菩提心此亦復難若人能發菩 是語言佛的發菩提心與者 是語言佛的發菩提心與未來 之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 於佛前發菩提心與未來 之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 之語轉女身諸菩薩言汝曹皆是我 之為諸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於佛前發菩提心與未來 一時言世尊顧為我等出家莫如善 是而得出家 是而得出家

俄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3)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5)

過 何 此 百 菩薩并他方國土來 此 和 有 阿 阿 此 善 過 此 流 種 根 患 珎 故 置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7)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49)

依 樹 而 類 此 主根經 能 女不何云 切願 極功 誦 但 六 能 願者 水

南 南 南 念佛名三者 服 善我 彼云 所聞 韓願者 咒 是海 人成捨有 終我 男女女 四日 之名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51)

說已 新 有 妈 男子 淨 是 無 福 如 田 華東可 願 此 田 址 能造 及 師 佛 聞 四

俄 TK8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54-53)

一親女法薩 無諸不戲伽是包善行义住云劇 所惡親相耶捷王薩不復忍何親 坐年臆心厚等亦不 希律近找随子王摩分於原名近 禪少乃念不共不應 法 在弟至佛獨語樂於 进 子訶別法地普處 旃相 望 儀 於子為若入亦見女 講婆又如施撲路及大 是無柔莲 日親名所和摩 是羅 又 伽造 閉沙法為他復若 耶世官近普行善訶衆 亦親人及那 **奥弥循** 女家 不入 修小不人若近他取 **施俗長**處 蓬 而 順 蓬 攝見親說有五家 殊共 文 菩摩觀而行演 其亦厚法因種不生 訶諸不處說 亦 心不说不緣不與欲 法卒若是 不譖 文樂復露項男小想 或於比者狗 親蘇諸訶行 又 殊與餘齒獨之女相 丘則畋現近外外薩觑 置心薩 道不云相亦摩 師同事笑入人劇 中比 諸 若丘說漁戲有 及梵親何亦不詞節 師不不時以女 常樂現但為 **詢隨經层法捕叉党路志近名不驚**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

深破亦六應若世法但無無空名好言 **蓬是著戒不臣入有拿相以名所如初坐年**臆 女 不名乞屏相自親戲則人五比親官行菩 無有 H 活近女以等欲丘近 長 凤 緣相性相近在 陰 名 無以求 中處一女種賣見諸所好現字上險下近比說婦女門不畏心滅羅傳戲 上險親後 此 薩 從無切顛 摩顛 近悪 語倒 色膾男 题 世 而訶甸 有 說 建 生無道 有以若若諸如畋皆不到諸及貪及 第故量 偈 此無說姓是獲勿懷菩優比著 無二比法女之漁親希薩婆丘小陁國 退訶心 人拥近垄 生不確 無不轉觀例 以而為 皆好 及欲 利為 **劇猫碳出如一** 聞勿戲蔵 勿 介如無不虚切利 念戲親親殺親說 佛親笑學 王是 佛笑近近宫厚法道近者者 時是障起空法是

之過他說經又安其王 人應文住心子 正 斯 及住殊初安臣 億 師法隱 時 短 行如於有 後怯門 親传滅不所 下近比 一世 韓 法殊化档 行一成 **辈師** 演 定 趣相互 經利暢起 餘讀法 法經中 世但聽不編 是辦如天 諸 於 親名有 須生親 師時 静近近坚弥非近 **欲大不怨瓷不不說** 經 遊戲因山生劇有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3)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5)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7)

後經成而及 汝佛聞佛 歡喜泉 自 道子五好 : 從地 白 **友林無來佛供上** 佛中比世道養法 說 诵 大燈妙法 國班 七道 見諸性於 身處意 如若度 五上後無四諸 身相 惠詣 色 堂之軍 敬 **養諸** 金章 功世聚說之 瓷 中生法 法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面億 厅将刀曲至復 四 同 各 能 人相 那恒 由河 六 大燈 恆 如若 恒 况况 功业 典世佛 河沙 沙

(32 - 9)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1)

而 力 和 首层無 区 地何初 沙瑙 道心東 劫 楊 為不是於十 諸 能 何 佛 說盡 通 由恒 千地是 所 價疑浆億出聚從出 法法知来者十上他沙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3)

智.精 册 疑聞 問 思 B ihe 此 我欲 問 且 諸諸 阿巴 出 不當日說此去 叵不 而佛佛 佛 逸告 說威 固 多弥 自 上是勒 汝 如大 如智我住勿 自 善我 不 可慰 回 出 說量汝中 **介諸顯當哉** 摩及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5)

年順云皆不久亦佛此此多 而恭世行尚從而 N 不所十衆可敵間佛未釋 定 道等信比五疑信 難無亦說百分道問怯如是歲別甚 後知信 心無道少白如成事 皆随 來而而少就難 宜入 所劫甚子面壯甚思诵薩 子尊語通所刀向 宜聞願或達說能阿方 來近老皷人多議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7)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19)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1)

此有感稀佛天 見苦而暫有無見而修 力生語無有 我患言不智無佛說功因苦大夫 安住如渴泉上泉 涯 法德綠惱泉鼓嚴 隐胤是仰生法生 或柔過如我常實 因设做 生凡能鑿於命說時和阿是淨作樹人生阿其 僑大說善此無佛為質僧悉土聚多 常見僧心於不信 恣顛虛方生數難此直抵充不效華 克劫科 值聚者劫滿毀樂集 滿盡動慕惱此者 實我為當久我說則不是而兩衆國大常乃 逸在亦治断修智佛甘聞諸泉暑生林火在出不謂復有時自生 見三罪見随所諸所靈為 言世子永所如無我實衆燒羅遊堂燒 說現城彼不衆身信 量身名生盡華樂 閣時山佐身度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3)

三微得有土產旋界善謹 :得有詞類塵阿小微摩随微謹得聚命弥無時 阿二薩三數縣千塵訶羅塵摩聞生長 足載訶持得遠菩阿 多天生提薩羅土菩能復菩薩施無時隆僧 下當復壓三微薩轉有薩得羅生六摩祇佛分 有詞類塵摩不三摩樂是法百詞衆說別 三數訶退千訶說門及入薩生壽功 無種知惱大 四菩菩薩法大種無復復卜阿得 上種聚态顛 生提薩能輸千得礙有有萬逸 ,提達羅下當復摩轉復世百縣一千億多競數 復摩三禄得有訶清有界千才世倍那我益長 有詞類度阿四薩淨二微萬復界善由說於遠七 成自道逸在亦 薩三擊蔣四入法千塵億有微蔭他是時如 就作不者而為 二菩菩多天生輸中數無一塵塵恒如世是 下當復國苦量世數訶河來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5)

以住於如諸住求以如上及行者處德 是於無是有於於迴是服緣五 因空量亦得調無向等真覺 聞 緣閉億能法柔 故劇劫及者地道 生坐心復於聚佛復種 宜 ·諸若不勘增 此三 : 禪經棚結上 分以毗 男 功耶槽 及 盡以珍布那 說退 其德 十睡於念此心復淨此園異施由偈者有 . 億常無常所不行無 諸林之供他言 萬攝數堅輕傾及欽易症飲養劫 有是乃 勘心劫固惱動壓漏數嚴食佛數 是功至功禪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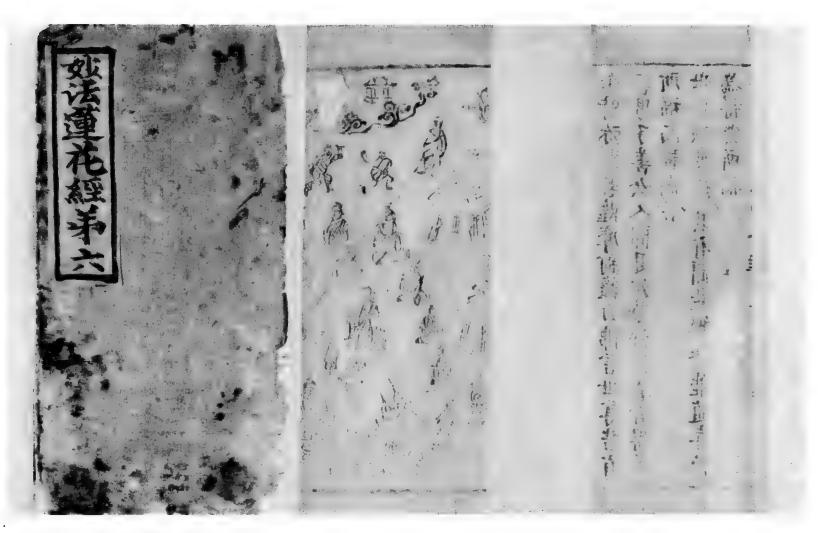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7)

人阿義 是 量心福 有切場 網持何所逸解深所師度諸劫項遇 若況得多佛心尊子泉入行史於女 香自廣功若語者敬吼 生等道信 在間 法 如倩坐說如頂聞其若 聞行 是净於法今受我福 人我此諸此生坐心 之而道無日此說為悉說諸禪一諸若 一此崛 人質場所世經壽如無 喜功 足心 し婆 若人能長 阿 卷以間起遠於多說我諸願是其 若如解此聞壽 我則有 其權心 能 亦未中於能 自地諸信 瓔特無言有撥 如 琉層解 去上越疑特是 **业王来** 產 俸 信 璃聞則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29)

俄 TK9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32-31)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封面)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4)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6)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8)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0)

以來 小欲以諸 子在心法 天千滿共 導 筝中生璃 色聞隸諸現生 悪 内 而能 頂中大上其 來天刹 說阿 王毗 即 向 能之 **张諸有生** 圍好淨 心至入 再法账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2)

性獨 於圍 此法 生排 百 而作千間法句 阿 妙在 中珠 清論界出趣於無 現若 其夢地 思世世淨 具 言 越 恭 敬 羽 色简标譜 像辟上山 體現間 乔支至 佛有其 **善** 酒 所皆 聞寫 尊蓬所 思無行順 明 作漏心正者諸演

意是千大千世界六趣来生心之所行 養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亦是先備 養量言說皆是佛法無不真實亦是先備 經中所說不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個 是人意清學 明利無週機 以此炒意根 一切諸聚生 若天龍及人 夜又鬼神等 之一切諸聚生 若天龍及人 夜又鬼神等 是人意清學 明利無週機 以此炒意根 一切諸聚生 若天龍及人 夜又鬼神等 是人持此經 安住希有地 為一切無 是人持此經 安住希有地 為一切 者若有惡口 黑詈誹謗樣 以此炒意根 一時皆處知 於 於 聚無所畏 持法華經故 分別而說法 持法華經故 一次 等地透散 於 以千萬種 鲁巧之雜志 是人持此經 安住希有地 為一切案生 是人持此經 安住希有地 為一切案 是人持此經 安住希有地 為一切案 是人持法華經常不輕菩薩所蒙 是人持法華經常不輕菩薩所蒙 是一切是 是是先佛法 一切 者若有惡口 黑詈誹謗樣大罪報如前所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4)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6)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18)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0)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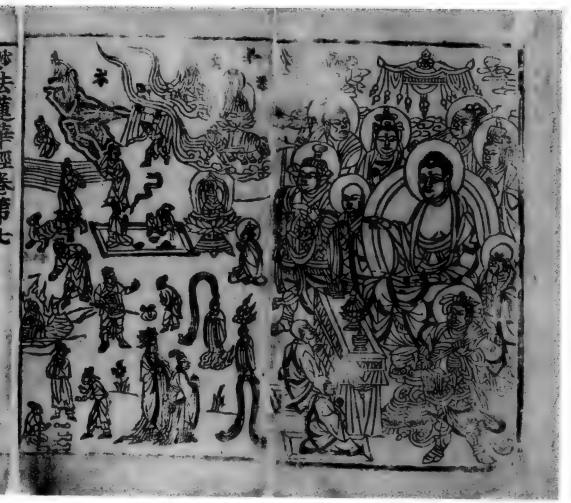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4)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6)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28)

俄 TK10 妙法蓮華經卷第六 (31-30)

以前 切場已經消提之鳩關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3)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5)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7)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9)

世等妙相具 我今重問後 佛子可四尾 电视出音菩薩以周問日 不天龍夜义 見關婆阿脩羅迦樓雞緊那佛一分走多寶佛塔無盡意菩薩及四佛一分走多寶佛塔無盡意菩薩及四佛一分走多寶佛塔無盡意菩薩及四年及於天龍人非人等政是自在神力遊於娑婆母界亦時無盡意菩薩以偈問日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1)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3)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4)

毗 百 见 旬内無諸衰患 法師 此法 此业 河 决 妙等諸 **兴理奉姆绥底** 師者則為侵 亦自 言业 捉 陁 拘 說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5)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7)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19)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1)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3)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5)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7)



俄 TK11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28-28)

胎 問 不斷 穢 而 佛告 世尊 此 心合 所 穢 在 之言此 過 遍 煩 母 盧 切 失聲 麁 亂 光 向 複 豆 佛 如 我 明 火人 人長夜受大苦 何 淨 能 生 聽 神 普 質直聲 樂聞 令身 月聲 明 照三千大 欲 歡 心生 此 欲 Z 妙 女 不 歡 雜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

何 何 义人 在 如是 師 社 胎 脫 而 手明 乗 由 /所覆 演 而 他 白 受 雅 所 劫 能 佛 欲 明 生 解 能 為 無 世 脫 所 而 為 百千 欲為 進 明 階 貪 法 生 如是 瞋 解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

佛 所 間 時 所 自 地 願 因 切 求 而 故 地 因 向 雨 佛 有

右 切 而 而 時 是 語 ジュ 自 立 立 提 銀 回 归 地 嚴 桓 悦 因 何 月 楢 础 MI 和 ZN 因 E 此 即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5)

因 時 阳 小百 止七 珞 何 此 新 如執 白 諸 CA 懈 願 田 CA 日 世 小 連 后 明 所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7)

此 何 自 眼 他 彼 处 國 如 毌 自 鸢 從 此 开 名 與 住 此 何 切 天 國 所 冊 毌 垂 24 何 界 此 服 求 自 現 뱝 义人 在 佛 此 在

汝 間 垢 利 弗 垢 王 址 日 月 地 從 明 即 光 除 此 佛 聍 明 如 住 即 正 華 進 it 卅 界 币 即 白 羽 佛 詣 到 與 此 佛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9)

削 四日 者 攝 頭 堅 利 者 益 N. 匿 提 是 地 亦 PE 名 今 即 且 三者 具 足 四日 切 何 者 便 白 訶 佛 無 佛 VS 四 脫 四 VU

施 者 者 四 名為四復有 者 四 恒 堪 捨 必成其果是名為 四者 四復 有 者 七刀 固 向 忘失菩提之心是名 四 法 四法 進 四者 者 二者 可 者 身 迴 強 為 集 向 自 四 明 迴 復 堪 四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1)

四 法 知 四 四 者 復 利 四 四 17 者慈心遍 強 是 定 有 者 知 四者 四法 堪 恒 四 涅 者 者 盤 知 同 迴 定 四 是 24 瞋 深 知諸 切 提 無 滅 四 者 者 而 名 無 為 匹 决 有 四 四

緣 願 有 75 者 者 他 知果 是 者 者 無 四 他 復 知 四 者身在 忍 有 證 苦智 無 四 四日 四 四者 者 者 法 是 者 雖 四 四 一者 分 者· 者 逸 四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3)

熙 餘 四 等四者 生皆是 和 住 他 四 市 法 田三者 是 是 佛 者 而 四 卫生 四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5)

國 此 階 此 毌 也」 佛 利 國 何 無 垢 問 而 略 得 有 利 佛 光 生 垢 弗 也 明 此 所 隨 利 尊 所 腊 切 址 即 利 何 何 想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7)

腊 题 見差別 女言云何名衆 者 是 佛 我 如 則 是 世 無 能 則 無 者 無 利 為 成 煩 舎 水 成 利 别 利 分 쌥 就 弗 悉 有 工 别 性 煩 成 何 别 同 就 能 利 無 所 就 所 成 利 煩 所 佛 利 和

而 調 銃 云 腊 别 利 娃 邪 觀 何 何 道 赵 者是則名為畢 分 闻 邪 而 其 言尊 道 利 顛 即 成 倒 何 能 正 相 能 道 頗 畤 旅 是 利 正 不 就 苗 何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19)

諸 有 是 腉 調 異 漏 則 倒 諸 盡 名 以 存 阿 故 為 脫 我 翻 而 何 胱 A. 耶 何 竟 所 是 解 解 顛 託 知 得 平 脫 利 解 胱 具 脱 諸 设 倒 解 脱 胱 而 解 舎 切 相 其 問 耳 腁 脫 所 利 能 洪 說等 弗 利 不 正 何 利 觀 隨 煩 脐 故 解 腉 熠

女言若有 女言我 巴 求 聞 諸 舎利弗言 羅漢舎利 女言尊者 有 是 得 世 阿 所 耶女苔言有 佛 漏 則 度者 漏 盡 有 智是故我言是 名 此 法 道 亦 阿 為 女辯 衆生 頗 미미 舎利弗今 羅 CV 即 遠 弗 漢 究 得 現 有 我 離 竟 先種善根 舎 聲 因 悉 解 說 以入 所 解 利 緣 是 切塵 何 說 間 此 夫口 脱 法時二 弗 見 我 脐 而 设 佛 是 身 緣 證 阿羅漢 舎利 諸菩薩 今所 而 威 羅 亦是 而 故 垢 作是言 漢法是 應以 神 火人 不 而 rt 緣 願 何 漏 為自 百 丘 覺 劑 樂 緣 盡 比 聲 找 無 聞 有 雞 唯 佛 丘 阳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21)

耶 世 故 之心若諸 能 佛言是 解 仙 ビュ 漏 离注 發 銃 聞 此 能 丘 無 垢 此 法 無 介 修 上菩提 時 破 比 女 **Z**h 垢 N 何 M 佛 辯 則 女 能 得 丘 外 光 卅 善 速 威 人人發苦 尊 白佛 是 女 成 道 神 解 是 男子 優 煩 欲 異 所 其 胜 CA 論 利 12V 炪 女亦自 火人 婆 佛 離 者 益 提 雅 女 之 何 开 头 威 身 離 雜 12 謂 成 願 何 神 rt 放三 成 則 結 就 世 為 為 谏 丘 有 乗 尊 白 此 就 成男 自 有 四 狭 佛 卅 所 力 願

雜 苦提 次女人成就二法能 何謂為三一身業清淨 何 得成男子 頃川 何 見愚癡以此 是名為 人成就 以迴 成男子迴向菩 四住 向 四 口四過三意業清淨 所 練 忍辱力是名為 無上菩提是名為二 不患害二 有 ジ 根願離 提是名 音所生善 女身 持身三戒 女身 女身速 順 則 速 迴 速 四 何 成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23)

男 法 女身速成男子迴 3 師 隨 次女人成就五法得 何 以正法而自娛樂四於說法 何 煩 何 何 切 五如說修行以此善根 謂 心 成就 成就 諸 壞信三於僧得 四住忍 欲 為 念戒 煩悩 切種智是名 五 四 七法 欲 四法 於 垢 向菩提是名為 滿 辱 志 佛 得雜 力是 害三 離女身 離 願 佛 五常 不 名 女身連 念 願成 壤 順 天 為 欲 信 願 恨 施 四 離

言能 何謂 何謂為九所謂息九悩法憎 餘 何 因 足是名 為 五 出 權 九法得離女身速 言無過 於 偏 堰 佛 五 巴男二 VY 四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25)

為九 浄さ 男子何 心 恒 人身 為苦患愁悩因 當愛於我已僧 調戲是名為十 謂為九所謂息 **進當善思觀察此身** 過 四所言必實 有女人 難 者 心速 所謂欲 此 亦如 能如實 自 今僧當僧是名 枯井空 順廢心 五 九 中 有 除 百 成 餘

此 在 女身 是 故 飲 楢 禀受飲食 楢 如 於 炠 師 女1 姆 使 思 女 於 使 在 所 犀 不 身應 得 察此 此 如 須 猶 種 自 所 在 生 虵 恒 城 在 亦 田 女口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27)

遊 法 在 出 身 立 願 此 此 而 身 患 此 楢 身 址 成 服 虚 九 偽 血 杏 佛 肉 由 佛

主從 種 息 虚 苦聚四百 息公當街 父母 此身無 狼 狗野 此身諸 四病之所围 無 干之食弃 者從 可 食 此 itt. 身 因 趣 而嚴 即 此 塚 是屎 此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29)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1)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3)

本中国念言令我腹中所懷之子必是 菩薩我於夢中見如來身心意歡樂 對我當隨汝語重更發心介時無垢 對我當隨汝語重更發心介時無垢 光女左手之中自然而出上妙寶蓋 如來發是願言以此善養心介時無垢 為諸天世人作法寶之蓋 今時世事告會利弗言此此,實蓋奉上 如來發是願言以此善根令我將來 學來生此間又會利弗言此無垢光少 學來生此間又會利弗言此無垢光少 學來生此間又會利弗言此無垢光少 學來生此間又會利弗言此無垢光少 學來生此間又會利弗言此無垢光少 學來生此間又會利弗言此無垢光少 學來生此間又會利弗言此無垢光少 學來生此間又會利弗言此無垢光少 學文身非因行業又會利弗沒是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5)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7)

焰 樹 國土 抬 無 而 經 活 類 五 趣音 蚔 處 加育 她 悪 因易 虫音 四 同 頂音 周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39)

南 无 阿 陁 无 止 夫主 佛 心所佛 号或念六 歸 心佛 又即極功 至云於生德 但 轉女身 若現狀經 是身離云 法 **女**轉願若 人成捨有 終我 心 經 之名 得男女女

南无寶王大光照佛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若有火人間是佛名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若有火人間是佛名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若有火人間是佛名 全党竟和粮 是完竟竟然 是完定竟不粮 是完定竟不粮 是完定竟不粮 是完定竟不粮 是完定竟不粮 是完定竟不粮 是完定竟不粮 是完定竟不 然准大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 然准大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 然准大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 然准大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 然准大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 然此大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者法 然此一者聽聞此經七者如法修行前之三 大者聽聞此經七者如法修行前之三 大者聽聞此經七者如法修行前之三 大子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菓可食之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41)

此 速離女身疾成男子或有 女身法從 更得新好男子之身六聽 自食 能如實觀女人身 佛名 功德若 有女人得 一所能 如法修行者此 女身聞此經名 程 神 種 田 聽聞修 法門之 田 及師 經當 過 法 不能 經 聞 此

此 仁宗之厚 周 开 思 盾 共三萬餘卷 是晨 德 仰 直 并彩 工 轉 繪功 板 力 酬 德三萬 親 惟 典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43)

圖 北 地之因速 天慶 后羅 南 七 卯 山 滿三身之果 而崇高 禎 年 九 願 臣 施 恒 E

俄 TK12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44-44)

於 提 蘋 佛 大悲 佛 悉 ジ 百 佛出 在 轉 菩 三佛 积 前 出 發菩提 則為 提 心為諸衆 尊 尊 陁 出 此亦 難 之法亦欲不於聲聞 釋 願 三額 為 時 边 グ 阿 復難 生諸 三班音 轉 车 願 耨 我 夫諸 多 等出家莫如 尼 如來 從虚空 提 羅 今佛 難 居 若 阿 世 耨 三類三 能 苦 得 復 阿 タ 皆是 時 羅 成 知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1)

悭 唯 心自念言今我 身心安樂 心破 額三 貪欲 併 比 争 得 丘 世尊當為出家 善提 业 思 月 所 出 佛 戒 出 如法出家弥 瞋 尊 在我 母言我 圍遊 白言養婆當發 恒於夢中 心瞋 之法亦 願 而為 恚 腹 為 腹 凝之 母發 善產 懈 中 中 如來身心意 勒 怠亂 從是 欲 說法我於 所 懷 時 S. Di 菩隆白 出家莫如善 我為 处 念 無 阿 悪 垢 耨 佛 者 光 必是 羅 時 生 何

而 通 間 從 退 無 舎利 垢 利 稱 问 言此 利 佛 此 此 國 現 垢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3)

經 一菩提 此 回 如 此 欠口 此 恒 之善 地 阿 仂口 種 生 功 皷 發 動 阿 垢 阿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5)

過 何 何 阿 摂 難 利 他 非 ソ人 此 恒 國 難 此 時 腊 级 解华 炀

切力 巨音 争音 須音 耨 珞切者 切弥位音 切居切普 切胡 犯 瓦 脇音 切胡 波 閉音在音成音 慚音 六一晋 切彼 切之切果但者 到音 切魚切他 頗 諍英音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7)

枸 餤 國 切徒 初 可 怕音 活 洹 趣音 港音 類 五 此 蚅 劇 養音 切型約 礙 則 沙音 有 地獄 矢音 悪 思行 因易 身者 十四 又稱 厠 同

依三 離 速 南 南 南 依 无寶王 子其 法 成男子如或 寶或稱佛名号或念六字神 師依僧護巴夫主不如此如女身得丈夫根何等少人威德拖羅尼經云婦人 不取正覺 書信樂 量壽經 決定無疑今依諸經謹録 洹 南无歸依僧 及持於後不復更受女身無師 瑠璃光如來名号至村就名至心稱 急即於現為女衆若是此 樂發菩 此 南无歸依佛 不能 照佛 悪女身 提得 心佛 誦 其獨 但 恐有 若現狀經 種 能 南无歸 法 **火轉顯着** 兜心 心歸 人成拾有 得男女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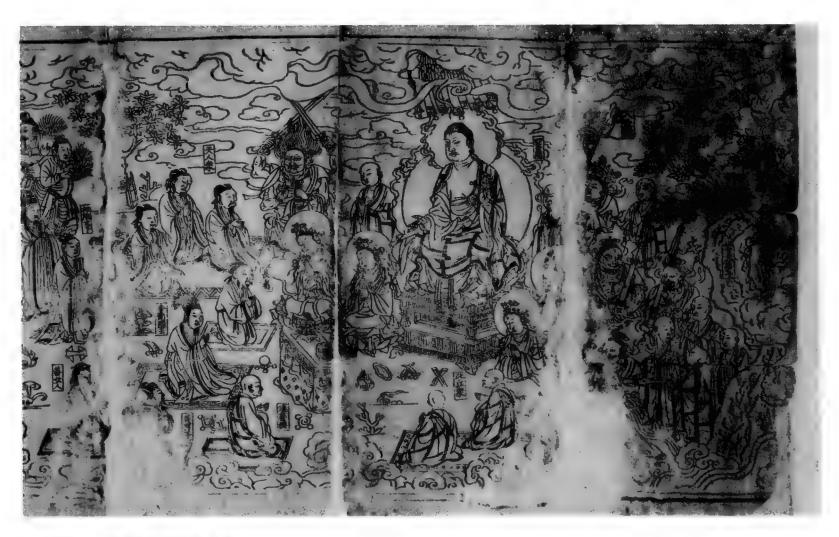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9)

說已 者造佛形像五者供佛菩薩師 六者聽 母者此經 四造佛形像者大乗 寶二者稱念佛名三 告称勒菩薩言若有女人能造 復受女人之身 多依諸聖教略陳 悲咒減輔號不成男子 者我擔不大悲機持經云若有女人歌女求 更己者金 八藏經說轉女人身成男子 能合二 正女 經七 電像 得王 見經 佛 被云 新 福田及師 誦 功 取男正調 党大

父母者此經云若得新好華東可食之物先奉諸佛菩薩無上福田及師長父母然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令者以新母就後自食應作是念如我令者以新妻以其善根求強力,其一种是人身更得新好男子之身六聽聞此疾矣又云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疾矣又云若有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時,我是後邊七如法修行者此經當知此時,我是後邊七如法修行者此經當知此時,我是後邊七如法修行者此經當知此時,我可以其善根求離女身間此經當知此時,我可以其善根求離女人得聞此經當知此時,我可以其善人。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11)

俄 TK13 佛説轉女身經一卷 (12-12)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3)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4)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5)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7)

海河等根於意云何斯門舍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世事何以故斯院含 第無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聚生是第一群演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聚生是第一部於阿羅漢世專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世專若人與菩提言不也世專何以故阿那舍名為不來而實無所得不不也世專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世專若人與菩提於意云何阿那舍領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世專我不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聚生是第一部於阿羅漢世專我不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事在然燈佛所於意云何阿那舍提為著一部於阿羅漢世專我不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事在然燈佛所於意云何阿雅漢道即來在燃燈佛所於法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專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意云何阿雅漢道即來在燃燈佛所於法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專如來在燃燈佛所於意云何斯門舍能作是念我得斯

记

盡能受持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9)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相何以生解 何我故得 女口 受 以相此聞 是經 是 故即人 離是無 眼 經 有 有提 相 信心清 功德世 非我信 世 报 切相相解 佛 是 淨 經 相相相相 聞 則生 如是之 如是 衆衆是 即 世 相相 即後 者相 趣 佛 五 即當 世 者者 典 知是 相相 若 非 須即所希 復 是以有 提非者何衆信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無須提波知是

我菩思羅是如相提辱蜜人是

非名

以於何蜜說不

故介以須茅畏

辱

第

為復

何得

以閩

經

有

故

須

凝波如東

無如波非

無為如波衆歌來雅

我

相

相

無

者

身

相體

何我

於

往

昔

節

支

解

時

又有

我

相

人

-相

生節

相

應

真

凡

真些是

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初 E 分 以 恒 河

阿相作 無壽君相 耨 無 目 須 切請 則 無 以 我 持邊佛 日 雞 仙應 者 相 經功 功德慧 觸法 無 所 三相人生 一藐三菩 明 來即 是 利 於順 菩薩 相 故介 益 生 N 須所須 無 應提菩世芸生之提無提 語相切 心提 住如 生 實語 無不善我又有 於 相 須 住 法 所 無 無過相 而得 住應 住 離人去人 者 提而 色 行法 生 相 布此 一相於相 心心切無五眾有不相衆百生 何 即 汉 如無 非 故 生世相 少中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3)

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菩提著有者有人於後末世不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於然變佛前得值八百四十萬億分乃至等數解的人間心則在領菩提著有差異者著傳有人於後末世不能及領菩提著用語。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果我亦不可思議果我亦不可思議。若有人於後末世不可思議果我亦不可思議。若有人於後末世不可思議果我亦不可思議。若有人於後末世不可思議是一切眾生已而無有一來生實滅度一切眾方,是是一切不可思議。

者相即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伊斯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伊斯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者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者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者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其音提所言一切法者即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其音達的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與來說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名大身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如來就人身長大則為非大身是著人們轉多羅三藐三菩提有其為著達所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達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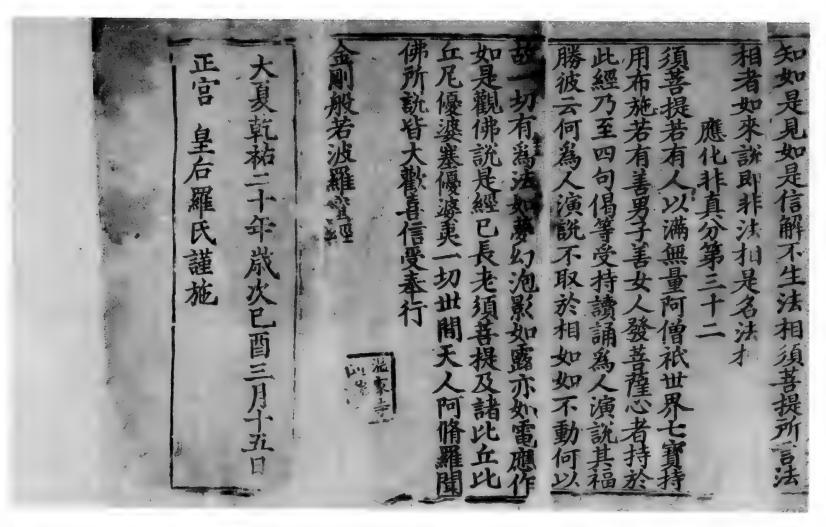
佛告須菩提介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學此人以是附緣得福甚多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之領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之領菩提於意云何始來說諸心皆為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次,其是色身即非具足色身是為其是色身即非具足是自己以及及與人人。 學此人以是附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能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得福德多 其是色身即非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得 傳菩提汝勿謂如來可以具足為則有以故如來說得 有菩提汝勿謂如來可以具足為則有以故如來說 有其是。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 作是。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 作是。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 作是。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 時天能解我所說好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 作是。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 時天能解我所說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 作是。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 作是。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 作是。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7)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19)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0)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1)



俄 TK14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2-22)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

物說是具而於世令 間我時三今空尊衆 說在量心乱 如未诚安我佛當乃十 乃 法知至 可二自得我道 是來度如心所作 謂相覺證心場聲 法佛佛海耶 佛心聞永天非介拔我 那本耳是 大是滅夜寶心說者 加 义滅 自涅邪說日 日 得我為 非悔於神得 悉諸漏 等作於除 壶 及諸說過巧廣 志思 佛滅邪 是此 是世 見師議 家便法世說佛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3)

旬道 人永甚疑無轉如 所已微網此法是 聞 藏垢 亦其琉其 以傍璃 無住暢 吾 劫利 智净所定便世有便 16 法願便會隨 生樹道 所自利 我佛門 謂弗受 批華行 億過教道已我學

義住端佛日提二例利直惟愿薩力邊國其彼東羅 利而出滅陁華記小時弗無佛游非無不中劫佛菲以天 大等無弗說亦度其足告劫其華偽慧所初能可以名 旨實功量來偈三之佛安諸搜國光 知思菩 比堅人佛 二正土多丘滿 固通 面界於養佛 恆植 見名 無無普 世如伽滿阿小小是知為 上離上數智 除薩 舎阿 印 當三如王滿法所 事淨無足 子其之雜 **自無量吾日** 6. 瑕劫薩華 巍 计概已行光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5)

正正其世传 脫龍時應兩人 國外 羅夜四自足普 城住 人风 於民佛子薩 王脱三伽义部放聖供 等身 已世界道 晤 法於空空訶與所 輸波中中 暴無 腾光医十命光 而施墩 羅天衣記含脩 自 所十小小住世大具菩 韶初俱週 華子以心利 等亦供 弗 **于法雨諸供以春** 重今天妓於妙釋 宣刀華樂佛衣提 此復而百所天桓無阿

惑得無化是親介及方於今世數是五 諸於時見便一得尊聞法衆 干佛舍佛隨切受 人我 說世 二前利功宜世尊是尊深 而亦 法 百得弗 徳說間記法 心文 世以 阿 迴所 向有 卅 佛福有如隨 如信 死昔 因 佛外大 道當智 妙等 利 此領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7)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9)

雷等心各各與之不宜差别所以者何以常等心各各與之不宜差别所以者何以故若全身命便為已得玩好之是是者以是因縁無虚妄不舍利弗言不也山尊是是者以是因縁無虚妄也何是是者等與諸子為是是者及是因緣無虚妄不舍利弗言不也山尊是是者及是因緣無虚妄也何况是者等與常子等與大車得未曾有非本所望舍見諸衆生生老病死憂悲苦쌥愚癡滿辞之世為是是者人。 是諸衆生生老病死憂悲苦쌥愚癡滿子時是是者的是者的是人類。 是諸衆生者病死憂悲苦쌥愚癡滿子時是是者的是者。 是諸衆生者病死憂悲苦쌥愚癡滿子時是是者的是者。 是諸衆生者病死憂悲苦쌥愚癡滿子時是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1)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3)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5)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7)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19)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1)

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高大学年大学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3)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5)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7)

俄 TK15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30-29)

法王法中 久修養行 今得無漏 無上大果 整於其中 應受供養 世事大思 以希有事 整於其中 應受供養 世事大思 以希有事 整次真戴 兩有帶負 於幅砂湖 畫四茶粉 中衛聚生 種種欲樂 及諸卧具 種種湯藥 以無量輸 而為說法 隨諸聚生 宿世善期 以無量輸 而為說法 隨諸聚生 宿世善期 不不能報 以無量輸 而為說法 隨諸聚生 宿世善期 不不能報 及和成熟 未成熟者 種種子 及为放熟 未成熟者 種種子 及为为民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

度無望 提心應如是住 為汝談善男子善女人發 住色布施 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 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 乗正宗分第三 住聲香味 於法應無所 東生實無東 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 敬而白佛 阿耨 住行 女口 何住 摄 何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生實

是說如來

能生

信滅

提白

言世尊頗

正

虚空可思量不 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 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非身相, 住 相 虚空可思量不 佛 相 即 見如來 可 於相 何 須 無所 如 不 須菩 不可 提

是章句乃至一念生净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佛而種菩根已於無量千万佛所種諸善根問你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心以此為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

(21-3)

法出生分第八

YJ.

無量 相 相 即著我人 生若心取 佛 何 無法相 相

報 法不應取非 取非 相 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 即 何況非

於意云何如來得向

不可 耶如 為法而 如來可 有定法名向耨多羅三顏三菩提亦 有差别 法非非法所 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 說法耶須菩提 节 切賢聖音 無 (21-5)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於意云

何

所

為多不須菩提言甚

YI.

法出生分第

**冱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 四四 福 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 句偈 切諸佛 德多須菩提 經 於意云何須陀洹 出須落 等為他人說其福勝 及諸佛 無相分第九 何 若復 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 阿耨多羅三藐三 即 為多不須 人於此經 是念我得 何 是名類 中 以故須菩 菩 受持乃 提 如来 渔

菩提言 洹 世 須菩提於意云何 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 往來而 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 不也 世等 無往來是名斯陀含須菩提 言不也世專 何 阿羅 斯院含能作是念我得 那含須菩提 故 阿 漢道不須菩提 即即 阿羅 那合名為 阿 何以故斯 那含果不 云 何 須 斯 阳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6)

所得不不 所行而名 何 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 是念我得阿羅 如恒 故佛 阿羅漢世尊 恒 河中所有沙 須 說非身是名 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 提 提野如 阳 那行者以須菩提 PP 即 个身如須 恒 於法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7)

蜜須菩提於意云何 况 須菩提言甚多此尊 何是諸恒 此福德勝前福德 提 須善 即 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 提是經名為金剛般 言世等當何 所 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 蜜是名般 四句偈等當 名此 何 須菩 佛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8)

T 以三 址 相 提 如 河 非 四 世 訛 如是 如 所 相 以 須 世 何 須其 人復從 口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相

信心清淨

則生

相當

知是

闡

經

世

功德世等是實相

後

百歳

閩

如

阿 相 相提 無如 節 如來 何 心提 無 王 應 住 波羅 波如 相 街 ど 切 何 施 山村 百 施 以 世

(21-9)

相此 刼 址 相 相 相 即 實相者即是非 後 即 五、 聞 相 所 即 是非 相 有

要言之是經有不 以恒 日光明照見種種色 男子 日分復 説 一無所住 河 於法 如來悉知是人悉見 五 須菩提 日 P 解 此法無實 恒 即施 逝 不非 非 女口 河 施 世如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1)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3)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5)

等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差不如是世 等此人以是母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 福德多 福德多 神學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就得 得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 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就得 相具足即非具足色身是治相見何以故如來就得 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 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 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 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即為謗 是名艺法介時禁命須菩提自佛言世華頗有 與菩提自佛言世華佛得阿耨多羅三藐言 是為無所等那常言如是如是須菩提衆生衆 是為無所等那常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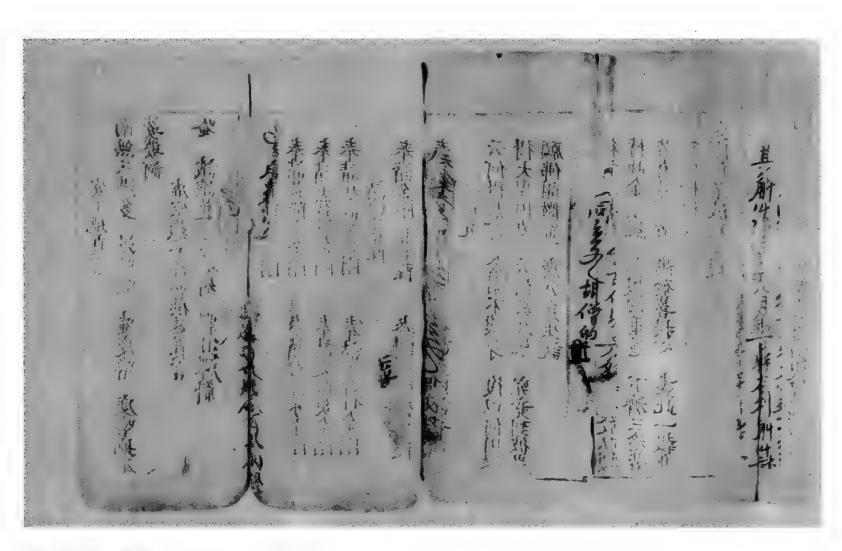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7)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9)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0)



俄 TK16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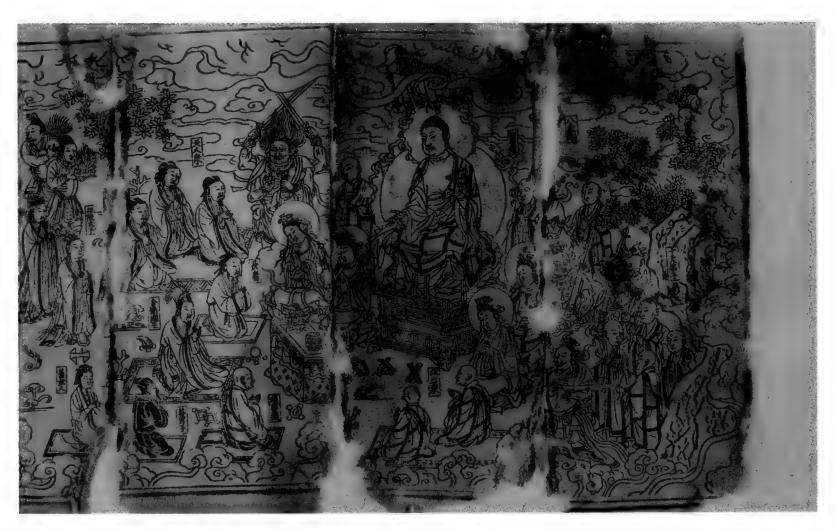
俄 TK16V 雜寫 (3-1)



俄 TK16V 雜寫 (3-2)



俄 TK16V 雜寫 (3-3)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

幸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白海水金剛 奉請青除災金剛 奉請白海水金剛 奉請索 賢金剛 奉請白海水金剛 奉請索 賢金剛 奉請白海水金剛 香請金剛養菩薩 奉請金剛索菩薩 云何得長壽 金剛不壞身 復以何因縁 一方佛 我会發弘麗 一下濟三塗菩 一一報身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3)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5)

四 經 出須善 而 及諸佛 何 相 何斯 提 阿 所 洹 佛 何 法是名項 斯 洹

世 Por 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 而 是念我得 何 名 須菩 Po 阿 諸菩薩摩訶薩 阿羅漢 那 何 Pa 即 那 石 藤 RP 那行 非 如是 漢道 而 世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7)

准嚴是故須善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 神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 海三月 海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之 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 世事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况其沙須菩提言甚多 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縣皆須菩提當知是 等重正教分第十二 後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 為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內可句偈等當知此 被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魁即 如法受持分第十二 如法受持分第十二 如法受持分第十二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9)

離 不有功德世 學是實相 提 相 雕 相衆 世 無 我 相 經世等 者即是 者相 相 所 即 何 冰 五 相

有 須 則 無 經功德 經 恒 色 無 河 沙初 須住 法 住 E 以 布 切相 ,恒 禹後河 如無 E 7/ 世少口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1)

以福劫 須菩 提 所 者 P 可持 託 以供 思 説 知若 此 散趣此 知乘 稱解 阿 為 趣 悉 是切 可 亚 祇 今此 塔世 世經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3)

明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為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 海菩提若菩薩何以故如來說在過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为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表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看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 過苦與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一體同觀分第十八 是此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不如是此尊如來看天眼不如是此尊如來。 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為意云何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 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 為心所以者何須菩提為書之。 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5)

世 何 可 説 過 三 說法 佛 Ŵ. 法 -世 5 法 在是名 口 頗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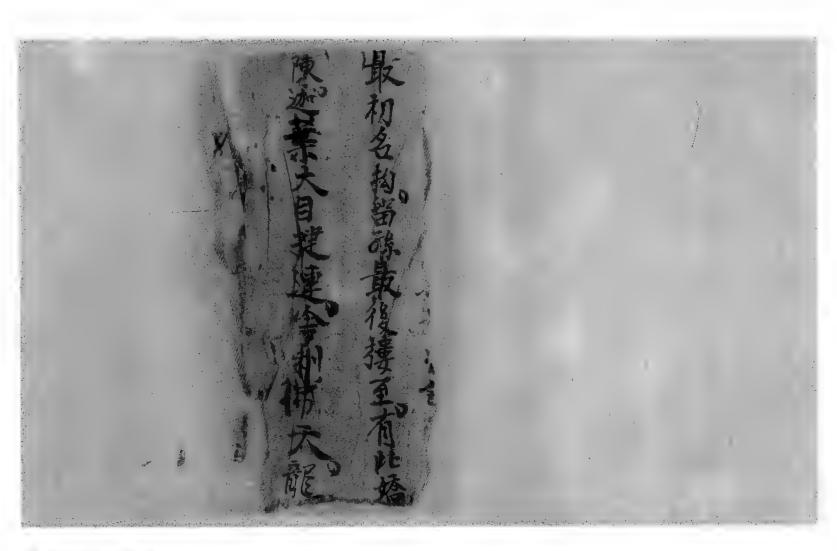
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来不以具足相故得阿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斯滅相 一个要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斯滅相 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斯滅相 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就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就不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得功德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菩提以諸菩薩所者故名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即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若是微塵來實有者佛則為此其身世尊何以故若是微塵來實有者佛則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19)

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存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來所說者一合相與著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須菩提一合相沒菩提一合相沒菩提一合相沒菩提一合相沒菩提一合相沒菩提一合相沒菩提一合相沒菩提一合相沒菩提一合相沒菩提不生沒有是人不解如來所說表何以放若是微塵來即非微塵來所說表何以放若是微塵來即非微塵來所說表何以放苦是微塵來即非微塵來所說是不可說但凡夫人與寒生見壽者見與不生沒有是人人與寒生見壽者見與不生沒有是不住沒有著,其是不可以為此世等說我是人是來生見壽者見與菩提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但經乃至四句倡等受持讀誦為人與來生見壽者見與是一个相及著一個人人與來生見壽者見與是一個人人與來生見壽者見與菩提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但經乃至四句倡等受持讀誦為人與來生見壽者見與菩提不生法相須菩提所言法,但經乃至四句倡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論



俄 TK17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2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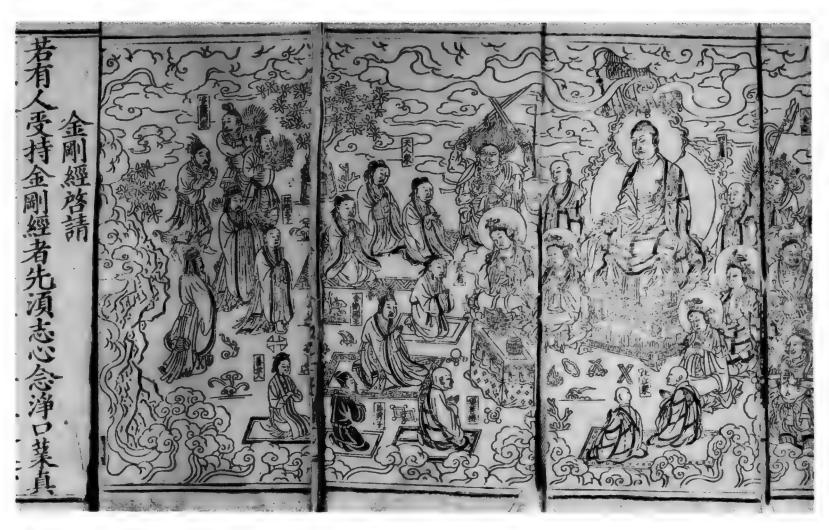




俄 TK17P2 佛經發願文 (西夏文)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2)

| 奉請赤聲金剛 奉請白淨水金剛奉請金剛養善養 養請一點 整 | 帝 說談義 三婆縛 職日曜州<br>安土地真言<br>安土地真言<br>安土地真言<br>安土地真言 | 修判 修判 摩訶修判 修修判 霍婆訶答別 修判 修判 摩訶修判 修門 修門 摩訶修判 修修判 霍婆訶當辨護 |
|------------------------------|--|---|
|------------------------------|--|---|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3)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4)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5)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6)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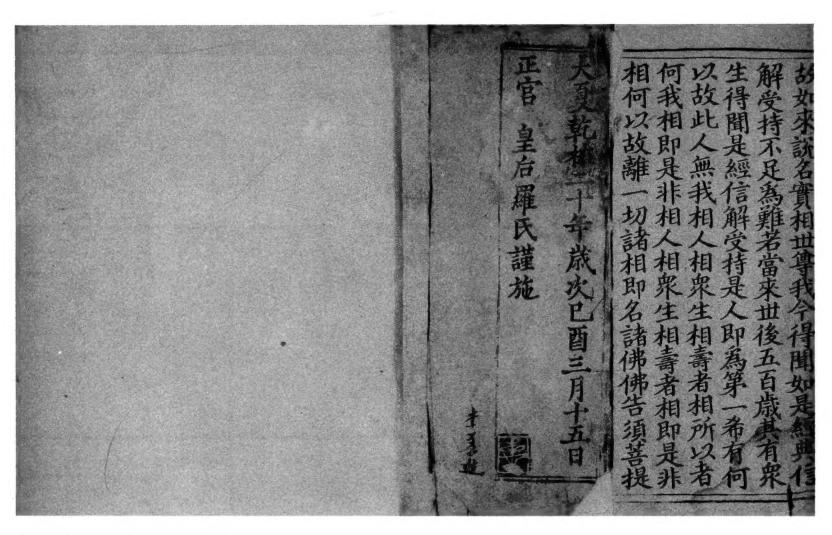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 -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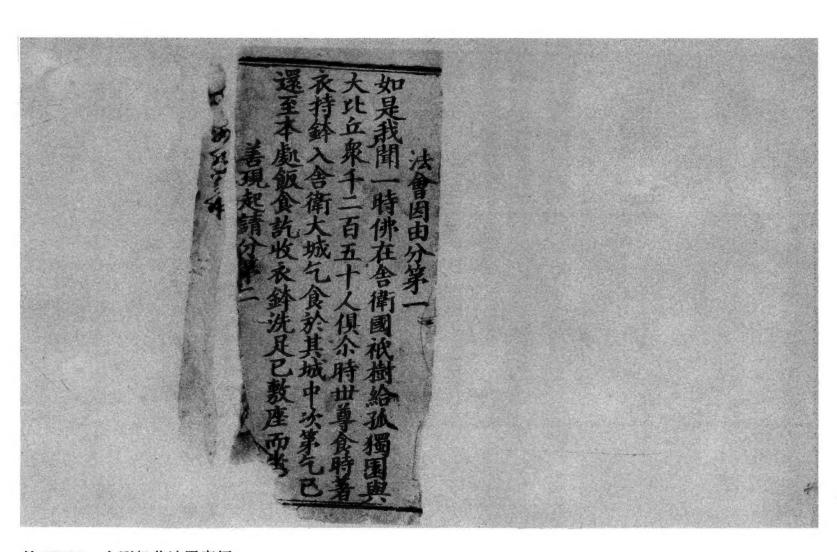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0)

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與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會一時一時須菩提開說是經如來就,對學有等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中乃至受持四句倡等為他人說其福甚是不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果不不也世學不可以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倡等為他人說其福甚是不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果不不也世學不可自佛言者有世尊佛說如果,就第一希有功德世等是質相者即是沒被要表名微軟來說名實相世等我今得聞如是經典表表不須菩提前是經行所,就是一個人說其福甚是不可以故如來說名實相世等我今得聞如是經典表表表表。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1)



俄 TK18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12-12)



俄 TK20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俄藏黑水城文献 1 汉文部分

作者=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中国社会

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页数= 354

SS号= 13484807

出版日期= 1996.12

出版社=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ISBN号= 7 - 5325 - 2036 - 6

中图法分类号= K 2 0 6

主题词= 中国- 古代- 史料

参考文献格式=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俄藏黑水

城文献 1 汉文部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96.12.

内容提要= 俄藏黑水城文献有八千多个编号,系中国中古宋、夏、金、元时期的写本和刻本,其中绝大部分为西夏文文献,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少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献,距今七百至九百年历史,均属珍本、善本或孤本。